

目 录

本卷前言 5-1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军事问题

(1921年2月至1922年4月)

专题说明 5-1

No01404 列宁就肃清盗匪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6日) 5-2

No01408 关于逮捕米龙诺夫的报告
(1921年2月17日) 5-3

No01410 斯克良斯基就军事问题致斯米尔诺夫
(1921年2月21日) 5-5

No01411 弗拉基米罗夫就粮食运输问题致瞿鲁巴
(1921年3月2日) 5-7

No01415 列宁就一红军战士的请求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3月3日) 5-9

No01416 托洛茨基就军事问题致加米涅夫
(1921年3月10日) 5-10

No01418 托洛茨基就喀琅施塔得局势致列宁
(1921年3月15日) 5-12

- №01419** 斯米尔诺夫就粮食问题给列宁的请示信
(1921年3月18日) 5-13
- №01420** 切卡斯基等就马斯拉科夫匪帮问题致列宁等
(1921年3月18日) 5-15
- №01421** 托洛茨基就军粮问题致克拉斯诺晓科夫
(1921年3月19日) 5-17
- №01422** 萨拉托夫省领导人就匪徒活动情况给列宁和
托洛茨基的报告(1921年3月19日) 5-18
- №01423** 托洛茨基给反盗匪活动委员会主席的便条
(1921年3月19日) 5-20
- №01424** 托洛茨基给反盗匪活动委员会主席的信
(1921年3月19日) 5-21
- №01425** 列宁就舰队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3月21日) 5-23
- №01426** 沙波什尼科夫和克拉耶夫斯基关于萨拉托夫
局势的通话(1921年3月23日) 5-24
- №01427** 加米涅夫关于萨拉托夫局势的报告
(1921年3月23日) 5-31
- №01428** 加米涅夫等就萨拉托夫局势给斯克良斯基的报告
(1921年3月23日) 5-33
- №01429** 普罗塔索夫等就平定叛乱致列宁电
(1921年3月25日) 5-35
- №01430** 列宁就涅米茨事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3月25日) 5-37
- №01431** 斯米尔诺夫就允许白匪返回问题给列宁的请示信
(1921年3月25日) 5-38

- №01436**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的
决定（1921年4月6日） 5-39
- №01437** 关于同德国军事工业部门合作的信件
（1921年4月7日） 5-40
- №01440** 列宁就安排专车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4月9日） 5-42
- №01443** 列宁就粮食问题致伏罗希洛夫
（1921年5月5日） 5-43
- №01446** 关于指派图哈切夫斯基平定坦波夫叛乱的文件
（不晚于1921年5月31日） 5-44
- №01449** 斯克良斯基和列宁就向蒙古推进问题交换的便条
（1921年6月14~15日） 5-45
- №01452** 列宁就安东诺夫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约于1921年6~7月） 5-46
- №01456** 关于坦波夫省盗匪情况给列宁的报告
（1921年7月16日） 5-47
- №01457** 关于坦波夫省的盗匪情况给俄共中央的报告
（1921年7月20日） 5-50
- №01459** 列宁就撤销海军总部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7月30日） 5-92
- №01460** 托洛茨基就撤销海军总部问题致列宁和
列宁的回复（1921年8月1日） 5-93
- №01461** 托洛茨基就撤销海军总部问题致列宁
（1921年8月2日） 5-94
- №01468** 斯克良斯基就红军退役问题致列宁
（约于1921年9月） 5-96

- №01469** 托洛茨基就购置武器问题致政治局
(1921年10月4日) 5-97
- №01470** 托洛茨基就购置武器问题致克尔任采夫
(1921年10月4日) 5-98
- №01471** 托洛茨基就购置武器问题致克拉辛
(1921年10月4日) 5-100
- №01477** 托洛茨基就哨兵事件致列宁
(1921年11月14日) 5-101
- №01478** 托洛茨基关于斯拉谢夫问题的建议
(1921年11月16日) 5-103
- №01479** 彼·波格丹诺夫就军事工业问题给托洛茨基
和列宁的报告(1921年11月20日) 5-106
- №01480** 托洛茨基就军事学说争论致列宁和列宁的回复
(1921年11月23日) 5-109
- №01481** 托洛茨基就消灭卡累利阿匪帮问题
致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1921年11月28日) 5-111
- №01482** 斯克良斯基就军费问题致列宁和列宁的批示
(约于1921年11月) 5-112
- №01485** 契切林就卡累利阿问题给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1921年12月2日) 5-113
- №01486** 托洛茨基就卡累利阿问题致政治局
(1921年12月3日) 5-116
- №01489** 托洛茨基就红军的劳动任务致列宁
(1921年12月16日) 5-119
- №01490** 列宁就军队的经济工作致托洛茨基
(1921年12月17日) 5-120

№01492	托洛茨基就卡累利阿问题致列宁 (1921年12月20日)	5-121
№01493	契切林就卡累利阿问题致列宁 (1921年12月20日)	5-122
№01515	列宁就军校学员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4月4日)	5-123
№01516	托洛茨基就军校学员问题复列宁 (1922年4月5日)	5-124
№03286	温什利赫特就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的 待遇问题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4月21日)	5-126
№03193	关于1923~1924业务年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反间谍部活动的简要资料 (1924年11月30日)	5-129

进军格鲁吉亚

(1921年2月至3月)

专题说明	5-143	
№01405	列宁就通讯联络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12日)	5-144
№01406	俄共(布)中央关于支援格鲁吉亚起义的决定 (1921年2月14日)	5-145
№01407	谢·加米涅夫等就格鲁吉亚战事给 斯克良斯基的报告(1921年2月17日)	5-147

- №01409** 托洛茨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21日) 5-149
- №01417** 列宁关于在格鲁吉亚应执行的政策给
第11集团军的电报(1921年3月10日) 5-150

美国救济署在苏俄的赈灾活动

(1921年8月至1923年6月)

- 专题说明** 5-151
- №05426** 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摘抄
(1921年8月1日) 5-152
- №05427** 李维诺夫就开始与美国救济署代表团谈判事致
契切林(1921年8月11日) 5-153
- №05428** 李维诺夫就与美国救济署代表团谈判进程事给
契切林的电报摘要(1921年8月12日) 5-155
- №05429** 李维诺夫就谈判中的分歧致契切林的电报
(1921年8月13日) 5-156
- №05430** 契切林就协商时不允许让步问题致
拉·巴·加米涅夫(1921年8月17日) 5-157
- №05431**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美救济署
1921年9月10~25日在俄工作
的报告摘录(1921年9月27日) 5-159
- №05432** 克拉辛就美救济署署长建议为俄国购买粮食事致
契切林的电报(1921年12月19日) 5-161
- №05433** 亚·弗·埃杜克就评价美救济署在俄活动事
致契切林(1921年12月21日) 5-163

№0543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6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12 月 22 日）	5 - 166
№05435	威·哈斯克尔致亚·弗·埃杜克信摘录 （1922 年 4 月 8 日）	5 - 167
№05436	亚·弗·埃杜克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呈文摘录 （1922 年 4 月 10 日）	5 - 169
№05437	亚·弗·埃杜克致加里宁的电话电报 （不晚于 1922 年 5 月 18 日）	5 - 171
№05438	赫·胡佛关于美救济署在俄工作给 威·哈定的报告摘录（1922 年 7 月 10 日）	5 - 172
№05439	什梅里奥维奇关于救济粮运抵俄国事给 卡·伊·兰德尔的呈文摘录 （不晚于 1923 年 1 月 17 日）	5 - 176
№05440	卡·伊·兰德尔关于美救济署工作的报告摘录 （1923 年 2 月 12 日）	5 - 178
№054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 号记录摘抄 （1923 年 6 月 14 日）	5 - 181
№0544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 号记录 第 37 条的附注（1923 年 6 月 21 日）	5 - 182

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

（1921 年 3 月至 1922 年 10 月）

专题说明	5 - 183	
№01412	弗拉基米罗夫就粮食税问题致瞿鲁巴 （1921 年 3 月 2 日）	5 - 185

№01413	哥尔布诺夫就彼得格勒学者协会的建议 致托洛茨基 (1921年3月2日)	5-187
№01414	列宁就粮食税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3月3日)	5-189
№01432	列宁和托洛茨基就租让问题交换的便条 (1921年3月28-29日)	5-190
№01433	列宁就格鲁吉亚租让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3月29日)	5-192
№01434	列宁就格鲁吉亚租让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3月30日)	5-193
№01435	列宁就格鲁吉亚租让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4月5日)	5-194
№01438	列宁就在外高加索推行新经济政策问题致 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4月9日)	5-195
№01441	列宁就电气化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4月30日)	5-196
№01442	托洛茨基就电气化问题复列宁 (1921年5月3日)	5-198
№01444	关于创建“苏维埃农民协会”问题 (1921年5月23日)	5-200
№01445	列宁就利用军队搞经济建设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5月30日)	5-204
№01458	列宁就波波夫的建议致莫洛托夫 (1921年7月28日)	5-206
№01467	列宁和斯大林就签订外贸合同问题致纳里曼诺夫 (1921年9月26日)	5-210
№01474	托洛茨基和列宁关于租让问题的通信 (1921年10月10日)	5-211

№01476	列宁致托洛茨基 (1921年10月31日)	5-216
№01483	布托夫致契切林 (1921年12月1日)	5-217
№01484	彼·阿·波格丹诺夫和列宁的批条 (1921年12月2-6日)	5-218
№01499	托洛茨基就新经济政策问题致列宁 (1922年1月21日)	5-219
№01529	沙图诺夫斯基就运输工作给列宁的报告 (1922年10月5日)	5-220
№01530	哥尔布诺夫就沙图诺夫斯基报告致托洛茨基 (1922年10月19日)	5-222
№01531	托洛茨基复哥尔布诺夫 (1922年10月20日)	5-223

苏俄与热那亚会议

(1922年1月至4月)

专题说明	5-224	
№01496	克拉辛就列宁参加热那亚会议问题致契切林 (1922年1月9日)	5-225
№01497	列宁就参加热那亚会议问题致托洛茨基等 (1922年1月12日)	5-226
№01498	列宁就热那亚会议的通讯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月16日)	5-227
№01499	列宁就契切林的建议致莫洛托夫 (1922年1月23日)	5-229
№01501	列宁就同德国签订租让合同问题致列扎瓦 (1922年1月23日)	5-231

№01502	托洛茨基就托雷塔的建议致政治局委员们 (1922年1月29日)	5-232
№01504	索柯里尼柯夫就白卫纸币问题致政治局委员 (1922年1月30日)	5-234
№01505	托洛茨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政治局 (1922年2月9日)	5-236
№01506	托洛茨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政治局 (1922年2月10日)	5-238
№01507	列宁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2月10日)	5-239
№01508	列宁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托洛茨基 (不晚于1922年2月22日)	5-240
№01523	列宁就偿还债务问题致斯大林 (1922年4月19日)	5-241

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党政工作

(1921年1月至1922年5月)

专题说明	5-242	
№01403	列宁等就工会问题争论致中央委员会 (1921年1月20日)	5-244
№01465	托洛茨基致列宁 (1921年8月25日)	5-245
№01487	托洛茨基就出版给齐赫泽的信的问题 致奥里明斯基 (1921年12月6日)	5-246
№01488	列宁致托洛茨基和莫洛托夫 (1921年12月7日)	5-249

№01491	列宁就清党问题致扎卢茨基 (1921年12月19日)	5-250
№01494	列宁致托洛茨基(1921年12月20日)	5-252
№01495	托洛茨基致福季耶娃(1921年12月28日) ...	5-253
№01509	列宁致托洛茨基(1922年2月)	5-254
№01510	列宁关于入党条件的便条 (1922年3月9日)	5-255
№01511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党的建设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2年3月10日)	5-256
№01513	列宁就《工人报》问题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1922年3月23日)	5-258
№01514	列宁致欣丘克(1922年3月23日)	5-259
№01520	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副主席)工作的决定(1922年4月11日)	5-260
№01521	列宁就《1910-1914年的法俄关系史料》 一书致斯大林(1922年4月15日)	5-268
№01522	政治局委员们对列宁同志关于副主席工作的 建议的最终意见(1922年4月21日)	5-270
№01524	福季耶娃致托洛茨基(1922年5月22日)	5-276

联共(布)关于争取青年作家的决定

(1922年6月至7月)

专题说明	5-277
№03278 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6月30日)	5-278

No03279	中央书记助理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7月3日）	5-281
No03280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7月3日）	5-282
No03281	雅科夫列夫致斯大林 （不晚于1922年7月3日）	5-284
No0328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记录摘抄（1922年7月6日）	5-287

波格丹诺夫院士案件

（1923年11月）

专题说明		5-290
No03138	致经办被捕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13日）	5-292
No03139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17日）	5-301
No03140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22日）	5-305
No03141	被捕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波格丹诺夫致国家政治 保卫局主席（1923年10月4日）	5-310

- №03142**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10月11日) 5-311
- №03136** 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波格丹诺夫致
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声明
(1923年11月6日) 5-312
- №03137** 波格丹诺夫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23年11月7日) 5-316
- №03143** 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波格丹诺夫致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
(1923年11月29日) 5-318

组建苏联的最初过程

(1922年8月至12月)

- 专题说明** 5-327
- №02406** 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与各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
(不早于1922年8月11日) 5-329
- №02407** 曼努伊尔斯基就乌克兰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9月4日) 5-331
- №02408** 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全会第七次
会议记录摘抄(1922年9月11日) 5-333
- №07307**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9月15日) 5-334
- №02410** 奥尔忠尼启则就需要亚美尼亚中央委员会支持
致卢卡申电(不早于1922年9月15日) 5-336

- №02411** 卢卡申就亚美尼亚党中央的决议致俄共（布）
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电
（1922年9月16日） 5-337
- №02412**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局第二次全会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9月16日） 5-338
- №02413** 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主席团
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9月16日） 5-339
- №07308** 斯大林就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问题致列宁
（1922年9月22日） 5-340
- №02415**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会议记录（一）
（1922年9月23日） 5-344
- №02416**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会议记录（二）
（1922年9月24日） 5-346
- №02417**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
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决议的最终文本
（1922年9月24日） 5-350
- №02418** 斯大林等人关于修改文本致俄共（布）
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
（不早于1922年9月26日） 5-352
- №02419** 加米涅夫就组建联盟的问题致列宁
（不晚于1922年9月27日） 5-354
- №02420** 加米涅夫给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结构
的框架图（不晚于1922年9月27日） 5-355
- №01527** 列宁就民族问题致加米涅夫
（1922年9月27日） 5-356
- №01528** 斯大林答列宁致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9月27日） 5-359

- №02422**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和
斯大林交换的便条（1922年9月28日）…………… 5-361
- №02423** 拉柯夫斯基就斯大林草案致斯大林
（1922年9月28日）…………… 5-362
- №02424** 拉柯夫斯基关于保持乌克兰独立致曼努伊尔斯基
的信（1922年9月29日）…………… 5-367
- №02425** 李可夫就与中央集权做斗争问题致俄共（布）
中央组织局委员会
（不早于1922年9月28日）…………… 5-369
- №02426**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10月3日）…………… 5-370
- №02427** 俄共（布）中央全会第七次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10月6日）…………… 5-372
- №0779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1月21日）…………… 5-373
- №07798**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1月25日）…………… 5-376
- №0779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的基本条款
（1922年11月25日）…………… 5-384
- №07800** 皮达可夫就组建苏联的机构问题致斯大林
（1922年11月27日）…………… 5-387
- №0780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1月28日）…………… 5-390
- №07802** 加米涅夫关于苏联基本章程草案致列宁的信
（不早于1922年11月28日）…………… 5-392
- №0780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
（1922年11月30日）…………… 5-394

№07804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2月5日）	5-398
№07805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员会通过的苏联宪法 草案（1922年12月5-16日之间）	5-401
№07806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2月16日）	5-406
№0780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12月18日）	5-416

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二）

（1922年11月至1923年10月）

专题说明	5-418	
№07308	俄共（布）中央秘密决定的保管方法 （不早于1922年11月30日）	5-420
№01537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弗鲁姆金和 斯托莫尼亚科夫（1922年12月12日）	5-421
№01538	托洛茨基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列宁 （1922年12月12日）	5-423
№01539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13日）	5-425
№01540	托洛茨基就簿记问题致列宁等 （1922年12月13日）	5-427
№01541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15日）	5-428
№01542	弗鲁姆金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列宁 （1922年12月15日）	5-429

№01543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15日)	5-430
№01544	克鲁普斯卡娅就转交列宁信件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21日)	5-431
№01545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	5-432
№01546	列宁手书哥尔克村地址的便条 (1923年1月15日)	5-446
№10808	托洛茨基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问题致中央政治局(1923年1月15日)	5-447
№10809	托洛茨基就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问题致 全体中央委员(1923年1月20日)	5-451
№02687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1923年1月25日)	5-461
№02688	书记处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和 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分工的设想 (1923年1月29日)	5-463
№0269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8号记录摘抄 (1923年2月8日)	5-466
№02692	托洛茨基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1923年2月13日)	5-467
№02693	托洛茨基关于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问题的提纲 (1923年2月12日)	5-468
№02694	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关于政治局委员会分工的 建议的意见(1923年2月15日)	5-471
№0269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0日)	5-472
№0269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0日)	5-473

№0269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1日）	5-476
№02698	托洛茨基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 （1923年2月22日）	5-477
№02699	俄共（布）中央全会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3日）	5-482
№02700	俄共（布）中央全会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3日）	5-483
№02701	俄共（布）中央全会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4日）	5-484
№0270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3月1日）	5-485
№02703	列宁致托洛茨基（1923年3月5日）	5-486
№02704	玛·沃洛季切娃致托洛茨基 （1923年3月5日）	5-487
№06511	玛·沃洛季切娃的询问结果 （1923年3月5日）	5-488
№10810	列宁致斯大林（1923年3月5日）	5-490
№02705	列宁致姆季瓦尼等（1923年3月6日）	5-492
№10811	斯大林致列宁（1923年3月7日）	5-493
№06512	加米涅夫致季诺维也夫（1923年3月7日） ...	5-494
№06513	斯大林致奥尔忠尼启则（1923年3月7日） ...	5-496
№02706	托洛茨基关于工业的提纲 （1923年3月6日）	5-498
№0270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3月8日）	5-513
№02708	彼·阿·波格丹诺夫对工业提纲的修改意见 （1923年3月13日）	5-514

№0270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3月22日）	5-517
№0651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7号记录摘抄 （1923年3月26日）	5-518
№06515	格利亚谢尔同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 （1923年3月26日）	5-520
№06516	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第19号记录摘抄 （1923年3月31日）	5-521
№06517	托洛茨基致布哈林（1923年4月1日）	5-523
№06518	福季耶娃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文章致斯大林 （1923年4月16日）	5-524
№02711	托洛茨基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文章 致全体中央委员（1923年4月16日）	5-525
№02712	福季耶娃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文章致加米涅夫 （1923年4月16日）	5-527
№06520	加米涅夫致俄共（布）中央书记处 （1923年4月16日）	5-528
№06521	加米涅夫致福季耶娃（1923年4月16日）	5-529
№06522	福季耶娃致斯大林（1923年4月16日）	5-530
№06523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委员 （1923年4月16日）	5-531
№06524	纳扎列强致俄共（布）全体中央委员 （1923年4月16日）	5-532
№02713	托洛茨基就斯大林的声明致俄共（布） 中央委员们（1923年4月17日）	5-533
№02714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1923年4月18日）	5-535
№06525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第2号 记录摘抄（1923年4月18日）	5-536

№10806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对季诺维也夫建议的意见汇编 (1923年6月初)	5-537
№10807	季诺维也夫的建议(1923年6月2日)	5-539
№02734	托洛茨基就政治局分工问题致俄共(布)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1923年6月15日)	5-540
№02735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1923年6月16日)	5-543
№02736	托洛茨基就开放酒类买卖致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1923年6月29日)	5-544
№02737	托洛茨基针对开放酒类买卖提出的决议草案 (1923年6月30日)	5-545
№02738	四十六人声明(1923年10月15日)	5-546
№06526	格利亚谢尔致布哈林(不早于1923年12月)	5-556

俄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21年6月至1923年5月)

专题说明	5-559	
№01447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致列宁等(1921年6月5日)	5-560
№01448	列宁复托洛茨基(1921年6月5日)	5-562
№01450	德共代表团就“三月发动”问题致俄共中央(1921年6月16日)	5-563
№01451	列宁就德共代表团的信致托洛茨基(1921年6月18日)	5-565

- №01453**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致列宁
(1921年7月3日) 5-566
- №01454**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再致列宁
(1921年7月3日) 5-569
- №01455** 列宁复托洛茨基(1921年7月3日) 5-570
- №01463** 托洛茨基就德共问题致列宁和布哈林
(1921年8月15日) 5-571
- №01464** 列宁就德国统一共产党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8月16日) 5-573
- №01466** 托洛茨基就法共任务致列宁(1921年9月) ... 5-574
- №01472** 列宁就德共莱维书信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10月9日) 5-577
- №01473** 托洛茨基就德共莱维书信问题致列宁
(约于1921年10月10日) 5-578
- №01475** 托洛茨基就德共莱维书信问题再致列宁
(1921年10月11日) 5-579
- №01517** 列宁:我们的代价太大了
(1922年4月9日) 5-580
- №01518** 列宁就三个国际会议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2年4月9日) 5-585
- №01519** 托洛茨基就三个国际会议问题致政治局
(1922年4月10日) 5-587
- №01899** 列宁就英国选举问题致拉狄克
(1922年10月28日) 5-589
- №01532** 托洛茨基就法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2日) 5-591
- №01533** 托洛茨基就法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3日) 5-594

№01534	托洛茨基就意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4日)	5-595
№01535	列宁就意共等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25日)	5-597
№01536	列宁就土地纲领草案致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25日)	5-598
№03369	克里姆林宫保管员给俄共(布)中央的报告 (1922年12月2日)	5-600
№06259	关于建立“意大利军团”的建议 (1923年5月26日)	5-602

俄共(布)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

(1923年7月至10月)

专题说明	5-606	
№0323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拉狄克同志 关于德国形势的通报》的决议 (1923年7月27日)	5-607
№0323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外交人民委员部 问题(关于德国)》的决议(附电文) (1923年8月18日)	5-608
№03236	中央书记助理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和 鲁祖塔克(附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提纲的意见) (1923年8月20日)	5-611
№0323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1923年8月22日)	5-614

- №032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
问题会议记录（1923年8月21日）…………… 5-616
- №03239** 中央书记扬·鲁祖塔克关于国际形势致各省委、
州委、民族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中央局的
密码电报（1923年8月28日）…………… 5-629
- №0324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鲁祖塔克同志的
通报》的决议（附鲁祖塔克的建议）
（1923年9月13日）…………… 5-631
- №032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决议
（1923年9月21日）…………… 5-634
- №03242**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形势》
的决议（附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1923年9月23日）…………… 5-635
- №0324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问题”的
决议（1923年10月4日）…………… 5-648

【专题说明】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军事问题

(1921年2月至1922年4月)

进入1921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俄全国开始进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然而各地暴乱仍在继续，苏维埃政权面临艰巨的剿匪任务。由于连年的战争，加上气候不佳，苏俄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粮食问题的解决又同剿匪任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不肃清各地的土匪，产粮区的粮食就运不出去，首都、工业地区、饥荒地区就得不到粮食。本专题所收档案资料涉及肃清盗匪、平息叛乱、肃反工作、军队建设等等问题。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任建华、刘燕明、
项国兰、王锦文、王希礼、乌传袞)

№01404

列宁就肃清盗匪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6日)

副本

绝密

1921年2月6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斯克良斯基^① 同志：

请把萨拉托夫省军事委员会的电报给我送来，您今天只给我送来了总司令对这份电报的“答复”。

这个答复写得很糟，有些地方还文理不通。

这不是**办事**，而是官僚主义的敷衍塞责：应当肃清盗匪活动，而不是敷衍塞责。

让他们每周给我送两次简短的，最简短的汇报，谈同盗匪活动作斗争的情况。

还要向野战司令部讲清楚，他们应当工作，而不应当敷衍塞责。

这个“司令部的军事委员”伊柳申是个什么人？他的资历如何？

✧

列 宁

^① 斯克良斯基，埃·马·（1892～1925）——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4年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01408

关于逮捕米龙诺夫的报告

(1921年2月17日)

副本

绝密

电报 (密码)

野战司令部机要处 454 函

1921年2月17日收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

司令部机要处齐里特解码

1921年2月18日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参谋长“r”组

第 14412 号 / 395 函 号

1921年2月17日转发顿河州驻军
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电报

2月16日，第 37168/p/101/函 号：

“根据乌斯季梅德韦杰茨军区军事委员保科夫同志的报告，据他所获得的情报（他保证消息准确），到乌斯季梅德韦杰茨军区度

假的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龙诺夫^①，在该军区策划大规模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参加叛乱的有当地的居民、当地的军队，据说还有通过阿尔切达-卡梅申火车站到达的第21骑兵师的一部和第15骑兵师的一部。2月13日在居民和军队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军区军事委员会秘密逮捕了米龙诺夫，并用专用车厢将其押送莫斯科，同时送上起诉书。参与密谋的似乎还有几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现在顿河州肃反委员会正在拘捕密谋参加者。所有被捕者不迟于2月18日便可押往米哈伊洛夫卡。”

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 普加乔夫
政委 佩切尔斯基

副本送列宁同志（亲收）

2月23日

斯克良斯基。

秘密

斯克良斯基同志：

“米龙诺夫现在何处？目前情况如何？3月5日。列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米龙诺夫，菲·库·（1872--1921）——哥萨克军官。1920年加入俄共（布），任骑兵第二集团军司令员。

No01410

斯克良斯基就军事问题致斯米尔诺夫

(1921年2月21日)

副本

绝密

莫斯科，1921年2月21日，第37号

速发

致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斯米尔诺夫^①同志

根据总司令的报告，第21师已开始行动。如果无需为顺利开赴鄂木斯克肃清道路，则该师不准备在乌拉尔滞留。此外在叶卡捷琳堡已为这个师准备好了补充兵员，补充兵员将在那里编入该师。为了组建骑兵师从西方面军调往你处一个旅，从高加索第21骑兵师调去两个骑兵团。总之，中部地区所有的骑兵师现在都在执行任务，抽调整师是不可能的，尤其现在这更不可能，因为中央在乌克兰的铁路运输上现在遇到极大的困难，而许多骑兵部队都集中在乌克兰。直到今天，8列军车的骑兵旅和两列军车的第21步兵师都还在路上。第21骑兵师的部队不适合粮食工作，但作战却是好样的。请你们注意到这一情况。

^① 斯米尔诺夫，伊·尼·（1881～1936）——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候补委员和邮电人民委员等职。1936年被处死，后获平反。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
副主席 斯克良斯基

发给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斯米尔诺夫同志

“我把斯克良斯基的这份报告转给您，作为对您的那些急电的答复，请您经常向我报告有关匪徒的情况、有关粮食工作和粮食发运的情况。”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01411

弗拉基米罗夫就
粮食运输问题致瞿鲁巴

(1921年3月2日)

副本

秘密

电报 (密码)

发自第5集团军电报局

647, 107, 2 / III 20, 30

1921年3月2日, 第161号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瞿鲁巴^①

抄送：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工作条件常常使一切计划落空。马赫诺^②在彻底破坏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县和别尔江斯克县的粮食机关并杀害许多粮食工作者之后，又在破坏赫尔松县的机关。刚刚得到的消息说，马赫诺匪帮从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越过第聂伯河，在大亚历德罗夫斯克区粮食委员会杀死了区粮食委员和42名粮食工作者。为梅列法—赫尔松沿线

① 瞿鲁巴，亚·德·(1870~192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② 马赫诺，涅·伊·(1889~1934)——国内战争期间在乌克兰多次组织叛乱。

各车站运送粮食的工作受阻。我正在梅列法—赫尔松铁路线上增调100多万普特粮食，并已紧急运往顿巴斯。进一步窜犯必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保障顿巴斯和红军供给的任务几乎无法完成。

粮食人民委员 弗拉基米罗夫^①

^① 弗拉基米罗夫，米·康·（1879～1925）——历任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和农业人民委员、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01415

列宁就一红军战士的 请求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3月3日)

1921年3月3日

第179号

斯克良斯基同志：

红军战士康德拉季·叶梅利亚诺夫^①同志（通信处：第16集团军，第5步兵师，第1独立工兵连）请求我把他调出部队，并准许他到彼得格勒市的军事工程学院（花园街4号）学习。

他1920年3月22日毕业于军事工程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被派到西部战线。

现在，各战线平静，他想继续自己的学业。

我本人了解康德拉季·叶梅利亚诺夫同志和叶梅利亚诺夫全家（是“老近卫军”里优秀的彼得堡工人布尔什维克），所以请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反对意见的话）批准康德拉季·叶梅利亚诺夫同志的请求，并下达相应的命令。

请费心写几句话答复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① 叶梅利亚诺夫，康·尼·（1901～1937）——工人布尔什维克尼·亚·叶梅利亚诺夫的儿子，工程师。1917～1927年在赤卫队和红军任职。

№01416

托洛茨基就军事问题致加米涅夫

(1921年3月10日)

副本

邮政电报第36号

莫斯科，1921年3月10日

致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主席团加米涅夫^①同志

抄送：列宁同志

把关于军队的问题归结为关于民兵制优缺点的“原则性”议论，这在目前的形势下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必须为代表大会提供有关我们军队现状的实际情况。因此我认为根本不能举行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不仅要谢绝来宾，而且要以主席团的名义宣布，凡在代表大会外泄露事实、情报和文件者，应受到党内严肃查处。

也许个别同志（如波德沃伊斯基^②和梅霍诺申^③）可以例外，

① 加米涅夫，列·波·（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职。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后平反。

② 波德沃伊斯基，尼·伊·（1880～1949）——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后历任陆军人民委员、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最高军事检察院院长、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

③ 梅霍诺申，康·亚·（1889～1938）——十月革命后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把他们排除在会议之外是不对的。

这种个别的例外可由代表大会决定。

托洛茨基

№01418

托洛茨基就喀琅施塔得局势致列宁

(1921年3月15日)

副本

邮政电报第36/а号

莫斯科，1921年3月15日

致列宁同志

鉴于城里出现关于喀琅施塔得的十分荒诞的传闻，必须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有关情况的报道。也许最不束缚我们的形式是，在报纸上刊登一篇如同我在前天答英美记者问那样的答记者问。请立即告诉我您是否同意。

托洛茨基

附答记者问。^①

^① 托洛茨基的答记者问刊登在3月16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上。

№01419

斯米尔诺夫就粮食问题给列宁的请示信

(1921年3月18日)

副本

秘密

密码电报

发自鄂木斯克

3月17日第142/6号

1921年3月18日19时30分送解码

收文第35号

俄共中央委员会机要处

利西奇金收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由于粮食工作组织得不好，又缺少去满洲购买粮食的外汇，远东共和国已无力向其部队提供给养。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并未给我们下达关于我们与远东共和国经济相关关系的明确指示。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共和国成了从西伯利亚无偿获取面包和肉的寄生虫。我们为军队运送的粮食成了大锅饭，军队却仍在挨饿。请向远东共和国政府下达强硬指示，为军队运送的粮食应由军队专用，不应在公民中分发，并明确指示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拨给远东共和国的黄金中有多少是留给部队专用的。春季即将到来，

要求部队大力进行与暴乱分子和谢苗诺夫分子的斗争。部队现在缺衣少食，克拉斯诺晓科夫^①政府在向我们索要部队需要的全部供给的同时，又把得到的物资分给了居民。必须把军队的供给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请紧急下达指示。

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 斯米尔诺夫

^① 克拉斯诺晓科夫，亚·米·（1880～1937）——1920～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和部长会议主席，1921年起任俄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等职。

№01420

切卡斯基等就马斯拉科夫
匪帮问题致列宁等

(1921年3月18日)

副本

秘密

电报(密码)

全俄肃反委员会第2821/III号

1921年3月18日

发自阿斯特拉罕第004365 468 17/3号

20 59 密电优先拍发

1921年3月17日,第3553号

致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莫斯科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①

曾在斯塔罗波尔省和顿河州地区同我们交战的马斯拉科夫^②匪帮,在三门大炮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进入了卡尔梅克草原并向托尔戈瓦亚—列蒙特诺耶地区的东北部(察里津—黑亚尔)进攻。据

① 捷尔任斯基,费·埃·(1877~1926)——1895年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俄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② 马斯拉科夫,格·萨·——原为红军旅长,在因违抗军令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时率部叛变,成为活动在卡尔梅克草原上最大一股政治土匪的首领。1921年7月被红军击毙。

最新情报，他们已占领基谢廖沃村。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都没有抵抗这股势力强大的匪徒的兵力。阿斯特拉罕省的50万普特粮食储备全部集中在察里津，匪帮向察里津进逼使储备粮受到威胁，而这些粮食是阿斯特拉罕省在捕鱼季节和石油运输季节里的唯一的粮食后备。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把察里津的粮食装上驳船，由于河道冰封驳船无法驶抵阿斯特拉罕，不过河道一解冻驳船便会立即开航。阿斯特拉罕城里的粮食储备已用尽，从波克罗夫斯克火车站调运粮食的工作已完全停止，因为波克罗夫斯克的粮食已按照你们的指示调往中部地区。当前的形势要求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消灭上面提到的马斯拉科夫匪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入察里津—萨列普塔—黑亚尔地区。由于最近的局势，阿斯特拉罕目前的状况十分紧张。正在莫斯科的阿斯特拉罕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瑟普诺夫同志会亲自向你们报告最近的局势。根据以上情况，特别是由于不能从察里津得到粮食，局势必然会日趋严重。

请紧急电示你们采取的措施。

省肃反委员会主席 切卡斯基
俄共省委主席 里亚博夫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古兰
省粮食委员 涅普里亚欣

列宁同志的亲笔批示：

“托洛茨基同志：必须全力以赴消灭马斯拉科夫。列宁3月19日。”

№01421

托洛茨基就军粮问题

致克拉斯诺晓科夫

(1921年3月19日)

副本

秘密

直达电报 (密码)

莫斯科, 1921年3月19日第41号

致远东共和国 赤塔 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

抄送: 鄂木斯克 斯米尔诺夫

据已获得的情报证实, 运抵远东共和国的军粮分发给了居民。军队还在挨饿并不断瓦解。考虑到远东共和国的军队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必须采取措施, 以确保军粮专用,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把军粮挪作他用。请报告目前状况以及采取的措施, 以便转报中央。

托洛茨基

№01422

萨拉托夫省领导人就匪徒活动情况
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报告

(1921年3月19日)

副本

秘密

密码电报

1921年3月19日送解码

俄共中央机要处收文第37号

罗尼斯收

发自萨拉托夫，1921年3月19日

莫斯科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由省委、省执行委员会、梁赞—乌拉尔铁路代表和有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了驻军司令给列宁的报告，讨论了萨拉托夫省的形势，认为以现有的方式同匪徒进行两个半月的斗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近来盗匪活动开始席卷全省。谢尔多布斯克县、巴拉绍夫县、卡梅申县、沃利斯克县、杰尔加切夫县、新乌津斯克县和赫瓦伦斯克县都发生了叛乱。由于我们缺少足够的骑兵和步兵，致使匪徒四处横行。他们控制过卡梅申，掌握了赫瓦伦斯克，威胁沃利斯

克，并包围谢尔多布斯克，距萨拉托夫 80 俄里的佐洛托耶已被他们占领。以小部队同匪徒斗争只能给他们提供获得装备的机会。鉴于萨拉托夫省的这种状况，目前与匪徒的斗争的状况令人再也无法容忍了，这种状况造成了如下结果：全省播种 170 万俄亩的播种运动中断了，7 个粮食收集站和公共粮食中的 300 万普特粮食遭到匪徒和农民的洗劫，省里的工作全部瘫痪，匪徒所到之处苏维埃政权均不再存在，城市完全被匪徒破坏，向中部地区调运粮食的任务已无法完成，该省的所有城市都有可能因饥荒发生暴乱，这种状况使工人群众情绪低落，人心浮动，他们当中开始出现骚乱和罢工，生产率大幅度下降。因此我们坚决请求立即派遣武装力量，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改变与匪徒斗争的方式、方法，重新审查指挥人员，派遣有威望的军事委员会直接组织这场斗争和制定各地的行动计划。全省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应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否则共和国将彻底丢失萨拉托夫省。需要付出巨大的力量和牺牲方能消除由于不履行我们的指示和要求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省委 马尔丁诺夫
省执行委员会 费奥多尔·伊万诺夫
肃反委员会主席 斯米多维奇

列宁同志的亲笔批示：

“托洛茨基同志：我已收到您的有关文件。必须整顿地方组织。但是莫斯科应当紧急援助萨拉托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否则于我们不利。”

列宁
3 月 19 日
— 19 —

№01423

托洛茨基给反盗匪活动
委员会主席的便条

(1921年3月19日)

副本

秘密

邮政电报第38号

莫斯科，1921年3月19日

致反盗匪活动委员会主席

附上萨拉托夫发来的电报。请报告所采取的措施。

托洛茨基

№01424

托洛茨基给反盗匪活动委员会主席的信

(1921年3月19日)

副本

秘密

邮政电报第37号

莫斯科，1921年3月19日

致反盗匪活动委员会主席

抄送：组织局

抄送：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

萨拉托夫省委和省执行委员会确认，我们的部队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只是在武装盗匪，因此要求增派步兵和骑兵部队，以及改变作战方法和更动作战指挥人员等等。

在地方组织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极为严峻但并非不可避免的复杂形势。很显然，只有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才能确保同各地盗匪活动斗争的部队的可靠而又有战斗力。大体上必须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来确定这种责任：

1. 为在省内作战的讨伐部队首长配备一名临时政委——省委委员（或省执行委员会委员）。

2. 政委的责任是通过抽调各地共产党队伍和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作战部队的办法来保证作战部队的可靠性和战斗力。

3. 各县均应担负此项责任。

4. 所有已经脱离各省部队但尚能作战的共产党员都应参加红色讨伐部队。

5. 省委、县委和其他各级党的委员会要对各地的党支部在出现困难时刻的表现进行严格登记，登记材料将作为以后重新登记的基础。

6. 对外援的要求应当根据总的方针进行研究，如地方组织缺乏预见性、警惕性和干劲。

请反盗匪活动委员会尽快审查这些建议（如果这类建议未采用过），以便进一步与组织局协商，并迅速传达到各地方党组织。

托洛茨基

№01425

列宁就舰队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3月21日)

副本

秘密

1921年3月21日

列宁同志的亲笔便函

托洛茨基同志：

我们是否让舰队完全“停航”一年？舰队有什么用呢？把煤炭送给铁路或纺织厂，以便农民能得到布匹。我认为应该采取果断措施。舰队会感到难过，但苏维埃政权却会受益。

列 宁

№01426

沙波什尼科夫和克拉耶夫斯基 关于萨拉托夫局势的通话

(1921年3月23日)

副本

绝密

1921年3月23日

总参谋长第一助理沙波什尼科夫同志与伏尔加左岸部队司令克拉耶夫斯基同志的谈话。

克拉耶夫斯基：“我是克拉耶夫斯基司令。”

沙波什尼科夫：“我是总参谋长第一助理沙波什尼科夫。”

“您好，打扰您了，请原谅。总司令命令我就下列问题尽快同您通话：

(1) 传达来自萨拉托夫的情报：‘斯米多维奇说，萨拉托夫省的瓦解仍在继续。各地农民正在从收粮站的公共粮仓中抢劫粮食，并且正在拥向其他收粮站，因为被划分为小部队的武装力量没有威慑力。在萨拉托夫以南20俄里，卡梅申以北，伏尔加河到红库特地区和阿斯特拉罕铁路沿线，到处可见一群群骑马和步行的农民。这使城市居民人心涣散，船坞受到威胁，交通中断。波波夫^①匪

^① 波波夫——原将军，活动在萨拉托夫地区的匪帮。

帮就在卡拉布拉克—沃利斯克铁路以南活动。必须坚决地尽快结束这一切。要速调两辆装甲巡道车和—列装甲列车；必须从坦波夫调来骑兵部队；急需 7.62 毫米步枪、机枪和子弹。成立了萨拉托夫和萨拉托夫省革命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尔丁诺夫、布列宁、涅伊巴赫、普拉克辛和主席——莫斯科的瓦西里耶夫^① 同志。革命委员会急需 30 亿卢布。萨拉托夫没有钱。我们确认 3 月 20 日发出的那份电报。社会叛徒、狗崽子们越来越厚颜无耻。请以革命的名义采取行动。斯米多维奇。’

总司令请您谈谈对萨拉托夫省局势的看法，请尽可能全面地说明同波波夫匪帮斗争的情况以及卡梅申以北和红库特地区的情况，根据萨拉托夫司令部的要求提出您现在需要提供哪些援助。

(2) 通过第 0902/он 号电报，您请求将第 81 旅派往勒季谢沃车站。总司令准备派该旅前往察里津，将派另外两个旅去萨拉托夫，因为第 79 旅因运输困难来不及到达勒季谢沃同波波夫匪帮交战。关于上述情况，总司令也让我同您交换一下意见。沙波什尼科夫。”

克拉耶夫斯基：“我是克拉耶夫斯基司令。

您好。最近在军区，尤其是在那些最大限度地收走了粮食而粮食工作者又不会做工的地方，爆发了饥饿农民的暴动。一星期前萨马拉省也发生了类似萨托拉夫省目前的这种情况。斯塔夫罗波尔、布祖卢克、布古鲁斯兰和萨马拉等县几千农民集合在一起，有的地方甚至达几万人，企图抢劫粮食基地，但是开枪后有的地方平息了，萨马拉省的暴动也被镇压下去。目前萨马拉省正处在这样一

^① 瓦西里耶夫-尤任，米·伊·（1876—1937）——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4—1937 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

种局势，在许多乡里，几千名饥饿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向粮食机构要粮食。常常是由于粮食工作者不善于做说服工作，引起农民的愤慨。目前在萨拉托夫以南 100 俄里的罗夫诺和佐洛托耶地区农民暴动正在蔓延，红库特地区也跃跃欲试。现在那里火车仍正常行驶，已调遣萨拉托夫步兵训练班的两个连前往那里。第 1、第 2 集群正在追击波波夫匪帮，但是战士们已精疲力竭，这一情况我在莫斯科时已经报告了总司令。调遣新的部队接替追击波波夫匪帮的第 1、第 2 集群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第 26 师连一个机动营也派不出。全师上下一直在不停地战斗。由于车辆缺乏，从萨马拉—萨拉托夫地区调遣部队也是不可能的。萨拉托夫执行委员会张皇失措，把局势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可怕。因萨拉托夫地区没有机动部队，我命令第 26 师师长在增援旅抵达之前把沃利斯克和萨拉托夫指挥员训练班投入同匪帮的斗争。第 81 旅抵达勒季谢沃后将根据局势的变化接受任务。我想，这个旅得用于同罗夫诺耶、佐洛托耶、红库特地区的匪徒作战。察里津日前局势稳定，另外两个旅到达后，可以通过水路将第 81 旅调往察里津、阿斯特拉罕。至于为萨拉托夫财政局拨款一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下令拨给萨拉托夫 1000 支步枪、10 挺机关枪。我认为在部队重新部署前不能提供更多的武器。请告知，为伏尔加左岸军区指派的第 27 师第 1 旅何时能抵达，因为该师抵达后，我要把第 50 师的部队重新组建整顿。部队司令克拉耶夫斯基。”

总司令的谈话

总司令：“您没有提供有关波波夫匪帮的新情况，而我们正根据您的报告在重新部署奔萨地区的兵力。您提交报告后已过 48 小时，如果在此期间局势发生了变化，您本应立即向我们续报。波波

夫显然没有去奥泽尔基，也决没有同安东诺夫^①会合的意图。今后请多加注意这方面的情报，因为现在部队已疲于奔命，铁路运输也已超负荷。萨拉托夫需要装甲列车和装甲巡道车。您是否已找到85号装甲列车，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它在塞兹兰。因此您现在就有的你们需要的装甲列车。另外您没有报告萨马拉地区的情况，我从其他渠道得知那里有些地方正在酝酿新的骚乱。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关于第81旅，它还没到达我们这里，可是您却已经在打它的主意了。我坚持要求第81旅到指定地区集结，在那里接受检查，作好战斗准备，如果需要的话，我会调去军装供他们穿，然后才能让他们投入战斗。如果萨拉托夫局势十分严峻，我将把第20旅的步兵团派到那里，根据您最近对波波夫匪帮状况的评估，我已把这个团派往奔萨。这个步兵团大概要比第81旅先到达指定地点。萨拉托夫需要步枪，而你们有我拨给你们组建旅用的步枪。而根据最新的报告你们因人力不足组建不起来，这是你们的最新报告。总之，建议你们抓紧对省军事委员会和参加平叛部队的控制，因为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不是来自萨马拉的人，其他什么人都可以指挥萨拉托夫。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加米涅夫^②。”

克拉耶夫斯基：“我现在向您转达刚刚收到的来自萨拉托夫的有关波波夫活动的报告。1英寸比10俄里的地图。沃利斯克地区（特鲁宁^③同志的萨拉托夫支队在这一地区），3月23日21时第1和第2骑兵团开进沃利斯克市；随后第1和第2集群也到达了沃利

① 安东诺夫，亚·斯·（1888～1922）——社会革命党人，坦波夫省叛乱的首领。

② 加米涅夫，谢·谢·（1881～1936）——俄国旧军官，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1919年7月～1924年4月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930年加入联共（布）。

③ 特鲁宁，可能是图鲁宁或图鲁年，伊·彼·（1893～1939）——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6月起任党的萨拉托夫省巴库雷乡责任书记、乡革命委员会主席、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委员。

斯克市。基于目前局势（侦察报告第 001323/он 号）萨拉托夫支队是这样部署的：拉普申同志的第 1 集群和第 1、第 2 骑兵团带着大炮沿铁路线从普里沃利斯克车站转移到巴尔努科夫卡车站（作战命令第 001305/он 号），第 2 集群留守在沃利斯克市。对作战报告第 1001313 号作了改变，由叶菲缅科的支队留守赫瓦伦斯克市执行警备任务。为了确保彼得罗夫斯克—沃利斯克铁路线的安全，7 号装甲巡道车于 3 月 23 日 1 时 30 分由勒季谢沃车站驶往卡拉布拉克车站，并再开往萨尔特科夫卡车站。第 149 旅驻扎的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博尔卡拉梅什地区和罗夫诺地区没有新情报。卡梅申地区，第 30 营配合法连布尔赫的支队于 3 月 21 日开始由库尔纳耶夫向科雷什基诺进攻，遭到匪徒的猛烈抵抗，14 时 30 分匪徒转入反攻，但是被击退。匪帮并没有就此罢休，增援部队到达后，他们又重新发动进攻，而且兵力增至 2000 人，其中 300 人持有步枪，还有 600 名装备精良的骑兵。结果经过交战，第 30 营于 3 月 21 日 24 时开始向波乔姆金撤退。战斗中损失了一挺机枪，因为驮枪的马被打死了。由于子弹不足部队被迫撤退。第 30 营同法连布尔赫的部队一起顺利通过了别列日涅科夫、下多布林卡，于 3 月 22 日 14 时到达卡梅申。由于第 38 营部队撤退，卡梅申北部受到威胁。下多布林卡被匪徒的侦察兵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波克罗夫斯克以南 30 俄里的乌兹莫尔斯卡亚村。为肃清匪徒从波克罗夫斯克派出一支混成连，其中有 250 名步兵，45 名骑兵，配备两挺机枪，由第 4 预备团和该团团校中优秀的红军战士组成（侦察报告第 0013723 号）。红库特地区，由 215 人组成的萨拉托夫学员支队于 3 月 21 日 14 时到达红库特，14 时 40 分卸完装备后开往红库特村平息叛乱。没有得到有关装甲列车的消息。杰尔加奇和新乌津斯克地区没有新情况。谢尔多布斯克地区局势稳定。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省也没有新情报。第 001322/он 号。第 50 师代理师参谋长科尔宗，参谋长

助理列别捷夫。

萨马拉省目前局势非常平静。奥伦堡省的局势也很稳定。我派5号装甲列车由塞兹兰开往阿特卡尔斯克车站。最好从奔萨调一个团去萨拉托夫打击罗夫诺耶地区的匪徒。组建旅的工作仍在进行，第1、第2团的人已补充齐全并已投入训练。我不会干扰第81旅的行动，对它的使用将视局势而定。如果您下令派他们去察里津，他们将开赴那里。至于萨拉托夫省同莫斯科的联系，那不是我的过错。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表现得异常张皇失措。请告诉我第81旅的行军路线。司令克拉耶夫斯基。”

总司令：“您仍坚持要派这个旅去萨拉托夫，我们必须确保季霍列茨卡亚—察里津铁路线的安全，因此我首先把第81旅派往察里津。如果您坚持派往萨拉托夫。我也可以把第81旅派去，但是我坚持要求全旅集中起来，整顿好，然后再投入战斗。加米涅夫。”

克拉耶夫斯基：“是。第81旅到达萨拉托夫后将发给他们军装，加强政治工作人员的力量，适当休整后再投入战斗。请问是否从奔萨为萨拉托夫调一个团，该团将被派到罗夫诺耶地区。我部有两个营和一个骑兵连现在奔萨，因缺少去库兹涅茨克—奔萨一线的车辆，这两个营和一个骑兵连无法调动。请决定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装备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还有些不大明确。海军司令涅米茨^①已命令阿斯特拉罕港口把舰队武装起来。我想确切地知道，是由港口来武装舰只，还是像以往那样由军区来负责此项工作。克拉耶夫斯基。”

^① 涅米茨，亚·瓦·（1879～1967）——1917年8月起任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继续指挥黑海舰队。1920年2月～1921年12月任共和国海军司令。

总司令：“关于区舰队的装备，特别是组建区舰队应该由你们决定，我已下达了有关命令。装甲列车的情况如何？加米涅夫。”

克拉耶夫斯基：“第70号装甲列车已由察里津开往阿特卡尔斯克车站，如果河中的冰层会影响调动的話，列车将从乌尔巴赫调到伏尔加河的对岸。已命令第85号装甲列车从塞兹兰紧急开往阿特卡尔斯克东站，在阿特卡尔斯克和彼得罗夫斯克车站之间运行。在库兹涅茨克—塞兹兰一线运行的装甲列车和装甲巡道车停在库兹涅茨克车站。请您告诉我，是否从奔萨派一个团去萨拉托夫？克拉耶夫斯基。”

总司令：“我将从奔萨派一个团支援萨拉托夫。我没有问题了。祝一切顺利。加米涅夫。”

克拉耶夫斯基：“没问题了。再见。克拉耶夫斯基。”

№01427

加米涅夫关于萨拉托夫局势的报告

(1921年3月23日)

副本

绝密

亲收

莫斯科，1921年3月23日

1921年3月23日同斯米多维奇^①同志谈话的记录

经直达电报同伏尔加左岸部队司令克拉耶夫斯基同志通话后，弄清了萨拉托夫省的局势，现报告如下：

(1) 为增援萨拉托夫省我从奔萨紧急调派尚在途中的后备集团军步兵旅的一个集团赴萨拉托夫。

(2) 开往萨拉托夫省的第27步兵师第81步兵旅正奉命快速前往萨拉托夫。

(3) 3月21日投入战斗的特鲁宁同志指挥的萨拉托夫支队正在追击波波夫匪帮。

(4) 按照伏尔加左岸地区部队司令的命令正在往萨拉托夫省调动下列装甲列车：第85号装甲列车由塞兹兰车站调到阿特卡尔斯克车站；为确保彼得罗夫斯克—沃利斯克铁路线的安全，第7号装甲巡道车于3月22日1时30分从勒季谢沃车站开往卡拉布拉克车

^① 斯米多维奇，彼·格·(1874—1935)——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站（沿彼得罗夫斯克—沃利斯克铁路线），并前往萨尔特科夫卡车站；第70号装甲列车从察里津开往阿特卡尔斯克车站，如果河面上的冰层不妨碍调动，将从乌尔巴赫开到伏尔加河对岸；装甲列车和装甲巡道车停在塞兹兰—奔萨铁路线的库兹涅茨克车站，沿库兹涅茨克—塞兹兰铁路线来回行驶。

（5）伏尔加左岸军区司令命令为萨拉托夫调拨1000支步枪和10挺机枪。

总司令 （加米涅夫）

№01428

加米涅夫等就萨拉托夫局势 给斯克良斯基的报告

(1921年3月23日)

副本

绝密

莫斯科，1921年3月23日第1695/он号

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对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1921年3月19日电报的答复
已采取下列措施：

1. 为加强由伏尔加左岸军区司令指挥的部队正派以下部队增援：曾参加攻克喀琅施塔得的彼得格勒第27步兵师、4支装甲部队（2支来自高加索方面军，2支来自西方面军）首先开往阿斯特拉罕、察里津、萨拉托夫和卡梅申。关于从西伯利亚调派一个骑兵师增援萨马拉地区的事宜正在进行磋商。

2. 关于重新考查指挥员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反盗匪活动委员会会议第7号记录中的第6号记载：“责成丹尼洛夫^①同志和明仁斯基^②同志于3月20日前从是否适于反盗匪活动的角度提出

① 丹尼洛夫，斯·斯·（1877～1939）——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明仁斯基，维·鲁·（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财政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等职。

重新切实审查进行反盗匪活动斗争的部队指挥员的具体措施，并拟订为这些部队配备得力指挥员的办法。要特别注意这些部队中的原白军军官。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总司令 （加米涅夫）

代共和国总参谋长 （沙波什尼科夫）

代总参谋部政委 （克利姆）

№01429

普罗塔索夫等就平定叛乱致列宁电

(1921年3月25日)

副本

秘密

密码电报

发自秋明

1921年3月25日送解码

Φ.利西奇金收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现将奥布多尔斯克同志们的无线电报抄件送上，这是有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来在我国北冰洋沿岸远北雪原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最新历史的光辉文献。这份电报从奥布多尔斯克发出时正值当地发生叛乱，匪徒从托博尔斯克方面逼近。电报发出后，来自奥布多尔斯克的补充情报说，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已平定叛乱，没有武器的奥布多尔斯克人正向南部隘口撤退（带着功率强大的奥布多尔斯克无线电台）。托博尔斯克北部的共产党员们抛洒热血，向不可战胜的俄国共产党、亲爱的同志们和我们的领袖列宁致以充满激情的最后的敬礼。我们在这里牺牲，是向党和共和国尽自己的义务，我们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俄国共产党区委书记 普罗塔索夫
俄国共产党秋明省委书记 阿格耶夫

列宁同志亲笔批示：

“可否通过军事部门给予帮助？”

№01430

列宁就涅米茨事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3月25日)

副本

1921年3月25日，第2857号

致斯克良斯基同志

我发现，涅米茨同志不得不在国防委员会白白等了三个半小时，因为没有人过问他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建议今后利用军事部门和国防委员会的电话或秘书提前几分钟通知涅米茨同志并让他乘汽车前来（因为他有病）。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列宁同志手书）

No01431

斯米尔诺夫就允许白匪 返回问题给列宁的请示信

(1921年3月25日)

副本

秘密

密码电报

1921年3月26日送解码

收文第50号，俄共中央机要处 M.丘古诺夫收

鄂木斯克，1921年3月25日，第175/6号

列宁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逃往中国蒙古西部的杜托夫以及其他匪首率领的白匪正在发生分化。他们请求允许他们返回苏维埃俄国。他们总共约5000人。这些白匪是由英国人武装起来的。为了分化这些人员和削弱他们对西伯利亚构成的威胁，我已命令塞米巴拉金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准许匪帮在向我边防部队缴出武器的情况下越过边界，并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如不同意上述做法，请电示。

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 斯米尔诺夫

列宁同志的（亲笔）批示：

“送托洛茨基。”

№01436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专列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副本

秘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4月6日

命令 202П.50

送托洛茨基同志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无论是在途中还是在共和国任何地点停留时，对该专列上不超过300人的红军战士均按前线红军战士的标准提供口粮。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01437

关于同德国军事工业部门合作的信件

(1921年4月7日)

秘密

斯克良斯基亲收

发文第174号

莫斯科 1921年4月7日

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列宁同志

抄送：契切林同志

尊敬的同志：

根据我们在莫斯科所谈的基础同您所知的德国小组举行的谈判取得了如下结果。这个小组认为，首先要同我们在恢复我国军事工业方面进行合作，具体为以下三个方面：组建空军、潜水舰队，制造武器。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德国小组安排“布洛姆和福斯”公司（制造潜水艇）、“阿尔巴特罗斯韦尔克”公司（制造飞机）和克虜伯公司（制造常规武器）参与此事，这些公司同意向我们提供自己的技术力量和所需要的设备。现正在制定近期计划，预计20日你们所知的诺伊曼将赴莫斯科商定聘请几位技术人员（5~6人）参与此事的办法，以便进一步就地研究存在的问题。请您收到此件后立即用契切林同志的密码通过无线电台通知我，你们认为诺伊曼

此时前来是否恰当，拟定这些计划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柯普)

致斯克良斯基同志

我同意放行，请最好及时通告（姓名），以便作出安排和让我掌握情况，避免发生意外。

维·明仁斯基

(明仁斯基同志手书)

斯克良斯基同志：

请简单告诉我一下，您是否已答复，我想已予回复。此件请退还。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No01440

列宁就安排专车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4月9日)

副本

1921年4月9日

斯克良斯基同志：

我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①和布哈林^②夫妇以及其他几位同志已前往克里木。他们乘坐的是专用车厢。能否在他们提出请求时下令把这节车厢挂在军用列车上，以便加快行进速度？（往返）

（列宁同志手书）

斯克良斯基同志：

关于布哈林和我的妹妹等人乘坐的车厢一事，我刚刚同哈尔科夫通了话。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不要再打扰阿尔然诺夫了。无需再下达任何命令。谢谢。

敬礼！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
- ① 乌里扬诺娃，玛·伊·（1878～1837）——列宁的妹妹。1917～1929年任《真理报》编委和责任秘书。
- ② 布哈林，尼·伊·（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判处死刑，1988年平反。

№01443

列宁就粮食问题致伏罗希洛夫

(1921年5月5日)

副本

秘密

直达电报

1921年5月5日 第108号

致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伏罗希洛夫^①同志

请您命令骑兵集团军的指挥员们，在集团军转移时要全力协助地方粮食机关，因为莫斯科急切需要粮食支援，执行情况请专门检查。

列 宁

^① 伏罗希洛夫，克·叶·（1881—196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是骑兵第一集团军的组织者之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成员、北高加索军区司令。

№01446

**关于指派图哈切夫斯基
平定坦波夫叛乱的文件**

(不晚于1921年5月31日)

副本

(1921年5月31日前)

我认为最好派图哈切夫斯基^①去平息坦波夫叛乱。最近那里的情况没有好转，有些地方甚至恶化了。这一任命将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尤其在海外。

您的意见如何？

(斯克良斯基同志手书)

请交莫洛托夫^②于明日转政治局。建议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一事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宣布，不必见报。

(列宁同志手书)

① 图哈切夫斯基，米·尼·(1893~1937)——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8~1921年任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1921年5月任受命肃清安东诺夫匪帮的坦波夫军区部队司令。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平反。

② 莫洛托夫，维·米·(1890~198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年起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等职。1962年被开除出党。

№01449

斯克良斯基和列宁
就向蒙古推进问题交换的便条

(1921年6月14~15日)

副本

秘密

(看来是1921年6月14~15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们向蒙古推进问题是否已决定？

应立刻下达指示。

(斯克良斯基同志手书)

我们今天已经同莫洛托夫商定，他答应通过电话请政治局通过。

(列宁同志手书)

您是否同意？

(斯克良斯基同志手书)

№01452

列宁就安东诺夫问题

致斯克良斯基

(约于1921年6~7月)

副本

秘密

图哈切夫斯基那里的情况如何？

还没有抓到安东诺夫吗？

您是否催促一下？

何时向政治局报告？

(列宁同志手书)

№01456

关于坦波夫省盗匪情况

给列宁的报告

(1921年7月16日)

副本

绝密

莫斯科，1921年7月16日

第125 K号

致列宁同志
报告

(按照列宁同志通过丹尼洛夫同志转达给我的指示，关于坦波夫省盗匪活动的报告摘录)

一、5月初盗匪活动的情况

在坦波夫省的5个县里，苏维埃政权已不复存在（不包括城市），这5个县是基尔萨诺夫县、坦波夫县、莫尔尚斯克县（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以南）、科兹洛夫县（罗斯托夫铁路以东）和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县（该县最南部除外）。

在这个为农民暴动所席卷的地区，政权已落入劳动农民同盟手中，社会革命党通过该同盟贯彻自己的政策。

匪徒大约有21000人。

暴动始于1920年9月，当地的农民和盗匪把它称作自己的革命，甚至以革命发生的时刻来标志事件的时间（例如常说：“这是

发生在革命前，这是在革命后”，等等)。

暴动的原因与整个俄罗斯联邦是一样，是对余粮收集制不满和地方粮食机关不讲求方法、粗暴推行余粮收集制。

组织暴动的原因如下：

- (1) 坦波夫省已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强大的巢穴。
- (2) 社会革命党人在创建劳动农民同盟时采取的策略很高明。
- (3) 安东诺夫在领导基尔萨诺夫警察局时隐匿大量武器，最后，还有安东诺夫的军事组织才能。

二、战局计划

对于即将采取的行动，我们没有把它看做是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战役，而是把它看做是一个战局，甚至是一场战争。

由于盗匪的战斗力比较弱，歼灭其有生力量不会特别困难。

主要的和最困难的任务是夺取土地，占领匪帮盘踞的地方，并在这些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

为完成武装占据的任务投入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只调三个骑兵旅用于机动。

为了使各地苏维埃的工作配合军事行动，成立了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权委员会的县级机构。

建立苏维埃政权需采取下列措施：消灭盗匪分子，建立革命委员会，通过把农民武装起来对抗盗匪活动的办法来分化农民，用没收盗匪财产的办法给农民以物质上的鼓励，采取恐怖措施对付盗匪活动的支持者，取缔劳动农民同盟委员会，红军要帮助当地居民干活，搞好苏维埃的工作。

与此同时，采取一系列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案打击盗匪，这些匪帮会因弹尽粮绝（根据地被我们占领）而被彻底消灭。

三、取得的战果和将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经过有计划、有步骤的为期 40 天的大小战役，坦波夫省的农

民暴动被平定了。

劳动农民同盟被粉碎。

苏维埃政权普遍得到恢复。

截止到7月11日，21000名盗匪只剩下12000名骑兵。大多数匪徒头目被消灭。

在匪徒们的眼里，农民的形象已变坏，他们在寻求红军的武装保护，以摆脱匪徒的侵扰。

然而与此同时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又不相信关于粮食税的法令是真诚的。他们中流传谣言说，到秋天我军将撤离坦波夫省，匪徒还会重新活动，而且有些地方劳动农民同盟的乡级委员会还存在。

因此我认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 (1) 目前在坦波夫省执行任务的军队1年内不撤离该省，
- (2) 武装占据的司令部留在坦波夫省，至少在冬季之前不考虑裁减司令部的工作，
- (3) 所有经过动员被派往坦波夫省的共产党员都留在该省，并对那些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过久的共产党员进行重新部署，
- (4) 不向坦波夫省收取任何追加的粮食税。

图哈切夫斯基

列宁同志亲笔批示：

“秘密。

送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同志：

请简单写几句，哪一项措施能先确定下来？列宁 7月29日。”

№01457

关于坦波夫省的盗匪情况

给俄共中央的报告

(1921年7月20日)

归档：1921年8月20日

弗·伊·列宁收文本第802号

1921年7月20日

致俄共中央

1. 关于坦波夫省的盗匪活动^①

坦波夫省概况

坦波夫省，按居民成分来说是俄罗斯各省中农民最多的一个省份：农村居民有325万，城市居民只有25万（将近8%）。工业极不发达，称得上是企业的只有拉斯卡佐沃制呢厂（工人均为半工半农），3家甜菜榨糖厂，几家酒精厂和不久前建立的一家“火药厂”（约有2000人，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基地），以及较有影响的坦波夫军械修理厂（有几百名工人）。手工业相当发达（北部各林业县的手工业主要是制作货运四轮大车，提炼焦油和树脂等，拉斯卡佐沃附近地

^① 列宁于8月1日对这一报告作了批复。见《列宁全集》第51卷第152页。

区的手工业是编织长筒袜，乌斯曼县是制作粗麻布，等等)。1917年地主占有的土地约60万俄亩，其中近10.7万俄亩为优质牧场(农民的份地中约有15万俄亩是牧场)。地主庄园大部分是经营水平高的农场。农户采用的还是传统、陈旧的经营方式；不过已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面积耕地的善于经营的庄稼汉。到1917年约20%的农户每户拥有6俄亩以上的耕地，约8%的农户拥有10俄亩以上的耕地。坦波夫省是一个产粮省，全省每年运出的农产品约6000万普特，其中约有2600万普特运往国外。坦波夫、拉斯卡佐沃和科兹洛夫都是流转额达几百万普特的大粮食市场。此外这个除了农民就是地主的边远省份早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地。长期以来它都是行政流放地；当地的许多农民先后离开这里投奔到更远的地方。早在1895年，社会革命党的组织已控制了5个县(当时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克举行了这几个县的社会革命党组织的代表大会)。斯廖托夫^①、玛·斯皮里多诺娃^②和维·米·切尔诺夫^③这些著名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均来自坦波夫省。

① 斯廖托夫，斯·尼·(1876~1915)——社会革命党的创建者之一。

② 斯皮里多诺娃，玛·亚·(1884~1941)——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者之一。

③ 切尔诺夫，维·米·(1873~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任立宪会议主席。后流亡国外。

革命带来的变化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革命使坦波夫的农民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夺取了大部分地主庄园并将它们分掉。一些大农户也蒙受了损失。昔日的地主土地约7.2万俄亩划归国营农场，到1920年建起近150个国营农场，但没有一个办得像样的，全都亏损，这些国营农场利用的全是农民的劳动（采用对分制），只有很少几个（坦波夫县的伊万诺夫国营农场）对农村有点实际帮助。农民几乎普遍对国营农场（通过国营农场对苏维埃政权）持有敌对态度。对待此前曾大力扶植的集体农庄，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持这种敌对态度。这是因为在实行集体化时坦波夫省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面。由于极度缺乏农具等而自然加强了对集体经营的向往，但是对所给予的各种优惠和补贴的鼓励做得过头了。从前的地主、管家和仆人等类的人物往往都在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里落了户。集体农庄成了残疾人和游手好闲之徒的庇护所，在这方面集体农庄并不比国营农场逊色；具有经济价值和经得住个体农民苛刻批评的集体农庄为数很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地规划非常关注，而个体农民的土地规划只是刚刚开始。耕地交错和相隔过远的现象成了坦波夫农民的一大难题。迁居问题看来是这个省最伤脑筋的问题。

从 1917 年到 1919 年土地分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的说农户数量增加得并不多。然而高达 6% 的无耕地者在两年的时间里下降到 1%，耕作 6 俄亩的农户从 18% 减少到 6.3%。这个过程在那些产粮县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科兹洛夫，无耕地农户的数量从 5.1% 减少到 0.2%；有大约 2 俄亩耕地的农户从 29.9% 增加到 36%；拥有 2.1 到 6 俄亩的农户从 46.5% 增加到 53.2%，而拥有 6 俄亩以上耕地的农户从 18.5% 减少到 5.6%；并且拥有 13 俄亩以上耕地的农户完全消失了，这样的农户在 1917 年占 2.8%（其中 0.1% 拥有 35.1 到 40 俄亩耕地），基尔萨诺夫县（“安东诺夫匪帮”的老巢）的统计资料更为典型：不耕作农户从 9.3% 减少到 0.9%；拥有大约 2 俄亩耕地的农户从 21.3 减少到 13.8%，拥有 2.1 到 6 俄亩耕的农户从 40% 增加到 66%；拥有超过 6 俄亩耕地的农户几乎减少了二分之一，从 30.4% 减少到 16.3%（其中拥有 6.1 到 8 俄亩耕地的农户从 11% 增加到 13.7%，而拥有耕地 8 俄亩以上的农户从 19.4% 减少到 2.6%，即几乎减少了八分之七。同时拥有耕地 16 俄亩以上的农户完全消失了）。

注意!!!

从多少？
600000？
480000？
10~12%？

靠近前线环境
的影响（政权
不稳定性）

正在全俄发生的农民土地平均化的过程正是在坦波夫省发生了闻名全俄国的以十分粗暴的形式进行。无产和半无产农户产差不多已经消失，与此同时富农户也明显减少了。因革命而受到损害的农户不少于60000个。这些在经济上被削弱的富农是1918~1921年期间发生的震撼全省的各种农民暴动的主要支柱：1918年发生的农民暴动卷进了近40000农民。开小差的很多，1918~1919年“绿军”有几千人，这些“绿军”毫无疑问与白卫分子有联系，不过他们在农村并没有得到牢固的反苏维埃组织的支持，没有提出明确的纲要求，也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

靠近残酷和国内战争变化不定的前线，不断受到来自顿河区的反革命的压力、马蒙托夫的袭击，这些情况使人们感到对苏维埃政权是否稳固没有把握，也使苏维埃的常设机关难以站稳脚跟。在这个省落户的有许多部队的逃兵、惯于抢劫滋事的形形色色的战时丧失阶级特性的分子以及公开的白卫分子。几十支红军队伍到过南部各县，他们在这里白吃白喝，却很少为农民经济的需要着想。苏维埃政权带有狭隘的军事行政性质。经济和教育机关不能充分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性工作。实行余粮收集制使这个省负担特别重：这个省的粮食被靠近前线的部队吃光了，农具损失严重，经营水平高的农户数量下降，然而粮食人民委员部仍然把它列为高产省。1919~1920年

余粮收集制的
负担
注意!!!

要在这个省征集 27 百万普特粮食，这一难以胜任的任务，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完成了一半。不过对坦波夫省农民施加的压力绝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产粮”省更重。关于征粮队暴行的种种传说都是言过其实。经过仔细调查确认，这些征粮队总的来说完全按照严厉的法令和通告行事，只有两三例严重违法的行为。1920～1921 年余粮收集任务尽管比头一年削减了一半，还是难以完成。由于播种面积严重不足，收成非常不好，省内大部分地区粮食不能自给。根据省粮食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的资料，人均占有粮食（扣除播种需要的种子，但没有扣除饲料粮）4.2 普特。1909～1913 年的平均粮食消费水平（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为 17.9 普特，此外还有 7.4 普特的饲料粮。也就是说，去年坦波夫省当地收成几乎只相当需要量的 1/4。而下达的余粮收集任务是 11 百万普特粮食和 11 百万普特土豆。要是百分之百地完成这一任务，农民人均只能剩留 1 普特粮食和 1.6 普特土豆。但余粮收集任务仍然完成近 50%。到 1 月份全省已经有半数农民饿肚子；乌斯曼县、利佩茨克县部分地区和科兹洛夫县的饥荒达到了极限（有人吃树皮，有人饿死）；秋播作物已播种完毕，尽管苏维埃政权各级机关施加了异常大的压力，仍比去年少播 2% 面积，春播减少了 12% 面积。同时还应当补充说明，坦波夫省的农民得到的集体供应的承诺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比如说 1920 年让农民自己出车

去拉盐，而行程安排得非常糟)。在使用没收的牲畜及保管粮食和蔬菜方面，粮食委员会机关的工作既马虎大意，又不精打细算：大批牲畜死亡，粮食发热，土豆受冻。

注意!!!

由于缺乏饲料和林业委员会不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农民（特别是北方各县的农民）承担的出畜力车义务十分沉重。

苏维埃政权的
军事行政性质

一般说来，大多数农民都把苏维埃政权与那些外来的对乡执行委员会和村苏维埃胡乱发号施令、动辄以不执行命令（经常是毫无道理的命令）为由逮捕地方政权机关代表的政委或特派员混为一谈，还把苏维埃政权与那些其行为常常危害农民经济、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的活动的征粮队混为一谈。许多农民习惯于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一味发号施令、全然不讲求经济效益的机关。在坦波夫省，这种情绪由于上面提到的种种情况和盘根错节的社会革命党的积极活动而表现得特别明显。社会革命党主要依靠因革命而在经济上受到损害的富农，他们在农村很有势力，常把余粮收集制的主要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头上（各地的余粮收集任务几乎都是“按人口”摊派的）。

注意 社会革
命党人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愈演愈烈。暴动是社会革命党精心策划的。当地的社会革命党组织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 1920 年 5 月 13 日通告信的指示，在农村展开了大量的工作（有几个判决是对英国代表团的献礼）。他们和形形

色色的反苏维埃集团（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人）沆瀣一气，成立了应为发动武装暴动作准备的“劳动农民同盟”。6月10月在亚历山德罗夫乡卡列伊克村原舍什拉夫采夫庄园里举行了坦波夫省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大会，此后他们加紧了发动暴动的准备工作。社会革命党坦波夫省委指示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停止游击斗争，全力投入“组织工作”。而安东诺夫早在1919年就纠集100来名匪徒积极从事反“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在基尔萨诺夫县就暗杀了近200位苏维埃工作者。8月社会革命党省委大部分成员被肃反委员会逮捕。其余一些人盘踞在劳动农民同盟省委员会里并推行了一条十分猖獗的路线。在社会革命党9月全国代表会议上，坦波夫省代表团的表演证明这条路线符合整个坦波夫省社会革命党组织的情绪，会议期间“坦波夫人”对苏维埃政权表现出了一种势不两立的好斗态度，要求立即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武装行动。社会革命党坦波夫省委被肃反委员会摧毁以后，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基本上在组织上不受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各地的社会革命党人各自进行活动，都没有与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而且至今也没有建立起这种联系。他们早在8月下半月就已逐步发动公开的暴动，组织袭击卡缅卡村和佐洛托耶村的苏维埃机关和征粮队。同时成立了“卡缅卡第一骑兵游击团”，从而为组建“国民军”打下了基础。

“劳动农民同盟”

注意!!!

注意!

坦波夫劳动农民同盟纲领是把社会革命党中央通告信(1920年5月13日)推荐的纲领加以修正改写而成的,充分反映了组成劳动农民同盟的那些群体的社会愿望,纲领提出“除罗曼诺夫家族以外”所有公民政治上完全平等,个人有经营自由,工业非国有化,对工业品规定固定价格,但对农产品不规定固定价格,合作经营自由,学校教学自由。劳动农民同盟分子的一些讲话提出了一些很典型的要求来对这个纲领作补充:“为平等、博爱和自由而解放人和马匹”(3月中旬举行的拉斯卡佐沃区非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或者在各个乡会手写的决议中,在匪帮司令部的文告中蛊惑人心地提出“打倒共产党人犹太佬”。

参加劳动农民同盟各级委员会的武装富农完全控制了那些未加入同盟的村庄。抢劫不受惩处(初期),人数不多、力量分散而且指挥不当的红军部队的失利,以及摆脱余粮收集制和出畜力车义务制的前景,由于富农阶层的这些有组织的影响(在坦波夫县、基尔萨诺夫县、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和莫尔尚斯克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科兹洛夫县的部分地区,社会革命党人一富农的影响格外有组织),驱使农村的主要阶层起来支持暴动。

到1月中旬,暴动的组织已经有一定规模:

(1) 在5个县组建近900个由乡会选出的村委员会,由这些村委员会组成劳动农民同盟的乡委员会、区委员会、县委员会。

(2) 劳动农民同盟委员会行使政权机关的基本职能。在军事方面它组织志愿人员的补充兵员，或根据“司令部”的命令动员人们参加匪帮在本地区招募的团。它还为游击队收集捐款、粮食和各种物品，为他们安排医疗服务，向他们的家庭提供帮助。委员会通过“管理处”来安排匪徒们宿营，为他们更换马匹、组织通讯联络和侦察活动。委员会为了配合同小股“红军”和“红军”同情者进行斗争、维护通讯设施，组建了“内卫队”（村内卫队为5—50人）。劳动农民同盟委员会还从事一般性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

“游击部队”
——农民民兵

注意!!!

(3) 匪徒根据地区原则建立了一些“团”。纸面上存在精确的编制，而在实际上这些“团”不过是组织程度不等（含2个到7个骑兵连）、人数不等（200到2000名骑兵）、装备不齐（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武器）的乌合之众，他们多数是骑兵，步兵很少见。虽说司令部拟定了许多精确的命令和指示，但是很少能执行。各个团都有很正规的骑兵侦察队、机枪队、骑兵通讯队、组织良好的办事机构、后勤处、马匹调换处、辎重队（按编制已大大削减，而实际上还十分庞大）、团军事法庭、有时还配备一名专职“刽子手”、政治处（政治工作人员）。纪律条令明确规定了惩处的主要方法是鞭打（从班长有权抽打两鞭子到团长有权抽打20鞭子，超过此数由军事法庭判决）和枪决。反抢劫、酗酒和赌博的斗争，虽然从一些命令来看在大力进行，却没有取得任何成

效。

通过“总司令部”和许多“游击团”的工作可以看出他们中的确有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并且在努力认真地组织“部队”，然而首领之间不和、士兵不守纪律成了他们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不和还表现在高层指挥人员中。每个阿塔曼都想当总司令，例如“西部集团军司令”瓦西卡·卡拉西、“北部集团军司令”谢良斯基等。安东诺夫自命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他确实是11月14日举行的“游击团”指挥员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5人小组之一。但是由于他热衷于搞独立行动，劳动农民同盟省委员会显然拿他与时常独自冒险的“第1集团军司令”托克马科夫相提并论。1月15日由“巴季科”（劳动农民同盟省委主席普卢日尼科夫）主持召开的省军事会议作了统一总司令部的尝试，会上决定保留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直接由安东诺夫指挥）及其司令部，由省委统一指挥，两个司令部各派3名代表参加省委。（这项决定遭到第1集团军各“团”代表会议的否决，他们要求根据各团的在编数（第1集团军有10个团，第2集团军有4个团）按比例确定代表名额。）“游击队”的统一指挥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通常重大行动都要事先经过各游击队代表开会协商。这一时期有番号的团达20个，此外还有几个独立支队，安东诺夫始终带着一支“独立团”，其成员都是经过特别挑选而且装备精良的亡命徒。2月份他

们的战斗兵力达 40000 人，其中大部分是逃兵，只有少量素质很好的军人（来自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前线）。除了“野战”部队，“内卫队”的兵力达 10000 人。

匪徒们由于得到当地居民有组织的协助，很少受到损失，而且行动非常灵活，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他们采取的战术是用密集的骑兵对我们的麻痹大意的小部队大包围后突然发起进攻。对我军的进攻他们几乎从来不迎击。火力常常组织得不好，命中率很低。他们不断袭击我们的营地，破坏道路和通讯设施。他们一贯对我指挥人员，特别是共产党员与普通红军战士区别对待。红军战士被俘后，他们通常予以释放、发给通行证并劝说他们返回家乡；而对红军指挥人员和所有共产党员则进行严刑拷打，然后处死。

“游击队”消息灵通，说明他们的密探和情报机构组织广泛，一度甚至安插进省肃反委员会和党的县委、铁路部门的领导系统和我们的军事机关及经济机关（尤其是基尔萨诺夫县的）。“安东诺夫分子”及时地了解到了我们调遣部队的情况和运送军用物资及粮食的情况，从我们的军械库和医疗部门获得补给。

我们的组织状况

注意!!!

到 1921 年 1 月，我们用总人数不过 3000 名步兵的几支部队来对付这支以劳动农民同盟各级委员会网为依托、受到所有反革命势力支持的有组织的农民军队。5 个县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几乎全都躲进了城里；农村党的组织完全遭到破坏，

党组织没有能及时地有计划地把党员集中起来离开发生暴动的村子，以致有几千名党员惨遭杀害。此外党组织经受了1920~1921年冬的严重危机——纪律松懈，腐蚀性影响严重（蛊惑性的民主、工人反对派），有1/2的党员脱党。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省党代表会议吵得不可开交。在1月和2月期间省委事实上已不存在：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领导，反盗匪活动的斗争措施混乱，——先是没有力量，却打算实行红色恐怖（烧毁村庄），后来却又突然准备同匪徒“和解”，不分青红皂白便释放了800名被捕的农民。从1月中旬开始，调来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新部队，任命巴甫洛夫^①为该部队司令，但是这支部队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这里的特殊情况，军需供应很糟，政治工作缺乏，各司令部机关人力不足，又不可靠（从当地人中挑选的），肃反委员会和特别部还是空缺。一些部队（由当地的逃兵组建）从士气来看很成问题。侦察工作非常糟，与各个村子的联络极差，有关敌人的多少准确一些的情报都是靠空中侦察获得的。

成立全权委员会。 只是在2月份坦波夫省的情况才引起中央的
它的主要任务 严重关注，但是由于把军队调去平定喀琅施塔得
和工作计划 叛乱，大大延误了关于坦波夫省盗匪活动的各项
决定的实施。但该省逐步得到人员和资金大量补

^① 巴甫洛夫，帕·安·（1892~1924）——1919年加入俄共。曾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充。2月底在坦波夫省建立了盗匪活动清剿全权委员会，一批肃反工作人员和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到达当地，同时被动员来的人员已开始陆续投入播种运动。全权委员会立即确定了当前工作的基本任务：

(1) 通过精心实施的军事、政治行动使农民基本群众对盗匪活动保持中立，把盗匪活动限制在某些富农阶层中，并说服富农阶层，要他们明白支持暴动对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好处；进一步激发农村中的中农阶层和贫苦阶层积极参加反击盗匪的斗争，给我们以大力支持。

(2) 在军事方面，紧密配合上述任务，迫使匪徒们放弃他们的主要基地，在“野战”中将其击溃，并牢固地、长期地占领这些基地，进行长期的清洗工作和重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3) 肃反委员会和特别部的任务是，收集“游击队”、“内卫队”和劳动农民同盟各级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查明劳动农民同盟与一些苏维埃机关的联系，并截断这些联系，消灭反革命的领导组织。

为此于2月底制定了下列具体计划：

(1) 加强党的组织（召开省紧急党代表会议以改选省委），采取一系列坚决的战斗决策，通过严厉党内惩处和相应的党的工作来克服蛊惑性民主，开展加强党组织和动员党员上“剿匪前线”的双周活动。

(2) 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些

注意!!!

措施包括加强集团军政治部的工作，安排好部队的供给，改善红军战士的生活，改组后的革命军事法庭进行坚强的工作：清洗各司令部、清理通信联络机构、将不可靠的部队调离该省。吸引红军战士从经济上多方面帮助农村。

(3) 清理并加强省肃反委员会和特别部的机关（尤其是农村情报员网），对被捕人员的案卷进行整理；仔细研究匪帮行动的路线图和各个区、村镇在暴动中的作用；列出铁路员工、中小学教师、合作社工作人员等中间的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根据中央的指示与其他省进行“商品交换”；在部队和机关（特别是在军需库）组织内部举报，以便截断反革命分子的联系。

(4) 列出匪徒及其家属的名单，根据1917年的调查统计资料制定出匪徒控制的村子里的富农家庭花名册，并向中央提出将这些家庭迁出该省的问题。

(5) 在确定的匪徒暴动主要基地的地区有步骤地实施武装占领制度。

(6) 与此同时开展广泛的政治运动，目的是使农村中的基本群众投向苏维埃政权方面：举行非党代表会议，以便查明农民不满的具体原因，向他们阐明新法令的实质，尽可能地满足非党代表会议提出的要求，严格审理代表们要求立案的案件。

(7) 开展确立“革命法制”运动，即在各县建立拥有全权的3人特别小组，检查指导司法行

政机关的工作，审理对司法行政机关的申诉，监督尽快和正确地处理这些申诉。对匪徒和犯罪的苏维埃工作者进行公开审理。报刊和代表会议讨论我们存在的混乱问题时实行广泛的公开性。

(8) 在农村加强进行有关新法令问题的鼓动工作，本着吸引农民自己相互帮助的精神开展播种运动。

(9) 基于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已有转变，开展在村里宣判匪徒和组建农民自卫队（帮助我们的军队）的运动。

实施计划

这项计划已在3~4月份由全权委员会实施。

(a) 党的工作

(1) 3月初举行了省紧急党代表会议，会上选举了新的省委（扎宾、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和我又重新入选省委），通过了肃清最近一次例行代表会议带来的“蛊惑性民主”影响的决议和授权省委就组织纪律问题采取非常措施的决议。3月底进行了“加强党建双周活动”和其他活动；从4月起党的各级委员会开始通过举办讲座的形式研究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策略，为检查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对这些党组织作了清理和整顿，完成了一系列党内动员工作，动员党员投入播种运动和奔赴剿匪前线。

(b) 军队政治工作

(2) 截止5月份，加强集团军政治部的工作因力量不足未能做到应有的程度，但是此项工作在4月份还是进行得相当有条理——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已经明确，政治委员，特别是各司令

部的政治委员已审查完毕。部队已逐步从就地征粮转向由我们供给，派购工作和其他工作已经结束，不过6月前对部队的粮食供应仍没有充分保证。5月中旬前被服装具供应工作同样极糟。然而由于集团军政治部和部分革命军事法庭加强了政治工作，再加上部队的供给有了一定的改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提高了，司令部的改组（用新调来的人员取代了“当地”工作人员，特别部的工作得到加强，已经有可能清除部队中的瓦解分子）对此也有所帮助；一些不可靠的部队全部被调离坦波夫省。大批红军战士投入播种运动，仅科兹洛夫一县，红军战士就为农民耕地1000多俄亩。

(c) 肃反委员会

(3) 经过新来同志们的积极努力和省委的直接帮助，到4月初，肃反委员会和特别部机关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并展开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预定的工作计划全部完成。到4月底，打游击的匪徒名单已分别列出（约10000多名），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可疑分子的名单也已列出；情报人员网已经铺开（为他们拨出了活动基金），并且情报工作终于走上正轨（在3月中旬时，情报工作还搞得很糟，当时经常由于司令部夸大了敌人要发动进攻等等的传闻，在坦波夫弄得人心惶惶），反革命组织的联系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匪徒的供给来源业已查明。坦波夫县12个乡的富农分子名单已列出，强制这些富农家庭迁出该省，铁路员工、中小学教师等进行“商品交换”

等问题已向中央提出。

(d) 武装占据

(4) 3月初制定了一个武装占据的精密计划，并且考虑到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且也是经济上的需要。坦波夫—博里索格列布斯克铁路与坦波夫—基尔萨诺夫铁路和萨拉托夫省界之间的地区被划作武装占据的主要地区。这个地区包括“安东诺夫分子”的主要基地，3月初安东诺夫被逐出该地区。预计在这个地区的若干地点（基尔萨诺夫县有6个点，坦波夫县有4个点）部署长期守备部队，作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支柱，最大限度地集中苏维埃和党的力量来帮助各级革命委员会。除了兵力为少于一个步兵营的长期守备部队外，每个管区专门配置骑兵集群（以骑兵为主），以对付“野战”匪徒。对于那些被逐出武装占领区的匪帮，将派专门的骑兵集群继续追击。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细则，后来又补充了组织农民乡纠察队（帮助我们的军队）的工作细则。专门动员来的一大批同志和中央派来的开展播种运动的一大批同志都被调往这个地区。为基尔萨诺夫、坦波夫和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县拨出了用于奖励特别奉公守法的村子和户主的特别基金。然而由于我们部队未能成功地包围安东诺夫（3月底他带着匪徒主力杀回家乡，使我们在这个地区遭到了一系列丢脸的小失利，特别是在拉斯卡佐沃村），预定于3月底4月初进行的武装占据的工作中断了，这项工作只有在4月底对匪徒作战取得一系列决定性胜利时

(从匪徒手中夺回我们在不同时期丢失的全部火炮和机枪，匪徒的精锐部队遭受重创并再一次被逐出他们的主要基地)才能恢复和重新展开。

(e) 政治运动

(5) 政治运动也在按既定计划进行。2月份就已开始举行的非党代表会议到3月份普遍召开。3月10~16日召开的省农民代表会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次会议通过了告游击匪帮参加者书，敦促他们停止反对苏维埃政权、使农民破产、让劳动人民的敌人从中渔利的暴动。会议还通过了一些有关粮食问题、播种运动和出畜力车义务制等方面的决议。代表会议极为鲜明地表现出了农村各主要阶层的思想状况。

①对工人专政不满，“我们这叫什么工农政权，实际上是工人政权，是统治农民的政权”——这是许多代表在会上发言中表现出来的共同想法；“政权首先应当属于农民”，因为农民是国家的主要力量，这是非常明确地提出的政治要求（发生了一件十分典型的事：有人极力主张从一位代表提出的给列宁的致敬电中删去最后一句口号“工农政权万岁”，或者把“工人”和“农民”两个词的位置换一下，他们说“农民应当排在前面”）。对工人专政不满首先是因为对粮食政策（对粮食代办员和征粮队的行为）不满，对农村的不讲经济的态度（“烂掉了粮食，死掉了牲口”，“自己掌管土地，却不会使用”，“出畜力车义务制使许多马匹死掉了，不作准备就乱干”，等等）感到不满。

②对地方行政人员和某些部门负责人行为不满（“法令好是好，但是一到了地方就变了样”，“受贿”，“把自己凌驾于农村之上”）；觉得苏维埃政权不像是本地有机发展起来的，倒像是外部强加的，地方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只会发号施令，而且往往是瞎指挥。

③但是农民终究没有想出任何一种可以取代苏维埃的明确的国家制度形式，而鼓吹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和召开立宪会议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在省代表会议上，会议主席团部分成员在决议案中提出了“选举自由和不分阶级地给予全体公民平等权利”的要求，但是毫无争议地被取消了，因为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至今都是由我国国家体制发展的“战时”特点决定的，并非是这个政权的实质与小私有农民的政治意向发生了有机的对立。

④因此在红军与安东诺夫匪帮的斗争中，农民中的主要阶层都保持一定的中立：他们没有表现出特别赞成劳动农民同盟纲领提出的全国性要求，认为“白军与红军”的斗争在经济上对农民没有好处（这些农民从来不把“安东诺夫分子”和红军说成是“我们的军队”，而称前者为“白军”，称后者为“红军”，他们所希望的首先是不受打扰他们的经济工作）。他们不相信我军是坚不可摧的，不敢公开支持红军，因此他们拒不接受必须全村作出反对匪帮的决定和组织抵抗匪徒的自卫队的提案。但是他们非常拥护苏维埃机关

关心他们的经济的种种表现。

⑤他们对于省取消余粮收集制、实施扶助农民经济的法令和从余粮收集制改行实物税的消息非常满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代表会议结束时他们对待苏维埃政权及其代表的态度十分友好。

满足农民的要求

省非党农民代表会议结束后，我们立即满足了会上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

①关于粮食问题，允许凭需要证明在省内自由购买粮食，为开办油坊和风力磨坊提供了方便，规定用征收的粮食来首先满足本乡缺粮农民的需要；还规定向完成收购任务不少于50%的村（而不是乡）供应一定数量的布匹、盐、煤油，在个别情况下根据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县粮食委员会的决定也向完成收购任务不足50%的村供应上述物资。

②发布了关于调整出畜力车义务制和在农忙时减少运输任务的通令。

③在土地规划方面，已命令林业机关简化供应迁居者建筑材料的手续，由省农业局制定土地规划4年实施计划（制定此项计划时要考虑6年的需要，由土地测绘学院拟订一份草案）。

④建议省代表会议推选出进入省播种委员会的代表，决定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进行突击检查，目的在于把它们改造成示范实验机构。

⑤根据代表们的申述，对某些负责人员和红军部队滥用职权的行为立即进行司法调查。

⑥加强“革命法制”和“公开性”的运动因

缺少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开展得不够充分。各县都组建了检查指导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全权3人小组”，但是他们的工作进行得不够深入。这些工作包括收集有关滥用职权的粮食工作者的材料，并将这些工作人员调离，将个别人免职和交付法庭审判（特别是在科滋洛夫县）。大规模公开的政治审判搞得太少。报刊上的公开性为庸人们“激动的思想”打开了某种阀门。

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开展了播种运动（尽管省播种委员会制定和下发有关细则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迟缓）和宣传落实新法令的运动。在所有这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各村作出反匪徒决定和组织乡农民自卫队的运动（成效不大）。由于武装占据了匪徒的主要活动区和我军剿匪接连取得胜利，全部政治工作以3月25日开始的“匪徒投案自首双周”活动作为结束。这项活动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县持续到4月20日，其他地区均于4月12日结束。

出版工作

由于开展了这一政治运动，各地的出版工作很有起色；一个月的出版物超过了11月—2月（这期间出版的各种小报、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不超过180000份）的一倍，从2月20日到4月1日印刷出版了13种小报，共215000份，这些小报谈到的题目有：“列宁对坦波夫农民的讲话”、关于农民自卫纠察队、关于反匪徒的决定、关于匪徒投案自首、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省非党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关于帮助

遭受饥荒的农民等等。

6种小册子的题目是：《匪徒活动真相》（25000份）、《给红军战士的训示》（10000份）、《给休假者的指示》（5000份）、《春播地的播种计划》（10000份）、《关于加强农业的法令》（7000份）、《共产党人识字课本》（6000份），以及2幅宣传画（各500份）。开始出版专门的农民报纸：《坦波夫庄稼人报》（共出版36号，每号为15000份）和《庄稼人》杂志（面向全体农业工作者，每期发行量为5000份），出版了一期专刊《红色庄稼人双周刊》（5000份）。

除了通常的定期出版物，这里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中央的书刊。没有为他们提供纸张（为了保证出版用纸不得不采取革命手段），也没有为改进印厂设备和扩大印厂提供任何帮助。

匪徒投案自首 双周活动

“匪徒投案自首双周活动”总的来说成效不大，在3月末和4月初由于我军军事上失利而中断了；只有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县，由于当地的匪帮被歼灭，投案自首活动取得很大成果，投案自首者达4000人。按照承诺，所有一般成员都被释放回家（尽管只有很少人交出了武器），而“组织者”也给以从轻惩处。在所有5个地区，投案的匪徒共达6000人。这项活动至少加剧了“游击团”的瓦解和匪首与一般成员之间的矛盾。总的政治局势也有助于这种瓦解，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对农民的政治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政治运动。在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下，加上4月

农民的转变

底安东诺夫主力部队遭到失败，我军坚强的守备部队牢固地占据了匪徒的主要控制区，农民的主要阶层的情绪大为转变，开始敌视盗匪活动。

扎根于富农的盗匪活动完全烂掉了。安东诺夫分子抢劫来的物资（50多个国营农场、几家酿酒厂和其他工厂遭到洗劫）已经挥霍完，富农也压缩了自己的援助，匪徒们转而通过专门的收粮队强行分派的办法收集粮食。由于在全省流窜，匪徒们的马匹损失严重。农忙开始了，匪徒们却强行夺走马匹。起初他们抢“苏维埃”村的农民的马匹，后来又抢“中立”村的农民的马匹。不再有人志愿加入匪帮，对和平劳动和向苏维埃政权投案自首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因此匪徒们成立了缉拿逃兵委员会，残酷地惩罚逃兵，千方百计干扰田间播种，到处胁迫农民加入匪帮。由于受到这些强制手段的威逼和对苏维埃政权抱有好感，有时则由于一些复员军人的直接发起，许多村子的农民都开始起来反抗匪徒，一些地方开始帮助我们的军队（从前这种现象是极为罕见的），对此匪徒们加强了恐怖行动（杀人、放火，等等）。农村分裂了，一部分村子明确敌视“白军”，而另一部分村子仍在积极从事盗匪活动。中间的村子则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而在这些村子里，一些阶层（富农阶层）对其他群众实行大多数农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军事组织专政，而其他群众对这一专政日益不满。随着我军武装占据战果的扩大，在匪徒占据的村子里连最顽固的富农

分子也越来越动摇，他们已经意识到同红军斗争毫无希望。许多村子，特别是匪徒占据的村子，如卡缅卡、帕诺维、库斯特、巴哈列夫卡和坦波夫县的上斯帕斯科耶，5月初宣布他们承认苏维埃政权并要求批准他们恢复苏维埃（其中有些村，例如匪徒活动十分突出的村子捷基诺要求本地出身的匪徒主动向苏维埃政权投降）。富农已开始拒绝支援逃兵、土匪的叛乱，于是叛乱逐渐收缩为少数匪徒的活动，日益失去农村中广大农民的支持。不过坦波夫的富农不再直接支持叛匪，并拒绝与苏维埃政权直接交战，却不肯放下武器（把武器妥善地藏了起来，极少有人交出来），也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组织（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村子里，除了重新建立并公开进行工作的苏维埃外还有秘密的劳动农民同盟的委员会）。

农民情绪的这种转变为全权委员会转入与匪徒展开无情的斗争提供了可能。肃反委员会和特别部已于4月底将这一斗争所需要的主要材料准备好（匪徒及其家属名单等）。肃清匪徒的运动是从4月底开始的，事先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出版工作

与此同时，出版工作也没有放松：4月份出版了13种小报（关于投案自首、匪徒的暴行、对劳动农民的帮助、对待一般匪徒的政策，等等），共15000份；5种宣传画，共10000份；4号《坦波夫庄稼人报》，每号15000千份，2期“五·一”专刊，共30000份，等等。

从5月1日为开
展新运动作准备
(扣留人质)
第130号命令

更换指挥员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派遣新的工作人员（约1200名军人共产党员）和新的部队（军校学员），这些新的工作人员和部队需要加以安置和指导，这一切多少拖延了新运动的开展，然而却为更加广泛地开展新运动提供了可能。5月头3个星期用于指导革命委员会成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调动部队，筹建集中营，发布和传达有关命令、工作条例、清查的形式，为部队调拨补给品和粮食（6月初有些地方的部队已经在挨饿了）。对整个运动的计划作了修订。仍旧以武装占据体制为主，只是由于大批新力量的抵达，实施武装占据的地区扩大了。在这个地区划分出匪徒活动重点村，并对这些村采取群众性恐怖手段，因为对这些村作出了特别“判决”，历举他们对劳动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把这里的所有男性居民送交革命军事法庭审判，所有匪徒家属均作为匪徒的从犯投入集中营，当作人质并给匪徒投案自首规定两周的期限，超过规定期限者，将其家属驱逐出本省，并全部没收其家庭财产（在此之前实行有条件的查封）。同时进行逐个搜查，一旦发现藏有武器，将户主就地枪决。规定实行这一措施的第130号命令已公之于众。为了领导这次战役以及整个剿匪工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各管区成立了直属全权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作战部主任、政治处主任、特别处主任、管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管区党委书记（委员会的主席由全

权委员会任命)。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已得到贯彻第 130 号命令的明确指示,其中规定了扣留人质的办法,指出对待红军战士家属要格外慎重,不准拘捕病人和有哺乳婴儿或怀孕的妇女,等等(清查和没收财产)。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必须每天通过电报报告一次情况,每 3 天通过一定的形式综合汇报一次。为将各个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的材料进行汇总,全权委员会设立一个情报处,司令部设立隶属作战部的特别“行政处”。对筹建乡村民兵的工作我们也格外予以重视;按照中央的决定,向坦波夫省派遣几千名前红军战士(1897 年出生的),以充实民兵,他们一到这里便接受专门的短期培训,发给每人详细的工作细则作为指导。对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细则重新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俄肃反委员会全权代表列文同志和乌博列维奇^①同志)已结束了在对 3 个管区的巡回指导。计划 6 月 1 日开始行动。

171 号命令

没过多久,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代表会议(于 6 月 9 日召开)就发现采取的措施不得力:匪徒家属纷纷外逃,躲到了各自的亲戚家;还有一些匪徒拒不交代身份;上缴的武器数量极少,劳动农民同盟省委员会为对抗我们的第 130 号命令而颁布了自己的命令——扣留红军家属和苏维

^① 乌博列维奇,伊·彼·(1896—1937)——1917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在南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任集团军司令。1922 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7 年被处死,后平反。

埃工作人员家属作人质，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些地区在执行这个命令时的手段极为残忍（干脆把红军家属几十个几十个地杀掉）；有些地方的公民、有时还有红军部队出于对白色恐怖的害怕而请求别去触动匪徒家属。但是，许多地方的农民还是积极支持我们的，盗匪活动在农村业主阶层中彻底丧失了支柱。鉴于上述情况才制定了加强对匪徒、匪徒家属及窝藏犯的制裁的第171号命令。同时又指出：在贯彻第171号命令时不要分散力量，要在盗匪活动最为猖獗的一定地区毫不手软地集中贯彻。第一管区是各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正确贯彻第171号命令的典型。由于坚决执行扣留人质的制度，在不交出武器和盗匪活动积极参与者之前分批公开处决人质，匪徒负隅顽抗的帕列夫乡被制服了。我们在肃反工作和军事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对这项工作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肃反委员会切断了匪徒借以获取给养和消息的一切联系，大批放逐可疑分子（昔日的反苏维埃政党的党员），揭露并彻底消灭了为安东诺夫分子效力的反革命组织（显然是指萨文柯夫—立宪民主党组织），抓获了劳动农民同盟省委员会中最有影响的委员（该委员会主席在7月10日后被击毙）和“总司令部”成员，查清了匪徒的秘密所在地及其仓库。

军事行动

早在5月份就分崩离析的几股匪徒，在农民情绪急剧转变的情况下，于6月上半月遭到致命打击（以科诺普科的摩托化支队为主在2~8日

先后摧毁了安东诺夫的第二集团军和博古斯拉夫斯基的第一集团军)。匪徒们为恢复战局而进行的垂死挣扎曾几度暂时得逞(击溃了几支部队:缴获了伏尔加左岸军区骑兵师的2挺机枪、击毙45人;缴获了骑兵军校的4挺机枪、击毙近40人;缴获了摩托化支队的3辆汽车和5挺机枪),但是这一切并未能使他们挽回败局;6月底,卡西“旅”匆忙破坏了从坦波夫到基尔萨诺夫的铁路(烧毁了几个车站和几座桥梁,洗劫了两列火车,等等)。但是到7月初,匪徒的残部被我们的部队逐一消灭。我方5月初侦察确认匪徒人数为21000人,到7月中旬只剩下几百人,其余的人有的被击毙(6至7月有近2000名匪徒被击毙)、有的投诚或被抓获,有的逃之夭夭(卡拉西最近被击毙,安东诺夫的左膀右臂——库兹涅佐夫正在为投降进行谈判,中了埋伏被抓获的各匪帮的12名重要头目被处死,等等)。

出版工作

这一时期(5月~7月10日)所做的出版准备工作包括:10种小报(326000份)、发给个别乡的8份决议书(2300份)、查抄和没收财产工作细则(15000份)、就7个有关问题发给鼓动员的宣传提纲专页(17000份);11种小册子:《匪徒活动真相》、《给红军战士的指示》、由全权委员会起草的《致红军中的共产党员》、由集团军政治部起草的《致军人共产党员》、《社会革命党》、《对野营训练的指示》、《复员军人手册》、《给民警的指示》、《给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的指

示》、列宁的《论粮食税》、《坦波夫庄稼人手册》、总共为 109000 份，宣传画就有 2000 份。集团军政治部还专门出版了 16 号（每号 10000 份）《红军战士报》和 12 号（每号 15000 份）《坦波夫庄稼人报》。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还出版了小报，有时还出版了专门的报纸（如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和科兹洛夫）。

军校学员

参加野营集训的军校学员使运动的开展有所延缓，因为他们的所在地是匪徒经常出没的一个主要地区，但是在 6 月中旬之前他们没做任何工作，6 月中旬才接受了名为第六管区（从第一管区中专门给他们划出的管区）的明确战斗任务。

农民自卫队

农民情绪的急剧变化为我们组建对付匪徒的农民自卫纠察队奠定了基础：从 6 月底开始，许多乡都组建自卫队协助乡村民兵和我们自己的军队开展工作。自卫队在作战方面接受军事部门的指挥。民兵则全面地服从军事部门的指挥。为了保护铁路，早在 4 月底就实行了从铁路沿线村庄抓人质的制度，6 月这一制度又扩大用于保护电报网和野外道路桥梁；7 月决定不再为上述目的抓人质，而把人质留在村里，但指出，这些家庭要首先对破坏铁路的行为负责，等等。

运动的总结

根据管区政治工作委员会的极不完全统计，6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由于贯彻第 130 号和第 171 号命令，取得了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果。

科兹洛夫县、莫尔尚斯克县、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县和基尔萨诺夫县都结束了组建革命委员会

的工作；坦波夫县境内到处都已组建乡革命委员会，总共325个村中只有64个村没有成立村革命委员会。据政治工作委员会6月1日至7月2日的统计：抓获匪徒1748人、逃兵2452人；投案自首的匪徒1449人（其中近400人携武器自首）、逃兵6672人。以上各项合计为12301人。扣留单个人质3430人、913家。没收财产的农户为157户，烧毁或拆除的房屋有85幢。最近一周被抓获的匪徒—逃兵达16000人，1500家，没收财产的农户达500户，烧毁和拆除的房屋达250幢。300多个匪属家庭在匪徒投案自首后获得了自由。缴获的武器如下：大炮1门、机枪16挺、步枪近2000支、能装备150挺机枪的备件仓库1座，等等。开设了几座粮库、装备了一所设有150个床位的医院，等等。

劳动农民同盟被摧毁：它的省委员会被取缔、乡委员会和村委员会被抓获；安东诺夫的“总司令部”被摧毁。由劳动农民同盟领导的反革命组织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为匪徒提供物质保证的渠道被切断。

光是在坦波夫县和基尔萨诺夫县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红色恐怖。然而这些县采取的办法各不相同——基尔萨诺夫县北部的农民由于经常受到政治鼓动，很快就开始协助搜捕匪徒的工作；匪徒活动猖獗一时的帕列夫乡的农民在几个富农人质被处决后开始交出武器和匪徒。第六管区的军校学员通过政治工作、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帮助农民

干农活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这里很少实行红色恐怖，但匪徒的恐怖活动仍很猖獗，匪徒经常成批几十个几十个地杀害红军战士的家属。

匪徒活动猖獗的另一个县，即坦波夫县的几个乡采取的措施极为严酷：别洛梅斯特纳亚乡和德沃伊尼亚乡的农民拒不交出武器和匪徒，直到处决了两批富农人质后才交了出来。这里共处决了154名匪徒人质、逮捕了227个匪属家庭，烧毁房屋17幢、拆除房屋24幢，并将22幢房屋交给贫农使用；在埃斯塔利斯卡亚乡，处决人质和匪徒75人、烧毁房屋12幢、拆除房屋21幢，由这两个乡农民揭发和部分交出的匪徒达300人，上交步枪118支、短筒枪25支、左轮手枪10支，等等。

在别洛梅斯特纳亚—德沃伊尼亚乡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他们于6月27日打退了卡拉西匪帮的进攻。劳动农民同盟省委员会所在坦波夫县卡缅斯克乡，在所有男子都被扣押后才投降——供出了仓库和秘密通道，供出了许多匪徒头目，其中包括劳动农民同盟省、区、乡和村委员会的委员，地方“内卫队”和几十个匪徒主动投案自首。克里沃波利亚尼耶村的村民在13名人质被处决后供出了机枪备件库的所在地，供出了几个匪徒和谢良斯基匪帮残部的窝点。在6月1日至7月10日这段时间，坦波夫县主动自首的匪徒携武器的有59人、未携武器有906人、逃兵1445人；被抓获的匪徒和逃兵分别为1455和

1045人。549个家庭被抓为人质，295家被没收了全部财产，拆除房屋80幢，烧毁房屋60幢，处决匪徒591人、人质70人、窝藏犯2人。

粮食困难

农民在5~6月份面临严重的粮食困难。乌斯曼县、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县、利佩茨克县和科兹洛夫县所属几个乡的农民在新粮收获前吃光了糠秕和槲蕻。工人由于得不到口粮而发生骚乱——格里亚齐、勒季谢沃和坦波夫车站机务段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在逮捕和解雇了工人后罢工才平息下去。坦波夫省利佩茨克县的制革工人、享受穿制服待遇的工人和修理厂工人也发生了骚乱。省工会理事会等在全权委员会支持下采取的措施没有收到实际成效——采购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商品交换达不到预期效果，其原因是当地市场物品匮乏，跨省市场实际上又不容许建立。只有到联办菜园收成上市后，情况才会有所好转。

党的组织

由于工人情绪的变化，党组织在工人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党组织本身的腐化征兆（酗酒、群众性纷争和各集团纷争、无纪律）依然存在。为同这些现象作斗争，派出了专门委员会，党内法庭、肃反委员会也参加了斗争，还对在一地工作时间过长的人作了调动。又动员了几十名同志去参加反对盗匪活动的斗争——仅科兹洛夫一个县就动员了上百人。他们花大力气做了大量工作，省委的报告已经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我要指出的是，粮食运动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开办了省粮食视察员训练班，宣传提纲以及列宁和雅

罗斯拉夫斯基论粮食税的小册子已各出版了10000份，有关粮食工作的各项指示的汇编本《粮食工作者手册》已准备付印，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讨论了有关粮食运动的问题。确定8月15日开始开展粮食月。《消息报》每天都有粮食工作者专版。出版了《庄稼人手册》（10000份），对农业经营和粮食税问题作了必要的说明，等等。

总结

总的说来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

(1) 匪帮的武装力量已被摧垮：5月初有近20000名匪徒在活动，目前仅剩几百人。

(2) 各路匪徒根本得不到农村业主阶层的支持。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匪徒抱明确敌视的态度并愿意组成自卫队帮助我们的民兵和军队开展工作。

(3) 各地的劳动农民同盟组织几乎都被摧毁，匪徒的民兵体系以及通讯、侦察和物资供应机关也被摧毁。

(4) 但是基尔萨诺夫县和坦波夫县的一些村子仍存在亲匪徒情绪和匪徒组织。没收的武器数量少。多数农民有观望和不信任情绪。（传说）许多匪徒暂时都回家了。

(5) 产生上述情绪的原因在于：因播种面积不足而歉收和收成好坏相差很大，缺粮省传出的谣言闹得人心惶惶，还有谣言说红军马上就要撤离。

(6) 这一地区的武装占据几近完成，已开始

转入在各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常设机关。

(7) 各地都有了乡村民兵，乡村民兵和已开始组建的农民自卫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8) 党组织削弱了、过于疲惫，工人群众中正在滋长着反对派情绪，农民组织（党支部）刚刚开始整顿。党组织的人数由去年的 14000 人下降到 5000 人。军队中的党员也近 5000 人。

(9) 集中营里扣留的人质达 5000 人，但没有下达放逐他们的指示。

(10) 铁路工人仍然是反革命组织的中坚；而且调动铁路工人的问题实际上至今未获解决。

目前的措施

我在最近的一次报告中谈到了目前必须采取的措施：首先要在一年内在坦波夫省保留足够数量的驻军，把军校学员留到 10 月 1 日，保留集团军政治部、省肃反委员会和特别部的机构及力量；保留直属总司令领导的全权委员会和军事指挥机关；对全权委员会的各项建议给予必要的支持（把铁路工人从梁赞—乌拉尔一线调出，放逐匪徒家属、巩固乡村民兵的力量、组织农民自卫队、举行非党农民代表会议（省代表会议定于 8 月 25 日召开）、改选乡、村两级苏维埃（从 7 月中旬开始）并召开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然后召开省苏维埃代表大会，8 月 15 日召开省党代表会议。通过补充新同志和工作调动等途径增加省内党和苏维埃工作者队伍。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省内的粮食供应形势问题。

今年的收成低于平均年成。少播种的面积比去年多（少播种秋播作物的面积比去年增加2%，少播种春播作物的面积比去年增加12%）。该省又一次面临着饥荒的威胁，但是粮食人民委员会却依然认为该省是产粮区，并要求把去年贷给的一半种子调给萨马拉省。应当确认坦波夫省的农业极度衰退，近期内非但不能从这里调走粮食和饲料，而且还要：

- (1) 由中央解决省内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 (2) 像扶持重点企业的工人一样扶持缺粮省的工人。
- (3) 免征坦波夫省的国家税，并降低地方税额。
- (4) 允许农民去乌克兰筹集种子。
- (5) 向坦波夫省提供足够的货币和商品，以便为挨饿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购买粮食。
- (6) 加紧向坦波夫省投放犁及其他农具。
- (7) 绝对停止从坦波夫省调出马匹（4个主要县的马匹都被匪徒折腾垮了）。

针对坦波夫省情况制定的措施就是这些。

结论

总结坦波夫省的经验，应得出以下结论：

(1) 农民暴动是在农村小私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普遍不满的基础上爆发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地对小私有者实行了强制，很少考虑农民经营的特点，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教育方面对农村都丝毫没有提供服务。

(2) 靠近前线的各省容易发生农民暴动，因

为这里的苏维埃政权长期不稳定，势单力薄，常常带有军事行政性质。

(3) 农民暴动的核心力量是富农阶层，首先是那些由于革命而在经济上吃了苦头、有时甚至还跌入“贫农”行列的富农，这些富农是农村中最有文化、政治上也最成熟的阶层。他们急欲恢复自己的经济权力，是社会革命党人宣传的最适宜的土壤。他们把对共产党人的仇恨转化成对工人阶级的仇恨，自觉不自觉地力求推翻工人阶级的专政——他们认为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军队”是抵制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战胜农村基本群众的必要手段。但是总的说来，富农阶层[的认识]并不能上升到国家总体水平去：他们的经营活动[视野?]过去和现在都超不出他们本乡本村的家园，因此由他们发动的运动也必然具有分散性和局限性，并且也不可能服从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为目标的明确的全国性纲领；由于他们发动的运动离开了工业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暴动，只能是强盗式的破坏行动（坦波夫省的情况尤其如此）。

(4) 富农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影响（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从余粮收集制的命运看或从向农民提供种子帮助的情况看——通常是“按人头”而不是按财产状况等分配的，即可得到证明）就可以发动比较广泛的农民阶层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但是农民阶层被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仅仅是由于他们对苏维埃政权中某

些理应克服的东西感到不满，而不是对政权的本质不满。如能正确对待农民的迫切需求，那么，农民是能克服在无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之间的动摇，转而支持无产阶级的。

(5) 农村至今文化上极为落后，连苏维埃政权的一些最基本的法令都不知道，农村还在受种种荒诞谣言的左右，农村居民都在为自己的落后感到极度苦恼，急欲更加直接更加积极地参与建设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党在农村设有扎根，一旦爆发暴动，就容易与农村失去联系。

脱离农民的原因在于，农村的苏维埃政权依然主要具有军事行政性质，而不具有经济性质，是一支从外部发号施令的力量，而不是公认的农民经济的领导者；苏维埃政权在农民看来是个强制机关，而不是首先为农村服务的组织。

(6) 对这种对待农村的非经济的态度农民深恶痛绝——这方面稍有疏忽就有反应，粮食政策、出畜力车义务制和播种委员会的问题都是如此。总的说来，农民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实行出畜力车义务制，有必要调整农业生产，他们只是对这些正确原则中的非经济表现表示不满，并希望贯彻这些正确的原则时能首先考虑他们的需求。

(7) 土地规划混乱对农村来说是一件最令人苦恼的事情——农民已经认识到，土地零散插花和分布太远的问题如不解决，改善经营的问题就无从谈起。然而我们的土地规划速度简直慢得惊

人。

(8) 农民的上述基本需求如能得到满足，富农阶层的暴动就容易被控制，但是要消灭这一暴动则需要加紧进行军事工作和肃反工作。

综上所述应得出以下结论：

应当

(1) 村苏维埃和乡执行委员会应当从一个主要是行政机关变为主要起经济领导作用的机关。他们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贯彻中央的指示，还应包括团结农村各方力量振兴和发展农业及家庭手工业。要千方百计地在当地居民中树立地方政权的威信：光靠命令不行，还应根据各地条件提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决策并就落实决策的办法预先与地方政权进行沟通。要逐步地从个人管理制向集体管理制过渡——提措施时要提前与当地人士讨论，贯彻这些措施时必须依靠地方上的先进分子。

(2) 与此同时要毫不留情地制止非经济倾向，要有一个模范的保存和分配居民上交的产品的办法。在农村中审慎贯彻有关粮食税、合作社和调整农业生产的新法令时要考虑到各地的情况及特点。不要乱许诺——对待农村工作的态度要明确，要让农村确切地了解对它有什么要求，它什么时候履行这些要求，它能得到什么，除此之外不应再对农村提出其他要求，也不应强加无法完成的义务。要多一些预见性，不能像现在这样经济安排往往落后于形势。

(3) 应当广泛地向农村宣传苏维埃政权的实

质及苏维埃政权的法令，逐步培养农民参加苏维埃工作（为此可在秋冬两季组织苏维埃工作流动培训班，必须在农村成立工农检查小组，等等）。应当加强同农村的技术联系和政治联系。比如，我们的县党委应巩固同各乡支部的联系并领导各乡支部的工作（比方说可以派党的主要负责工作者去某些乡蹲点，让他们每个月在乡里工作1~2周时间），还要监督各乡的支部，不要让他们脱离农村群众，一头扎进行政事务中去，要使他们成为清醒的农村经济工作领导者，成为农村中先进的文化启蒙力量。

（4）必须极其认真地注意土地规划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培养新的土地丈量员和农业技术员，在全国和全省范围内坚定地开展移民工作（除了其他办法外，要用土地来“稳住”农民）。

（5）不允许从影响农村的新办法向过去的办法倒退——要取缔征粮队（有人又在旧话重提），取缔连环保（有些地方又开始实行连环保——省粮食委员会有权在相当数量的公民逾期不纳税的情况下禁止这些公民所在的整个村开展买卖活动），让合作社贸易自由发展（粮食人民委员部又在忙着制定固定价格“等价物”），要取消附加税（应信守诺言，可是又提出了一个征收救济饥民附加税的提案）等等。

（6）为补充农村苏维埃干部应广泛起用复员的红军战士（一般来说要起用那些不负众望的人），有时应召集他们参加一些专门会议，在有

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成立专门组织并同他们保持经常性联系。

(7) 如果发生新的农民暴动则应当：

①对某些省的过去的富农分子进行登记（根据1917年普查时的记载）并首先在这些入中间寻找骚动的基本骨干。

②组建强大的乡村民兵（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制服），依靠他们去帮助农民自卫队（其核心是共产党员和复员的红军战士）开展工作，农民自卫队靠地方资金或旧武器解决装备问题，有行动时由军事部门发给给养并进行领导。

③将各村的“肃反委员会”情报员网提前整顿好。

④专门对中小学教师、合作社工作者和与农村相关的各类工作者进行一次登记，立即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⑤组建摩托化支队，配合骑兵给匪徒以决定性打击。

(8) 发生暴动时要把暴动的主要根据地及占领的时间搞清楚，以便于有步骤地清剿匪徒和恢复苏维埃政权；要把各路匪徒孤立起来，不让他们与农村中的基本阶层接近，要使农村中的基本阶层与匪徒对立起来，实行扣留人质（匪属）的制度。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坦波夫省全权委员会主席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收文第 号 [章]

致托洛茨基同志

(1) 望知照。

(2) 望下令专门检查一下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并报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列 宁

8月1日

№01459

列宁就撤销海军总部
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7月30日)

副本

绝密

1921年7月30日第21996号

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

撤销海军总部是必要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研究撤销海军总部的专门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已预先提出了解决办法。主管部门认为必须加速处理这件事。

请发出相应的命令，并请告知，您规定了多长的期限以及由谁来负责完成撤销工作。^①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乌里扬诺夫）

（打字机打印）

① 提出改组海军人民委员部问题，是因为要缩减海军战斗单位，把若干港口设施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管辖。

№01460

托洛茨基就撤销海军总部问题

致列宁和列宁的回复

(1921年8月1日)

副本

(1921年8月1日13时)

致列宁同志

这公文是怎么回事？

它怎么通过肃反委员会来转达？

我简直搞不懂。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手书)

托洛茨基同志：

我根据温什利赫特^①同志的请求，由他转达这个电话的内容。由于事情非常紧迫，他恳请我与您谈谈。他急急忙忙地拿走了自己的电报单，未说明详细情况。全俄肃反委员会恳请加速办理。他们有重要设想。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温什利赫特，约·斯·（1879～1938）——1900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陆军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民航总局局长等职。

№01461

托洛茨基就撤销海军总部问题致列宁

(1921年8月2日)

副本

莫斯科，第76号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1) “撤销海军总部是必要的”——这个问题至今未被提出的原因是，布雷和扫雷以及海岸警卫等工作不能不由海军总部来做。

(2)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改组海军总部的专门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已预先提出了解决办法”。专门委员会没有预先提出解决办法，而是准备作（甚至还没有提出）一系列的组织变动，实际上是部门内的变动，不是全国性变动。

(3) 早在专门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海军总部就已经精简了（惟一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约3个月来海军总部的在册人数（包括管理人员和部队）已由18万人减少到4.5万人，目前也是按4.5万人进行供应。

(4) 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是否会使海军总部进一步精简，目前还很难说。专门委员会主席古谢夫^①同志认为，如果该委员会中多数人的决议获得通过，就不会再精简了；如果该委员会中少数人（古谢夫同志在某些问题上属于少数）的决议获得通过，那么至少在8个月之后还会作一定的精简。

^① 古谢夫，谢·伊·（1874～1933）——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9～12月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红军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

(5) 海军总部掌管着多种用途的港口设施。若把这些设施转交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那么就不是精简海军总部的工作人员，而是把他们调到别的部门去。然而专门委员会作出结论（据我所知是一致通过的）说，现在向交通人民委员部转交这些设施是危险的。

(6) 另外，专门委员会本身的工作尚未结束。它委托海军司令涅米茨根据以前的决定对机构、港口和舰船的数量作出确切的统计。鉴于此项工作很复杂，专门委员会给涅米茨规定了两周的期限。星期四才到期。专门委员会在接到涅米茨的报告后才能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

(7) 亚戈达^①同志参与了各项决定的做出，其中包括委托涅米茨在两周内完成的任务的决定，因此他应当知道，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可能介入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而且正如上面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工作对实际精简海军总部的问题来说都是非常相对的、大有疑问的。

(8) 仍然要从立法上名称上进行改革，即撤销海军人民委员部并相应地改变名称。实际上人民委员部早已不存在了（既没有人民委员部，又没有部务委员会）。是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撤销人民委员部还是默认现状，我认为都不是重要问题。

(9) 因此，我很难发出相应的“命令”，因为我不清楚应当同什么“相应”。军事部门一点儿也没有耽搁或浪费时间。如果说有这样的问題，那是误会，是提出了超出军事部门可能承受的过于性急的要求。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① 亚戈达，亨·格·（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处决。

№01468

**斯克良斯基就红军
退役问题致列宁**
(约于1921年9月)

副本
秘密

对1897年出生的那批人该如何处理？

关于这批人退役的命令我们暂时压着不发，只让1896年出生的人和1892~1895年出生的残留人员退役。

(斯克良斯基同志手书)

让退役。

(列宁同志手书)

№01469

托洛茨基就购置武器问题致政治局

(1921年10月4日)

副本

第116号

致政治局、列宁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工作委员会（托洛茨基、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①、古谢夫）认为必须拨款1000万金卢布，并同时起草了一份电报^②（随此件附上）。

请政治局即刻就此问题作出决定，以便于今日将电报发往指定地点。

托洛茨基

① 奥尔忠尼启则，格·康·（1886—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第16集团军、第14集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起是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成员。1921年起先后任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7年自杀。

② 见本卷文件№01470。

№01470

托洛茨基就购置武器问题致克尔任采夫

(1921年10月4日)

副本

绝密

电报(密码)

莫斯科, 1921年10月4日第117号

致克尔任采夫^①同志

抄送: 克拉辛^②同志

如真能按优惠条件(减价并确保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成交,则可以购买价值在1000万金卢布以内的货物。有关确定准确价格、供货条件及供货的实际保障等事宜请即刻与克拉辛联系,我们已将这份电报的副本寄给他。速将你们与克拉辛的往来信函的副本以及你们决定采取的各项步骤报告莫斯科。

关于购货的事基本上是这样决定的: 将近3/5的拨款用于购买

① 克尔任采夫, 普·米·(1881~1940)——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起在《消息报》、罗斯塔社工作。1921~1923年和1925~1926年先后任驻瑞典和驻意大利全权代表。

② 克拉辛, 列·波·(1870~1926)——1890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十月革命后历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1920~1924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1920~1923年兼任驻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参加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此后先后任驻法国和英国全权代表。

步枪和子弹，将近 2/5 的拨款用于购买冲锋枪和三英分口径子弹以及“马克沁”重机枪。在最终成交前务必将一切可能采取的购货方案报告莫斯科。

当然，在接货时必须作极严格的技术检验。你们那里是否有非常懂行的人，他们是谁？是否有必要从这里派人过去？这样做会耽搁一些时间。能否将由卖方公司的代表参加的正式接货和技术检验工作改在彼得格勒进行？

托洛茨基

№01471

托洛茨基就购置武器问题致克拉辛

(1921年10月4日)

副本

绝密

电报(密码)

莫斯科, 1921年10月4日第118号

致克拉辛同志

抄送: 克尔任采夫同志

克尔任采夫同志提议购置相当数量的美国造俄制步枪和机枪。这里决定为此拨款1000万卢布。

最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做到:

- (1) 在接货时进行严格的技术检验,
- (2) 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生没收和沉船等情况时保证我方不受太大损失,
- (3) 最大限度地压低价格,
- (4) 以最快速度办妥一切手续并迅速供货。

更具体的情况由克尔任采夫同志另行向您通报。请你们以极其谨慎而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并全力以赴地把事情办好。

托洛茨基

№01477

托洛茨基就哨兵事件致列宁

(1921年11月14日)

莫斯科，1921年11月14日

邮政电报第184号

致列宁同志

兹寄上扎卢茨基^①同志就军校学员哨兵事件^②给我的来信(随信附上我这儿所有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扎卢茨基同志描绘的情景与学员的报告大相径庭。政治局决定调查这一事件。我认为这种调查是完全必要的。委员会可以由以下人员组成：主席——加米涅夫同志(鉴于扎卢茨基同志的地位必须由一名中央委员担任)，委员——叶努基泽^③和丹尼洛夫。给该委员会规定的期限要尽可能短，24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这件事情越拖下去，越会议论纷纷。请通过电话表决。

① 1921年11月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局工作人员奥·彼·戈尔登贝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去克里姆林宫见列宁时被哨兵扣留耽搁。列宁要求订出规章，以免再出现类似现象。

② 扎卢茨基，彼·安·(1887~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后从事党和行政领导工作。

③ 叶努基泽，阿·萨·(1877~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全俄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34年当选中央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附言：请注意彼得罗夫斯基^① 同志的报告，报告说，福季耶娃^② 同志也遇到过类似的哨兵事件。

列·达·（托洛茨基）

① 彼得罗夫斯基，格·伊·（1878～1958）——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长期领导乌克兰的工作。1919～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② 福季耶娃，莉·亚·（1881～197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1918～1924年兼任列宁秘书。

№01478

托洛茨基关于斯拉谢夫问题的建议

(1921年11月16日)

副本

第192号

莫斯科，1921年11月16日

致列宁同志（转政治局）契切林同志、温什利赫特同志

受托洛茨基同志委托，现寄上托洛茨基同志和温什利赫特同志商定的对斯拉谢夫^①一事的初步结论。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办公厅主任（布托夫）

副本

绝密

1921年11月16日

托洛茨基同志和温什利赫特同志就对斯拉谢夫等人采取下一步

^① 斯拉谢夫，雅·亚·（1885～1929）——俄将军，毕业于参谋学院。国内战争期间率领白卫志愿军的师团。1919年12月起领导克里木的守卫防务。1920年因反对弗兰格尔而被解职。1921年秋经苏维埃政府批准和一批军官返回苏俄，在军事学校任教。1929年遭暗杀。

行动商定的初步结论。

我们建议：

(1) 为了从军事上和外交上研究这些证词并且使有关部门能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提出一些补充问题，请把证词的副本送交托洛茨基和契切林。

(2) 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与军事部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温什利赫特、托洛茨基和契切林）协商后在最短期间拟定一个有关斯拉谢夫等人归国的报告，其中要摘引斯拉谢夫等人关于斯拉谢夫归国原因的证词中的原话。

(3) 同时由斯拉谢夫等人起草一份对国外白军残部的呼吁书。呼吁书要经上述三人小组审查，与斯拉谢夫等人到达的消息同时发表，或者第二天立即发表。

(4) 鉴于斯拉谢夫的证词提到前不久英法间谍曾提出过针对苏维埃俄国的军事建议，务必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问题，立即把斯拉谢夫等人的确切口头证词收集起来作为外交照会的材料。

(5) 鉴于斯拉谢夫等人坚持要求担任军事职务，主要是队列职务，可答复他们，军事部门无疑会认为他们是宝贵的工作人员，但是只有在红军了解了上述人员投向苏维埃俄国这一事实，并弄清他们的动机之后，即充分掌握这一事实之后，才能最终确定他们的工作性质。

(6) 同时斯拉谢夫等人的主要工作应当是撰写与苏维埃俄国斗争时期的回忆录。由于这些回忆录将提供宝贵的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材料，必要时可为他们配备一些可靠的速记员，这些速记员能减轻他们的工作困难，还可指定一名著作家同志来做编辑工作，而且来领导这一工作。

(7) 要建议斯拉谢夫等人在写完回忆录之前应避免会见和拜访亲友，以便集中精力使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不致拖延过久。要向斯拉

谢夫等人指出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8) 要支持斯拉谢夫号召其他原弗兰格尔分子返回苏维埃俄国的倡议，给予必要的协助。

托洛茨基
温什利赫特

№01479

彼·波格丹诺夫就军事工业问题 给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报告

(1921年11月20日)

副本

绝密

图拉，1921年11月20日

第1230 C号，1921年11月22日

致托洛茨基

列宁同志

9月份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商定的部队主要战斗装备的计划。

在入春之前必须建立一定的战斗装备储备以及改善部队的供应是这个计划的基础。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特别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和在图拉召开的负责工作人员会议上反复强调建立所需的储备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我认为必须向你们报告，现在问题不仅在于图拉的工厂，而是整个军事工业都处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会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原因如下：

(1) 在设有国防委员会军需特派员时，从财政拨款、燃料供应和物资供应方面来说，军事工业被置于特殊的条件下，所有的军工厂需要多少财政拨款就给多少，军工厂的燃料供应优先，物资供应

方面同样如此。而现在对军事工业的供应，不论是货币，还是燃料及材料，都与其他工业部门处于同一水平，如货币供应，我们现在只满足重点工厂发放工资的需求，而对其他工厂工人的工资的拖欠在逐月增加，由于振兴国内经济的愿望和努力，要求更加重视一系列民用工业部门，这样对军事工业的利益的“冷淡”也就在所难免。

(2) 最近几年，军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许多种材料的储备来维持的，因此当前线需要增加供应时，一些军事工业部门有可能快速发展；而现在这些储备多半几近枯竭，特别是再过几个月我们的炸药制造就要中断，因为我们没有硝，而同时进口计划中取消了从国外采购硝的项目，再过几个月铅也供应不上了，还缺少一些特殊品种的钢材，等等；我们尤其尖锐地感到缺乏航空材料和仪表，因此根本无法制造出稍微符合这一战斗部门所需的高要求的机器设备。

然而如果我们对军事工业始终不渝地贯彻大力促进的政策，那我们就有一切客观条件来使我们的军事工业保持所需的高度，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只有危急时刻才会想起军事工业，而战斗沉寂时，所有支持军事工业的努力都会遭到我们高级机关的拒绝（例如5月份进口计划中从国外订购许多急需物品的要求就遭到了拒绝）。

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存在时期，我们成功地集中了所有的军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实行统一的管理方法，整顿纪律，研究这些工厂并弄清它们的需求与愿望，以便充分地加以利用，我们逐步挑选出了优秀的技术人员，其中包括我们在军事工业领域中所有的优秀专家。有了这些人才，有了我们的工厂，我们就能保持共和国的战斗力的，我再重复一遍，一定要把对军事工业的关心看做是我们最重要的国家事务，并且始终坚持这一观点。

请允许我向政治局就军事工业的现状作一个简短的报告，阐述

我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其中最紧迫的有以下几点：

(1) 把军事工业委员会划为独立的财务单位，拨给所需的货币，不得削减。

(2) 补拨一笔黄金储备（马上就拨 1500000），以从国外购买我们共和国内没有，而军事工业缺乏无法生存的材料和设备（硝、铅和一些仪器设备等等）。

(3) 整个军事工业仍由国家供应木材燃料，供应这种燃料的同时，与铁路一样也供应矿物燃料。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彼·波格丹诺夫^①

托洛茨基同志的批示：

“完全赞成。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的批示抄送列宁同志和波格丹诺夫同志。

^① 波格丹诺夫，彼·阿·（1882～193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

№01480

托洛茨基就军事学说争论

致列宁和列宁的回复

(1921年11月23日)

一、托洛茨基致列宁

副本

绝密

1921年11月23日第4243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现在我们的军人党员中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军事学说问题的争论。我认为讨论归根到底是会有好处的，但是眼下却不少胡说八道、匪夷所思。例如指责红军的“军事学说”（整个争论都围绕着这个庄重的词进行）中没有包括进攻性革命战争的思想。我现在正就此题目写一组文章或一本小册子，我想在其中把党在十月革命之前和以后不同时期关于革命战争的言论编在一起。您能否凭记忆告诉我，关于这个问题您在哪儿写过什么（*）？有无（**）决议？

（打印件）

您的 托洛茨基

（亲笔签名）

二、列宁复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

(*) 完整的東西似乎沒有。零散的倒有不少：大部分都收在《反潮流》(如《論廢除武裝》、《第二國際的破產》等文章)里。還有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戰爭》(日內瓦1915年版)等等。例如第145頁，注釋(第2版)。

(**) 決議大概是有的，尤其是1914~1917年間。您手頭是否有《俄共代表大會決議彙編(1903~1921年)》這本書(彼得格勒1921年版)? 如果沒有，我可寄上。

敬禮!

列 寧

(列寧同志手書)

№01481

**托洛茨基就消灭卡累利阿匪帮问题
致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1921年11月28日)

副本

秘密

直达电报(密码)

莫斯科, 1921年11月28日第220号

致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根据总司令下达的所有命令, 请军区注意务必全力以赴最迅速最坚决地消灭卡累利阿白卫匪帮, 因为战斗拖延无疑会给国际关系造成损害。必须向所有遭到攻击和受到威胁的地区投入一批批经过精心选拔、坚定善战的共产党人。请告诉我, 为了尽快消灭冒险分子你们认为必须采取哪些补充措施。

托洛茨基

№01482

**斯克良斯基就军费问题
致列宁和列宁的批示**

(约于1921年11月)

副本
绝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912~1913年和1914年的军费支出为5000万。对1922年全年的开支财政委员会只想给330万。怎么办？打架吗？

(斯克良斯基同志手书)

别打架，而是把答应给托洛茨基的“增发”5%。

(列宁同志手书)

No 01485

契切林就卡累利阿问题 给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1921年12月2日)

副本

绝密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由于刻不容缓，恳请政治局立即紧急作出决定，表明我们对芬兰就卡累利阿问题向国际联盟陈述一事的态度。卡累利阿起义者的胜利现在甚至吸引了芬兰的中派分子。文诺拉政府在相当一部分芬兰资产阶级的激动情绪的影响下，向国际联盟提出声明，其中按自己的观点说明卡累利阿问题，解释尤里耶夫条约和我们对卡累利阿的政策，向国际联盟报告卡累利阿境内的武装冲突事件，抱怨向逃往芬兰的难民提供食品负担沉重，希望向俄国饥民提供的援助尤其要提供给卡累利阿，最后它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眼看着一个少数民族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由于现在的问题是境外的芬兰居民能否生存的问题，芬兰政府认为他们不得不请国际联盟理事会认真研究这个严重的问题；芬兰政府请国际联盟理事会考虑是否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东卡累利阿的问题，访问这个国家，提出报告，总结委员会调查的结果，从而为国际联盟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决定提供客观依据。”

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认为，我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最坚决

的立场，反对让国际联盟插手我国事务，并应从这种策动国际联盟反对我们的图谋一出现就予以制止。我们认为必须马上向芬兰指出，它走上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道路，我们尤其认为，在发表这一声明的同时有必要在芬兰边界上展示武力。这件事要趁国际联盟尚未作出答复时赶快做。我们通过我们的坚决政策能使国际联盟理事会有所顾忌，也必定能阻止芬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时机对我们有利，因为英国和法国目前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波兰十分坚决地转而与我们建立较为友好的关系；罗马尼亚发生内阁危机。我们通过这种坚决立场能使邻国将来不再采取这种方式。同时要向我们的军事当局和全俄肃反委员会提出最迅速地坚决镇压暴动这一任务。同时我们认为，为了表示抗议，有必要暂时从芬兰召回我们的混合委员会代表团。代表团要讨论有关相互结算和相互偿还的问题，而且从目前来看芬兰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要比我们大。最后我认为最好能提出对喀琅施塔得分子也实行大赦的问题，可把其中的积极分子派往卡累利阿。如果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不反对这样做，那么从政治上看，现在对喀琅施塔得分子大赦，就会大大削弱卡累利阿反对我们的势力。我们在国外的报刊要同时大力指出这方面的军事危险。

如果中央委员会采纳这个建议，务必趁国际联盟尚未作出答复时马上向芬兰发出相应的照会。

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暴动造成的结果会切断我们与摩尔曼斯克的联系。

外交人民委员部 格奥尔吉·契切林^①

^① 契切林，格·瓦·（1872—1936）——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1930年退休。

列宁同志亲笔批示：

“托洛茨基同志：

请扼要写出您的意见。我觉得契切林同志是对的。列宁 12 月 3 日。”

№01486

托洛茨基就卡累利阿问题致政治局

(1921年12月3日)

副本

绝密

第233号

致政治局委员：列宁、莫洛托夫、列·波·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同志

抄送：契切林和斯克良斯基同志

(1) 契切林同志的报告说，卡累利阿的暴动会切断我们同摩尔曼斯克的联系，他说得完全不对。铁路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并且防卫严密。当然要提防某些卡累利阿白卫匪帮在后方的骚扰（如破坏铁路设施等等），但是其他地方也不能绝对保证不发生此类事。至于卡累利阿白卫匪帮，他们全都被赶得远离铁路，很不活跃，待在边境附近，而我们彻底清剿他们的战斗进展得十分正常。

(2) 关于必须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歼灭匪帮的命令已及时发布，并且每天都在落实。我把其中的一个命令（第220号）附在这一副本中。

(3) 我认为契切林同志有关政治—外交方面的建议完全正确。我建议：

(a) 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立即发布大致如下的公报：

“芬兰政府故意造谣卡累利阿发生并不存在的暴动。事实上是

人数不多的匪帮的入侵。所有的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证明，匪帮入侵卡累利阿是一个庞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佩特留拉^①和萨文柯夫^②等的部队参与了这一计划。与卡累利阿本身的情况毫无关系。指望苏维埃俄国发生暴动而进行的反革命入侵的庞大计划破产了，其后果是一些孤立的匪帮越过了苏维埃俄国的边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和卡累利阿）。这些匪帮无论在哪儿都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任何支持。卡累利阿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一样平静。与芬兰通讯社捏造的消息相反，通往摩尔曼斯克的铁路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掌握在苏维埃当局的手中。这条铁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危险。只是在边界附近的荒原上有小股的匪帮残部，他们准备返回他们来的那个地方去，即返回芬兰去。”

如此等等。

如果契切林同志认为有必要从军事角度作更为精确的叙述，他可以从我们司令部得到有关的材料，已指示司令部提供这一材料。

结论就是契切林同志提出的：芬兰白匪运动的任务是要促使国际联盟干预并企图破坏苏维埃的主权。对此我们一刻也不能容忍。今后如果芬兰不放弃公开干涉的敌对图谋，就同它中止外交关系。

(b) 与发布这一公报的同时，要向芬兰政府发出照会，照会是否指明确定的期限——这一点尚需考虑。

(c) 彼得格勒召开苏维埃会议，作出带警告性的决议。会议最好安排在星期二。届时总司令能出席会议，他因军务星期一要去彼

① 佩特留拉，西·瓦·（1879—1926）——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领袖之一。1917年和1918年参与组织乌克兰中央拉达和督政府，1919年2月起为督政府首脑。

② 萨文柯夫，波·维·（1879—1925）——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十月革命后多次策动叛乱。

得格勒及以东地区。总司令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并扼要介绍目前形势，将是一次有力的示威，会使芬兰白军忐忑不安。

(d) 召回混合委员会代表团也许要视所采取的初步措施（公报、照会和彼得格勒示威）起的作用而定。

托洛茨基

No01489

托洛茨基就红军的劳动任务致列宁

(1921年12月16日)

副本

绝密

邮政电报，第4627号

莫斯科，1921年12月16日

致列宁同志

抄送：政治局委员

关于红军的劳动任务问题可以加进人民委员会8月16日决定中的一段话：

“为保障红军物质生活并减轻国家实施这一任务时的负担，要求红军以不中止履行直接任务，又能创造最大经济成果的限度内采取相应的形式来独立自主地满足自身的需要。”

这是这个决定的第一点。这个决定的第二点谈了军事部门经营企业的权限。第三点谈了企业生产出的产品的分配。这两点未必有必要写进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第一点可以列进去，因为它具有某些原则性意义，实际上目前这一点几乎没有实施。部队担负着执勤任务和护粮、护路等警卫任务，顾不上比较有条不紊的经济工作。

列·托洛茨基

(签名)

№01490

列宁就军队的经济工作致托洛茨基

(1921年12月17日)

副本

1921年12月17日第1213号

致托洛茨基同志

能否在您的提纲和您的报告中加进有关军队经济工作的内容？是否谈谈：不破坏与劳动军事委员会的继承关系？总的说来可根据决定中提出的任务来谈，好像是1921年中央的一次全会的决定，或者是1921年秋政治局的一次会议的决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 宁

No 01492

托洛茨基就卡累利阿问题致列宁

(1921年12月20日)

副本

1921年12月20日第283号

致列宁同志

关于芬兰和卡累利阿我当然要谈得相当详尽，因为看来在这里已经摆开春季的西方战场，已经形成了白军的北方登陆场等等。可是您难道能对此保持沉默吗？这可能使芬兰人误解，以为我们惊慌失措了，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感觉，况且您的报告与我的报告相隔至少一个星期。尽管从另一方面看，保持沉默也可以被解释成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是考虑到芬兰人暂时的成功，后一种解释很难成立。如果您总的说来打算谈西方的威胁的话（而这是必要的），那我认为联系这一点，应该提一下在卡累利阿正试图摆开一个新战场。接下来您可以说有关这一问题在适当的时候还要更详细地向代表大会报告。

列·托洛茨基

№01493

契切林就卡累利阿问题致列宁

(1921年12月20日)

副本

1921年12月20日第283号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李维诺夫^①同志答应向您报告我们的请求，请您务必提一下芬兰在卡累利阿针对我们形成了一个新战场。我们在尤里耶夫通报了允许卡累利阿人自治，芬兰人由此推断出他们有权监督和干涉，而这是我们反对的。我们向卡累利阿提供的是苏维埃自治，是以全卡累利阿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基础的；芬兰白卫分子说这是最恶劣的暴政，商人和富农叫嚷说：芬兰人应当帮助他们的亲人摆脱无法忍受的布尔什维克暴政。芬兰政府似乎“不知道”芬兰有个招募局，派遣匪帮，募集资金等等。可是招募局却在“履行自己”作为国际联盟一员的“义务”，请求国际联盟向卡累利阿派出调查委员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契切林

^① 李维诺夫，马·马·（1876--1951）——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苏俄驻英国全权代表。1918年起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等职。

№01515

列宁就军校学员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4月4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4月4日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天我偶然地，但确是从一个熟悉情况和值得绝对信任的人那里获得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们在挨饿，这是一，第二，他们都对警卫任务异常繁重而无法学习表示不满。

鉴于这种情况，是否应该：

(1) 向人民委员会申请一笔专项补充拨款，全部用来改善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的伙食，保证他们能够完全吃饱。

(2) 讨论一下，可否在克里姆林宫采用电信号装置，以减轻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的警卫任务？（一位叫捷尔缅的工程师曾在克里姆林宫给我们看了他的试验：是这样一种信号装置，人一接近导线但尚未触及，电铃就响了）。

(3) 要是电信号装置不能减少警卫人员的人数和时间，可否采用其他机械设施，如隐蔽岗亭（从岗亭里能看到外面的一切，但从外面却看不见里面的哨兵），或者检查通行证等等的其他办法。

您的 列宁

(列宁同志手书)

№01516

托洛茨基就军校学员问题复列宁

(1922年4月5日)

副本

绝密

邮政电报第19/P号

1922年4月5日

致列宁同志

(1) 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没有挨饿。我在室外偶然遇见他们时常问他们。他们不仅能足额领到一份军事院校的高定量口粮，而且还能领到超标准的供应。不错，面包质量偏低（掺有燕麦、荞麦等等）。虽然作了一切努力，但这一缺憾至今尚未能清除。

(2) 勤务的确繁重：低年级学员大约隔两天值一天班，而高年级学员隔三天值一天班。克里姆林宫现有1300名学员，就是说实在太少了。已决定再增加500人，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调来，其余的将陆续调来。这将会减轻勤务工作。

(3) 至于采用机械化手段，那很难实现，至少是一项极大的工程，费用不小。这个问题反复研究过，几次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又发回研究，等等。

(4) 住房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彼得松同志告诉我说，这个问题略微有些进展：小人民委员会拨了150万战前卢布用于扩建住

房。但还是这位彼得松^①说，索柯里尼柯夫^②……打算就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向政治局申诉。

托洛茨基

① 彼得松，P. A. (1897~1940) ——1920~1935年任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后任某辅军区副司令。

② 索柯里尼柯夫，格·雅·(1888~1939) ——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1921年11月起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03286

温什利赫特就国家政治
保卫局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4月21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国家政治保卫局职务的特殊性和从事活动的总的条件，与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本质和环境完全不同，这就要求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必须进行最紧张的工作，包括工作量、经常处于紧急状态、神经不安，而且常常充满危险和冒生命危险。

这种状况是无庸争辩的，也不需要特别的证据，因此在研究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的物质条件时要极其认真地加以考虑，以便保证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继续进行他们的责任重大的工作。

预算在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时已把这一情况考虑在内，一般较之同等情况的其他苏维埃工作人员略高一些。

但是，这种预算数字的提高在实际中却是理论上的，反映为中等水平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较之其他机关水平的工作人员略高，却绝不是实际上使个别工作人员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却比其他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的工资要低得多。

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指出一点：许多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4月份的工资（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掌握的情报）为几千万卢布

(例如，外贸人民委员部为 6 千万~9 千万)，更不必说私人的，或甚至国营的生产企业了，那里达到几亿卢布，而同一时期，按照中央平均拨款额计算，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的工资仅为 13 亿 6 千万卢布。

除了这里引用的现金工资发放不足和数量过小（而且发放拖延，使其实际价值更加贬低）的极其明显的事实以外，还不得不指出，其他的待遇（它们多少也能稍稍弥补现金工资的不足），如食品补助和服装用品补助，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所能得到的也大大低于规定的标准。就以服装用品为例，尽管政治局已确认全体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均应全额享受，但目前实现这种待遇的可能性已被取消，因为中央预算委员会给予国家政治保卫局用于服装制作的拨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总数中只按 25000 人计算（而且标准也大为降低）。

在上述条件下，不能不得出结论：国家政治保卫局要正常履行职责正面临最严重和最实际的危险。

当然，会有这样一部分工作人员，他们出于自己高度的自觉性、责任感和革命良知，愿意即使在最无法想象的物质条件下也坚守自己的岗位，继续工作，并毫无疑问将一直恪尽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计较任何物质损失。但是毕竟只有少数人表现出这种英勇精神，而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表现这样的英雄气概是不可能的。

结果，必然会出现如下情况：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人员纷纷试图离开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致使人员缩减而在最关键的时刻工作瘫痪；或者不坚定的工作人员直接违反职责要求，贪污、受贿、直接背离职守、出卖这个事业。

一方面是现代生活条件，而在个别公民之间的物质福利分配上又存在反常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的工作条

件使他们在活动中又太经常地遇到最明显的诱惑，这一切使不够坚定的工作人员的上述犯罪现象变得如此现实，从而必将对国家政治保卫局活动的根基本身造成威胁。

以上所述并不仅仅涉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编的和公开的工作人员，因为对这些人而言，通过严格的进入标准和进一步加强对他们的实际监督，总还能对上述危险多少加以控制；但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将在更加大得多的程度上受到数量众多的情报人员造成的危险。他们主要是秘密的工作人员和编外的情报员，对他们的人选和工作条件当然不可能进行经常不懈的监督。就这些大量人员而言，应当承认，要他们为国家利益而正常工作的惟一保证，只有对他们的劳动给予正常的、不低于生活要求的报酬，这些工作人员的报酬哪怕稍稍低于其他机关或有意破坏他们工作的人可能给予的报酬，也必将从根本上破坏其工作的价值，使国家政治保卫局以这一工作为基础的活动毁于一旦，而维持工作人员生存的惟一资源只是国库的拨款，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本身是有可能生产出任何价值的。

以上看法迫使国家政治保卫局以最为恳切的心情请求关注全面改善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物质状况的必要性，特别是坚持必须全额发放已批准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在编工作人员的待遇（津贴、食品、物质补贴），特别是不得公开的支出。

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 温什利赫特

1922年4月21日于莫斯科

№03193

关于 1923~1924 业务年度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部
活动的简要资料
(1924 年 11 月 30 日)

绝密

一 反间谍部^① 的职责

1. 同反革命军事组织（包括暴动组织、密谋组织、有政治色彩的盗匪组织、帮会组织、恐怖组织）作斗争。

以人员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如原来的军官、沙俄军队的宪兵，以及（最近期间）沙俄的士官。

2. 同除经济间谍以外的各种间谍活动（军事、政治、外交、攻击性破坏——后方爆炸——等间谍活动）作斗争。

研究对象为：外国的所有外交代表机构、苏联领土上外国侨民区、外国新闻记者和其他外国人（各种各样的租赁公司及其他外国公司）、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编制人员、邮政局和电报局、非法越境人员（每月平均 1.1 万人）、授人以外国国籍的人，来自国外的人，诸如：有权选择外国国籍的人，遣返人

^① 国家政治保卫局反间谍部，成立于 1918 年 5 月，在阿·阿尔图佐夫的领导下在 20 年代初得到扩大和巩固，并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员、难民和战俘，以及同国外保持书面联系或直接联系者（合法往来的苏联公民）。

3. 对于原白军军官和军事官员进行登记。重新登记和就取消原白军人员登记问题作出结论。

4. 对于除军事部门以外的所有苏联主管部门使用武器和军事装具的情况进行监督（向所有机关和个人发放领取炸药、武器和弹药的准许证、发放携带武器的许可证）。对武装部队（护林队、工业警察等）的编成人员进行监视。

二

1. 1923—1924 工作年度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部的活动（第一项职责）的主要特点，是富农和保皇派的活动有极大的加强。其原因是：

（1）农业经济的恢复在形式上与革命前的情况相接近。富农经济恢复比较快，富农不满意于累进税率和市场上商品缺乏；

（2）农村苏维埃政权（和党的机关）软弱无力，缺乏对贫农的法律帮助和没有强制和革命镇压机关，因此农村中富农分子（甚至地主）作恶多端。杀害农村通讯员的行动证明，占统治地位的富农对于开始深入农村的党和苏维埃的影响进行绝望的反抗；

（3）由于以下各种原因，大量没有生活依靠并流向县城和农村的旧人员一时激增：a. 苏维埃行政管理机关和工商机关及企业实行缩减编制；b. 被合作社所排挤的各种不健康的投机性商业企业被迫关闭和破产；c. 军队精简和最反动的指挥人员被遣散；d. 很大数量的大学生被开除；e. 在苏维埃条件下无法加以使用的、大量败落贫困了的白俄侨民从侨居地回国（仅仅从中国最近又将有近3000名军官来到，这当然是一批精选的地道白卫分子）。这就是

说，农村的富农可获得一批因经济和政治条件而被城市抛出来的反革命组织骨干。

目前大量富农分子积极加强活动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各个地区都自发出现反革命组织这一事实。

1922~1923年我们几乎还不知道存在与外国反革命指挥中心没有联系的组织这一事实，而1923~1924年期间我们发现了好几个这类组织。以前，通常都是从国外来人（带着钱）建立反苏维埃组织，现在则发现自发出现的反革命集团主动地与国外建立联系。实际上，原先那一种反苏组织并不特别危险，因为结果常常是把收到的钱财加以没收，使之多少为苏维埃服务。

总之，如果说1922~1923年期间富农在主要地区还安静地呆着（盗匪横行的地区不在此列，那里往往几十次被占领，如乌克兰），一批旧人员（军官）或者还在苏维埃服务，或者热衷于投机倒把，那么，在1923~1924年间我们到处看到是白卫分子企图把农民拉到自己一边来。

例如：（1）1924年5月被制止的克里木暴动。参加者——一部分是鞑靼人中的富农和地主（由于克里木民族政策的特点而保留特权地位），一部分是俄罗斯族富农（德国侨民、保加利亚人、磨坊承租人，等等）。领导人中有：警官、原白卫分子（富农士官出身的军工生产部门的军官）、原先的官吏。到被揭发时为止，这个组织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克里木到处风传弗兰格尔的登陆部队很快就要到来的消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①的传单也广为散发。132名策划者已枪决。居民慑于这个组织的恐怖行动，很长时间没交待出策划者。

^① 尼古拉·尼古拉二世的孪生叔父，骑兵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最高总司令（1914~1915）和高加索战线总司令。1917年后流亡国外。

克里木的国家政治保卫部门由于人数少、成员涣散软弱，也因为资金不足，未能及时通过谍报手段查出这个组织，使其得以蔓延到严重程度。

(2) 在敖德萨（第聂伯河沿岸的富农村落）、沃伦和戈梅利等州的一些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组织，但在对我们较为有利的阶段（筹划阶段）被揭露了。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沃伦州发现一个组织在农民中正收集成千上万的签名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请愿。

(3) 在格鲁吉亚发生一起未能完全预先防止的孟什维克的暴动^①，并有一部分受到富农影响的农民参加（“民族上层”）。

从以上列举的事例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当农村苏维埃政权软弱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基本任务——防止农村暴动，如在最危险地点没有足够的谍报来源，是无法完成的。可惜，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得到的经费极少，我们通常获知这类动向都太晚了，整个苏维埃机关要为此付出大得多的无法估量的花费。

附注：毫无疑问，鉴于农民中的富农阶层猖狂活动，国外的反革命指挥中心感觉到脚下有了某种土壤，于是进一步加强了活动，而这在目前条件下对于我们是极其危险的。从国外向我国积极派遣间谍的行动有所增加，但为了避免过大的危险，通常避开大的中心城市。除保皇派以外，蠢蠢欲动的还有左翼资产阶级分子（米留可夫^②）和各种各样的极端派分子。

2. 我们注意到，第二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被清除的一些旧人员心怀不满，正在力求组织起来，而其中最狂热的一些人则企图

^① 格鲁吉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是1924年秋孟什维克组织的。

^② 米留可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17年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国外。

进行恐怖活动。恐怖主义情绪表现强烈，而在许多地方正在转入组织准备。

这里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意向通常都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国外指挥中心的压力，或后者的恐怖行动协议。

几乎在苏联所有大的中心城市都发现有恐怖主义的小组织。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工作的年轻军官和被开除的大学生。这些组织人数不多，独立分散，很难发现，需要进行大量的谍报工作。他们实施破坏活动的方法各不相同。发现有用毒气杀人的事例（塞瓦斯托波尔）。

组织具有恐怖主义情绪的帮派集团的例子有：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近卫军军官小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军官小组、谢苗诺夫近卫团军官小组、伊兹梅洛沃近卫团军官小组）、高等法政学校校友小组、彼得堡法政学校校友小组。

值得指出，例如高等法政学校分子的组织又分为若干个部（情报部、组织部），正准备建立宣传部。情报部正在收集有关高等法政学校分子同共产党人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系的准确消息，登记参加苏维埃的资历，把不可靠分子列入黑名单，进行抵制。我们用于查找恐怖分子所花的钱与沙皇政府为此的拨款相比小得无法比拟。固然，还没有像社会革命党对付我们的那种统一集中的组织，但相互没有联系而各自独立行动的恐怖主义小组的出现会更加危险。

我们在这方面的谍报工作还在初创阶段。在莫斯科，这些事是由反间谍部工作人员负责的。1924年破获了一个在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有内线的可汗-图穆罗夫上校的组织。可汗-图穆罗夫准备刺杀托洛茨基同志。

国外的指挥中心（反间谍部就知道了个这样的指挥中心）正在准备恐怖主义的发动。德国人则从技术上予以援助（运送器材——

通过外交邮件和飞机，以及用白俄罗斯组织的钱进行毒气试验)。

3. 政治盗匪 (公开的国内战争的残余) 总的说来在日益减少。可见下表:

统计截止时间	盗匪团伙数量	总人数
至 1924 年 1 月 1 日	284 个匪帮	11086 人
至 1924 年 11 月 1 日	326 个匪帮	4955 人

1924 年轰动一时的案件是萨文科夫事件，虽然由于及时采取了有效的谍报手段而不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钱财。对付从海外策划行动的那些组织，我们更多需要的是艺术，而不是钱财，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外大多只有不够隐蔽的指挥中心。近来那里的隐蔽程度有明显好转。

三

间谍活动。1923~1924 年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部得以使反间谍斗争提高到这样的程度，即主要的欧洲国家参谋部 (除英国外) 获得的情报材料中有 95% 是根据军事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而提供给他们，因而它们对我国军事实力的概念正是符合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从这些国家参谋部获得的文件材料证明，我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其余 5% 的材料经过我们反间谍机关拦阻网络的阻挡，大部分是从边境地区透露出去的，因而只具有地方性的局部意义，不会影响总的判断。

随着法国大使馆的到来和英国政府大大增加对俄情报的经费预算 (近 300000 卢布)，我们势必要增加反间谍机关的经费，如果我们不想心甘情愿地让外国人有可能查清我国所有真正的实情。

在 1923~1924 年期间，有 1375 名间谍是经过我们机关检查的

(不包括和平时期并无重大意义而只能为战争作准备的小规模边境间谍活动)。

关于 1923~1924 年间谍活动情况资料第 1 号附后。

四

由于没有给我们拨款而关闭了各地的“检疫”站，今年对白卫分子（主要是回来的遣返人员）的登记工作十分困难。到达的白军军官（远东 3000 人，列宁格勒 1500 人，东南部人数不详），我们只好不经仔细审查而分配到各地。

最后，我认为必须指出，根据反间谍处的消息得知，英国使馆对俄国军官的影响极其危险。英国人建议军官们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关，为双方工作，以便通过这种办法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实际的反革命活动隔离开来。

1923~1924 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处中央机关破获了近 10 名这一类双料间谍。这是通过花费钱财的复杂方法做到的。

附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处秘密开支的项目总表，其中中央机关部分具体列出（见表一），地方机关部分稍笼统一些（见表二）。

资料第 1 号（关于间谍活动）

绝密

本资料仅涉及外国针对苏联的外交、政治和攻击性（破坏性）间谍活动。同经济间谍活动作斗争不属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部的职责。

针对苏联而采取上述各种类型间谍活动的国家有：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里不包括东方国家，同这类国家的间谍活动作斗争由东方部进行。

外国从两个方面大力开展情报活动：（1）通过派驻在我联盟境内的拥有豁免权的官方机构。这样的机构仅在莫斯科一地就有 25 个。此外，还有一批外国新闻记者，其中有 27 名美国记者是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2）在外交使团之外，还通过由本国总参谋部情报部建立情报站。（为此目的，德国人组织专门的商业企业，如“孔科尔迪亚”酒类贸易公司、光学仪器商店，和通过教会及在大的德国侨民区组织的广泛分支系统；波兰人通过天主教会、开设书店、贸易公司；芬兰人几乎只采用一种办法，即从侨民中招募白卫分子派到苏联；中国人通过组织各种社团，如“中国工人联合会”，以及开办中国式的大烟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则通过在各地开办钱币兑换所、书店、古玩店。）各种各样的合营贸易公司和租赁企业（“容克斯”、“德尔留夫特”、“统一电报局”、“努恩基亚”）对各国参谋部组织情报网起了重大作用。

外国情报机关的活动，如上所述，是通过以上组织和机构实现的，但是，这类活动的特点是：第一、相互交换信息和文件（波兰武官和土耳其武官互换材料，爱沙尼亚情报站人员与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交换材料，等等），同时，一些边境国^①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英国或法国工作，因此，拥有相当多的钱用于这项活动。例如，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情报机关专门而且仅仅为英国工作，波兰的情报机关则部分地为英国工作，近期还

^① 边境国，指在原俄罗斯帝国边疆建立的国家，此处指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有瑞典人和挪威人这样做。为法国人工作的有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德国人目前还是单独活动。

除了在中央进行情报活动外，外国还大力开展边境的情报活动，这样做的主要有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根据准确消息，波兰总参谋部第二局及其国外代理机构向西部军区边境地带派遣了 490 名特工，其中熟练的特工 194 人，其余为初出场者；罗马尼亚参谋部为此派出 136 人，其中 80 人为新手；捷克斯洛伐克派遣到我国境内 13 名单独活动的间谍；在拉脱维亚与苏联边界上，在拉脱维亚境内有 35 个钱币兑换所。这些钱币兑换所实际上都是拉脱维亚情报人员和反间谍工作人员以及保皇派的偷渡点。在边界上就有 5 个接送情报人员、反间谍工作人员和反革命组织代表的偷渡点。边境地带到处都是走私贩和间谍，由他们组织向苏联方面越境的偷渡点。10 月份有 1 个由 10 个人组成的有组织的匪徒团伙越境，其任务是破坏铁路和袭击火车，以及抢劫合作社和国家机关，2 名匪徒被捕获。有 120 名负有军事和政治任务的间谍派到苏联境内，查获 16 人。

在爱沙尼亚境内和边境地带也有钱币兑换所，它们也开展情报工作。1924 年内派遣到苏联的间谍有 35 人，派遣到爱沙尼亚方面的有 28 人。间谍活动以越境走私为掩护。

从芬兰方面派来 175 名间谍，主要派往卡累利阿。

英国通过在雷瓦尔、里加、赫尔辛福斯以及斯德哥尔摩的“护照检验所”不断向苏联派遣负有特别任务的单个情报人员。英国情报机关的一般原则是：对一个国家的情报活动从相邻国家进行。

外国间谍活动的涉及面极广，除必不可少的获取军事、社会、外交信息外，一些外国情报机关，主要是英国和为英国效劳的边境国的情报机关，专门关注获取关于党内局势和共产国际活动的信息。同时要特别提到一些外国情报机关的破坏性活动，如德国、英

国和法国—波兰的情报机关。

从总的方面应当指出，苏联境内外国秘密谍报机关开展活动的范围极广，如：外国参谋部越过国界与位于我国境内的情报站经常保持联系，把各式各样的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恐怖分子派来我国，并在中央这里给予他们支持，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要求他们提供信息，通过外交邮件使国外的反革命组织及保皇派指挥中心同在我国境内的反革命组织及个别恐怖分子建立联系，甚至通过外交邮件传递保皇派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和其他组织的种种书刊，以及为反革命集团提供武器和剧毒药物以进行恐怖活动。通过文件和事实确定的此类活动，涉及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规模较小的英国（仅通讯往来）等使团，它们在列宁格勒、明斯克、哈尔科夫及梯弗利斯等地的领事馆。此外，一些外交代表机构还从事危害性政治活动：德国人在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中、在东南部和外高加索的侨民中散发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书刊；芬兰使团在卡累利阿也进行这样的工作；波兰驻明斯克领事馆则在白俄罗斯大力这样做，罗马尼亚在西南部、英国在中亚也广泛从事此类活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东方部掌握有这方面的材料）。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兹援引有关外国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 1924 年第一季度 3 个月内用于针对苏联的活动经费资料如下（以卢布为单位）：

序号	国别	情报部门	反间谍机关	备注
1	英国	300000	此为近似数字，可能另有 400000 卢布用于对东方民族的工作	
2	拉脱维亚	30000	24000	
3	立陶宛	9000	9000	
4	爱沙尼亚	18000	15000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军事问题

续表

序号	国别	情报部门	反间谍机关	备注
5	芬兰	27000	21000	
6	德国	200000	无资料	
7	奥地利	9000	6000	
8	瑞典	10000	6000	
9	挪威	12000	7500	
10	丹麦	7500	6000	
11	匈牙利	15000	15000	
12	法国	250000	无资料	
13	波兰	72000	55000	
14	捷克斯洛伐克	30000	无资料	
15	罗马尼亚	24000	无资料	
16	日本	278283	32000	
合计		1949783	491500	
总计	2441283 卢布			

附注：法国人最近这方面的开支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还必须指出以下一些十分严重的情况：在 1923～1924 年期间，外国情报机关针对我国的活动强度，以及为此而拨发的费用，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最近几个月来还大大增加。其中，英国和德国情报机关的活动特别突出。今年 8 月 9～23 日间，在雷瓦尔英国间谍建议一些保皇党人迅速着手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并给其中某些人提供了近 5000 英镑，以策划炸毁任何线路上的桥梁，破坏水电、电车、电话、电报等等；今年 10 月，这几个英国人又向这几个保皇组织和恐怖团体建议这样做（不过这次是在赫尔辛福斯），而且更加富有挑动性。与此同时，在赫尔辛福斯和在波兰，各种组织都收到建议，要求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各国共产党国外指挥中心、信使联络、接头点、共产国际执委会同工农红军总部及国家政治保卫局

的相互关系,东方政策)的详细情报,并不惜给予任何赏格。同时我们也得悉,自从现在已作废的英苏条约签署以后,用于对苏联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情报经费增加了2倍,而且工作指挥中心迁移到了斯德哥尔摩。

德国情报机关大大拓宽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并且也开始变得带有攻击破坏性质:在租赁企业“容克斯”的协助下,把基利尔分子^①的传单偷运进我国,具体建议以古契柯夫^②为代表的奥贝尔^③小组在俄罗斯对重要的苏维埃活动家实施恐怖活动。为此,“容克斯”公司提供了一切现有的交通手段运送各种供进行恐怖活动使用的毒气、毒药等等。此“容克斯”公司在执行租赁条约方面出现故意消极拖延的做法。

德国“孔科尔迪亚”合营公司最近以来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积极情报活动,主要是在梯弗利斯和罗斯托夫的军事情报活动。

德意志帝国政府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十分具体地建议继续利用他们的外交邮件,以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同他在苏俄境内的各个组织进行联系。还建议从巴黎迁往德国。

1923~1924年期间,国家政治保卫局反间谍部在同外国情报机关的活动作斗争方面,以及在防止我国各种机构有可能被利用来获取情报和建立同反苏维埃分子的联系方面进行了以下工作。

以下是由于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而加以逮捕和判刑的人数统计资料:

-
- ① 基利尔分子,基利尔·弗拉基米尔罗维奇大公(1876~1939)的拥护者,基利尔于1924年8月宣布自己是“全俄皇帝”。
 - ② 古契柯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62~1936)——莫斯科大企业家,“10月17日同盟”首领,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0~1911),1917年3~4月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部长。后流亡国外。
 - ③ 奥贝尔,泰奥多尔——瑞士律师,反共产国际联盟创始人。

1924年1月1日至11月1日期间(10个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在苏联境内逮捕外国人的数字

共逮捕外国人	926人
其中：	
驱逐出境	463人
判罪和正在侦讯中	353人
释放	110人
因在苏联境内与外国人联系而被逮捕的	449人
其中：	
驱逐出境	243人
判罪和正在侦讯中	155人
释放	51人

注：关于同外国人联系的俄国公民的材料尚不完整，因为某些区域(西伯利亚、突厥斯坦和高加索)至今尚无准确材料。

上述数字足以说明清除间谍活动的成效，但反间谍部所做的主要工作在于以下各方面。

我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做到这样的程度，即目前外国各总参谋部(关于英国总参谋部，因为未经核查，我们尚不能肯定)所获得的情报材料，其中95%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部会同军事主管部门，根据军事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而拟制的。因此，外国总参谋部关于红军，关于红军人数的消息是符合我们的希望的。这一判断系以文件资料为根据。此外，一系列外国情报机关，如波兰、爱沙尼亚和部分地包括芬兰(工作刚刚开始)的情报机关，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且根据我们的指示行动。在1923~1924年期间，

我们已经彻底摧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列宁格勒的间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波兰总参谋部在白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并把意大利的间谍机关控制在自己手中。我们获得了一大批电码和密码，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外国的电报往来我们都能知道。我们得以从根本上阻止了通过某些外国使团进行的一些保皇派组织的通信往来，并把它们控制在我们手中。反间谍部的技术处已经给一些使团装上了专门的技术设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部定期对许多外国的外交邮件以及个别外国人的全部信件进行暗中检查。此外，还在边境车厢开展业务活动。

反间谍部还监视并清查所有外交人民委员部、外国科技局^①、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援助协会^② 机关中的不可靠分子。

参加这项工作的共有 103 名秘密特工。1923—1924 年期间用于此项工作的花费共 139462 卢布 62 戈比。

阿·阿尔图佐夫^③

1924 年 11 月 30 日

① 外国科技局——20 年代驻柏林的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局。

② 国际工人援助会——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1921 年成立于柏林，1935 年停止活动。

③ 阿尔图佐夫，阿尔图尔·克里斯蒂安诺维奇(1891—1938)——1919 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常委会委员，至 30 年代初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反间谍部部长。1937 年被捕，遭镇压。

【专题说明】

进军格鲁吉亚

(1921年2月至3月)

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政府。1919年2月在格鲁吉亚民族议会的选举中，孟什维克获得了议会130席中的105席。1920年5月7日，俄罗斯联邦同格鲁吉亚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放弃俄国对格鲁吉亚的一切要求，答应不对格鲁吉亚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1921年2月，格鲁吉亚发生武装起义。苏俄红军“应起义者的要求”开进格鲁吉亚。1921年2月25日宣布成立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本专题档案资料，揭示了出兵过程的某些情况。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任建华翻译)

No 01405

列宁就通讯联络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12日)

斯克良斯基同志：

我们的通讯联络情况空前地糟，糟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和斯大林有极为重要的事，跟奥尔忠尼启则却联系不上，佛敏^①跟斯米尔加^②也联系不上。

向顿河畔罗斯托夫发一份急电，就直说是我的意思，让那里马上指定一名负责人，负责同他们两个人保持联系并把他们（两个人）的回电发来（要一直这样做）给我、给斯大林、给佛敏。

如果不是这样做，我就把这里的负责人送交法庭（或要求撤职和逮捕）。这是不可容忍的。

列 宁

附言：这可是军队上层领导的彻底瘫痪！

竟然同斯米尔加和奥尔忠尼启则这样的负责人（!!）失掉了联系!!!

① 佛敏，瓦·瓦·（1884～1938）——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和铁路运输政委。1921年1月起任最高运输委员会主席、副交通人民委员。

② 斯米尔加，伊·捷·（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01406

俄共（布）中央关于支援 格鲁吉亚起义的决定

（1921年2月14日）

副本

绝密

1921年2月14日

中央倾向于准许第11集团军积极支援格鲁吉亚的起义并占领梯弗利斯，条件是：遵守国际准则，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经过认真研究全部情况后保证取得成功。我们要事先说明，由于运输困难我们已经断粮，所以连一列火车、连一节车皮也不能给你们。我们从高加索也不得不只运粮食和石油。要求立即用直达电报答复，由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斯米尔加、吉季斯^①、特里丰诺夫^②和弗鲁姆金^③签署。在我们答复所有这些人的电报之前，不得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

- ① 吉季斯，弗·米·（1881～1938）——俄国旧军官。1918年2月起在红军任职。先后任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1920年5月至1921年5月任高加索方面军司令。
- ② 特里丰诺夫，瓦·安·（1888—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夏起任特别远征军政委、南方面军特别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1月至1921年5月任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 ③ 弗鲁姆金，莫·伊·（1878～193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起历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卒于狱中。

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克列斯廷斯基
(打字机打印, 斯克良斯基同志签字)

斯克良斯基同志: 请立即将此件译成密码, 要特别当心, 亲自守着, 留下原件后发给斯米尔加, 要求他亲自守在接收机旁并亲自解码(向总司令口述密件内容, 不要把密件拿给他看)。

斯大林亲自将密件发给奥尔忠尼启则。

这样便可万无一失。由您负责。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文件全部退还。

(列宁同志手书)

№01407

谢·加米涅夫等就格鲁吉亚战事
给斯克良斯基的报告

(1921年2月17日)

副本

秘密

亲收

莫斯科，1921年2月17日第864/п号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由于第11集团军司令部擅自行动，我们面对的是攻入格鲁吉亚这一既成事实：红军已越过格鲁吉亚边界，正同格鲁吉亚军队交战。

现在还不能判断高加索事态将如何发展，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事态的规模将会很大，我们应当准备在高加索进行大规模的战役。

总司令部在以往的3个报告中一再指出，在高加索进行大规模战役的条件尚未成熟。现在，面对既成事实，不可能保证高加索原有的局面，因为高加索铁路运输已达极限标准。我们因此非但不能在这个时期加强高加索部队，而且连部队的复员军人也无法疏散。

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应该在高加索摆开战场，正如第11集团军实际所做的那样。铁路的全部运输能力应当由军事部门调配，由军事部门负责运出共和国所需的粮食，以便尽可能减轻由于

采取军事行动而造成的对往中部地区运送粮食的影响。

考虑到在此之前一切具有军事行动性质的运输只能由最高运输委员会批准进行，必须指示最高运输委员会切勿拖延阻拦共和国中部地区为高加索所需物资组织的运输。

考虑到燃料、运输和粮食方面的困难，军事部门当然会尽可能地酌情限制自己的需要。

我认为自己有义务预先指出，在高加索目前事态下，必须暂停该方面军人员的长期休假。

由于军队的供给严重不足和无法充分满足高加索方面军必需的服装，我坚持暂停向工人分发服装，即使停发50%便鞋、夏装和灯笼裤也好。

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获取一些装备，例如步枪和飞机，同样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我请求立即为军事部门提供最广泛的贷款。

最后我强调，军事部门所有这些过分的要求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无视前线的整个局势和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现状而擅自决定造成的结果。

总司令 谢·加米涅夫

总参谋部政委 丹尼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列别捷夫

斯克良斯基批示：

“送列宁同志。斯克良斯基。2月17日”

列宁同志批示：

“退斯克良斯基。”

№01409

托洛茨基就格鲁吉亚
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2月21日)

副本

秘密

直达电报(密码)

自叶卡捷琳堡, 1921年2月21日第16号

致莫斯科 斯克良斯基

请为我准备一份关于对格鲁吉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问题的简要报告, 这一战役是何时开始的, 由谁下的命令, 等等。我要这个报告是为了参加全会的需要。

托洛茨基

№01417

列宁关于在格鲁吉亚应执行的
政策给第11集团军的电报

(1921年3月10日)

副本

秘密

直达电报(密码)

1921年3月10日第50/山号

抄送：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奥尔忠尼启则

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鉴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已驻扎在格鲁吉亚，希望你们与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建立密切的联系，严格遵守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未经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触犯当地居民利益的措施，要特别尊重格鲁吉亚的主权机关，对待格鲁吉亚居民格外关心和谨慎。立即向集团军的所有机关，包括特别部^①下达有关指示。要追究违反这一指示者的责任，一旦发生违反指示的事件或者与当地居民发生小小的摩擦或误会，都应立即报告。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良斯基

^① 特别部是红军中的肃反机关。每个集团军均成立了特别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特别部的活动有监督权。

【专题说明】

美国救济署在苏俄的 赈灾活动

(1921年8月至1923年6月)

20年代初苏俄伏尔加流域、乌克兰和克里木等地区发生严重的饥荒。高尔基呼吁西方进步力量给予救援。最早的响应者之一是美国救济署，它在1921年7月26日给高尔基的信中答应给予必要的救助，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释放关押在苏俄监狱中的美国人，苏俄政府认识到美国援助的重要性，但担心美国借此干涉苏俄内政。俄共中央政治局和列宁直接监督了与美国的谈判，指示李维诺夫除政治条件外可接受美方提出的任何条件。经过谈判，双方在条件上互相作了让步。到1922年中，美国救济署为苏俄采购了40万吨的粮食，所办的食堂为325万儿童和530万成人提供了食品，为居民提供了医疗帮助。1923年6月起美国救济署在苏联的活动逐渐停止。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胡昊翻译)

№05426

俄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第53号记录摘抄
(1921年8月1日)

向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同志作了电话征询。

听取

23. 胡佛^①的建议^②。

决议：

胡佛关于供养100万儿童的建议应予通过，即使通过谈判不能改变他提出的先决条件。

中央书记 维·莫洛托夫

① 胡佛，赫伯特·克拉克（1874—1964）——1919—1923年任美国救济署署长，1921—1928年任商业部长，1929—1933年任美国总统。

② 指1921年7月26日通过无线电广播的美国救济署署长胡佛给高尔基的关于赈济俄国饥民的建议。

No05427

李维诺夫就开始与美国救济署代表团 谈判事致契切林

(1921年8月11日)

今天在外交部与胡佛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晤^①，应美国人的要求由梅洛维茨^② 总理向我介绍了该代表团。布朗^③ 声称，胡佛在给高尔基的第一份电报中提出的条件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履行，而克服饥荒委员会^④ 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显然，他认为委员会是某种慈善组织，因此认为我的委任书是没有效力的。尽管我解释了委员会与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布朗仍坚持必须有苏维埃政府的委任书，但他对我答应以副人民委员身份签署协议表示满意。随后布朗向我出示了76名美国公民的名单。[他问]，为什么仅释放了6人，[我]向他解释说，因为行动自由的美国人未向我们登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承诺，一旦他们向我

①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马·马·李维诺夫和美国救济署全权代表布朗1921年8月10—20日在里加就美国给予俄国饥民以实际援助问题进行了谈判，结果签订了27条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救济署派遣必要的人员来苏俄，而苏维埃政府保障其人员的行动自由和来往自由，为进行工作建立必要的组织，苏维埃政府不干涉其工作，但有权派中央和地方的代表参与。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严格限定在救济工作，不得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

② 梅洛维茨·梅洛维奇——1921年是拉托维亚总理兼外交部长。

③ 布朗，沃尔特——1921年8月在里加就援助俄国饥民问题同俄罗斯联邦进行谈判的代表，1921—1923年任美国救济署驻欧洲主任。

④ 克服饥荒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7月18日的指令成立，由加里宁任主席。1922年10月15日改组为中央消除饥荒后果委员会。

们提出请求，我们不拒绝给他们签证，甚至在报刊上向他们通告这一点。最后，布朗声明，尽管他个人对我的解释表示满意，然而他还得请示本国政府和胡佛，他们是否认为先决条件已得到执行。他认为，在得到答复之前，谈判应当中止，尽管他的答复会令人满意的。由于我提出抗议和说我不能长时间滞留里加，布朗答应星期五早晨给予答复。

显然，他是在等待与最高会议^①有关的补充指示或爱沙尼亚释放美国人的证词。如果继续拖延，我请求允许我把下一步谈判之事委托给克列斯廷斯基同志^②，尽管这会成为新的扯皮的借口。我提议：第一，为防万一，请让明天的信使给我带来有人民委员会主席签字的委托书；第二，给我带来全俄肃反委员会释放各省监狱中的美国人的命令副本；第三，报上关于所有美国人可自由离境声明的复印件。

李维诺夫^③

1921年8月10日^④

① 1921年8月10日在巴黎召开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由原法国驻俄大使约·努兰斯为首的委员会，调查赈济俄国饥民的可能性。

② 克列斯廷斯基，尼·尼（1883～1938）——1918～1921年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1919～1921年为俄共（布）政治局委员。

③ 李维诺夫，马·马·（1876～1951）——1921～1922年任俄联邦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年是同美救济署谈判的俄联邦代表。

④ 签署文件的日期。

No05428

李维诺夫就与美国救济署
代表团谈判进程事给
契切林的电报摘要

(1921年8月12日)^①

胡佛组织在谈判中坚持只同苏维埃政府，而不是与诸如“库基斯”^②（这里这样叫库斯科夫-基什金委员会）的社会组织谈判和达成协议 [……]。这样，来自国外的主要援助就不能通过基什金的渠道进行 [……]。我向新闻界提供了有关饥荒规模、儿童数量的详尽数字，通报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除饥荒委员会^③、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所采取的措施，并用这些事例表明，无论如何，苏维埃政府自身肩负了与饥荒斗争的重担，所以，协调行动是绝对必要的。我非常坚定地声明，如果我们履行了胡佛提出的纯政治性条件——释放美国人（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那就不会再作出只涉及俄国和俄国人民的任何政治性让步 [……]）。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马·李维诺夫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

② “库基斯”——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经苏维埃政府批准由一批社会活动家于1921年7月21日成立，8月27日解散。其成员大多是原临时政府成员，如谢·普罗科菲耶夫，尼·米·基什金以及叶·德·库斯柯娃等。

③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

№05429

李维诺夫就谈判中的分歧致契切林的电报^①

(1921年8月13日)

绝密 优先速发

包含在胡佛给他们的第一份电报中的关于不受我们干预的地方独立委员会、关于委员会成员来往自由和豁免权的条款^②，我们认为可以接受，但布朗未必会作出让步。我们起初的让步和客气态度纵容了无赖行为。美国救济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加入国际救援组织，但谈判的失败，特别是在关于分配机关或豁免权问题上谈判的失败，会破坏国外的整个活动，促使所有组织的合并。布朗本人还未决定，他是利用“库斯基”委员会呢还是建立新的委员会。把事务转交给我国的机构，甚至在寄存一大笔款项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干。他未为委员会和俄国的人员要任何特权，实际上自由宪章并不比纸面上更可怕。设想在补充口粮问题上突破比较合适，如果胡佛固执己见，那他们将处于可笑的境地。请在星期一早晨告知，政治局的千方百计避免谈判破裂的指示^③是否仍然有效。有一种印象，美国救济署对我们没有别的用心，但与他们的麻烦是少不了的。

李维诺夫

① 电报副本曾送交列宁和加米涅夫。

② 即1921年8月20日俄联邦政府与美国救济署于里加签订的协议第2和12条。

③ 1921年8月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俄政府谈判代表李维诺夫发出指令，除政治和绝对无法接受的条款外，要通过各种让步实现胡佛提出的粮食援助。决定指出，未经政治局许可不得改变谈判进程。

No 05430

契切林就协商时不允许让步问题

致拉·巴·加米涅夫

(1921年8月17日)

致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

尽管李维诺夫同志在其报告中说，他认为，对胡佛坚持的一切作出让步没有任何危险，但我觉得不能开这样的先例。如果我们承认了胡佛，那就很难拒绝承认其他的人。其实您或许记得无线电广播中谈到的红十字会计划或最高委员会^①计划，那里说的只是不能赋予一些苏维埃机关不受监督地分配粮食的权力，根本不是国中国，而说的只是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这对胡佛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今天我见到了英国代表团团长寇松^②，我对他说，我们要求，或者把分配权交给外国组织监督的我国机构，或者我国监督的外国组织。他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如果

① 1921年8月底9月初在巴黎召开了努兰斯委员会会议，结果于9月4日向俄联邦政府发出关于可以向俄国饥民提供赈济的照会，条件是苏维埃政府同意对国内局势进行“调查”。10月6~8日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同意了这一决定。会议规定了提供贷款的条件——苏俄政府承认沙俄和临时政府的外债，保证承担未来的义务。1921年8月中旬在日内瓦召开了红十字会国际和各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赈济俄国饥民问题，选举了挪威科学家、北极研究家弗·南森为赈济的总全权代表。但会议没有解决主要的问题——资金问题，南森组织只好求助于社会团体和个人。

② 寇松，P.——英国政府驻俄联邦官方代表，英国代表团团长，1921年9月22日转交了政府照会，其中指责俄联邦破坏了有关东方政策的协议。

由于胡佛不愿意让我们进行某种监督或让我方可能辞退有过失的人而发生破裂，那么这将最终表明，不受我们监督的分配组织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以后向我们提出要求时，最终必需考虑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表现出坚定性。

契切林^①

^① 契切林，格·瓦·（1872～1936）——1918～1930年任俄联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No05431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美救济署
1921年9月10~25日在俄工作的报告^① 摘录**
(1921年9月27日)

在这段期间做了以下工作：组织方面——招募 10 名秘密工作人员^②，他们分属下列工种：2 名办公人员（1 名翻译，1 名女打字员），1 名办事员，1 名电工、1 名车库维修工，1 名房屋管理员，1 名工作人员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工作，但他经常去看他们，2 名司机已被接受，但尚未开始工作，1 名报道员——外国记者，是共产党员。招募工作还在继续，拟在最近提供 2 名办公人员（1 人已受到工作的正式邀请）和 1 名司机。1 名同志被派从事报道美救济署彼得格勒分部的活动，他事先准备好了设在莫斯科的美国战栗教徒组织的推荐书。他还可能被委托招募美救济署在彼得格勒工作的秘密工作人员。在美国人去喀山期间，派了我们的一名司机和一名翻译作陪同人员。

共约 48 名胡佛的人来到俄国，其中 3 名在彼得格勒，8 名在伏尔加河沿岸（喀山、撒马拉），有 1 名办事员奉命陪同，2 名在新罗西斯克，9 月 25 日来到莫斯科，其余的人都在莫斯科。工作结果是，报告期间查实如下：来自美国的美救济署工作人员中，2 名系美国秘密警察：里加—莫斯科信使芬克和律师克留美尔，掌管车库。

美救济署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军人：哈斯克爾是上校，卡罗尔是炮兵少校，格列克是骑兵上尉，萨拉尔特是中尉，连那尔根是少

① 报告曾送交列宁。

② 并安排在美救济署工作。

校，波农是少校。其中许多人从前在俄国生活过：莱尔斯——其父在莫斯科有贸易大厦，在莫斯科住到1918年；列维斯1916年住在俄国；皮尔斯在高加索待过2年；格列克在莫斯科生活过，波兰占领时期1920年住在基辅，有推测说，他是波兰军队的飞行员；托尔涅尔1916年曾在莫斯科生活，1917年和1918年住在彼得格勒。

托尔涅尔公开表示反对苏维埃政权。

莱尔斯负责接待工作，此人行迹非常可疑，据推测，他的工作是招募从事反革命目的的工作人员。他千方百计恢复巴黎俄侨与他们在莫斯科的亲友的联系。他给巴黎的布尔采夫^①写了一封长信（在案卷中有他手写的给布尔采夫的信封）。他对俄罗斯联邦的经济状况感兴趣，对边疆区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红军的状况、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对动员的态度等尤甚。他与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和她的外甥女谢菲列尔的关系非常密切。

美救济署一抵达，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和谢菲列尔就被安排到该机构工作，她们公然表示仇视苏维埃政权。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与莱尔斯秘密接过头。德米特里·米海洛维奇（姓氏尚未查明）属莱尔斯—托尔斯泰一伙，他没有明确的工作，但是总是待在那里，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还查清了几个与在莫斯科和喀山的美救济署有联系的人的姓氏和地址。

已给喀山、萨拉托夫、新罗西斯克和彼得格勒下达了安排对美救济署的监视和在其中工作的电报指示和命令。

全俄肃反委员会情报部信息处长^②

① 布尔采夫，弗·李·（1862—1942）——俄国政论家和出版人，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② 签名无法辨认。

No 05432

克拉辛就美救济署署长
建议为俄国购买粮食事致
契切林的电报^①

(1921年12月19日)

今天，布朗向我们转达了胡佛的如下建议：美国政府同意自己出资2000万美元为俄国的饥荒省份购买粮食和种子，条件是苏维埃政府有义务从1月1日开始的3个月内通过胡佛的组织为饥荒地区也购买数目为1000万美元的粮食和种子。由胡佛的组织按可能最优惠的条件采购，不能把它看做是商业行为，而是对饥民的援助。苏维埃政府将不对采购进行任何实际监督，因为把我国代表派到美国迄今是不允许的。这1000万美元或者用支票支付，或者用1914年8月前属于俄国国库的黄金支付。在扣除苏维埃政府账内的运输和保险等正常消耗后黄金按照现行的官方汇率折抵给美国。所购粮食总的应该用于救济饥民，此外苏维埃政府在对饥荒地区补偿相应数量粮食的情况下，有权把美救署送达的粮食用作其他之需。照布朗的话说，这个条件绝不是〔有意〕找碴儿。美国2000万美元的粮食和谷物将和我们1000万美元购买的粮食和谷物同时送达。我们应不晚于12月26日星期一

^① 电报由人民委员会秘书莉迪亚·福季耶娃通过电话告诉列宁。列宁于当日用电话向福季耶娃口授给中央书记莫洛托夫的信，认为应当立即同意胡佛的建议，利用部分采购的粮食供春播之用。

同意此事^①。如果我们不同意或推迟答复，美国政府将放弃自己捐献 2000 万美元与俄国饥荒斗争的打算。请在 12 月 19 日指定的上述期限作出答复。

克拉辛^②

① 苏维埃政府接受了胡佛的建议——在美国用 2000 万美元为俄国购买粮食，并从俄国国库支付价值 1000 万美元的黄金。1921 年 12 月 30 日美救济署欧洲分部主任布朗与俄外贸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在伦敦签订了关于在美国为俄国购买粮食和种子的协定。同日，克拉辛还同布朗签订了关于美救济署提供价值 2000 万美元的粮食、种子和谷物，并在俄饥荒地区的成人中分配的协议。协定规定，1921 年 8 月 20 日签订的文件条款适用于美救济署在俄国范围已经扩大的工作。

② 克拉辛，列·波·（1870～1926）——1920～1923 年任俄联邦驻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1920～1925 年任俄联邦（苏联）外贸人民委员。

№05433

亚·弗·埃杜克就评价美救济署 在俄活动事致契切林

(1921年12月21日)^①

绝密

刚刚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克拉辛今年12月19日6202号电报的副本，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对其内容说说自己的以下看法。

从我被任命为苏维埃政府驻美救济署的代表之日起，我就努力深入到救济伏尔加沿岸饥民的胡佛代表们的工作中去，此刻我坚定地断言，不能把这个组织看成是非政治的，它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工作并不是奉公守法，最多只能说是非常谨慎的。美救济署的头目们是些军人，官阶到上校，是胡佛及其一伙的盲目工具。里加条约^②形式上得到遵守，但美救济署中的美国人利用一切疏漏，来挑我们苏维埃机关的毛病。我可以保证，美救济署的所有工作表明，他们关心的不是给我们或饥民以实质性的帮助，而更多的是为美救济署作广告。除此外，尽管目前美救济署投在饥荒区的粮食数量占首位，但我们付出的代价也高于他所有组织，美救济署的代表们也不考虑这些开销是否与我们的能力相当，相反地，有用各种要

① 副本送交安·马·列扎瓦、列宁、李维诺夫、加米涅夫、亚·德·瞿鲁巴以及俄共中央莫洛托夫。

② 指俄联邦政府和美救济署1921年8月20日在里加签订的关于给予俄饥荒地区儿童和成人以救助的协定。

求把我们置于困境的明显趋势（如住宅、工作人员的车厢、大量的印刷工作），也不考虑地方在安排伙食时的困难情况和我国的气候条件。所以，如果算上苏维埃政府提供给美救署的实物和纸币的所有服务，那么与胡佛先生的美救济署送达俄国的粮食的花费相比，我怀疑还剩下多大的好处。

此外，美救济署完全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我们的要求，我们希望给予某些范畴的饥民以援助，他们也显得非常不慷慨。诚然，最近某些方面有所改善，我仍然深信，把为饥民购买粮食的1000万美元这样的巨额黄金交由美救济署支配，是非常冒险的，甚至是在胡佛自己出双倍的数目用于同一目的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花费1000万的黄金救助饥民，如果由克拉辛同志购买这个数目的粮食，把这些粮食交由饥荒救济委员会中央支配，只由苏维埃机关监督按计划分配来救助饥民，我认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事实上，我们得到的结果不会少于把这1000万美元交给美国人支配并由他们分配这三倍数量的粮食，由于这是在美国机构的帮助下分配3000万美元的粮食，如果根据里加条约，如此组织分配，那么，除了这里已有的一百多名美国人外，还要将数千名外国人吸引到俄罗斯联邦境内，他们就会把一小撮白卫军组织在自己周围，这样，大量的资金将被用于供养和组织与我们敌对的分子。

根据我的情报，美救济署不是别的，而是股东们支持的隐蔽的股份公司。股东们是美国的企业主，美救济署的全部需求是由股东根据所出股金的多少支付的，满足这些股东们的所有要求，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保证购买粮食的交易对我们有利。我深信，实施美救济署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美国的贷款将是非常昂贵的。如果认为还是必须采纳美救济署的建议，那么，无论如何必须修改里加条约，认真地进行修改，因为条约给美国人在俄罗斯联邦

提供了太多的行动自由，几乎排除了对美国人员的任何监控。^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亚·埃杜克^②

① 1921年12月3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涉及美救济署的政治措施问题，责成约·斯·温什利赫特、亚·弗·埃杜克、瓦·米·米哈伊洛夫在加米涅夫的监督下制定预防美救济署无限扩大其机构和吸收不合适人员的专门措施。

② 埃杜克·亚·弗·（1886—1941）——1921—1922年苏俄政府驻美救济署代表

№0543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6号记录摘抄

（1921年12月22日）^①

出席：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加里宁同志，中央委员托姆斯基同志。

听取：10. 布朗转达的美国的建议。^②

决议：a) 委托李维诺夫同志今天就给克拉辛（至少发三个地方）发出明码电报，内容如下：“我们接受布朗向您转达的美国的建议。由于饥荒日益加剧，请确定粮食送达的最近期限” [……]。b) 根据与布朗的协议需支出的1000万美元，从4000万卢布的拨款中提取 [……]。

中央书记 维·莫洛托夫

① 这一天继续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亚·埃杜克关于里加条约执行进程以及修改条约的必要性问题。通过决定，在政治局与瞿鲁巴委员会的结论一起讨论。在文件上有中央书记莫洛托夫的批注，要求埃杜克提出关于修改条约的具体建议。

② 见1921年12月19日克拉辛给契切林的电报。

No 05435

威·哈斯克尔致亚·弗·埃杜克信摘录

(1922年4月8日)

阁下：

敬请关注以下性质极其严重的情况：

1. 从各个港口运到伏尔加河沿岸各饥荒区用于供应成年人的玉米，未达到足以使我们履行我们供应成年居民计划的数量，并且远未达到克拉辛先生临行前承诺的数量，当时他说，两周内每天至少运达 250 车皮，将来还要增加。

2. 3月25日后应该增加调拨的车皮，但未做到。

4. 对上述作一补充，我再次声明，对明显违反里加协议提出抗议，这种情况在各个港口都发生过，表现在不经过我们批准，就擅自支配伏尔加河区沿路的美国玉米。尽管第一次事故发生后就应该向整个铁路部门下达总的严厉的指令，它应保证美救济署的粮食不受侵犯和对它的印记表示尊重，但这种情形仍继续发生。

5. 注意到伏尔加河沿岸受苦居民的状况，您当然相信，由于苏维埃俄国的铁路部门显然没有能力运送已经抵达港口的货物，向美国的美救济署建议放弃发送用于供应伏尔加河沿岸成年居民的货物，我是非常难过的，把港口的玉米装进车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把它发往形成堵塞的中心，粮食肯定要烂掉的。

我通知您，用于供应成年居民的玉米只有半数抵达港口，并且从美国运出的玉米数量相当少。换句话说，我的理解是，俄国的铁路拥挤不堪，无力运输我们的粮食。请立即告知，您对这个问题的

看法，因为星期四我要去里加，以重新全盘考虑在俄国的整个工作计划。

此致敬礼！

主任 威·赫·哈斯克尔^①

^① 威·赫·哈斯克尔是美国救济署俄国分部主任。

№05436

亚·弗·埃杜克致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呈文摘录

（1922年4月10日）

秘密

尊敬的同志们：

目前十分清楚地看出，援救俄国饥民事务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胜任转运归我们支配的粮食。在俄罗斯联邦工作和进入联邦共和国版图的各个组织的援助在逐渐扩大，现在仅美救济署提供的儿童口粮就达 2755000 份，成人的达到 500 万份 [……]。大量发给我们的粮食可望抵达我国和外国港口，然而，目前的状况，确切地说，我们的运输工具的分配和使用让人极其担心对饥民提供食物援助计划能否得到执行 [……]。为了供应喀山和省里的儿童和成人的食粮，一天需要 77 个车皮，交通人民委员部总共只给 36 个 [……]。萨马拉方面，必须 185 节车皮，而总共给了 64 节 [……]。为了执行最低纲要，一天必需 349 节车皮，而总共只给我们 164 节，这明显地打乱了对饥民援助的计划，必将使大量的饥民遭到饿死的命运。

[……]^① 建议立即采取紧急的非常措施为粮食运输提供交通工具，为此不惜削减，甚至完全或暂时中断某些铁路运输。

① 部分文本丢失。

我深信，只要集中所有力量并给予交通人民委员部以可能的帮助，它还承受得了来自饥荒救济委员会增加粮食运量的某些压力，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中央出面说话作为美国人对交通人民委员部不履行承担义务所作反应的证明，兹附上美救济署本年4月8日第1382号信的副本^①。

必须抓紧解决这个问题，以便我能在星期四前对美救济署每天能使用多少车皮的问题作出答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亚·埃杜克

^① 见本专题№05435文件。

No 05437

**亚·弗·埃杜克致
加里宁的电话电报**
(不晚于 1922 年 5 月 18 日)^①

对正在发生的延宕向我拨出货币资金一事我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必须于 1922 年 1 月 9 日给美救济署拨出 1921 年 12 月亏欠的 42.5 亿卢布，总共需拨 125 亿卢布。尽管我不止一次地请求赈济饥民委员会中央 1 月份给我提供 150 亿卢布的拨款，但迄今仍未拨出，而小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由小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和赈济饥民委员会中央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审议向我拨出货币资金的问题。我提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开展工作，我请求采取措施，向我提供我指定数目的纸币，因为我的要求是经过周密讨论后提出的，数目是很菲薄的。美救济署答应在今年 1 月供应 200 万饥民，由于不及时拨出货币资金，这个计划将被破坏。

俄罗斯联邦驻国外赈济饥民组织全权代表 亚·埃杜克

^① 电话电报于 1922 年 5 月 18 日收到。

№05438

赫·胡佛关于美救济署在
俄工作给威·哈定的报告摘录

(1922年7月10日)

敬爱的总统先生：

国会授予使用合众国谷物公司的资金救济俄国饥民的全权于7月1日到期，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此期间不仅由这些资金、而且由美国救济署从其他来源得到的资金所取得的总体结果提出一份简短的报告。

委员会通过谷物公司购买和从军事部门得到以下粮食，除一小部分外，这些粮食均由美国救济署转运：

	单位：吨
谷物	248418
粒粮	92841
小麦	41120
黑麦	21074
罐装牛奶	21696
药品	3400
<hr/>	
共计	428549

除上述物资外，由美国救济署及其下属其他组织出资运出以下物资，其中大米、油脂、白糖和可可等是对儿童份粮的专门补充：

	单位：吨
小麦	111686
面粉	101855
粒粮	29559
豆类、豌豆和特殊种子	9259
大米	15763
罐装牛奶	33515
白糖	15464
油脂	9277
可可	3395
药品	2000
其他、服装、口袋、肥皂	24337
共计	360430 ^①

美国救济署的资金来源

到救济运动结束时，从美国救济署各个方面收集经它们同意并在美国救济署监督下分配的资金^②，初步估算，包含以下大致数目[……]：

美国救济署的总资金、粮食、各种包裹、捐献	17500000 美元
国会对粮食和种子的拨款 (合众国种子自由资金总量)	19300000 美元
国会来自军需、药品拨款	4000000 美元
美国红十字会药品供应	3600000 美元
欧洲联合分配委员会	2325000 美元

① 原文如此。

② 1921年8月21日召开了慈善组织代表会议，11个组织签订了关于在美救济署的领导下共同赈济俄国饥民的协议。

劳拉·斯捷尔曼纪念会	500000 美元
苏维埃政府提供的黄金	11433000 美元
国家路德派教徒委员会	300000 美元
摩门教派中央委员会	200000 美元
联邦教会委员会	90000 美元
国际基督教青年联合会	50000 美元
伏尔加救济委员会	200000 美元

共计 59498000 美元

根据我们条约的条件，由俄国当局出资向我们提供了所有国内运输、仓库、分配和设备。此外，由于住在合众国的人给俄国的某些人邮寄食品包裹，救济署从中得到了邮寄手续费。

由邮寄得到的款项显然超过行政开支，并成为救济儿童的一笔可观资金。以此为基础，国会的资金和由分配署募集的款项分文未动。

除了上述款项外，经公开呼吁友协^①向美救济署购买了41.5万美元的粮食，分几次直接寄给了自己的分配组织。

此外，合众国的各种共产主义委员会借社会慈善事业的名义募集了粮食，直接寄给苏维埃政府分配，价值约50万美元。

分 配

美国救济署国内外行政人员约200名美国人，他们辖下约有8000名俄国人，他们管理15700个食堂和分配点，供应为数约325

^① 指苏俄之友协会，该协会1921年7月在美国产生，8月7~9日在纽约举行的代表会议上正式成立。

万名儿童和 530 万名成年人，总共约 855 万人 [……]。

药品供应为控制伤寒、热肠病、天花和饿伤寒等病提供了可能。

数百万人接种了各种疫苗，并实施了其他卫生措施。

我得到我们分部的消息说，救济署目前给予所有它能接触到的生命处于危险的人以救援，与饥饿直接有关的死亡曾一度中止，尽管在俄国几乎每个人都在挨饿。初冬死亡率曾相当大。如果俄国的铁路能够运输美国救济署在俄国各港口的大批粮食储备，死亡率就会低得多。

总 结

[……] 我认为，这些努力阻止了战后的最大一次灾难。俄国人民将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深信，工作结果会使美国人民长期满意。不这样做，数百万人会饿死。还有更多的人会因随之而来的组织不善和疾病而死亡。

我要感谢运输部，它运输货物，工作卓著；我要感谢海军，它提供了舰艇，感谢各位舰长们，他们帮助解决俄国港口的困难；我要感谢部队，他们提供了人力和食品援助。上面提及的美国其他组织的共同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给了俄国当局以巨大的帮助。

我想补充一下，没有您的直接支持，不会达到这些成就的。

忠诚于您的 赫尔伯特·胡佛

美国救济署署长

№05439

什梅里奥维奇关于救济粮运抵俄国事 给卡·伊·兰德尔的呈文摘录

(不晚于1923年1月17日)^①

秘密

我认为有必要提请您注意紧急解决继续自美国向俄国提供食物包裹和物品包裹的重要性^②。对每个食物包裹美救济署征收10美元(约5亿卢布),同期在乌克兰这种包裹只收15亿卢布。如果我们以收到包裹的主要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粮食价格为例,那么,包裹的价值不超过1.75亿卢布。这样,美救济署对包裹征收的钱约超过它的价值一倍。据此判断,物品包裹的情况也好不了。

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1920年底从美国寄到俄国的一美元这里付给350卢布,那时在美国的报刊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反俄国宣传。而现在,像美救济署这样的半政府组织,靠牺牲俄国居民的利益,每10美元多得50%,美救济署不仅未遭到反对,而且还享受免费提供的运输工具、货栈等。

居民优惠得到食品包裹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应该把终止输入上

① 呈文于1923年1月17日随俄联邦和乌克兰驻国外援俄组织全权代表卡·伊·兰德尔的信一道发给国家银行行长。

② 向俄国提供食物包裹一事是根据同美救济署的协议实施的,协议草案根据加米涅夫的建议于1921年10月19日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述包裹问题提上日程，并向美国和俄国居民解释，以这种方法给予个人救济是不合算的 [……]。

什梅里奥维奇^①

^① 什梅里奥维奇——俄联邦和乌克兰驻美国慈善组织“Joint”所属国外组织特命全权代表。

No05440

**卡·伊·兰德尔关于
美救济署工作的报告摘录**

(1923年2月12日)

绝密

根据最新消息和在日常工作中与美救济署每天的接触判断，我可以明确地说，美救济署在其规定的工作期限（今年6月）结束后，仍有在俄国继续存在的坚定意愿。显然，在与美国建立正式关系之前，合众国政府有必要保持这里的美救济署作为美国的代表机关。美救济署对我们的某些要求作出一定让步，让步要比期待从如此保守的组织能够得到的大得多，其原因显然就在这里 [……]。

美救济署的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慈善工作和邮寄工作。美救济署的慈善活动包括为儿童、病人提供食品，对大学生进行救济，医疗。这部分工作的金额如下：今年1月食品救济75万美元，医疗38万美元，总计113万美元。2月：食品救济120万美元，医疗38万美元，总计158万美元。3月：食品救济180万美元，药品救济38万美元，总共218万美元。美救济署在16个区工作，现在供养儿童达150万。口粮的卡路里迄今是极其低的，从2月1日起增加到660卡路里，正在谈判进一步增加到900卡路里 [……]。

在医疗方面，在有谢马什柯^①和索洛维约夫^②同志参加的正

① 谢马什柯，尼·亚·（1874～1949）——1918～1930年任俄联邦（苏联）卫生人民委员。

② 索洛维约夫，季·彼·（1876～1928）——1918年起任俄联邦（苏联）副卫生人民委员，1919年起任俄红十字会主席。

式会议上，美救济署答应与卫生人民委员部协调订购和分配药品的计划和清单，在地方与我国的保健机关协调。在供应大学生食品方面，目前最大限额是月 11000 人，近期尚无加大救济的具体项目 [……]。

我们另一个难题是削减美救济署的组织开支，毫无疑问，它是我们花钱最多的组织。

最近，美救济署已原则同意加大削减开支（它已经作了某些削减，16000 名工作人员只剩下 2000 名了），并组成了特别混合委员会，任务是制定美救济署的开支预算，以削减支出。但美救济署拒绝承担机关的全部开支（按照近东救济委员会的样子），拒绝的理由是根据条约必须有我国政府参与此事。

在美救济署的新创议中有一个建议值得注意，这就是在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基础上，保障二级中学教师的邮包（一人一月一个）。这个建议同美救济署去年提出的为我国知识分子提供保障的建议有密切联系，它因美救济署不承认均等原则被我们否决。在最近的建议中，这个原则得到承认，在邮包分配委员会中，我们占多数（我的代表 1 人，工会 1 人，美救济署 1 人）。但我们必须作一实质性修改——不仅要为二级学校，而且也要为一级学校的教师发邮包。毫无疑问，美救济署建议的意图是驯服和收买水平较高的城市知识分子 [……]。但不应对这些企图过分担心；考虑到目前时局，我们不能麻木不仁，而要把这个领域的救济纳入到对我们最无害而最有利的轨道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1）去年我国饥民的状况和考虑到今年的需要——极其贫困的居民有 900 万，其所需救济之规模是我国自己的资金和资源不能满足的。

（2）恢复我国农业和某些工业部门需要集中全力及资金，为此必须利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性，甚至是外国组织提供的，哪怕

他们的出发点是一己的利益。

(3) 注意到外国组织过去工作的实际经验，他们现在的工作以及今后的具体计划，毫无疑问证明这些救济对我们有好处，这些救济的开销会被给我们带来的益处中得到弥补 [……]。

(5) 认为无论在慈善方面，还是在改造方面，根据以下原则继续这项工作是可行的：a) 把这些组织的机关减少到最低限度；b) 机关等的开支全部或大部分转由这些组织自己承担 [……]；c) 外国组织的工作计划与中央消除饥荒后果委员会^①的计划充分协调，而在改造方面，与相应部门的工作计划和方法进行协调 [……]；d) 通过我国消除失业、救助残疾人和流浪儿的组织系统，开设便宜的大众食堂，支持社会性工作等等给予援助。

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驻国外援俄组织全权代表 卡·兰德尔^②

① 消除饥荒后果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中央消除饥荒后果委员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9月7日的指令成立，任务是消除伏尔加流域饥荒的后果。1923年6月20日撤销。

② 兰德尔，卡·伊·(1883~1937)——1922年起任俄联邦和乌克兰驻国外援俄组织全权代表。1923~1925年任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054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 号记录摘录

(1923 年 6 月 14 日)^①

出席：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拉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索尔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40. 关于撤销美救济署。^②

决议：同意加米涅夫同志与美救济署代表签署撤销协议，注销苏联与美救济署之间的一切相互账款，双方欠款无偿勾销，同时苏联政府答应不在苏联领土上向美救济署提出要求。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① 1921 年 4 月 12 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美救济署问题，决定自 1923 年 6 月起开始停止美救济署在苏联的工作。

② 1923 年 6 月 12 日经政治局委员们电话表决通过。

№0544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3号记录第37条的附注
(1923年6月21日)**

加米涅夫同志建议^①：

1. 由人民委员会作出致谢决议，并以恰当的形式授予哈斯克尔；
2. 授予哈斯克尔及其两名亲密助手艺术礼品；
3. 6月15日离开之前举行宴会。

^① 加米涅夫1923年4月9日的建议经15、16日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电话表决通过。

【专题说明】

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

(1921年3月至1922年10月)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它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通过强制的手段限制以至消灭被看做社会主义大敌的小生产，消灭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虽有其军事上的需要，但从指导思想上看，更主要的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在起作用。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一开始就受到农民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拒，但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形势下，这个矛盾暂时被掩盖了起来，但到1921年初，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标志——余粮收集制的不满就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各地农民暴动蜂起，最后爆发了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原是十月革命中的骨干力量，在十月革命和后来的国内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把喀琅施塔得暴动所引发的危机叫做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加速模式的改造过程，把从1920年起党内外就有人提出的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改革迅速予以落实。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粮食税的决定，这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标志，是一种模式的转换。就实质而言，是

从依靠军事行政命令的办法建设共产主义，转换成通过商品货币、依靠市场机制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它虽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但在社会主义史上仍然是值得注意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同模式转换相适应，或者说，作为这次模式转换的灵魂的是列宁思想的新发展。毋庸讳言，军事共产主义的推行同当时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通过三年的实践，列宁看到此路不通，它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也得不到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列宁看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把“小生产者”的广大农民看做社会主义的大敌，而应当把他们看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或缺的同盟者，应当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吸引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的一系列有关论述为新的模式——新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论证。这一切是列宁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列宁思想中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最有借鉴意义的宝贵遗产。

本专题的文件涉及粮食税、租让制、电气化、运输工作、对外贸易以及军队如何介入经济建设等等问题。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任建华、
刘燕明、项国兰、韦清豪)

№01412

弗拉基米罗夫就粮食税问题致瞿鲁巴

(1921年3月2日)

副本

秘密

电报(密码)

发自第5集团军电报局

643, 138, 2, 20, 30,

1921年3月2日收

1921年3月2日, 第162/Б号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抄送: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致瞿鲁巴

代表大会粮食小组的讨论清楚地证明实行粮食税极为危险。空想家们和非党人士还揭示了农民对粮食税的想法, 他们特别强调要自由支配纳税后剩余的粮食, 用以同工人进行交换。更加危险的是, 工人也明显倾向于进行这种交换。如果这一切不纳入国家调节, 粮食机关便无法进行收购。请注意, 既然乌克兰尽管困难很大, 但仍然成功地推行了余粮收集制, 那么考虑到整个社会政治关系, 不可能制定出毫无争议的税收量并把它们收齐, 而这是支配余粮的先决条件。所有负责的粮食工作者都确信,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

进行工作。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试投票也清楚地说明，乌克兰不能实行粮食税。

粮食人民委员 弗拉基米罗夫^①

^① 弗拉基米罗夫，米·康·（1879～1925）——历任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和农业人民委员、苏联副财政人员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No01413

哥尔布诺夫就彼得格勒
学者协会的建议致托洛茨基

(1921年3月2日)

副本

1921年3月2日第178号

致莫斯科 托洛茨基同志

受列宁同志的委托现送上彼得格勒学者协会的建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原则上应当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它并不要求我们负什么责任，在政治上即使对我们无益，也决无害处。

如果您对学者们的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列宁同志请您给他打个电话。

务必今天告知您的意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①)

^① 哥尔布诺夫，尼·彼·(1892--1936)——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20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副本

秘密

1月27日，由140位著名的学术界代表（36位院士，40位高等院校的主席和校长，43位最著名的大学教授，20位工程师、“实业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彼得格勒市学者协会认为，有必要就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通过阿·叶·费尔斯曼^①院士、阿·马·彼什科夫^②（他没有正式参加会议，原因不详）和会议成员Л.И.托洛茨基（从他的外貌和言谈来看不能令人十分信赖）向苏维埃政府提出彼得格勒学者协会关于作为中介为苏维埃政府筹借外债（120万金卢布）用以为彼得格勒购买粮食问题建议。

如果政府原则上同意，会议将研究并紧急提出一个经济和财政计划以及实现这个计划的组织形式，但是必须承认会议的法人地位并为其顺利制定计划提供条件（一笔数目不大的贷款，办公用品，用于召集会议的交通工具，会议代表往返莫斯科的权利，试探国外反应的机会以便具体实施会议代表出国交流的计划）。

会议同意在制定粮食进口方面扩展自己的建议，利用特殊的财政条件（贷款）不仅能保证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还能保证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粮食供应。

（签名）^③

① 费尔斯曼，亚·叶·（1883—1945）——矿物学家，1919年起是科学院院士。

② 彼什科夫，阿·马·（1868—1936）——即马克西姆·高尔基。

③ 署名字迹难辨。

№01414

列宁就粮食税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3月3日)

副本

秘密

1921年3月3日

托洛茨基同志：

寄给您供参阅。

事情很有意思。

依我看，乌克兰的共产党员们错了。

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不是否定粮食税，而是要求加强军事措施，以彻底消灭马赫诺等等。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01432

列宁和托洛茨基就
租让问题交换的便条

(1921年3月28~29日)

一、列宁致托洛茨基

副本复制件

莫斯科，1921年3月28~29日

托洛茨基同志：

请看一下这封信^①（很有意思），并退还给我。我今天就跟哈尔科夫方面谈。

但是关于租让问题的那些说法不幼稚和可笑吗？“爱国主义”既有巴库的，又有顿巴斯的。

最好是把顿巴斯（+克里沃罗格）的1/4租让给承租人。您的意见呢？

列 宁

^① 格·列·皮达可夫1921年3月22日写信，请求列宁协助把谢·伊·瑟尔佐夫派到顿巴斯做党的工作，但此事受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阻挠，原因是在工会问题争论时瑟尔佐夫曾追随过托洛茨基。此外皮达可夫在信中还反对租让顿巴斯。

二、托洛茨基致列宁

1. 我认为顿巴斯没有理由不搞租让。
2. 由于健康原因我不得不离开。请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完成此事（反正我无所谓）。

托洛茨基

附言：请注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在一些省宣布交换自由的同时必须从工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托洛茨基

№01433

列宁就格鲁吉亚租让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3月29日)

副本

直达电报(密码)

1921年3月29日第70/田号

致奥尔忠尼启则

我们收到了纳里曼诺夫^①、布尼亚特扎德^②和谢布罗夫斯基^③的一份十分悲观的电报，他们正确地指出，要把第11集团军调回饥饿的、被洗劫一空的阿塞拜疆是完全不可能的。请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把该集团军留在格鲁吉亚，无论如何要尽快以格鲁吉亚的租让项目和锰矿石等等从国外换回粮食。请尽快答复。

受政治局委托 列宁

① 纳里曼诺夫，纳·克·纳·(1870~1925)——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任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

② 布尼亚特扎德，达·霍·(1888~1938)——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是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和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先后任阿塞拜疆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③ 谢列布罗夫斯基，亚·巴·(1884~1938)——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6年在巴库任阿塞拜疆中央石油管理局局长。

№01434

列宁就格鲁吉亚租让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3月30日)

副本

秘密

直达电报 (密码)

1921年3月30日第72/ш号

致奥尔忠尼启则

务请十分认真地注意昨天提出的关于集团军和格鲁吉亚租让项目的问题。格鲁吉亚的孟维什克政府曾签订过一系列租让合同，要尽一切力量设法恢复这些旧的租让合同，尽可能快一点并想各种办法签订新的合同，以使用租让项目换取粮食。把这份电报给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看一下，并尽快把他们的答复告诉我。

列 宁

№01435

列宁就格鲁吉亚租让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4月5日)

副本

绝密

密码

1921年4月5日第76/山号

致奥尔忠尼启则

您的答复不完全，也不清楚^①，请向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第一，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是否已批准把特克瓦尔切利煤矿租让给意大利人，是什么时候批准的，什么条件？请来电简单汇报一下，并来信告知详情。

第二，关于奇阿图拉锰矿：是否已经把德国矿主变为租赁者或者承租人，是什么时候，什么条件？最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的解决要极其迅速，这无论对格鲁吉亚，还是对俄罗斯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租让，特别是租让给意大利和德国，是绝对必要的，正像用石油交换商品一样，先同这些国家大规模进行，然后再同其他国家进行。请把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的措施告诉我。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指奥尔忠尼启则对列宁1921年3月30日电报的答复。

№01438

列宁就在外高加索推行新经济政策
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1年4月9日)

副本
绝密
密码

1921年4月9日第78号

致奥尔忠尼启则

您关于外高加索粮食状况严重的密码电报已经收到。我们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了亚美尼亚一些工作，向粮食人民委员部重申交给它的各种任务，但是，我要预先指出，我们这里困难很大，无力援助。我坚决要求为整个外高加索成立一个区域经济机构，尽一切努力签订租让合同，特别是在格鲁吉亚；设法哪怕是在国外购买种子，并利用巴库的资源把阿塞拜疆的灌溉工作推进一步，以便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同时努力发展同北高加索的商品交换。您和格鲁吉亚的同志们是否领会了我们实行粮食税的新政策的意义？给他们读一下这封信，并经常把情况告诉我；请读一读我给巴库的谢列布罗夫斯基的信^①。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见《列宁全集》第50卷第210~212页。

№01441

列宁就电气化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4月30日)

副本

绝密

莫斯科 1921年4月30日

托洛茨基同志：

沙图诺夫斯基^①的小册子《水力和革命的彼得格勒》我读过了。

写得很差劲。夸夸其谈而已。有用的东西一点也没有。

惟一的一点有用的意思是在第15页：

“根据这些杰出的水力专家的意见，有8个月就足以取得这一伟大业绩的实际成果。”

专家是谁呢？没有这样的专家（我问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没有这样的专家）。沙图诺夫斯基写了他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这样评价的）。除了这一条空洞的意见，整个小册

^① 沙图诺夫斯基，雅·莫·（1876～1932）——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8月起从事经济工作，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运输总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处成员。沙图诺夫斯基的小册子《水力和革命的彼得格勒》提出了恢复彼得格勒这个正在衰落的工业中心的问题。他提出利用斯维里河和沃尔霍夫河的水力来恢复彼得格勒的经济，声称他提出了一个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相反的“革命的”改造计划。1921年4月24日，列宁把此小册子送交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并在小册子的封面上写道：“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您的意见如何？请马上退给我。我再寄给季诺维也夫。”

子里什么也没有。

让沙图诺夫斯基来证明并提出实际的建议吧，否则废话仍然是废话。

您的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01442

托洛茨基就电气化问题复列宁

(1921年5月3日)

副本

1921年5月3日

邮政电报第57号

关于沙图诺夫斯基同志的小册子

致列宁同志

沙图诺夫斯基的这本书是一本鼓动性小册子，意在引起人们对彼得格勒工人问题的关注，向有关机关提出问题。这样的鼓动性小册子，当然并不是彼得格勒地区电气化委员会的报告。

基本设想是无可争议的，无需专家审查。彼得格勒就其现状来说是没有生命力的。从工业的角度来看，它现在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寄生虫。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供养它，很值得怀疑。

由此提出一项独立的任务：要么关闭彼得格勒工业，把彼得格勒当作布局更加合理的工业的材料管理仓库；要么提出彼得格勒首先实现电气化的问题。这正是沙图诺夫斯基所要求的。他认为，如果能够以顽强的精神努力去工作的话，8个月就可以完成电气化的规划设计工作。他很可能错了。但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

题提出来，并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是无可争论的。而此项工作需要引起群众的兴趣，在这方面他是对的。他的小册子的功绩就在于此。至于您所说的专家的意见，我认为他并不非常有把握。他在搞电气化的技术核算和商业概算，大概认为这就是经济计划。我则认为，就像乘法表不是商业企业一样，商业概算还不是经济计划，甚至不是制定经济计划的途径，而仅仅是经济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初步工作。并且整个概算对当前的经济计划现在和将来产生的影响都十分小。

彼得格勒电气化问题是目前经济计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毫无计划性，不懂得计划的必要性，而计划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却在有计划地否定制定切实可行的近期经济计划的必要性。不过这已经超出了关于沙图诺夫斯基小册子的问题。

托洛茨基

附 言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这样的：应该把电气化专家们请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明白，用一般的办法，彼得格勒很可能等不到电气化了。必须重视这一问题。请费神计算出，你们需要哪些人力和物力——首先要依靠彼得格勒自己的力量——以便大力加快彼得格勒的电气化进程，哪怕只在最重要的企业内实现也好。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作出初步统计。”

我认为，这以后才真的会少“说废话”，多干实事。

托洛茨基

№01444

关于创建“苏维埃农民协会”问题

(1921年5月23日)

列宁同志给莫洛托夫同志的批语：

建议请中央委员们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后面，然后将文件退回中央书记处，请督促及时退回，因为这是机密。

列 宁

5月23日

我的意见附后。

列 宁

副本

绝密

1921年5月11日

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创建“苏维埃农民协会”

—
由于改行实物税和自由商品交换而引起的我们政策的转变，必然会促进农民的经济组织，特别是合作社组织的大发展。一旦人们

认识到这种转变是可靠的、真诚的，现在的非党农民群众便会大批加入到我们的党组织中来。将产生两种危险：一方面，农民可能越过无产阶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无产阶级而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可能会被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瓦解。

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控制农村建设的办法，尽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力量为数不多，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核心不受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腐蚀。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一方面大力提倡经济工作上的首创精神（俄国共产党应当在合作社和手工业建设方面发挥这种首创精神），同时发扬大无畏的政治首创精神。

二

必须仿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原则来建立“苏维埃农民协会”。共青团形式上是非党机构，但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接受俄国共产党的领导。苏维埃农民协会也应该是这样的。必须挑选一批党员干部，同可靠的、完全站在苏维埃立场上的非党农民一道成为协会支部会的创建者，担当起接收会员的工作，仔细审查入会者的社会面貌（不接纳富农分子）和政治色彩（不接纳黑帮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

协会应当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国家制度的长期不可动摇的形式，承认土地国有制，同剥削他人劳动的行为作斗争，每个会员有义务力争实现社会的统一，至少要按照合作社原则进行经济活动，等等）。信教不影响加入协会。

协会的任务应该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文化教育方面的任务，又有文化经济的任务。协会通过组织讲座、座谈、争论、群众集会、报刊宣传等形式不断提高会员的政治觉悟；向苏维埃，向文化教育和经济组织（包括合作组织）的理事会推荐自己的候选人。协会还要协助建立启蒙小组、俱乐部、乡村阅览室等等。创办合作社以及向农民改善农业委员会、乡经济委员会等部门提出关于改善

地方经济的建议等等，都是协会分内的事。

协会创建者有权定期对会员进行重新登记和确定会员的预备期，候补会员经过预备期之后获得表决权。

三

通过建立这种协会将取得如下成果：

(1) 为农民对建立社会政治组织的愿望提供一个解决办法，农民在经济组织性提高后必然会出现这种愿望的；

(2) 使这种愿望来自俄国共产党的渠道，而农村共产党员自己能够实现这种愿望。

(3) 使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失去最后的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并且在组织上陷入孤立。

(4) 俄国共产党得以在政治上监督农村的所有文化经济建设：在各个协会分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并可以通过他们了解个别会员的全部言行，知道每个会员的政治面貌，党面对的将不再是一大帮“非党”群众（其中既隐藏着社会革命党人、黑帮分子，也有正直的非党人士），而是易于识别的类别分明的群体；农民协会将成为传动带，它将把小型主动轮（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阶层）的运转传给大型的农民主动精神的实际工作轮；显然，没有这个传动带，无产者阶层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运动；

(5) 在工作中受到考验，证明自己完全忠于苏维埃政权，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协会会员可以转入党内，这对党不会有任何损害，也无须让他们经受“候补党员”、“同情者”等名目的长时期令人难受的“考验”。

四

我设想苏维埃农民协会应该是综合性的组织，既不同于工会，

也不同于纯政治性的联盟。农民工会首先不符合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特性：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在经济上的联合（尤其是在新的政治方针指导下）自然是按照具有集体企业（合作企业）形式的联合路线来进行的。按照劳动力专业技能的特征把农民联合起来意味着人为地把他们联合起来，要他们向无产阶级模式靠拢。

其次，如果协会加入总的工会网，特别是加入土地、林业工作者工会，那么就可能出现农民大量涌入工会的极大危险，使非党工人组织面临的危险比共产党组织面临的危险还要大。

最后，对农民来说，单纯的经济联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其政治组织（哪怕为了政治监督）。然而若是人为地以纯政治为基础进行联合，农民便只能是一个阶级特性长期不能融为一体的群体；因此，对共同的文化教育和文化需求的服务应当是增加内聚力的辅助条件。

请将上述意见提交中央讨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瓦·奥博连斯基（奥新斯基）^①

我认为为时过早。应当想出几条措施，更慎重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提交政治局。请全体中央委员提出自己简要的意见。

列 宁

1921年5月23日

^① 奥新斯基，恩·，原名奥博连斯基，瓦·瓦·（1887～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3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在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死于狱中，后平反。

No01445

列宁就利用军队搞经济 建设问题致斯克良斯基

(1921年5月30日)

副本

1921年5月30日第364号

抄送：托洛茨基、总司令、古谢夫和丹尼洛夫同志亲收。原件退我。

斯克良斯基

(送巴·巴·列别杰夫5份。6月21日)

斯克良斯基同志：

关于利用军队搞经济建设问题。

这个问题一刻也不能忘记。

要全面考虑，作好准备，制定这方面的一整套计划并始终不渝地加以贯彻。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显得特别突出：

(1) 目前的最紧迫的经济工作（护盐和采盐；燃料方面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

(2) 今后若干年内实现国家统一经济计划方面的工作。十年内要完成的电气化计划（第一批工程）需要37000万个劳动日。这等

于军队每年每人要出 $(37 \div 1.6) = 24$ 个劳动日，也就是每月两天。

当然，军队的部署现状，向各劳动地点运送以及其他等等情况，都会带来无数困难，但是，军队仍然能够而且应当（借助普遍军训）为电气化事业提供巨大的援助。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经济上使军队同这个伟大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始终如一地致力于这一伟大的事业。

请您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宣读这封信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能听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得到他们的哪怕是简短的意见，我都会感到高兴。^①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列宁手书）

① 根据斯克良斯基的指示，信的抄件分送给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各委员在7天内提交自己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后来，1921年7月4日列宁又指出，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要考虑军队参加经济建设（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67页）。

№01458

列宁就波波夫的建议 致莫洛托夫

(1921年7月28日)

副本

绝密

1921年7月28日第624号

致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同志

我个人倾向于采纳波波夫^①的建议。我提议明天白天交政治局讨论并作出最后决定。^②

列 宁

附：列宁同志同弗拉基米罗夫和波波夫同志的直达电报通话。

① 波波夫，帕·伊·（1872～1950）——1924年加入俄共（布）。1918年起任中央统计局局长。

② 1921年7月29日，俄共（布）政治局讨论了在乌克兰征收粮食税的问题。在上午的会上，原则上通过了波波夫的建议——至少征收12000万普特粮食。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打电报来说，只能保证实际征收粮食税1亿普特，加上磨房税2000万普特以及商品交换1000万普特。俄共（布）政治局在下午会议上撤销了原决定，通过了乌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

副本

秘密

1921年7月28日

列宁同志同弗拉基米罗夫和波波夫同志的直达电报通话

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波波夫同志认为，根据我们的税率实际上可以收到8000万普特，如果提高收成税率，按波波夫同志的意见，还可以多收2000万普特。我认为，无论实际收成是否与预计的增产相符，波波夫的计算都是不正确的。我原来已按照各县的政治状况把税率提到最高限度。我深信，有盗匪活动的各县税率如再提高，实际上会导致收入减少。我认为惟一的出路就在于拿到全部磨坊税，这项税收可提供大约1700万普特，但是，为此必须提出一个具体条件：在组织磨坊主方面对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作出改变。

尽管在政治上有所不便，但是要采取措施，使余粮只归合作社收。我刚才给各省发电报要求推迟公布税率。这样一来运动又要推迟了。

列宁同志：

波波夫昨天告诉我，他认为正确的数字不是8000万普特，而是13300万普特。他答应今天把同您最后商谈的结果告诉我。他还答应把关于如何计算乌克兰可能和必须达到的最高限度的粮食税额的具体建议也送来，可是今天我从波波夫那里还什么也没有收到。请您在今天打电话把您和波波夫两人各自最后拟定的方案报来，分别指出哪几点你们是一致的，哪几点不一致。这些必须今天收到，再拖下去是不能容许的。

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还没有跟波波夫商量好。他建议提高税率的主要涉及有盗匪活动的各县，那里的党组织十分薄弱，这些县对原定的税率已经提出反对了。我相信得不出好结果。拉柯夫斯基正要把这个问题同其他一系列建议一起提交政治局。我向您预先报告，他想向政治局提出的一个建议是：责成9个省的农民一周内每户上交两普特，其中一普特作为纳税，另一普特作为支援乌克兰和苏维埃俄罗斯遭受饥荒的人的特别储备。这样做将有可能迅速增加运出的粮食，实际上可增加税收1200万普特。请回答。我认为从整个情况来看这是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

为了立即作出决定，我们必须收到波波夫的建议。刚才收到弗拉基米罗夫和拉柯夫斯基的电话，还必须有波波夫回复的建议，我希望他已经知道弗拉基米罗夫和拉柯夫斯基的电话的内容。请波波夫赶快打电话来。

波波夫同志：

我已建议政治局把很大一部分县划入收成较高的类别，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有可能多收2000万~2500万普特的粮食税。莫斯科方法与乌克兰方法所不同的地方是：乌克兰的收成按他们自己的方法计算要比按莫斯科方法计算低30~45%。政治局考虑到组织上的原因（机构涣散）和政治上的原因（盗匪活动），没有采取这一建议，因为在我到来之前两三天已将税率下达各县。但我个人认为下达各县的税率各乡还不知道，因此我认为改变收成税率是可能的。这样做，再说一遍，至少能多收2000万普特。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把收成等级提高几等，把一些县的收成定为80、90、100普特。实施这类税率的县，按莫斯科的抽查方法计算不少于25个，这些县能多提供粮食税400万~600万普特。政治局已接受建议，但收成却是按自己的办法确定的。这只能在3~

4个县，而不是25个县增加税收，总共绝不会超过100万普特。粮食税总额由粮食人民委员部预定为13300万普特，后来由于多算了纳税人中大土地使用者的数目，又增加了60%；而按大土地使用者占大多数的实际情况，税收总额可以增加10~15%，最多到20%。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由于纳税人少报耕地数量和多报农户人口而造成的税收减少：土地使用的规模愈大，报的人口愈多。根据我的计算，税收总额会减少20~30%。粮食人民委员部实际上不可能精确确定每个农户的耕地面积和人口。因此，如果说根据平均税率算出的税收总额由于纳税人多数是大土地使用者而有某些增加，那么另一方面，这点增加却由于耕地减少20~30%而抵消了。因此，乌克兰按当地税率实际上可能收到的是8300万普特，而不是他们预计的13300万普特。我曾建议算出实际上可以收到的税额，总数按下面的计算可达10000万普特：按平均数计算可收8300万普特；其次，将部分县的收成税率提高，可以多收2000万~2500万普特；第三，将25个县划为收成为80、90、100普特或更高的类别，还可以多收400万~600万普特。此外，通过磨坊税可收入1700万普特。因此，我们可以收到近10000万~10700万普特的粮食税和1700万普特的磨坊税，总共有12000万普特。其中我们可以拿出6000万普特给俄罗斯联邦。我不反对政治局通过的各项决定，总能拿到一些粮食，但数量太小，因为税收总额的实际增加只能依靠把一部分县的收成提升到较高的一个等级。此外还应补充一点：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给各地发出了推迟24小时公布各县收成等级的电报。政治局通过的决定已使弗拉基米罗夫的电报无效。我等待新的指示。

列宁同志：

我们明天白天作最后答复，在这之前请设法暂不预先作任何决定，以便能在明天同波波夫同志商量好后通过一项执行波波夫同志方案的决定。

№01467

列宁和斯大林就签订外贸
合同问题致纳里曼诺夫

(1921年9月26日)

副本

秘密

密码

第 01185 / 261 / III

致巴库 纳里曼诺夫

未经区域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意和俄共中央批准，无论如何不得与德国人或其他任何人签订对外贸易合同。收到此电后请复电并告执行情况，然后函告全部详情。

列 宁 斯大林

№01474

托洛茨基和列宁关于租让问题的通信

(1921年10月10日)

一、托洛茨基致列宁

(1921年10月10日)

副本

致列宁同志

备忘录起草人沃里克^①是参加谈判的德国人之一。
现将副本寄上，以备您未收到副本之需。

托洛茨基

二、列宁致托洛茨基

(1921年10月10日)

托洛茨基同志：

我没有这个副本。把军事方面的租让与“商务”方面的租让结合起来也许是对的，要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沃里克，新闻工作者，充当德国和苏俄各界人士之间的非官方调解人。

备忘录

鉴于在我们9月初回到柏林时费尽周折在德国的经济界和一部分对政治熟知并感兴趣的人上中建立起来的亲俄国的各种联系再次中断，考虑到同样的波动还会不断发生，有必要搞清楚这些干扰的起因，然后找出最恰当的方法去克服它，甚至是阻止它。

不久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无不同最近席卷欧洲的干涉浪潮有关。来自伏尔加地区的夸大其辞的报道和对委员会^①成员被捕的歪曲描述等等，被巴黎的俄国银行家们用来告诫其德国同行不要和俄国的现政府合作。最热衷于干涉俄国的法国看来已经（可能通过卢舍尔^②和拉特瑙^③）向德国的领导层作出暗示：如果德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友好甚至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将以解决上西里西亚问题作为回报。我们至少从一位内阁成员那里直接获悉，波兰由于在内政和经济上都很薄弱，而且在外交上也只不过是东部边境较为活跃，所以它暂时对德国没有实际危险。

经济界的思想 and 态度是：人们一旦确信现政府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就会立即投入到盼望已久的俄国的活动领域中去。如果以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经济界人士的思想相符的方式向他们证明，新的经济方针将持续下去，最初的步骤在施行，那就会引起并增强他们的信任。为了促使政界继续干下去，有必要——仅举几个例子——

① 1921年8月27日全俄救济饥民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因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而被捕，但多数人旋即获释。

② 卢舍尔，路易（1872～1931）——德国铁路工程师，后从事重工业工作。1918年起任多届政府内阁的部长。

③ 拉特瑙，瓦尔特（1867～1922）——德国 AEG 康采恩的领导人。1921年5月担任负责重建工作的部长，10月辞职。

用适当的方式去关注不可避免的来自波兰的危险，并且不断提供证据证明，俄国的其他任何一个政权都必然会敌视德国，或者更可能的是，暴力颠覆的结果必将是长期的混乱和国内动乱；一个被如此削弱的俄国将只不过是大战的战利品，或者从势力范围的划分来说，成为它们的附属国。

从来自各方面的此类消息看，9月中旬局面多少有些恢复。和对经济感兴趣的人士的谈判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在第二种类型的谈判中达成了一个具体的富有成效的协议，出于某些原因这一类谈判将完全分开进行。

下面就主动争取德俄接触提几条建议。德国政治家的情绪变化往往有很大影响。鉴于当前德国内政状况的特点，尤其需要把将来内阁的经常变动考虑在内。

在德国和俄国的领导层之间建立个人的联系有利于两国关系在最近的将来的连续性。德国方面适合的人选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坚信在最近的将来倾向俄国的必要性，并且也能够在必需要时刻通过个人关系或其公认的地位把这一主张令人信服地传达给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人士。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和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以确信对方的观点和自己一致。援引同俄方负责人进行的意见交换，也为他们在本国进行解释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

一旦和几位这样的人物有了个人接触，俄国政府就会有希望通过可靠途径给权威性机构传送在欧洲被歪曲报道的——还会不断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同时必须竭力让广大群众尤其是对经济感兴趣的人士了解我们所理解的德俄亲善的主张。最适宜施加这一影响的是代表德国现任政府的大报。在和柏林的报纸编辑们的商谈中，我向他们证明，他们迄今所发表的有关俄国的材料大多数只报道了不正常的事件，粗略估计可能只占每天发生的事件的10%。迄今为止，德国报刊中

关注正常有序的日常生活状况的报道极少，出于容易说明的原因，这些报道没有引起那位作短暂逗留的来访者的注意，并且被那位怀有敌意的通讯员有意忽视。目前德国报纸的负责人们已经表示，他们愿意采纳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此外，由于来自东方通讯社和周边国家的各个通讯社的有关俄国事件的材料可靠性已经多次令他们失望，所以他们甚至已经作出决定，今后要对这些材料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为此我保证向他们提供真实材料，尤其是有关俄国经济最新发展的统计材料。

第三点是必须找出和德国经济界人士建立直接的密切联系的途径和方法。为此必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思想方法。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我获得了一个印象：由于总是出现财政危险，所以只有当他们完全确信现任政府的延续性以及同它进行有益合作的可能性后，他们才愿意大规模投资。要形成并增强这种信任，只有以适当方式让这些人士了解前6个月中颁布的指导新的经济发展的所有法令。为此正准备把收集到的法令和指令译成德文，标题为《工业中的新经济政策》。和译文一同发表的评论应该通过单个实例和统计数字形象地说明，俄国人是如何依据这些法令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的。这些有关俄国企业家的活动的积极报道——其中一些人得到官方提供的贷款等等——将不会不给德国的各界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德国的企业家目前已经决定将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所以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就俄德在政治领域的合作问题而言，只有和愿意接管对俄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俄国企业的那些人士合作才是有益的。显然，合作所需要的资本只有很久以后才能获得投资者所期望的利润。如果有一个租让企业可以迅速可靠地获利，那么这位投资者将更加愿意去冒这个投资风险。

从这一观点出发租让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组。一方面这些人——例如接管较大规模的工厂——对俄国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这些工

厂需要外国企业家的巨额投入，而不能期望迅速获取利润。我想称它们为生产性的租让企业，以区别于更具商业性租让企业，例如，在易于开发并且具备便利的通向支付良好的市场的运输条件的地方开发原材料的储备。当然用于这一类开发的租让企业对俄国的国民经济价值不大。如果同时向德国的大企业家提供用于开发的租让企业，那么和他们的重要合作将更加容易，也可以说是更加廉价。这些机会我已于9月份向柏林的感兴趣的人士作了说明，他们认为很值得考虑。为进一步阐明这个主张，现在有必要提供有关易于开发的各种机会的材料。正如已经提到的，这些租让企业必须大致具备以下条件：

- 1) 有关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必须在国际市场上有良好的卖价。
- 2) 其开采只需要极少的投资。
- 3) 必须具有便利的运输条件。

有些地方这样的条件已经具备，例如：

- 1) 位于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北部的几个位置优越的森林地区。
- 2) 例如在俄国草原地区的干涸湖泊中发现的化学原料。具有因数量少而在世界市场上价格高的先决条件。这指的是碘化钾、溴等等。

3) 易于开采的鞣剂（丹宁等等）。可以这样说，最高经济委员会出口部的任务应该是：有计划地探寻俄国的原料和半成品的开发和利用的机会，然后把这些材料提供给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买主，以作为对俄国经济的首批合作者的一种激励。

№01476

列宁致托洛茨基

(1921年10月31日)

副本

绝密

1921年10月31日

托洛茨基同志：

(1) 乌克兰人穿越国境事件是怎么一回事？能简单谈一下吗？

(2) 而克拉辛的抗议^①呢？我们是否已经彻底解决这件事了？
还是只同意进行谈判？

敬礼！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克拉辛抗议——1921年10月19日克拉辛从伦敦报告他同美国一家建筑公司谈判的情况，要求为此拨出一笔专款。10月28日政治局同意了克拉辛的方案。11月1日克拉辛来电报，抱怨延缓拨款，还说似乎苏维埃政府拒绝了厄克特的租让，苏俄的机关使租让政策陷于破产。

№01483

布托夫致契切林

(1921年12月1日)

副本

绝密

致契切林同志

尊敬的同志：

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委托，现寄上柯普^①的信（1921年11月26日第83号）、克列斯廷斯基同志的信（1921年11月26日第240号）及克列斯廷斯基^②同志的电报（1921年11月28日）。

阅后请签字，不得复制。

阅后请送波格丹诺夫^③同志一阅，请同样秘密退我。

致同志的敬礼！

布托夫

-
- ① 柯普，维·列·（1880～1930）——1919～1930年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
- ② 克列斯廷斯基，尼·尼·（1883～1938）——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人民银行总委员、财政人民委员、驻德国全权代表、副外交人民委员、副司法人民委员。党的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38年被处死，后平反。
- ③ 波格丹诺夫，彼·阿·（1882～1939）——1921～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01484

彼·阿·波格丹诺夫和列宁的批条

(1921年12月2~6日)

副本

绝密

弗·伊·登记本，收文，第1568号

“秘密退托洛茨基同志，不得复制。”

(契切林同志手书)

彼·波格丹诺夫(亲笔签名)

12月2日

“秘密。退托洛茨基秘书。”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12月4日

注：上述文件保存在“租让”卷宗(关于出售旧船问题)。

No01499

托洛茨基就新经济政策问题致列宁

(1922年1月21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月21日

致列宁同志

昨天我在青年代表会议^①上作了一个报告。一个姓古尔维奇^②的非常年轻的孟什维克在会上发了言，他好像是唐恩的侄子。

我完全清楚了，现在的问题在政治上和宣传上是这样的：采取新的政策是意味着我们从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还是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当然是从第二层意思给青年作解释的。古尔维奇断言我们回到了资本主义，还说列宁谈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个论据（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认为您务必利用首次出现的有利的由头来说明，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样的限度内对工人国家的经济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这个工人国家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为此它才利用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的成本核算方法。

托洛茨基

^① 指1922年1月20—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市青年工人会议。

^② 古尔维奇, J. M. ——费·伊·唐恩的侄子。在莫斯科从事孟什维克的青年运动。

№01529

沙图诺夫斯基就运输 工作给列宁的报告

(1922年10月5日)

副本 绝密 亲收 秘密

1922年10月5日

弗·伊·登记本

收文第572号 1922年10月5日

列宁同志：

运输工作应当是您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之一。

运输工作现在比过去差。它的状况糟了好几倍。如果突然需要调动军队的话，它是胜任不了的。它不能胜任紧急运输。正在进行的代表大会^①触及运输工作的任务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务。它开会是要把工会分成水运员工工会和铁路工会，但这样做并不能振兴运输业。

燃料问题占首位。交通人民委员部想用黄金从国外购买煤，而且看来不得不这样做。这种做法真该结束了。罗蒙诺索夫花掉的黄金够多了。对于燃料总管理局来说不能这样做，它在削减开采量，因为不能支付煤价。此外，这也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

交通人民委员部没完没了地改组，这种改组十分危险。

^① 指10月2日召开的全俄铁路和水运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决不能让哈拉托夫在部务委员会中取代十分有经验的佛敏，因为哈拉托夫得掌握佛敏三年来的经验并荒废他已掌握的工作。现在该开始珍惜像佛敏这样的同志所积累的经验了。

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不协调。在基本问题缺乏为大家所接受的明确路线的情况下，有一些随便安插进去的人物，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工作。

运输业的分散化正在采取破坏这一有机体的形式。应该考虑到，它不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该委员会也不是有机体。不能容许把各个管理局合并成一个取代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把它撇在一边（就像对物资管理局做的那样）或者完全摆脱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管理（就像对中央海运管理局做的那样）。

现在对运输业的物资供应比以前好两三倍，尽管损耗几乎依旧，但维修工作却减少了，因为认为我们的机车甚至车皮已经够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现在很多地方无处存放征收的粮食。学校、教堂都堆满了。不能再拖着不运了。运输力不足的问题十分尖锐。现在不允许提出削减运输量的问题，何况冬天费用更大，需要的燃料更多。

我不会连篇累牍地罗列很多问题来打扰您。我只说一件事。现在应当明确地规定运输政策。政治局在运输业代表大会后应当把这件事委托给有捷尔任斯基和佛敏参加的权威性委员会处理，无论交通人民委员部及与之相关的各人民委员部系统，还是工会系统，都必须遵守这一委员会的指示。这一点对于两个工会尤为重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雅·沙图诺夫斯基^①

^① 沙图诺夫斯基，雅·莫·（1876—1932）——1920年8月起从事经济工作，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运输总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处成员。

№01530

哥尔布诺夫就沙图诺夫斯基

报告致托洛茨基

(1922年10月19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0月19日

第1236/63号

致托洛茨基同志

受列宁同志委托寄上沙图诺夫斯基同志关于运输工作的秘密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告诉他沙图诺夫斯基同志的看法是否值得重视和信任。如果有值得重视和信任的地方，请指出是哪一部分。

回信请寄给我。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哥尔布诺夫

附：报告的副本。^①

^① 见本卷文件№01529。

№01531

托洛茨基复哥尔布诺夫

(1922年10月20日)

副本

秘密

邮政电报第212 P号

1922年10月20日

致哥尔布诺夫同志

对第1236/63号文件的答复

对沙图诺夫斯基同志关于运输工作的报告，我说不出任何意见，因为我没有可能关注运输工作及其现状。我也没有来自沙图诺夫斯基同志的任何材料。

托洛茨基

【专题说明】

苏俄与热那亚会议

(1922年1月至4月)

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夏纳会议决定召开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即热那亚会议，以寻求“中欧和东欧经济复兴”的办法。苏俄政府接受了与会的邀请，并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1月27日组成了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由列宁担任代表团团长，格·瓦·契切林任副团长，团员有克拉辛、李维诺夫、越飞等。列宁领导了代表团的的全部工作，但考虑到列宁健康不佳，同时也出于安全考虑，列宁没有出席会议，而由契切林行使团长的职权。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举行。与会的有英、法、意、日、德、苏俄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会议期间，苏俄代表团利用战败国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德国缔结了拉帕洛条约，在反苏统一战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项国兰、王锦文、韦清豪)

№01496

克拉辛就列宁参加
热那亚会议问题致契切林

(1922年1月9日)

副本 解码电报

1922年1月9日7时30分解码

收文第278/C号

1922年1月7日

发自伦敦

致莫斯科，契切林

鉴于萨文柯夫^①分子、弗兰格尔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活动，我认为列宁决不能去意大利^②。（来伦敦还可以。这里可以妥善安排交通（如由克拉辛陪同）和住宿问题。如果列宁不来，是否可以建议由托洛茨基前来？当然也不能去意大利。

克拉辛

别尔津^③

① 萨文柯夫，波·维·（1879～1925）——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等职。十月革命后参加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参与组建顿河志愿军，建立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参与策划反革命叛乱。

② 指去意大利参加热那亚会议。

③ 别尔津，扬·安·（1881～1938）——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任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5年任驻英国全权代表。

№01497

列宁就参加热那亚会议
问题致托洛茨基等

(1922年1月12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月12日, 1826 /C, 14 /I

莉·福季耶娃电话记录

1922年1月12日, 第8028号

致托洛茨基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关于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赴意大利一事（据克拉辛同志的电报）。

我认为由于克拉辛指出的原因及其他原因，无论是我，还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不能前去。

列 宁

№01498

列宁就热那亚会议的通讯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月16日)

副本

秘密

1922年1月16日，第8040号

致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莫洛托夫同志和契切林同志

莫斯科与热那亚的电报联系在谈判期间至关重要。要提出这个问题并尽快解决。

(1) 3月8日前我们莫斯科的电报站能否接通热那亚？

好像答应过？请检查一下。

(2) 我们代表团在热那亚有收报机吗？

(3) 热那亚同我们怎么通话？

我们的军舰能否驶到热那亚附近，能否带上一个接通莫斯科的电报站？

如果办不到或者费用昂贵，那马上用专门的照会详细商定给我们的专用线路；如果这也非常昂贵，那是否应设置一条接通最近的德国电报站的专线，根据与德国人的合同再从那里进行联系？而我们将在热那亚维护（他们）。

请考虑一下，并尽快向政治局提出。

您的 列 宁

“致斯克良斯基同志

请同我们的专家讨论一下。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手书)

№01499

列宁就契切林的建议致莫洛托夫

(1922年1月23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月23日第8063号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知照托洛茨基同志，第1941/C号

刚刚收到契切林的两封信（20日的和22日的）。他提出一个问题：可否为得到相当的补偿而同意对我国的宪法作些小的改动，即让寄生分子在苏维埃中有代表权。这样做是为了迁就美国人。

我认为，契切林的这个建议表明，应将他：

(1) 立即送进疗养院，这方面的任何姑息、拖延等等，在我看来都是对一切谈判的极大威胁。^①

(2) 这表明我的建议（随信附上）是多么及时，这就是：立即为我们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全体团员拟订我方初步的、大致的、而不是明确的条件。^②

列 宁

电话记录 莉·福季耶娃

1922年1月21日

^① 见《列宁全集》第52卷第198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399~401页。

这封信是我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在会上转交给加米涅夫同志的，加米涅夫答应把信转交给您。

莉·福季耶娃

№01501

列宁就同德国签订租让合同问题致列扎瓦

(1922年1月23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月23日第8065号

电话记录 莉·福季耶娃

致列扎瓦、波格丹诺夫和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知照托洛茨基同志，第1940/C号

我认为，正是现在，即在热那亚会议召开以前，接受克虏伯的建议^①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同德国公司签订租让合同，哪怕签订一项，对我们来说也是无比重要的，更不用说签订几项合同。因此，应当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人中的那种反对租让石油、农业等项目的偏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列 宁

^① 指德国克虏伯公司提出的承租5万俄亩土地的建议。参见《列宁全集》第52卷第354～355、420页。

№01502

托洛茨基就托雷塔的建议致政治局委员们

(1922年1月29日)

副本

秘密

1922年1月29日第84号

致政治局委员：列宁、加米涅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同志。致契切林同志。

今天我从报上^①看到了德拉·托雷塔^②的两份电报。他在第二份电报中说，除了最高苏维埃所代表的国家外还将邀请所有法律上得到承认的欧洲国家。毫无疑问，这就意味着将邀请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达什纳克党的亚美尼亚和木沙瓦特的阿塞拜疆。所有这些国家当年在法律上都得到过承认（至少格鲁吉亚是如此）。围绕格鲁吉亚开展的整个运动看来都与这种手法有密切联系。我认为我们要针锋相对，大致采取如下方法。

外交人民委员部寄给沃罗夫斯基、克拉辛和克列斯廷斯基发一个指示，其中指出：

“鉴于德拉·托雷塔提出的邀请所有法律上得到承认的欧洲国家这一意见会被某些人理解为将邀请邓尼金政府、格鲁吉亚政府和弗兰格尔的克里木政府等，因为所有这些政府都待在欧洲，都得到过

① 指1922年1月29日刊载在《消息报》上的电报。

② 托雷塔，德拉·（1873—？）——意大利外交家。1921—1922年任外交部长。

承认，况且这一承认也没有被收回，所以外交人民委员部建议你们立即采取措施，坚决消除由此可能产生的误解，因为如果侨居国外的白卫分子、邓尼金分子、格鲁吉亚人和孟什维克的这种解释会博得俄国人民群众的某些信任，那就会给参加热那亚会议造成困难。更不必说实际邀请国外的反革命组织（侨居国外的邓尼金分子、格鲁吉亚人等）必定会使苏维埃共和国无法参加这类会议了。”

我认为这类断然决然的声明对于目前围绕格鲁吉亚进行的鼓动也是有益的。我们的反鼓动进行得太晚了，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用外文出版的小册子^①（小册子没用俄文出版）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会议前夕才能出版，送到需要送去的地方。格鲁吉亚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断然决然的声明马上会使“格鲁吉亚”鼓动失去实际的目标。在这样的声明或消息发布后的一个星期里也许还会骂我们，然后便会张皇失措地不再吭声。这才是我们的反鼓动要产生的必要的影响。

托洛茨基

附言：当然给克拉辛、沃罗夫斯基^②和克列斯廷斯基的指示应当发表并通过广播宣传。可以直接向德拉·托雷塔或者什么委员会提出照会。但前一种办法比较谨慎，因为不要求必须作出答复，而同时在政治上和鼓动上又可达到同样的目的。

托洛茨基

① 指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在帝国主义和革命之间。以格鲁吉亚为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

② 沃罗夫斯基，瓦·瓦·（1871～1923）——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3年任苏俄驻意大利全权代表。

№01504

索柯里尼柯夫就白卫纸币问题致政治局委员

(1922年1月30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月31日，第2027号

收文第108/Л号，1922年1月30日

知照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同志

致契切林同志

皮利亚夫斯基^①同志

柳比莫夫^②同志（财政人民委员部）

列宁同志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

工作委员会在统计我们对协约国的索赔要求时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大多直接由协约国各国和美国印制的白卫纸币的发行给苏维埃俄国造成的损失。这些白卫纸币应看做是协约国军队给苏维埃俄国居民的征用收据。对这些征用收据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偿

① 皮利亚夫斯基，斯·斯·（1882～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10月起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担任人民委员会债务谈判实际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和报告人。1922年春以苏俄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热那亚会议。

② 柳比莫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专家。

还：

(1) 协约国各国对所有要求清偿的纸币按该纸币流通时期的价值偿付给苏维埃政府。

(2) 协约国各国付给苏维埃政府一笔总款项用作抵偿这些索赔要求。

依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必须着手弄清白卫印发的纸币的价值并计算出它的票面额。

财政人民委员（格·索柯里尼柯夫）

列宁同志的批示：

莫洛托夫同志转政治局委员。

№01505

托洛茨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政治局

(1922年2月9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2月9日，第107号

致政治局

抄送：布哈林、列宁、鲁祖塔克^①、托姆斯基^②、契切林同志

布哈林同志告诉我说，英国工党向本国政府建议把格鲁吉亚问题作为热那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如果这一消息核实无误，我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一些工会可以作出大致如下的决定：

“英国工党认为可以唆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干涉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内政。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为何英国工党只提出格鲁吉亚问题的原因。孟什维克及其同伙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斯坦等地，如同在格鲁吉亚一样，都被工人和农民

① 鲁祖塔克，扬·埃·（1887～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俄共（布）中央书记、苏联交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38年被处死，后平反。

② 托姆斯基，米·巴·（1880～1936）——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当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加创建红色工会国际，任总书记。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36年自杀。

赶跑了。我们也不想讨论所谓的英国工党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力图帮助英、法等国帝国主义中竭力主张武装干涉的一派破坏热那亚会议。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试图走上英国工党拉它走的那条路，我们将坚决要求我们的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关于解放埃及、印度和其他现在正为自己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真正受压迫的殖民地这一问题。同时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首要义务是要加倍工作来揭露英国社会党人伪君子的面目，他们不履行自己同英国殖民地起义奴隶群众坚决并肩战斗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一起码义务，反而试图把推翻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及其孟什维克代理人说成是军事暴力。应该向英国工人阶级无情地揭露妥协分子的这种恶劣手法。”

我提供的不是决定全文，只是一个大致纲要。我认为这件事需要赶快做。各个工会可以通过不同文本的决议。愈多愈好。我们每天都可以通过广播播送这些决议。为了赶快办这件事，我提议立即用电话进行讨论。

托洛茨基

№01506

托洛茨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政治局

(1922年2月10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2月10日，第109号

致政治局

抄送：列宁、布哈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和契切林同志

对第107号的外充

在我们各个工会就英国工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建议所作的决议中还可以加进如下想法：

“英国工党要求革命军队撤离格鲁吉亚，就是要让格鲁吉亚完全听凭帝国主义的摆布，苏维埃革命前帝国主义一直统治着格鲁吉亚，先是以土耳其和德国军队为代表，而后是以英国军队为代表。现在工党在要求红军撤走的同时，是否也要求英法的海军从黑海撤走呢，因为法英的海军无疑从黑海上对格鲁吉亚的独立和自由造成了威胁。英国工党不限制英国军国主义，却为了英国军国主义的利益竭力要解除这个帝国主义早就覬覦的沿海各革命国家的武装。”

我电话口授的只是主要的想法，不是全文。我想这个想法将会起到宣传的作用。

托洛茨基

№01507

列宁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2月10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2月10日

托洛茨基同志：

我不能同意您对韩德逊^①和格鲁吉亚问题（在热那亚）的看法。依我看，韩德逊同克伦斯基^②一样，正在帮助我们（由于愚蠢），所以需要不经意地、不声张地推动他，而不是排斥他。

让韩德逊叫他们（劳合—乔治和彭加勒）去出洋相吧。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个工会都不要表态。

《消息报》要赞扬韩德逊出了个扩大会议内容的“好主意”，当然会议内容的扩大，不只是提出格鲁吉亚问题，还要提出各民族和殖民地等等问题。

他们在热那亚因为讨论格鲁吉亚等问题而输给我们，或由他们而不是我们拒绝讨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

敬礼！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韩德逊，阿·（1863～1935）——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911～1934年为该党书记。曾任不管、内政、外交大臣等职务。

② 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总理、最高总司令等职。后流亡国外。

No 01508

列宁就格鲁吉亚问题致托洛茨基

(不晚于 1922 年 2 月 22 日)

副本
绝密

托洛茨基同志：

您关于契切林和拉柯夫斯基^①的来信已经收到。我们需要考虑考虑。

我们大概在 2 月 22~23 日作出决定。

为格鲁吉亚问题您是否利用一下 1919 年（好像是）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揭露他们同帝国主义分子的勾结。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请告福季耶娃。

您需要有这份东西并加以利用。

敬礼！

列 宁
(列宁同志手书)

① 拉柯夫斯基，克·格·（1873~1941）——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1923 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曾任党的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1941 年被处死，后平反。

№01523

列宁就偿还债务问题致斯大林

(1922年4月19日)

副本

绝密

电话记录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9日第8374号

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同志：

建议拍发如下电报（并通知《真理报》、《消息报》编辑部作为对我们报刊的指示）。

“契切林和索斯诺夫斯基^①：

热那亚的全部消息都表明，我们被骗了。劳合—乔治^②叫嚷反对法国，并以此掩盖其主要的意图——迫使我们偿还全部债务，特别是偿还以前的私有者的债务，现在该是开始有步骤地揭露英国外交家们这种惯用伎俩的时候了，要在我国报纸和外国共产党报纸上揭露这种伎俩。”

列 宁

① 索斯诺夫斯基，列·谢·（1886～1937）——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4年（有间断）任《贫苦农民报》编辑。1921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长。

② 劳合—乔治，戴·（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

【专题说明】

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党政工作

(1921年1月至1922年5月)

1921年以后，在经济方面，俄共的方针是全面推行和完善以粮食税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则是逐渐建立和完善法制，使各部门的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的队伍。到1922年年底前后，列宁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改善国家机关、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发展合作社、加强工农联盟、关注东方革命等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与此同时，列宁也对方针政策上出现的偏差，如放松外贸垄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等等，提出批评，进行纠正。本专题所收材料比较杂，涉及党政各个方面的事务。它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共和列宁的活动。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清党和党的建设问题，列宁主张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的队伍，为申请入党者规定较为严格的条件。另一个问题是列宁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各副主席之间的分工问题。列宁希望能经过研究讨论，对主席的工作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来，做到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列宁的建议在《列宁全集》上已有刊载，但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则是首次发表。关于列宁病中的最后活动以及

与此相关的俄共内部斗争，单设专题。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任建华、刘燕明、项国兰、王锦文、韦清豪）

№01403

列宁等就工会问题争论致中央委员会

(1921年1月20日)

副本

绝密

致中央委员会

鉴于彼得格勒发出告全党书和莫斯科委员会表示要进一步展开争论一事^①可以说已经解决，重提此事有可能加剧派别斗争，我们决定将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删掉，只保留大家一致通过的那一部分。

尼·列宁、约·斯大林和列·加米涅夫

1921年1月20日

米·加里宁、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②、米·托姆斯基和扬·鲁祖塔克通过电话表示同意。

① 1920年底1921年初俄共党内出现工会问题的争论。1920年1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5次代表会议提出工会要放弃战时的工作方法，扩大民主。托洛茨基在会上以及会后认为工会组织出现了危机，需要迅速实行“工会国家化”。他的主张引起争论。1921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俄共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表示支持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同日《真理报》还发表了莫斯科组织的决议，反对告全党书中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建议。

② 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费·安·）（1883～1921）——十月革命后任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全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01465

托洛茨基致列宁

(1921年8月25日)

副本

电话电报

第213号

莫斯科，1921年8月25日

致列宁同志

抄送：哥尔布诺夫同志

现将什片采尔的便条副本寄上。此事当然必须通过苏维埃系统解决，以消除将来再出现这种平行重复现象。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什片采尔当作一个顾问，就让他待在现有的或为此即将成立的一个委员会中，那是非常有害的。目前至少应该让什片采尔有可能切实地熟悉一下有关表格、登记卡和报表格式等方面的全部材料，以便今后在委员会中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用什片采尔本人的话说，如果事先不做过细的工作，委员会能做的工作就会很少。

托洛茨基

№01487

托洛茨基就出版给齐赫泽的 信的问题致奥里明斯基

(1921年12月6日)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①：

请原谅未能作复。我这个星期非常忙。

您问是否可以出版我给齐赫泽的信^②。我不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现在还不是写历史的时候。这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写成的，信的语气也与之相应。现在的读者不会理解这种语气，也不能作出必要的历史校正，只会给搞糊涂了。从国外应能找到党的档案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其中有大量“争吵”参与者写的信。难道您现在打算把这些信统统出版吗？这会造成完全没必要的政治麻烦，因为党内未必能找得出两个过去侨居国外的人不曾由于思想斗争和一时的激愤等而在通信中互相破口大骂过。

给我的信写些说明吗？可是这就意味着要讲一讲我那时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关于这一点我在我的小册子《总结与发展》的前言

① 奥里明斯基，米·斯·（1863～1933）——1883年起为民意党人，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编委、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人、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创办人和编辑。

② 奥里明斯基给托洛茨基写信，请求允许发表他在1913年4月日写给尼·谢·齐赫泽的信和1915年写给莫·索·乌里茨基的信。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1925年出版的《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发表了这两封信。

中已扼要谈过。我认为没有必要由于在警察司档案中偶然发现这些信而再重复这一点。对此要补充的一点是，现在来回顾派别斗争，可能引发一场论战，因为——我对此甚为抱歉——我绝不认为我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上完全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评价上我是不对的，根本不对，我过高估计了这一派革命的可能性，希望能把这一派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使之不再存在。然而造成这个根本性错误的原因是：我是从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来看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派的，而那时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我认为两派之间的分歧原则上并不很深，并希望（这个希望我不止一次在信中和报告中表示过）革命进程本身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会使两派接近(?)，还在1905年部分地做到了。（见列宁同志为考茨基论俄国革命的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①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对两派作出的结论则无疑是错误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其不妥协的路线，才在自己的队伍中集中了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只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个革命的团结的组织，才能如此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到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我现在可以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论战的文章分成两类：一类专门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它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的波兰理论机关刊物，《新时代》^②杂志），另一类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派别，它们之间的斗争等等。第一类文章我现在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来，因为这些文章与我们党从1917年以来采取的

① 《开端报》——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

② 《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立场完全吻合。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重新出版。寄来的两封信属于第二类文章，发表它们是不合时宜的。十年后让别的什么人去做这件事吧，如果那时对此感兴趣的话。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No 01488

列宁致托洛茨基和莫洛托夫

(1921年12月7日)

副本

绝密

致托洛茨基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

我今天就走^①。最近几天，尽管我减少了工作量，增加了休息时间，失眠仍很严重。我担心既不能在党的代表会议上，也不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请将这封信转给各政治局委员，以了解情况备不时之需。

列 宁

^① 指去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据俄文《列宁全集》第5版《列宁年谱》第12卷载，1921年12月6日至1922年1月13日列宁住在哥尔克。因此本信所标日期似不确。

№01491

列宁就清党问题致扎卢茨基

(1921年12月19日)

副本

绝密

电话记录 福季耶娃

1921年12月19日

致扎卢茨基^①、索尔茨^②和全体政治局委员

在清党^③问题上，我认为公布出来的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清党工作总的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我们也犯了相当多的局部性的错误。我认为，在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中，这两种情况都应该强调指出。我看，不必规定第二次清党的日期，这样，在哪一方面都不致束缚自己的手脚。我倒主张党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把入党条件规定得更严些：工人（以前在大工厂里至少当过十年普通雇佣工人，现在又至少工作了两三年的人，才能算作工人）的预备期为一年半，其余的人为三年。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对党的忠诚和共产

① 扎卢茨基，彼·安·（1887～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后从事党和行政领导工作。

② 索尔茨，亚·亚·（1872--1945）——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为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后为苏联最高法院成员，在苏联检察院担任负责职务。

③ 清党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进行的。清洗对象是“非共产主义分子”、原孟什维克等。结果有24.1%的党员被开除出党。

主义的坚忍精神得到充分的证明，处理本问题的各级党组织都以五分之四的多数确认，预备期可缩短一半。

除留党察看一定时期的和犯了可耻罪行而被开除的以外，这次清党中被开除出党的人重新入党时，预备期同上。请你们把这封短信给最接近的同志们看一看，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把意见简要地写一下，哪怕就在这封信上划出哪些你们同意，哪些你们不同意也行，寄给福季耶娃交我。

列 宁

№01494

列宁致托洛茨基

(1921年12月20日)

副本

绝密

1921年12月20日

托洛茨基同志：

我同加里宁一起正在开非党人士会议^①。他建议我就我提出的决议作一个简短的报告（您就有关专家问题对决议作的补充完全正确）。

您星期三能否就此决议作一个简短的报告？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

当然您要作的军事报告要准备好，您是不是星期二就能把这个报告结束？

我现在不可能在代表大会上再作一个报告。

请写封短信或打个电话来，如果您同意，那最好不过了，政治局可以通过电话表决加以确认。

列 宁

^① 指1921年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9次代表大会非党代表会议。

№01495

托洛茨基致福季耶娃

(1921年12月28日)

副本

邮政电话第309号

1921年12月28日

致福季耶娃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决议中有关专家（商务专家和技术专家）那一条看来产生了误解。从加米涅夫同志的话中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等着我拿出这一条。可是我记得我昨天还说过，使这一条的表述与整个决议的口气一致，我感到为难。如果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来写，那会好一些。

托洛茨基

№01509

列宁致托洛茨基

(1922年2月)

副本

秘密

托洛茨基同志：

关于我的住地^①，我们对所有的人（连格季耶^②也在内）都保密。

就说我在哥尔克村。

您是否对纳塔·伊万诺夫娜^③和格季耶医生说过相反的话？

如果说过，请写封短信来，以免老头生气。

如果没说过，那就请别说。如果他去您那里，请来信告知。

敬礼！

列 宁

① 列宁当时住在莫斯科郊区的科斯季诺村附近的国营农场疗养。

② 格季耶，费·亚·（1863～1938）——苏联内科医生。1919年起是列宁的医生。同时也是托洛茨基的保健医生。

③ 谢多娃-托洛茨卡娅，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1882～1962）——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

No01510

列宁关于入党条件的便条^①

(1922年3月9日)

副本

3月9日

我不反对。^② 由于提到的文件没有引用，许多地方看不清楚。^③ 依我看，介绍工人入党的要有3年党龄，介绍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要4年，介绍其他人的是5年。（“入党者”的）预备期的概念要规定得准确一些。细节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

列 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为给莫洛托夫的信。

② 指季诺维也夫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为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巩固党》这一提纲的最初草案。

③ 指俄共（布）第11次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和俄共（布）区域委员会、区域局和省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季诺维也夫《关于巩固党》的提纲的最初草案中没有予以引用。

№01511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党的 建设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2年3月10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3月10日

致中央书记处莫洛托夫同志

我建议把季诺维也夫的提纲放到星期日再说，依我们看，这份提纲不完备，还需要补充下面四点：

1. 尽可能确切地规定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界限，定出前者和后者的工作范围，并责成党的机关不再就苏维埃工作发布行政命令。

2. 认为有必要在不同的党的工作者群体之间分工，尽可能使之固定在一定的党、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部门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的工作者的频繁调动。

3. 提高党员质量的途径有：

(1) 组建高级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主要是工人小组。

(2) 组织工人马克思主义俱乐部来讨论日常问题。

(3) 普遍组建中低级党校。

(4) 改善党的积极工作者（党的军士）的物质生活状况。

至于萨法罗夫^①同志的提纲，我们认为今天就可以送去见报。

鉴于一部分同志，特别是奥新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②坚决要求把农村工作问题列入议程，我们建议单独同库比亚克^③同志谈一下，让他起草农村工作的初步提纲并提交中央审查。

斯大林
加米涅夫

-
- ① 萨法罗夫，格·伊·（1891～1942）——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成员，1921～192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党的10大和11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86～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任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21年起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真理报》编辑等职。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 ③ 库比亚克，尼·阿·（1881～1937）——历任党的彼得格勒省委主席、全俄农林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书记、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01513

**列宁就《工人报》问题
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1922年3月23日)

副本

绝密

电话记录 莉·福季耶娃

1922年3月23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

通报我收到索尔茨的一封信，他根据现有经验反对办《工人报》^①。他说《工人报》无非是养活一批多余的文人，绝对办不成新型的报纸，也不可能赢得新的读者。我看最好让这份报纸停刊，限令它在短期内处理善后，把腾出来的人力物力用到改进现有的几种报纸上。^②

列 宁

① 《工人报》由俄共（布）中央出版，1922年3月1日创刊，1932年1月停刊。

② 《工人报》编辑叶列梅耶夫上书中央政治局，对中央组织局1922年3月6日要求该报缩小篇幅，改变性质、内容等指示表示异议，为此列宁写了这封信。1922年3月23日，政治局确认了组织局的决定。

№01514

列宁致欣丘克

(1922年3月23日)

副本

绝密

电话记录。莉·福季耶娃

1922年3月23日

通报俄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

关于您^①提出的问题，我已大略地同瞿鲁巴同志谈过，并请瞿鲁巴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共同了解一下这件事，然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们的看法。我没有可能更多地过问这件事。^②

列 宁

① 指欣丘克。欣丘克，列·米·（1868～1944）——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6年任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

② 1922年3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如何履行同粮食人民委员部所订合同的决定，此决定把总社应交付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粮食减少到1000万普特。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第5次会议的俄共党团对这一决定表示了异议。3月23日政治局讨论了该党团提出的异议，3月2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修改了原来的决定。

№01520

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①

（1922年4月11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4月11日

通报政治局全体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李可夫、莫洛托夫同志

一、副主席总的和基本的任务

1. 由副主席专门负责的基本工作是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缩减苏维埃机关的编制，督促它们整顿并简化办公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其余的一切工作都应服从这一工作。

以下都是这一基本任务的详细规定或局部补充。

副主席负责：

2. 督促其他机关，不论苏维埃机关或党的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俄共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等等无一例外），在审

^① 这是列宁为制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新的工作条例而进行的大量工作的结果。副主席瞿鲁巴和李可夫参加了草案的制定。

议各项苏维埃问题时要通知副主席并有他们参加。

3. 尽量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摆脱各种琐碎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大多数）应由各主管部门解决，一部分（即那些不容拖延和特别重要的）由副主席直接处理。

4. 认真监督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办公会议，特别是小人民委员会，使它们的工作不致超出绝对必要的范围，使它们的工作和所担负的任务不致复杂化，使它们的职权不因官僚主义而过分膨胀，要求每个人民委员部和每个机关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心。

5. 强迫各人民委员部和各单独设立的机关在授予它们的权利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的范围内独立地和负责地进行管理。

6. 注意十分明确地逐个规定首先是各部务委员会委员和最重要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责任，其次是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责任；对普遍存在的个人职责不明以及由此产生的完全不负责任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

7. 通过召见和尽可能巡视莫斯科各机关及各省的办法，来亲自了解一定数量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不仅要了解高级工作人员，而且一定要了解中下级工作人员，以便考查和选拔人才，并真正改善苏维埃机关。

8. 使那些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部门和机关转入战斗状态，在人力、物力和副主席的亲自指导等方面尽量给予帮助。

二 有关副主席工作的专门问题

9. 副主席约十分之九的精力应该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十分之一的精力用于其他人民委员部。

10. 最近财政问题已经提到首要地位，对这些问题副主席应给予最大的注意。

11. 刻不容缓的是实行奖励制度，根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作社以及其他贸易机关的交易额和利润额来奖励苏维埃职员。

必须系统地研究并拟定措施，把奖励制度推广到全体苏维埃职员的全部报酬中去。

12. 应当停止筹建单独的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或把这方面业务并入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成立一个专门的“国内商业委员会”，下设一个规模极小的秘书处，该委员会惟一的地方机关是各省经济会议。

13. 极端重要的是考察国营托拉斯的工作，以便把办得还可以的托拉斯同大多数办得很坏的托拉斯区分开来，并把后者坚决关闭；检查共产党员在国营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中的作用（实际作用）；确定由谁对经营管理及其效率切实负责。

14. 每个副主席必须亲自负责在某个人民委员部建立一两个模范部门或机关，以便订出编制员额并加以检验，确定最佳的办文制度并加以监督。

以后应当把这些为数不多但确实是模范的机关所制定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和监督办法逐步推行于一切苏维埃机关。

由于这个问题异常重要，由于维护官僚主义旧习的苏维埃官僚们极其顽强的抵制，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斗争才能建立起少数模范机关来作为带动和检查其他机关的手段。应当根据同有关机关（苏维埃职员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劳动研究所等等）的协议并在副主席监督下，翻译和出版关于组织劳动和管理的一切优秀的最新著作，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著作。

15. 必须监督苏维埃机关内部（即使开始时很少几个机关）共产党员的工作调动，设法使共产党员只担任这样的职务（不论是最

高的职位或者最低的职位)，这种职务使他们能真正检查工作进程，真正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斗争，真正做到立即改善不幸的公民在不得不同我们那些毫无用处的苏维埃机关打交道时的境况和遭遇。

应该特别注意职位低的共产党员，因为实际上他们往往比职位高的共产党员更重要。

16. 省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应经常阅读，首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中央统计局和《经济生活报》^①的工作人员要经常读，要他们每个人阅读后向报刊或自己的机关提出最简短的评语，并作出必要的及时的指示和结论；其次是由几十个（不能再少）共产党员组成的小组阅读，这些党员尽可能不是职员，他们能够不从本部门的观点，而完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阅读工作报告。

在彼得格勒的由米柳亭^②同志领导的小组应当负责分发省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供阅读和在报纸、杂志、综合性小册子等等中利用。

必须不断地努力，逐步扩大该刊印的各经济机关（包括县经济会议，国营托拉斯、“合营公司”等等）的工作报告的范围，因为没有愈来愈多的居民习惯于在图书馆里使用此类工作报告，就根本谈不上把半亚洲式的国家真正变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17. 《经济生活报》应当成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真正机关报，成为经济管理的机关报。两位副主席应当经常阅读该报，坚决反对

① 《经济生活报》——1918~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日报。最初是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改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1931年以后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经济机关的机关报。

② 米柳亭，弗·巴·（1884~1937）——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0年起为布尔什维克。1917年当选中央委员，1920~1922年为中央候补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农业人民委员。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起历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中央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在所有文人和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企图把这家报纸降低到普通的“半独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表“意见”、观点和谩骂的报纸的水平，而不去综合工作报告，不去监督工作报告是否定期送达，不去认真分析各个机关的经济工作，不去严格批评那些有用的和无用的机关、人员、工作方法等等。

要使《经济生活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机关报，需要进行多年的斗争，而且需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8. 这同样适用于中央统计局。它不应当是“学院式的”和“独立的”机关——由于资产阶级的旧习惯，现在它有十分之九成了这样的机关。它应当是社会主义建设机关、检查机关、监督机关、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首先应当知道的数字统计上来的机关。旧习惯的阻力在这里也必然是很顽强的，因此斗争应该更顽强（请副主席看一看1921年夏我给《经济生活报》编辑和中央统计局的谈到上述问题的信）。

三 副主席的工作方法。他们的办事机关

19. 副主席要尽量摆脱琐事以及同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的不必要的会见。这些事通常要占去很多时间，这样就无法对实际工作进行检查。

20. 副主席要尽量避免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

21. 副主席应尽一切可能撤销现有的各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十分之九是多余的，其特性是在撤销后很快就会稍加改头换面地复活），并阻止成立新的委员会。

22. 在委员会的工作非过问不可的时候，副主席也要竭力避免亲自参与，尽可能只限于最后批准委员会的决定，或者加快工作，按规定程序把它们的决定送去批准。

23. 副主席的办事机关是：第一，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办公厅主任、他们的助手和秘书等人员。这个办事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扩大，不得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额，并且应控制在副主席能亲自监督得过来的（不太多的）人数之内。第二，副主席可委托小人民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办理某些事务。第三，副主席的主要办事机关应该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副主席亲自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为自己挑选助手和执行者，指导他们工作，检查他们的工作，着重吸收更多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这一工作（此事非常困难，但如不逐步取得进展，苏维埃政权就一定会灭亡）。

24. 副主席应比以往更经常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力，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玩忽职守、粗心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以行政处分（催促瞿鲁巴同志加速制订有关这一问题的法案）。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送交法庭，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组织威慑性的公开审讯。

四 关于两位副主席工作上的协调一致

25. 为了使两位副主席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他们要用副本互相通知所发的各项最重要的命令，并且要逐渐养成一种习惯，经常用速记把他们在接见时口头发出的命令、指示等等记录下来（当然只能记得十分简短扼要）。为此必须增加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速记员，在副主席的整个办公时间内能有两名速记员值班。如果需要，可向国外订购两架最好的录音机。

26. 对于重要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也应如此办理。

27. 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场合，两位副主席要进行磋商，以便对任务和行动取得一致的看法，并尽量消除工作中的交叉和矛盾。

两位副主席的意见如果有分歧，问题应由人民委员会主席解

决，主席不在时，由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特别指定的同志解决。

五 副主席的分工

28. 在作出专门决定以前，最近几个月内对副主席的分工作如下规定。

29. 瞿鲁巴同志主持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会议进行两小时后，由李可夫同志主持）。不主持会议的副主席也必须出席大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全体会议）。

瞿鲁巴同志签署发布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和以它的名义发出的电令，监督大人民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监督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他必须密切监督大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秘书处，同时负责使这两个办事机关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办事机关充分协调一致，消除任何矛盾和不协调的现象。

30. 李可夫同志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签署发布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电令，密切监督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和秘书处（如上所述，也要使这两个办事机关同大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关不脱节）。

31. 在检查执行情况、督促缩减编制和改善机构以及处理不必由大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解决的各种日常琐碎问题方面，两位副主席分别负责下列各人民委员部：

瞿鲁巴同志负责：

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邮电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

李可夫同志负责：

财政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中

央消费合作总社、劳动人民委员部（兼管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部分）、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中央统计局、区域经济会议、租让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01521

列宁就《1910~1914年的
法俄关系史料》一书致斯大林

(1922年4月15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4月15日第8370号

致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波克罗夫斯基同志^①

我刚收到《1910~1914年法俄关系史料》一书。

这本厚达733页的巨著是以可耻的、道地苏维埃式的马虎态度出版的，为此有关的人应当坐牢。没有定价。没有负责人或其他人署名。没有索引。连简单的人名录也编得很马虎。如此等等。

我建议：

(1) 责成加涅茨基和卡拉汉在两天之内查明出版此书的所有负有责任的人；

(2) 责成他们两人制止出售此书；

(3) 要他们编一个补遗表；

(4) 要他们编制详细的索引；总之，星期四以前，要就该书存

^① 波克罗夫斯基，米·尼·（1868~1932）——历史学家。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5月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

在的全部谬误，即缺陷及其补救^① 办法向中央提出简短的报告。

列 宁

附言：

在“序言”（没有署名的!!）里提到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但他是收集资料的，显然不能对出版和出版方面的技术工作负责。

① 政治局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如下决定：“1. 该书暂停发行，立即补印封面和序言，在其中说明出版单位和负责人姓名。2. 索引于工作就绪后出单行本，而不妨碍该书先开始发行。在序言里说明索引将另行出版。”

No01522

政治局委员们对列宁同志
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建议的最终意见

(1922年4月21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4月21日第2008/C号

通报全体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同志，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瞿鲁巴同志

政治局委员们对列宁同志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建议的最终意见。
意见：

—

(1) 第1条（实际检查）执行起来最困难，不彻底改组工农检察院，以及不建立起处理违法行为的系统，要执行这一条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现在的危险是，在这方面由少数人处理的一些偶然引起注意的问题的工作，会变成在各级机关间（各人民委员部、管理部门、工农检察院、国家计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等）转来转去扯皮的小事。

我参与制定了《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我不反对特别强调

这一条，但我把这一条看做是对我们还无力做到的那些东西的代用品。

(2) 整个草案是建立在我同瞿鲁巴同志和睦相处的基础上的。现在，工作进行得很好，很协调，有根据相信以后也将这样。但是从组织的（和宪法的）角度来看，在人员变换的情况下，未必可以指望那些在同一件事情上权力相等的人能顺利工作。我担心，这种情况就像暹罗双生子那样十分罕见。

(3) 副主席的工作在初期几乎全用于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及其各机关（这些机关决不能算作工作得又好又快的单位）的工作上，只有一部分时间用于其他工作上。

阿·伊·李可夫

1922年4月18日，第314号

二

(1) 提出的任务包罗万象，这等于什么任务也没有提出。副主席应当力求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这就决定草案所想达到的目的。各个条款似乎做出些指示如何做到一切都好，处处都好，直到编辑好《经济生活报》的样子。

(2) 工农检察院被当作是执行这些包罗万象任务的机构。要实现这些任务，工农检察院就其实质而言是不中用的，也不可能中用。在工农检察院中工作的主要是各部门出过事的工作人员，无视这一点是不行的。顺便说一下，因此，在工农检察院机关里内部倾轧极为盛行，这早已成为全国的话题。以为可以健全和加强这个机关（不是其人数不多的上层，而是整个组织）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优秀的工作人员今后仍将被派去做实质性工作，而不是去做检查工

作。由此可见，利用工农检查院为杠杆来提高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的计划乃是幻想。

(3) 我也完全不相信能利用工农检查院从非党工农中培养出行政管理人員和经济工作人员。为此需要有一系列学校和训练班，其中包括同经济工作和国务工作的某些部门有关的训练班。要认真抓好青年，认真教育他们，而不是通过工农检查院去“照看”。

(4) 我非常担心，副主席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成为造成困难的根源。在这方面录音机是无济于事的。既然有两位副主席，那么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就要正确处理好。

(5) 而主要的是，我仍然没有看到一个实际上每天都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如果说中央统计局有学院气很糟糕，那么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学院气就要糟糕一百倍，并且简直是致命的。去年年初就已经清楚，没有任何经济上统一的实际上起领导作用的机关。目前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改组表面上使它接近于我去年所建议的那个机关，但只是表面上。实际上，责任仍然分散，因此根本不知道谁在实际上领导燃料、运输、原料、货币等事务。在各部门间发生冲突时，这些问题都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或政治局，并凭印象作出决定，而且都是在火烧眉毛时才作出的。应当有一个墙上挂着今后一年的经济日程进度表的机关，有一个能预见并且能根据预见进行协调的机关。国家计划委员会就应当是这样的机关。我认为，由一位副主席来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要比决定谈到的所有问题都要实际得多。

列·托洛茨基

1922年4月19日，第317号

对我昨天关于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补充。

(1) 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经常努力、压力、指示、改正，等等，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机关。这项工作决不能由站在一旁的专门的机关去做，由这个机关偶而去看一看并指出需要做的一切。这是空想。世上任何地方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关，而且根据事物的逻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关。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最好能有一个国家监督机关，它的任务是有限的，但却是明确的，需要通晓苏维埃法律和簿记。工农检察院越集中力量抓这项任务，越专门致力于这项任务，就越有助于整顿所有的苏维埃机关，而主要是越有助于整顿我国的预算以至财政工作。

(2) 决定草案说“检查执行情况”是主要的实践任务，其实这并不是主要任务，至少在我们所谈到的1918、1919和1920这几年是如此。当时，命令根本不能完成（由于马虎、无能、健忘、缺乏纪律性）。现在，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具“人文性质的”部门还存在。命令形式上都在执行。但并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在执行过程中，指示实际上被化为乌有，这一方面是由于物资匮乏，而另一方面是由于无知和无能等，尽管有着善良的愿望。从外部进行突击检查，甚至是最精心策划的检查，只能再一次表明，情况很糟。但如何加以改进呢？需要教会抄写员好好抄写（不抄错），电话员不搞错电话号码，会计要及时正确地登记收支等等。只好再为办公室、机关、生产、商务部门等等工作人员开办夜间培训班。否则怎么办呢？没有人能代替他们。所以要不脱产地提高他们的水平。这条道路是困难的，但没有别的道路。

(3) 工作要有制度。然而没有制度（这是最重要和最危险的）的例子来自上边。所有经济—组织问题都是匆忙决定的，而且总比该作出决定的时间晚。缺少一个不断工作、向前看，对工作负责的经济领导机关。大家都看到并感觉到了这一点（现在的危机很大程

度上是由本来可以预见到的原因引起的)。因此提出了一些有时是幻想的,不适宜的,但却符合深层次需要的建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中央设立经济局。克拉辛完全是另一种气质的同志,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中央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还应该指出,即使中央设立经济局,同中央建立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黄金委员会等等相比,也是前进了一步。所有这一切都是缺少有预见的经济领导机关的结果。按照设想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是这样的机关。但就其人员构成、工作方法和思想倾向来说,它过去不是,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机关,将来也不会是。

应当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变成整顿经济的杠杆,为此再也不要因在这个中心问题上缺乏预见性、心血来潮而瓦解经济。如果在没有制度、没有计划的情况下从各方面去搅扰经济,光靠宣传手段和惩罚手段是不能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任何结果的。

列·托洛茨基

三

总的说来很好,不过太庞杂了,因此,作为指示存在不少矛盾。我不同意第11条,因为奖励制度要求各机关的领导人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and 与(个人)利益结合的意识,而这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而且也不会很快就有;这是我们的奖励制度崩溃,蜕变成对国家掠夺的原因。

米·托姆斯基

四

同意列宁同志的意见。

加米涅夫

五

同意列宁同志的意见。

莫洛托夫

№01524

福季耶娃致托洛茨基

(1922年5月22日)

副本

1922年5月22日第8430号

托洛茨基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我写信告诉您，说他赞成您代他向波德松涅奇纳亚站疗养院的孩子们送礼物的想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请您向孩子们转达，说他非常感谢他们的热忱来信和鲜花，并对他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表示遗憾；他不怀疑，如果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一定会康复的。

福季耶娃

【专题说明】

联共（布）关于 争取青年作家的决定

（1922年6月至7月）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持观望的态度，在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家中间，存在形形色色的思潮和流派。怎样做好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是一个大问题。托洛茨基相当敏感地看到了问题，提出了把他们争取过来的措施，主张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他的建议得到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赞同，很快就此形成了决议。顺便说一下，尽管到这时为止，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对立在不断加深，但在这一问题上，两人却显示了少有的一致。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温耀平、陈俐佩翻译）

№03278

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6月30日）

绝密

致政治局

关于青年作家、艺术家等等

我们毫无疑问正在面临着丧失那些倾向于我们的青年诗人、艺术家等等的危险。对于他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关怀，准确点说，只是偶而由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或者纯粹以手工业方式对个别人员表示关怀。就物质方面而言，我们甚至于把其中最有可能和最革命的人都推向资产阶级的或敌对的出版社，在那里这些年轻的诗人不得不同别人保持一致，把对于我们的好感掩盖起来。

心须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即同年轻的苏维埃艺术的代表人物建立关怀备至的个人关系。为此目的必须：

1. 对诗人、作家、艺术家等进行仔细认真的登记。这项登记应集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由书刊检查机关进行。每一名诗人应有其个人案卷，收入关于他的经历的材料、目前的文学联系、政治联系等等。对这类资料的要求是：

- （1）在对相应的作品进行书刊检查时可作参考；
- （2）有助于党的文学评论家了解相应诗人的流派倾向；

(3) 能够有根据地采取某种措施从物质上支持年轻的作家等等。

2. 现在就应当编制出一张不大的名单，列出那些无疑具有才华，无疑同情我们，但由于要获得工资而正在被推向资产阶级方面，而明天就有可能成为像皮利尼亚克^①那样（这是约诺夫^②同志告诉我的）处于与我们敌对或者半敌的阵营之中的作家们。编制这类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单的工作在莫斯科可以委托给美舍利亚科夫^③、沃龙斯基^④和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⑤同志，由3人共同会签，在彼得格勒委托给约诺夫、贝斯特良斯基^⑥同志（也许再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定一个什么人）。

3. 给重要的党的出版物（报纸、杂志）编辑部下达指示，要求把对于这些年轻作家的评论写得“实用”一些，也即要对这些年轻的文学家有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为此目的，评论家应当事先了解有关这名作家的全部材料，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发展脉络。同样十分重要的是，（通过编辑部或经由其他途径）在关心文学问题的某些党内同志同这些年轻诗人等等之间建立个人联系。

4. 我们的书刊检查机关也要具备上述的教育倾向。可以也应

-
- ① 皮利尼亚克（沃高），Б.А.（1884～1941）——俄作家，因“自然主义”地描写革命时代的生活而受到批判。
- ② 约诺夫（勃朗施坦），伊·约·（1887～1942）——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1918年起在一些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
- ③ 美舍利亚科夫，尼·列·（1865～1942）——政论家。《真理报》编委，国家出版社社长。
- ④ 沃龙斯基，А.К.（1884～1943）——作家、文学批评家，《红色处女地》主编。
- ⑤ 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П.И.（1881/1882～1940）——文学批评家，图书出版事业总局第一任局长。
- ⑥ 贝斯特良斯基（瓦丁），В.А.（1886～1940）——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消息报》和《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

当对于文学家的具有定形资产阶级学术倾向的出版物采取严格态度。对于已经成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分子汇集的实际中心的文学艺术派别则应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虽然抱有大量各种成见但明显向革命方向发展的作品和作者，则应采取关心、审慎和温和的态度。

由于这里涉及的是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只有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禁止其印刷出版。应当预先介绍作者与真正内行而又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作品确实存在反动因素的同志见面，如作者仍然不信服，则应印行其作品（如果并没有不能刊印的重大理由），同时从教育的角度刊登评论文章。

5. 关于支持青年诗人的形式问题应当专门进行研究。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这种支持表现为稿费的形式（区别对待，各人不同），但是为此必须让青年作者有地方可以刊印作品。《红色处女地》^①是一份纯粹党的刊物，对他们来说活动余地不够。也许，该创办一个非党的纯文艺刊物，有总的坚强领导，同时又容许在个别情况下有“背离”的余地。

6. 不管怎么说，看来不得不拨出一定数目的钱。

7. 对于年轻的艺术家的措施也应采取同样的措施。不过这方面要专门研究——在哪个机关建立上述案卷，具体委托谁来经办这件事。

列·托洛茨基

^① 《红色处女地》——1921—194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月刊，文学艺术和科学评论杂志。1934年起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

№03279

中央书记助理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7月3日)

第 5018 /C 号

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同志和瞿鲁巴同志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委托，兹寄上关于给予青年诗人以精神和物质上支持的材料（共3张），供政治局会议（7月6日，星期四）讨论前熟悉情况。

中央书记助理

№03280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7月3日）

第 5018 / C 号

致政治局全体委员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关于通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争取接近我们的青年诗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非常及时的。我认为，某些“无产阶级思想家们”（波格丹诺夫^①等人）议论得很多的苏维埃文化（就其狭义内容而言），现在才刚刚开始形成。这种文化应当在倾向于苏维埃的年轻诗人和文学家同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反革命流派和集团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把倾向于苏维埃的诗人团结成一个核心，并千方百计地在这场斗争中支持他们，这就是任务所在。我认为，这种团结年轻文学家的最适当的形式，应当是组织起一种独立的，譬如说，“俄罗斯文化发展协会”或者类似的机构。试图把青年作家拴到书刊检查委员会或别的某个“官方”机关那里的办法，只会把年轻诗人推开，并把事情搞糟。最好是一定让一名非党的但是倾向于苏维埃的作家，例如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②这样的人，去担任协会的领导人。物质上的支持，直到以某

① 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亚·亚·（1873—1928）——俄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

② 伊万诺夫，B.B.（1895—1963）——俄作家，20年代以《游击队员们》、《铁甲列车 14—69》等作品著称。

种可接受的形式出现的补贴，是绝对必需的。

为提供情况，附上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①同志对我的相应查询的回答。

^① 雅科夫列夫（爱泼斯坦），雅·阿·（1896～1938）——当时任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后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03281

雅科夫列夫致斯大林

(不晚于1922年7月3日)

致斯大林同志

对您的查询，说明如下：

1. 目前各个集团和文学流派中已经形成一批明确和肯定地站在我们立场上的作家。1921年是文学蓬勃发展的一年，从青年中推出了数十个新的文学名人。一场我们同反革命争夺这批文学力量中的多数人的斗争目前正在进行（所有侨民报刊正在试图“收买”我们的文学青年；彼得格勒文学家之家的《晨会》杂志是毫不隐讳的反革命机关报，它也不得不动用我们使用的那些文学名人）。主要的有组织的文学中心都掌握在白党手中（隐蔽的或公开的），如彼得格勒文学家之家、全俄作家协会。我们的组织中心无所作为，力量薄弱，不善于吸引新的作家——革命者、苏维埃人，但不是俄共党员。（莫斯科出版之家在这方面毫无生气，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从客观上有害的“清教徒式”的要求出发开除了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

2. 目前政治上接近我们的主要派别有：

(1) 在革命初期就靠拢我们的老作家——瓦列里·勃留索夫^①、谢尔盖·戈罗杰茨基^②、高尔基等；

(2) 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彼得格勒的和莫斯科

① 勃留索夫，В.Я.（1873～1924）——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② 戈罗杰茨基，С.М.（1884～1967）——苏诗人。

的) 拥有一批无疑很有才能的人;

(3) 未来派——马雅可夫斯基^①、阿谢耶夫^②、博布罗夫^③ 等;

(4) 意象派——马里延戈夫^④、叶赛宁^⑤、舍尔舍涅维奇^⑥、库西科夫等^⑦ 等;

(5) “谢拉皮翁兄弟”^⑧ ——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沙吉尼扬^⑨、尼·尼基京^⑩、尼·吉洪诺夫^⑪、波隆斯卡娅^⑫ 等; 还有一批作家正在摇摆之中, 政治上尚未定型, 其心灵深处正在侨民阵营与我们之间进行真正的战争(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左琴科^⑬ 等);

(6) 正在通过路标转换派^⑭ 走向我们一边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⑮、爱伦堡^⑯、德罗兹多夫^⑰ 等。

3. 为了形成同情我们的情绪, 把摇摆着的人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 可以采用建立一个把所有这些作家团体都联合起来的统一的中心的办法。这种联合毫无疑问应当是非党派性的。共产党员少

① 马雅可夫斯基, B. B. (1893~1930) ——苏诗人, 曾是未来派。

② 阿谢耶夫, H. H. (1889~1963) ——苏诗人。

③ 博布罗夫, C. П. (1889~1971) ——苏作家和翻译家。

④ 马里延戈夫, A. B. (1897~1962) ——苏诗人。

⑤ 叶赛宁, C. A. (1895~1925) ——苏诗人。

⑥ 舍尔舍涅维奇, B. Г. (1893~1942) ——苏作家和诗人。

⑦ 库西科夫, A. B. (1896~1977) ——俄作家。

⑧ “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 1921年在彼得格勒出现, 宣布不问政治。

⑨ 沙吉尼扬, M. C. (1888~1982) ——苏女作家。

⑩ 尼基京, H. H. (1895~1963) ——苏作家。

⑪ 吉洪诺夫, H. C. (1896~1979) ——苏作家。

⑫ 波隆斯卡娅, E. Г. (1890~1969) ——女诗人, 散文作家, 翻译家。

⑬ 左琴科, M. M. (1894~1958) ——苏作家。

⑭ 路标转换派——俄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 指望苏维埃政权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发生蜕化。因1921~1922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标转换》杂志而得名。

⑮ 托尔斯泰, A. H. (1882/83~1945) ——苏作家。

⑯ 爱伦堡, И. Г. (1891~1967) ——苏作家。

⑰ 德罗兹多夫, A. M. (1895~1963) ——苏作家。

数派应当摈弃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共产党员的傲慢自大，因为这种作风只会妨碍对非党的，但政治上和社会观点上接近我们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施加共产主义的影响。

4. 全俄作家协会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组织中心，因为它具有某些物质基础，而做一些工作以后（进行策略的和谨慎的工作）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莫斯科出版之家经过改组可以成为在莫斯科组织这样的全俄协会的基础。

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即通过建立“俄罗斯文化发展协会”——作为首先联合文学青年的非党的协会，它已有某些物质基础。

也可以采用综合性的做法——一方面建立有较严格限制的“协会”，同时争取范围较宽的“全俄作家协会”。

5. 无论采用哪一种组织方法，都要为它们提供相当的出版力量。

雅·雅科夫列夫

№0328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7月6日）

第 П16 / 5 号

俄共中央政治局第 16 次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7月6日

关于青年作家和艺术家

（托洛茨基同志）

（1）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但作以下修改^①：第 1 条“书刊检查机关”一词改为“国家出版社”。

第 2 条，增加“在最近 2 周内”。删去“像皮利尼亚克那样（这是约诺夫同志告诉我的）”几个词。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同志改为雅科夫列夫同志。

第 5 条改为：

“作为组织和支持青年作家的形式，拟建立一家文艺出版社（由国家予以资助），处于国家出版社的总的监督之下，但具有非党的性质，以使在苏维埃总方向中发展的各种文艺倾向和流派都有足够的活动余地。”

第 6 条：“认为必须为此拨给一定数目的款项”。

^① 此建议作为附件收入此会议记录，见附件。

(2) 责成由约诺夫、雅科夫列夫和梅谢里亚科夫三位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由雅科夫列夫同志召集）讨论把同情苏维埃政权的青年诗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以一名非党但绝对可靠的人员担任领导的独立协会是否适当和如何组织的问题。

(3) 责成加米涅夫同志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成立第5条提到的出版社的初步计划草案，并向勃留索夫艺术学院了解人员配备的办法，等等。

中央书记

附 件：

1. 对诗人、作家、艺术家等进行仔细认真的登记。这项登记应集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由国家出版社进行。每一名诗人都应有其个人案卷，收入关于他的经历的材料、目前的文学联系、政治联系等等。对这类资料的要求是：

- (1) 有助于国家出版社在采用相应的作品时作为参考；
- (2) 有助于党的文学评论家了解相应的诗人的流派倾向；
- (3) 能够有根据地采取某种措施从物质上支持青年作家等等。

2. 在近两周时间内编制出一张不大的名单，列出那些无疑具有才华，无疑同情我们，但由于要获得工资而被推向资产阶级方向，而明天就有可能处于与我们敌对或者半敌对的阵营之中的作家们。编制这类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单的工作在莫斯科可委托给美舍利亚科夫、沃龙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同志，由三人共同会签，在彼得格勒委托给约诺夫、贝斯特良斯基同志（也许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定某个第3个人）。

3. 给重要的党的出版物（报纸、杂志）编辑部下达指示，要求把对于这些年轻作家的评论写得“实用”一些，也即要对这些年轻的文学家有一定的推动和和影响。为此目的，评论家应当事先了解有关这名作家的全部材料，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发展脉络。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设法（通过编辑部或经由其他途径）使关心文学问题的某些党内同志同这些年轻诗人建立个人联系。

4. 我们的书刊检查机关也要具备上述教育倾向。可以也应当对于文学家的具有定形的资产阶级艺术倾向的出版物采取严格态度。对于已经成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分子汇集的实际中心的文学艺术派别则应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虽然抱有大量各种成见但明显向革命方向发展的作品和作者，则应采取关怀、审慎和温和的态度。

由于这里涉及的是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只有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禁止其印刷出版。应当预先介绍作者与真正内行而又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作品确实存在反动因素的同志见面，如作者仍然不信服，则应印行其作品（如果并没有不能刊印的重大理由），同时以教育的角度刊登评论文章。

5. 作为组织和支持青年诗人的形式，拟建立一家文艺出版社（由国家予以资助），处于国家出版社总的监督之下，但具有非党的性质，以使在苏维埃总方向中发展的各种文艺倾向和流派都有足够的活动余地。

6. 认为必须为此拨给一定数目的款项。

7. 对年轻的艺术家的也应采取同样的措施。不过这方面要专门研究——在哪个机关建立上述案卷，具体委托谁来经办这件事。

【专题说明】

波格丹诺夫院士案件

(1923年11月)

1921~1923年俄共内部出现一个左倾反对派——“工人真理”派。参加者大都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因出版《工人真理》杂志和《工人真理》小册子而得名。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已经以工人阶级遭到彻底失败而告终，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普通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活”，官僚和耐普曼已构成新的资产阶级，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成了国家机关的组织者和领导人的党，失去了同无产阶级的联系。他们号召最大限度地瓦解和分化俄国共产党。1923年秋被揭露，大部分人被开除出党。亚·波格丹诺夫被看做是该派的思想领袖，因此被捕受审。但因缺乏证据，不久获释。

亚·亚·波格丹诺夫(1873~1928)，本姓马林诺夫斯基。是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为布尔什维克，被选入多数派常务局，在党的第3、4、5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任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以及《新生活报》的编辑。因提出“经验一元论”受到列宁的批判。因领导“最后通牒派”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中央。1909年组织前进集团，1911年退出。十月革命后参加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张创造“无产阶级文化”。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

院士，在莫斯科讲授经济学。1921年起完全投身于科学研究工作。1926年创办输血研究所，1928年因在自身做输血实验而不幸殉职。波格丹诺夫在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提出了最普遍的系统论，他的思想为控制论奠定了基础。他在本案件中的自述，使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是颇为珍贵的资料。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李树柏翻译)

№03138

致经办被捕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13日)

声 明

(对1923年9月13日提审回答)

您向我提出了下列问题：

1. 我是不是“工人真理”集团的某些作品的作者或编辑？

2. 如果不是，那么我是不是该集团隐蔽的思想领导者，以某种方式指导该集团工作，即使在总的方面？

鉴于我以前发表的关于我“无党派”、“无政治倾向”的公开声明，从我这方面预先得到否定答案后，您又提出一个问题：

3.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经常以印刷品、书面和口头形式谈论一些无疑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这个事实和上述说法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您向我解释，说您是被迫提出这些问题的：第一，为下述情况所迫：在“工人真理”的出版物上，到处是从我的著述中摘录的我的思想的实际引文，虽然是用别人的话转述的。第二，国家政治保卫局有情报说，“工人真理”的某些成员常来向我求教，是以“工人真理”的成员身份来的，即为了取得政治指示。但是，您并未向我隐瞒，您有材料说明我和“工人真理”在基本点上似乎存在分歧。即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现在是否有可能和需要成立特殊的

“工人党”，有情报说我多次表示反对这一点。您说，此次调查的中心点是要弄清楚这两条水火不相容的情报中，哪条是正确的。

我指出，我不太了解“工人真理”的出版物，而且我作了解释，已经几个月了，我一直听说有人打算搞反对我的运动，把“工人真理”集团套在我的脖子上；然而，正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个整个事件极其反感，我简直不愿想它，所以也不读。您向我提供了下述出版物：

1. 《工人真理》，告工人书，1923年5月，9页打字稿。
2. 《工人真理》，机关报第2期，1923年5月份，23页打字稿。
3. 《告俄国革命无产阶级书》，未标明日期，11页油印稿(?)。

我从您的第三个问题开始作出我的解释，因为它在逻辑上是个预备题。

我是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我院的纲领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与实践”。显然，这里也包括研究最广泛的政治现象及其趋势和可能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科学院并不是政治组织，而是科研机构。

搞政治意味着组织政治力量并领导它们。假如我干的是这个，那么我“不问政治”的声明就是口是心非和撒谎。但我是最广泛的社会过程的研究者；分析其发展的政治条件及其基础和趋势，也是我的科研任务的一部分。不管哪一派的政治家，都可以随便使用我的分析结果，但这不是我的事，而是他们的事。

可是为什么有害的政治结论恰恰立足于您的分析之上——您反驳说。这只能意味着，它们用的不好。“为什么俄国共产党不更好地利用它们？”——我说。您觉得这不严肃；但我说话是严肃的，而且我有权这样做。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我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

析——这是1917至1918年间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那么我对知识分子“职责”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同甚至矛盾的分析又怎样呢？当时伊万诺夫在《真理报》上撰文，妄图把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融为一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认为这是危险而有害的并加以反驳，其观点和我十分相近。我为热那亚会议的召开，曾对凡尔赛条约及整个协约国的和平安排作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析，后来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对我说，我的报告对苏维埃代表团是有益的和宝贵的。过去，譬如革命前，布尔什维主义多次利用我的分析……就是革命后也常有这样的事：一些严肃负责的共产党人就他们感兴趣的政治问题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有害的。

除了我已经出版和公开发表的言论，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和研究人员有责任向找我的人提供对客观社会条件及其趋势做出的力所能及的科学阐述，对此我并不拒绝。至于说他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后来他们成了“工人真理成员”，得出了被认为是或者会被认为是有害的结论，这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如果他们或者是别的什么人，作为政治组织的成员到我这儿来，请我对该组织下指示，我会回答：“这不行，这不是我的事，我不问政治。”您有充分的客观证据，证明我在类似场合正是这样回答的。这就是我的那封信，它在搜查时被没收了，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荒唐的形式打印了出来（没有我的名字和“仅仅供俄共党员阅读”）。信上，在我的通信人的问题中涉及的还不是“指示”，顶多不过是如何评价某些政治事实，但要求较详细地深入专门的政治题目——我的通信人决非您所说的“青年人”中的一员，即可能为组织寻求指示的人，他顶多不过是俄共的一位忠实的党员。我还是答复他了，据我记忆所及，是这样答复的（现在信不在我这儿）：“有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过问政治，所以不了解

情况；其余问题我尽量回答。”接下来我便试着简略地分析世界政治局势及其趋势和可能性。这是私人信件，从中可以看出，是和同志通信，所以没有防备书报检查机关，即完全是以书信形式与要好的同志进行的一次私人谈话。

任何一个研究人员也不能为别的什么人从他的分析中作出的结论负责——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即使这些结论事实上是从他分析中得出的，他也不负责任：要知道，他有权犯错误，有权做个观点不彻底的人。然而，“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孟什维克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他们当中不乏大理论家——有多少哇！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波特列索夫，等等。而在西方有考茨基、希法亭等人。即是说，他们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有人对我说：“某些“年轻人”从您的分析中得出了“有害的”结论；显然，这些结论“事实上”是从这些分析中得出来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了不起的逻辑学家，有什么办法？或者我的思路如此清晰透彻，甚至大大超过马克思的思想，以致自然而然就能得出逻辑上正确无误的结论？

问题在于，从理论原理和分析中，根本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出”政治结论，也不能按照逻辑，从中引申出非科学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是从周围现实中得出政治结论的，现实又要通过阶级思维和阶级利益的棱镜加以感知，然后还要通过集团的甚至个人的政治气质的中介来感知。理论和分析只能是形成和加强这些结论的手段，当然，它们也应根据需要适应这些结论，否则这些结论就是强加给它们的。

事情就是这样。研究人员对别人从他的思想中得出的结论，根本不负任何责任。

下面再说明一下，我何以更加不能为“工人真理”的结论负责。我已浏览过给我的材料，现需指出：

1. 从文字方面看，这是年轻人的作品，他们在文字上不成熟，甚至缺乏宣传和通俗化的经验。请您随便在老党员作家中找一个公正无私的权威人士问问，能否认为这些作品出自波格丹诺夫的手笔。多么自命不凡的白痴，才会那么大量地引证自己的东西，使用自己的如此平常的术语，就像他们引证我的东西那样？是什么样的自杀情绪，才会迫使我每分钟都在秘密文件上“签字”？波格丹诺夫就不会用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出同样的东西吗？难道把刚开始写东西的真正的年轻人的风格和他们现在迷恋的一个老作家的风格区别开来就这么困难吗？

请看例子。机关报第2期上的《工人真理集体的行动纲领》，一开头（16—18页）就提供了一个严重“罪证”：用两页的篇幅概述人类的全部发展史，用的全是从各处摘引的我的话，而且准确无误。请您问问懂行的人，一个有经验的通俗作者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怎么能在两页纸上概述完“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个见多识广的（只要不是文化程度很低）读者，从对人类进化的这匆匆一瞥中能得出什么？内行的读者要这个干什么？

这里往往前后矛盾。例如：强烈要求生产合理化、减少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吸引外资——同时又欠公道地猖狂攻击“生产者”或“克拉辛分子”，而正是他们捍卫上述东西。这类攻击表明，他们显然不熟悉党的历史：“不，克拉辛同志，您没能通过党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考试，不要着急！”（机关报第2期《小集团》一文，第十一页）克拉辛同志曾是中央委员和历届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委员，并且站在其活动家的前列；多年来，布尔什维主义的“物质基础”——它的财务和技术，主要靠他维持。只有毫无经验且闭目塞听的人，才会说出“候选人考试”之类的话。

2. 从内容方面讲。

粗略的分析表明，这些作品有四个构成因素：

- 1) 强烈而真挚的，但又是年轻人的“左的”革命激情；
- 2) 对周围现实——工人阶级的生活、它的各种组织，包括俄共——的描述，既不是科学的抽象，又没有什么统计数字，而是透过上述的“革命左派”棱镜、从感受到的直觉中得出来的；
- 3) 上过的马克思主义学校；
- 4) 所谓“波格丹诺夫主义”。

这四点中第一点——需要证明吗？我决无此念头。这些年来，人们并不指责我有“左的狂热”，而是说我太过“右倾”，说我主张“特殊的孟什维主义”（布哈林语），说我追求“松树下的”理论“小修道室”（还是他的话）。

第二点——也不过如此。这些年来我根本不接近工厂、工会和党的生活。过去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才和群众发生联系。但自1921年秋天起我已离开他们，因为党决定开展反对我的运动，我看到，我的合作只会败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名声。我身不由己地躲进了社会主义科学院这个“小修道室”。

第三点我当然上过，共产党员上过，孟什维克也上过。

第四点，我本人始终把这一点看做是第三点的发展和继续；但不管怎么说，我对这一点负有责任。

所以，在“工人真理”体系的这四个因素中，我为一个因素负责。有人因此要我负全部责任。敬谢不敏。

孟什维主义中有三个此类要素：1) 机会主义的社会情绪；2) 了解具体现实的广泛材料，直接地和科学地了解——材料当然是透过机会主义本性的棱镜感知和收集的；3) 长期切实的马克思主义学校。马克思为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负责。为什么不完全负责呢？或者是因为他“超出了可企及的范围”？

您要我写下自己的话：“孟什维克利用马克思主义，“工人真

理”利用马克思主义加‘波格丹诺夫主义’。对此又能如何处理，为什么我要比马克思负更多的责任？”您大概觉得这种比较不相称。但要知道，这里讲的不是大小对比，而是形式上的对比关系；在这种场合这种比较对我比对马克思更有利，或者至少一个样。其实，拿“工人真理”小集团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大历史派别相比，拿波格丹诺夫和马克思相比，也未必那么不恰当。或者——或者……或者二人都负责，或者谁也不用负责。

3. 再比较一下从我这里摘引的东西和“工人真理”的结论。

您已经知道，号召建立特殊的新“工人党”这个主要结论，并不是我的。自从成立德国和荷兰的“工人共产党”，人们不只一次问我，关于在我国成立这类党的可能性我是怎么想的。我记得，第一个问我的是席勒同志，他是德国工人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前的该党代表。我对他的回答也和后来对许多人一样，我说，我看不到这样做的任何客观条件，许多条件直接反对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除了俄共，现在我们不可能有其他政党。

但我很容易用一系列例子证明，他们常常利用我的引文，特别是我的方法，这对充满热情、毫无经验、缺乏科学条理的年轻革命者来说是十分自然的，而我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的。

例如，《新资产阶级》一文（机关报第2期，第5至8页）描述了搞组织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形成“新资产阶级”的过程；把我对西方形成过程的描述作为依据，把这副画面直接移至俄国，作者甚至认为，这种形成过程在我国“最为清晰”。而且在作者的视野里就只有两股力量——“专家”和“无产阶级”；而对其余的力量及与他们有关的我国情况的全部特点则视而不见，如农民这些越来越占优势的群众及其经济趋势和其内在强烈的富农倾向，遗憾的是，还有如此众多投机倒把的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广大的无业游民，等等。能想象我会做出这种分析，或者会让人在

我的“指导”下做这样的分析吗？我国的画面恰恰是最为紊乱复杂的，而不是“最为清晰的”；我本人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自己无力对其做出分析，并多次以此为由明确拒绝就这类问题发表意见。

再谈谈无产阶级文化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告民众书中事情被描绘成这样：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前忽视”文化工作，致使工人阶级和党实际上“缺乏在其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政权和管理经济的素养”，而“不得不求助于有经验的人”——专家们，然后对他们言听计从。这纯粹是热血沸腾的年轻革命者的唯心主义观念，谁会相信我有这种看法？如果从建党之初布尔什维克都是十足的“前进派分子”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分子”，那么他们就很难避免和防止出现“缺乏素养”的局面，而不得不使用“专家”，等等。（公告第3页）

在这份公告中，稍后一点写道：“一个党员厂长，尽管来自工人，但他会逐渐变成工人汗水的榨取者，他不再努力满足工人的利益，而是追求生产的发展。”我不可能犯一个写作生手所犯的修辞错误，这一点姑且不谈，我担心，上述说法打击的恰好是我。因为正是我始终认为，在生产遭到普遍破坏的情况下，遗憾得很，“满足工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的利益。

我写这些决不是为了和“工人真理”集团辩论，与之斗争不是我的事，我“不问政治”并不是为了同它辩论。不过我想，所有这些无可争辩地证明，该集团在政治上是独立的，无须我的领导，我无权对其负责。

已经进行三年的反对我的残酷运动因我被捕而结束（暂时的！），这些反对我的人想制造关于我的荒唐看法。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首创者，不仅就其内涵讲，而且现在就其实际范围讲，都是世界性的：您可以在德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找到“无产阶级文化派”，您可以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听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争论，您可以在英国看到共产党人写的关于它的书。不管是什么

流派的前奠基人，但哲学上都是“经验一元论”的。普遍组织科学早期著作的作者，其思想即使错误，但就内在涵义讲，无论如何也是世界规模的，想从逻辑上否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生理集体主义”思想的作者，人们通过交换其能够在生理上进行交换的东西（例如他们的血液）恢复和增强生命力计划的作者，其想法即使是空想的（要知道，检验这一思想的实验由于我的被捕而中断，它能得出什么结果，尚不知晓），但其规模无论如何不止一平方厘米。更不要说那些琐事了，如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工作的年代，如经济普及和经济研究工作，如社会主义小说，等等。最后，即使这些都是“一派胡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人值得党的和理论界的最负责的人士在报纸、杂志和一大批书里（单是近几个月就出版了不下三本这样的书），在公开的讲演里，进行不断的中伤……所有这一切……一个小小的地下集团的头头，即使是非常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年轻革命者的集团；该集团借助复写和油印等方法，从事小规模地下工作，等等。

不，谁会相信这一点？或者，或者，……

不仅可能，而且可以设想，所有这些，事实上始终不过是“空话，空话，还是空话”。中伤了三年不是为的那个，用这么长时间来打基础不是为了那个……解决问题的是物质力量的对比关系；而要上诉只有到历史法庭上去，而这个法庭并不近。

可又有什么办法！起码感到荣幸。我将高傲地接受那个最高奖章，这种“勋章”在几个世纪里只奖给了少数几个人。在我之前得到这种勋章是这样一些人：伽利略，天主教世界给了他勋章；罗伯特·迈耶尔^①，市民世界给了他勋章。我大概会从社会那里得到勋章。

^① 迈耶尔，罗·（1814～1878）——德国自然科学家、医生。第一个提出能量守恒定律，并从理论上计算出热的机械当量，但长期得不到承认。

№03139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17日)

声 明

您在今天(9月15日)的审问中,终于把自己的问题具体化了一些,我的“思想体系”是不是能够成为诸如“工人真理”这样的行动纲领的最合适和最自然的出发点。您指出了我对西方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及其夺取统治地位的倾向的分析;“工人真理”把这一点搬到俄国,宣称俄国共产党是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党,说它在俄国共产党的旗号下夺取了政权并进行统治。

我的回答是:这里没有我的“思想体系”,只有我的术语。用了我的表述,但不是我的思想,不是我的分析结果。这些结果是我在报告和出版物中公开说过的。

1) 在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报告(《当代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倾向》)中我明确指出,在西方,组织者的知识分子正在探索取得统治地位的途径,他们开始为此半自觉地制订思想体系,仅此而已;甚至不能说今天他们已经取得了这种统治地位;他们在那里实际上并不受重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指出过了(这甚至遭到叶尔曼斯基同志的反对)。报告和讨论的速记稿就放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我家里也有。我要补充的是,反对我的著名共产党员也承认我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我指出的倾向确实存在。

2) 关于俄国知识分子, 我始终认为, 就组织作用而言, 他们大大低于西方知识分子, 他们“文化程度不高”, 正如我在《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命运》一文中所写的(见《新生活》, 1918年1月, 好像是18日和20日); 这是就他们的怠工而写的。所以在我看来, 视其为革命动力或领导力量, 这是不可思议的。假如由这群知识分子充当俄共的基础, 那么苏维埃政权就不会坚持6年, 恐怕连6个月也坚持不了。

3) 关于俄共和与之共存的苏维埃政权的依靠力量, 我在上面提到的文章(《工人阶级的命运》)中, 使用了“工兵联盟”这个术语。这符合1917年末的情况。要知道, 士兵不过是参加军事组织的农民(其主要部分): 就是说, 这个联盟是工农联盟。1918年夏, 在根据我的同事伊·伊·斯捷潘诺夫的禁令而未能出版的大部头《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一章(我保存了这一章)里, 我曾界定“共产主义联盟”是应军事共产主义之需而建立起的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下层劳动知识分子(是下层, 而不是以“组织者的”知识分子为主的上层)的联合。在该《教程》(两卷, 四册)再版时, 论“军事共产主义”一章已获得斯捷潘诺夫同志的批准; 该章详述了“共产主义联盟”的理论; 现在该书正由国家出版社出版, 但这一章的手稿(“军事社会经济形态)还保存在我家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一本国家出版社在8月份出版的新版《问答式政治经济学基本教程》来看一看, 这就足够了。现在书中增补了“军事共产主义”一章; 该章解释说: 假如形势要求建立军事共产主义, 而由于诸统治阶级文化水平低下和历史准备不足, 因而不能克服自己的本能, 不能采取最低限度的共产主义措施, 那么下层劳动者就会联合成共产主义联盟并把它们推

知识分子组成。该章还说明，这个联盟永远是革命的动力，是苏维埃政权和俄共的基础。

正如您所看到的，在这里，“工人真理”根本没有采纳我的“思想体系”，而是发挥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不能为别人的思想负责；当然，我要为“组织者的知识分子”一词负责，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罪过。可见情况恰好相反，我的思想不足以也不适于充当其被指控的政纲的出发点。

接下来您又向我提出两个个别问题。

1) 关于老布尔什维克科热夫尼科夫同志。我和这个名字毫无关系，我想，我不认识他。但并不排除他因某件事而来找过我；要知道，到我那儿的陌生人多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值得我记住的特别东西（我的机械记忆能力很差，主要是逻辑记忆）。我认识另一个科热夫尼科夫，他是个老头，干过出版工作。

2) 问我是否到过“梅特隆”工厂，我在那儿有没人熟人。也没去过，没熟人。但鉴于您对地点的描述，我想起一件可能引起疑问的事情。一个多月前，我到商店去买试验用的握力器；我去鲁比扬卡的特雷金商店看看。实际上没有商店，有个牌子写着“梅特隆”，以前是特雷金，在拐角处（或类似的地方）。我到那儿，走进大门：没有商店，只有工厂，仓库。我哪儿也没进去就走开了。

1923年9月16日

补充：关于“思想的十月”，您提到了它，但并没作为问题提出。虽然这个团体似乎隶属社会主义科学院，但我和它毫无关系，印象模糊。迄今我一直认为，这是些揭露异端邪说的正统派人士；

因为三个月以前或者更早些，有人对我说，那里曾做过反对我的报告（关于组织科学，记得是一个叫法因什泰的人做的），而且没邀请我。我不看他们的杂志（因缺少时间我几乎不看杂志，我只读有人专门要我注意的东西）。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9月17日

№03140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22日)

声 明

副本

在今天(9月22日)审讯结束时,我忘了为三个人的问题提供证词:

1) 弗·亚·巴扎罗夫^①。我很熟悉。他生活在白卫中间,几次倾向于孟什维主义,但却没有成为孟什维克。后来了解了这里的事态,接受了革命的全部结果,已经脱离政治。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左倾”:观点与我近似,但有点悲观情调,夸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全力投入国家计委的工作和科学文学活动。

2) 帕·伊·库什涅尔,我是四年前在无产阶级大学工作时认识他的。最近一年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关于原始共产主义问题的辩论会上。他在那里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一起发言,反对为原始共产主义辩护的我和叶梅里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更早一些,他还在《打铁场》上的一篇文章(记得是历史文化题目)中,反对过我(好像没有点名)。总之,我认为他根本不是赞成我的观点的人。

^① 巴扎洛夫,弗·亚·(1874~1939)——俄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斯托雷平时期宣传造神论和经验批判主义。

我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

3) 别洛乌索夫，马克思研究所（前商学院）教授。好像见过两次，在辩论会上，一次在12月份，另一次在不久前（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根本没有私交，对其政治观点无从评论。

关于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教师们的情绪——一无所知，因为两年多以前就离开了该大学。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9月22日

补充：1906年，托洛茨基从孟什维主义中得出了最高纲领主义的结论。我拿他和“工人真理”集团的“极端”结论做比较，这些结论试图以我的正面分析为基础——我已指出这是错误的。但我忘了提出一些事例来补充这一历史情况：当时孟什维克的首领们都接受了这结论，并将其见诸《开端报》，其中就有唐恩。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后来重使孟什维主义学说具有极端的温和性。意识形态学说很少能决定结论。它是一种可被用于达到各种目的的工具。长期以来许多共产党员一直认为，新经济政策与共产主义学说不相容。但后来他们相信了，没有什么不相容的。

我声明，每一个知道实践结论和人们的任务由什么来决定，知道意识形态在这里起什么样辅助从属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承认，别人妄图利用一个理论家的理论，以便得出他本人从未得出的结论，而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结论又不能不矛盾百出，但人们却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位理论家，这是十分不公正的。

我本人始终坚信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因为只要浏览一下“工人真理”的小册子（关于它我以前曾对阿格拉诺夫同志谈过，并且

在今天的审讯中写到了)，我对这本小册子就会丧失任何兴趣，也不想认真看待它，因为我看到了，它的结论不是我的，而是和我的观点相矛盾的。所以在我看来，显然“引证”我的词句和思想，纯属“意识形态上的”无聊之举。我不再去想这个令我厌恶的问题了。

这种“引证”给侦查工作提出了一个两难论题：要么是“冒名波格丹诺夫”幼稚地胡编乱写；要么是波格诺夫自己密告自己，这已经不是幼稚，而简直是发疯了。如果不是专家，大概很难识别刻意模仿大师（请原谅我用这个自傲的词儿，但像马·高尔基这样的人物都承认我有用这个词的权利）的伪作；所幸的是有一种解决问题的简单的而又无可置疑的办法。正是在最不择手段地滥用我的术语和词句的地方，其思想是与我在出版和讲演中一贯公开发表的东西针锋相对的。明显的例证就是“工人真理”第2期上论俄国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记得署名为“列昂尼德”（甚至笔名都取自我的小说）；文章完全使用我的语句，但正如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审问中从两个方面所揭露和证明的，该文和我的方法完全相反——我从总体上把握阶级关系，不许自己忽略它们的各种复杂性；该文也和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我认为他们毫无价值、组织上落后；该文同样不符合我对“共产主义联盟”的理解，我认为它才是苏维埃制度和俄共的基础。这里还会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但在另一方面大概有不清楚之处，当然，不太严重。您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问：为什么“工人真理”偏偏对我的术语和公式如此倾心？这就迫使我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得出了新的结论。在我看来，它们如此简单、明确和彻底。显然，我以前之所以没得出这些结论，只是由于考虑得不够。

我一直认为，问题不过是有人对我的思想感兴趣，实际上这可能是错误的。假定这些思想是正确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们就必定

有吸引力，情况往往适得其反。不是偶然地反对这些思想的人会比拥护它们的人多得多，但既然问题涉及到“工人真理”，那就会发现，这些思想决非全部而是部分地被直接歪曲了。这样还谈什么它们本身的吸引力？于是我开始寻找另一个更加客观的论据。

我在想我近三年来的境况。我遭到过数十次，我想是数百次攻讦；它们来自有影响的人士，还有有影响的集团；攻讦出现在官方文件里，公开演说里，在报纸、杂志文章和大量书籍中。我曾说过，出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一半是为了反对我，而当时在场的该杂志最亲近的撰稿人之一德沃拉伊茨基本人纠正我说：“不是一半，而是完全。”我试图答辩，但不予发表，而且要想回答一切，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在我周围形成了一种被毒化的和充满敌意的气氛……我的案子就是这种气氛造成的，它为此案提供材料，它把所需的人推向“波格丹诺夫主义”。

存在对事件进程、秩序和党不满的动荡因素。他们当然要为自己寻找思想体系。于是他们看中了一个遭迫害的人；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体现着他们不满的动因的人，又会被他们看成实现其要求的敌人。这可能比下述结论更简单，更合逻辑：“瞧，他应是我们从他那里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人。”他们按自己的情绪阅读、研究和解释。他们想求助于他。但他以理论家和研究家的身份保护自己，他“不问政治”。根本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政治实践的指示，而他对当前发展的评价只会令人扫兴：“形成新的政治力量的客观条件不具备，除了现存的党也不可能有另一个党。”他们想：“那好吧，没有他我们也能对付。我们要利用适合我们的东西，并且已经在充分地利用，对他没什么可客气的；我们自己能提出我们认为正确的任务。”

一切都清楚了：既有“对波格丹诺夫主义的热中”，又有野蛮放肆，不顾一切地利用和随心所欲地曲解我的思想，这同我的真实

思想完全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正如确实理解而不是单纯利用我的思想的人，我对他们有所了解，他们或者如我一般投身科学，或者从事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生活实践。

年轻人狭隘而又富于幻想。“对波格丹诺夫没什么可客气的；我们的事业更宝贵，为了我们的事业得到这么个受难者，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总是有好处的。”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和文字上很不成熟，但就其政治本能讲，他们实际上并不那么幼稚……如果说我没能立即弄清事实的这种联系，那是因为早已不按政治路线去思考了。

于是就发生了下述情况，一个孤独的科学工作者，像少数人那样孤独的人，处在两头受气的境地：一些人早就想把他这个可恨的思想家“置于死地”；而另一些人也不反对置他于挨打的境地，因为这对他们一点害处也没有。利益上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这两项计划都得逞，那将是极不公正的，必将受历史法庭的谴责。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9月23日

№03141

被捕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波格丹诺夫致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

(1923年10月4日)

声 明

您答应了我关于亲自审问的请求。这表明您对我的案子的态度既不是基于纯粹的形式主义，也不是基于敌视我的气氛所煽起的成见。

最期六，9月29日，我给您寄了一个尽可能详细的报告，就您提出的问题阐明了我的观点；星期日，10月1日，又寄了我的一本为群众出版的小书，一本入门课本。我想，您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确信，我主观上从来也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客观上同样不是这种人。在这段时间里与我有过交往的每一个我们共同的老同志都能对您这样说。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提醒您记住我们谈话中的一点，即您确定的关于一周期限的许诺。我写这份声明恰好是在我们谈完话之后一周；送到您手里自然要晚些。我当然明白，您的话里有大致的意思（甚至记得您用了“大约”一词）。如果我徒然打扰您了，我事先致歉：您能理解我不得已的固执。身处您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的每一句话都是严肃的；假如我的案件有什么变化，假如出现了新情况，应当告诉我。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指望您了。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0月4日晚7时

No 03142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10月11日)

声 明

上一周我接受两次探视，并被允诺四天后接受下一次探视。过去一周多，没有探视，看来，探视被终止了；也没有信。

恳请您说明一下，这是不是惩罚（像常有的那样），果真如此，那么原因何在？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0月11日晚5时半

No 03136

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亚·波格丹诺夫致社会主义 科学院主席团的声明

(1923年11月6日)

谨奉告，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①杂志1923年第8—9期第285页上，在署名为“唯物论者”的评论中载有：“……一大批主观上对工人阶级颇有好感的人阐发了一种理论，其全部客观意义就在于，力图破坏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基础——唯物主义。

我这不是指波格丹诺夫——他早就成了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叛徒，他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早已完结，他本人已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话里不仅包含谎言和对我的诬蔑，而且包含对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严重冒犯。

“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一说在这里到底指什么？很显然，这种说法具有普遍的原则意义，而不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指责另一些人在某个问题甚或某个领域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例如：德国共产党人，罗萨·卢森堡^②的积累、市场和危机理论的追随者，对列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苏联哲学和社会经济学刊物。1922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先是月刊，1933—1935年改为双月刊。1944年6月停刊。

② 卢森堡，罗莎（1871—1919）——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著有《资本积累论》（1913）、《国民经济学入门》（1925）等。

宁等俄国理论家所作的此类指责；或者伊·伊·斯捷潘诺夫^①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在宗教学说上相互指责。

这样，自身存在不久（总共五年）的社会主义科学院，其成员中早就有一个不折不扣的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该院甚至两度将其选入自己的主席团。好一个如此这般的“社会主义科学院”！

还有“政治上的叛徒”……如果注意一下这些话印在什么样的杂志上，那么它们就具有了特殊的专业涵义。该杂志在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的这两期里，对他却一次也没使用过这样的称号。而普列汉诺夫却是“统一派”集团的头子，该集团所持的立场比任何孟什维克都右，其极端社会爱国主义千方百计从事反对俄共的斗争，直至其积极的成员格·阿列克辛斯基^②的方法：参加白色反间谍组织，诽谤布尔什维克领袖被德国收买。

不言而喻，我搞不清这位匿名的“唯物论者”所说的“早就”干过的“政治叛徒行为”指的是什么。从1895年起我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员和组织员。自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1904至1909年任历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0至1911年是“前进”集团成员，但当时谁也不认为这是叛徒行为。波克罗夫斯基、卢纳察尔斯基和列别捷夫-波良斯基可以肯定这一点，他们参加该集团的时间几乎都比我长。离开国外政治活动后，我在1913年在《真理报》当编辑，1914年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任职。在1917年我又写起论战争和论革命的解释性宣传文章和小册子；它们大部分都由

①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② 阿列克辛斯基，格·阿·（1879~?）——1908年召回派，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1918年流亡国外。

布尔什维克们散发。尔后我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从事文化和科学领域的革命工作。

这样离开政治根本不可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说的背叛行为。不仅就该词的确切涵义讲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因为在这个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中，也有脱离政治的人和无党派人士——来自上述“统一派”集团的前成员。

那么，评论的不知名作者到底指的是什么？从那时起，我的惟一一件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是纯粹被动的——我因今年9月8日的政治指控而被捕，于10月13日获释。但本案的侦讯材料只有侦察员及其上司了解；而如果匿名评论家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恰恰不能写他已经写出的东西：侦察人员向我宣读的最后声明称，未见我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因此将我释放并准我留在莫斯科。

因此，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匿名作者的话纯属谎言和诽谤。一份权威性的机关刊物声言，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一员“早就是政治上的叛徒”，科学院对此能不闻不问吗？它能允许别人说它是政治叛徒们的藏身之地吗？每一个有理智的读者从声明中读到，我院院士可能是什么“货色”，因而不再关心工人阶级，这样的评语对我院来说是光荣的吗？

科学院理应回答并将被迫回答这些问题，不管它愿意不愿意。因为甚至沉默也是回答——而且对它来说是更坏的回答。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科学院承认，匿名作者的话是对的；那么它就应当公开并尽快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即它早先没有把这个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叛徒从他们之中开除出去。或者它知道它做了些什么，它把我选为其院士，又选为主席团成员，多次委托我代表它发言；它有责任维护本集体之一员的声誉和它自身的尊严。

波格丹诺夫院士案件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1月6日

请把我的这项声明列入议事日程并在社会主义科学院近日的全体会议上宣读。

亚·波格丹诺夫

№03137

波格丹诺夫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23年11月7日)

最尊敬的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

请将呈送的声明转交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关于该声明我将对您作几点解释。

首先，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愿使主席团和整个社会主义科学院处于难堪境地，这一点您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这种境地已经存在。如果有这样一位院士：在安排课程时没有问题；他的纯学术性的报告却出于政治和策略考虑不能在科学院机关刊物上发表；不便于邀请他参加隆重纪念同院另一位院士，他的老师的大会——大家都不想提起此人，等等，这种境况只能用难堪来形容。

另一方面，一个工作人员理应享有人权，起码是自卫权。我的声明就是必要的自卫（包括该词最粗俗的涵义）行动。

目前针对我的诽谤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准备进一步整我。捕我完全是三年多来文学上和政治上陷害的结果，在此期间我始终紧闭双唇。正是在这场陷害中，我那些非止一次清楚阐明的思想，被歪曲丑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可以把《工人真理》那些天真幼稚的文章强加在我的头上；这些文章和我对时代的社会条件的分析南辕北辙。摧毁三年诋毁比我刚刚争取到的获释，要困难得多。捷尔任斯基是个绝对真诚的人，他本人从这场迫害中对我有所了解。看来我成功地说服了他和侦查员们。但诋毁活动并未因此而终止。

我听说，不久前有人在外省作报告，说我在搞反苏维埃政权的

“地下斗争”。我获释后就听到一些流言，说我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联系，说我和流亡者有秘密来往，直至和波兰的反间谍机关有某种关系——最后一点引自《真理报》的一篇文章！

处心积虑的中伤者的下流行径本身丝毫不能伤害我。但是，如果我对此缄默不语（而我除了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无处提出抗议），那么明天，大搞反对我的运动的人就会把这当成明显的罪证加以利用：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任何一个侦探（他们受到足够的鼓励）将认为，随便找个什么借口逮捕我，这是他的共产党人的天职。

鉴于“某种关系”以及其他等等，科学院到底该怎么办？对此我一无所知，此时这已不是我的事情。但我想提请决策人注意如今已被大家完全忘却的事。

我们的革命尽管它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甚至不是人们迄今仍然认为的那样，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当我看到被革命举上最高地位的那些人很少想到历史在看着他们行动，历史将研究他们，将公正地和无情地审判他们，对此我常感到惊讶。是的，历史将不得不花很多功夫去处置大人物，有时还有小人物。甚至某个微不足道的诽谤者也想把自己逢迎拍马一钱不值的一生完全忘掉，但他会在别人传记中出现。

机关也应记住历史。社会主义科学院能否成为新科研组织的萌芽，或者只是个失败的典型，不管怎么说，历史反正会去研究它的而且十分认真，比研究什么法兰西科学院更认真，该科学院的卑劣行径甚至遭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揭露并被记录在案。

我对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态度是真诚的和严肃的。在我两年前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因我确信我的合作对它有害）之后，社会主义科学院一直是我最后的组织关系所在地。现在我希望（这决不单纯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它发挥最大的历史作用，这是它能够和应该起的作用。

您的亚·波格丹诺夫

№03143

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波格丹诺夫
致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

(1923年11月29日)

声 明

您建议我就下列问题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

1. 当前世界革命的一般意义和前景；包括俄国革命。
2. 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和俄国所起的作用。
3. “共产主义联盟”的作用和意义。

我曾断言（而且我没理由放弃这个观点），已经开始的世界革命不是社会范畴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它不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但它是阶级范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它能把无产阶级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阶级，而迄今为止他们还从不是这样的阶级。

无产阶级进行过反对剥削的斗争；但比剥削潜藏更深的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才是剥削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灵魂。除了理论上的斗争，反对它的斗争尚未开始。无产阶级为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斗争，这在客观上是适应资本主义，使之尽可能合乎他们的需要。社会主义是遥远的理想，而不是现实行动的纲领，不是指令性的力量。

世界大战和破坏已实际表明什么是经济无政府状态，其中产生

的对无产阶级发展和工人本身生存的威胁有多大。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来说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克服无政府状态已成为决定斗争目的的纲领性环节；社会主义方针在发展，这是必然的——工人群众甚至不自觉地受这种趋势所左右。例如，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要求矿山国有化。这种要求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要求，与其说它是反对剥削，毋宁说是反对无政府状态。

而且即使在阶级范围内，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也非易事；它还只是在进行中，离成功还很遥远。并非只有惟一的一个工人阶级，而是有两个：一个是有高度技能的上层，他们有相当高的组织，在资产阶级文化中拥有自己的一份，深谙资产阶级的组织方法——妥协，他们是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但不是资产阶级，为此资本主义才分给他们一部分剩余价值。

[第二类] 无产阶级是生产的执行者，他们在斗争中自行组织起来。

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旧社会形态的残余。

农民等只在落后国家里才是具有其社会分量的成分，这里暂时可以不去考虑：他们过去处于底层，以后仍将留在底层。

资产阶级受到了沉重打击，可以预料，其最具寄生性的群体，将被抛离其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其统治整个说来将难以维持下去。

工人阶级在生产中仍是实际执行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该阶级对掌握全部生产组织的领导权尚无准备，在纯粹的战斗环境中是不可能做好这种准备的；在这里他们只是组织自己和瓦解敌人，这不会为完整的经济组织者的实践提供经验。

二

“组织者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社会经济的实际组织者，看来能

够继续充当这种角色。但还像从前那样依靠牺牲别人吗？不，他们曾经效忠的那个主人已经垮台了，他们不能再指望他了，他把他们和整个社会引向了深渊。以前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生产中占据特殊地位，因而在经济上是“自在的阶级”，但却不是，也且不想成为“自为的阶级”，不想组成特殊的社会力量——实际上也不需要；对工程师、学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一切都归结为个人的升迁，没必要考虑一般任务，如果背离升迁的宗旨，甚至有害无益。现在不同了。主人垮了，必须自己想办法，靠单干不行。开始形成新的思想体系。拉特瑙、凯恩斯、凯约是其先驱。在西方，组织工作，眼下是职业的，发展甚快。对任务的意识不够，但已经本能地在试探通向新角色，通向新资产阶级的道路。随着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功，旧资产阶级的残余将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吸引和吸收，从而强大起来。这和以往的情况刚好相反。

然而，这些过程是缓慢的，我怀疑，没有来自工人阶级方面的特别推动，资产阶级“组织者的知识分子”能及时爬上预定的地位。

这种地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三

问题当然不在于类似战争年代德国的军事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在于金融资本与军事共产主义强制因素的混合体。

新形式首先要求国有化，起码是生产系统最主要和起主导作用的部分的国有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济领导权，要求实行新的剩余价值分配方式——红利—奖金制，以刺激专家们去发展事业；否则，国有工业会因官僚主义而停滞不前。这种制度看来也适用于工人，而且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在这种制度背后极易隐藏着泰罗制。阶级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亦然，试图把这种制度美

化为“国家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

特殊的过渡性质使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如果它能实现的话）有必要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

这就会立即出现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先天不足”。就其社会本性及其历史素养讲，知识分子都与严格的整体观念格格不入。除了个人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他们由于专业教育造成专业过细，所以浸透了小集团的狭隘性、“行会的”局限性和本位主义倾向。他们不能站到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经济的高度：他们的每一个集团都不可避免地要偏向自己，力求发展自己的部门，尽管这可能破坏与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每个集团都想多捞点，尽管这会损害别的集团。这就是产生不协调和特殊的无政府状态的新根源。

这里也应看到无产阶级的新作用，教育他们的新途径，因为他们是社会制度的惟一主人。

为了自身的利益（是和整体利益一致的），无产阶级将被迫与这些无政府状态作斗争：在有可能但尚未进行国有化的地方完成国有化，制止对经济平衡的破坏，揭露和施加压力以限制地区和部门的小集团利己主义。这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积极调节者的作用，这已不是局部性的实践，而是对经济的全面领导。虽然实际上要取得成功，当然只能视无产阶级与对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力量对比的情况而定。

这种实践将通过上述形式得到发展。但不排除下述可能，至少是在德、奥等国：在“工人”或“工农”政权的形式中，无产阶级可能不得不强迫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去管理社会经济。须知，法国民主派当年曾经硬把有反动情绪的资产阶级推上统治地位。

但情况也可能不同——对英美来说，这甚至是十分可能的：组织者的知识分子自己掌权并依靠无产阶级机会主义上层的支持，然

后论功行赏，对其进行再教育。当然，那时反对无政府状态争取严密组织生产的斗争，将不是通过国家机关，而是借助工会和政党进行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调节作用可能发展很顺利而且越来越成功，因为其自身的团结将增强。问题在于，在抗击一部分新资产阶级的小集团的和部门的利己主义时，无产阶级将在另一部分新资产阶级中找到支持，上述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对他们是不利的，反之亦然。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将团结一致，他们必将跃上顶峰，并将在斗争中成为整体的组织者。

届时也将完成对下层民众在组织上的补充教育，完成无产阶级上层的再教育，使二者合为一股力量；这股真正训练有素的力量足以完成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然，没有新的革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革命不仅能战胜新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他们将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也将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就其自身的本性讲却永远不愿迈出这些圈子。这就是生产和分配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四

我想，正是两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出现的可能的“国家资本主义”间隙的这个阶段，应当广泛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

我理解的“阶级文化”，不是某种日常生活形式，也不是阶级创造的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总和，这一切只是文化自身，其本质的附属部分，这是该阶级出自其社会本性的特殊组织方法之集大成——是组织自己生活同志式合作，使自己的意志系统化和使自身感觉和谐化的特殊形式。

无产阶级的社会建设者和全面组织者的训练，也就是其文化的

制作。无产阶级文化也就是对无产阶级进行现实的和理想的训练，因为他们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进入日常生活、科学和艺术的一切东西都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因素和表现。它们早就通过个人途径，自发地和半自觉地在民众中进行创造；在下一阶段，人们会自觉地和越来越有计划地进行创造和收集。英国共产党人伊旦和西多尔·保罗在《无产阶级文化》一书中，对我的观点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定义为“对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教育”，只需将该定义由教育方面扩展到一般生活领域，它就完整无缺了。

五

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的过渡性阶段到底能延续多久？

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进行得更快。金融资本主义经过了15~20年，就几乎寿终正寝了。

不过还是难以预测。如果发展进程加快，那么新阶段的任务显然会比金融资本时代的任务要复杂一些，困难一些。

六

世界革命的前景就是这样。

俄国的前景。在这里作出预见无比困难，“极限平衡”的方法已经不够，因为俄国革命不能自生自长。其整个进程和过程中都完全取决于世界局势。

俄国革命是在非常特殊的各种条件的配合下诞生的。

在一个落后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崩溃的基础上，创建了劳动阶级的共产主义同盟。该同盟是这一革命的动力。摧毁维系生命之源的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

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 1917—1921 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

谁来组织这个共产主义？船长，城防司令，掌权的人。在德国，大量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是由执政的阶级实行的，虽然往往是在下层劳动者的强大压力下施行的：资产阶级是难以实施这种措施的，因为它是反共的。但德国的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即其在组织上精明强干，历史经验丰富，会去做需要做的事。

而如果统治阶级不能根据迫切需要克服其私有者的本能，那将如何？下层劳动者会联合成共产主义同盟，推翻他们，夺取政权，以便组织共产主义。1871 年在被围困的巴黎，就曾由工人和追随他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这种联盟。在资产阶级的唆使下，法国农民没有参加进来，粉碎了它。

在俄国，这个联盟最初是工兵联盟。文化水平很低的士兵很容易追随共产主义口号，因为军队本来就是个大消费公社。这个联盟打垮并推翻了不够“文明”的资产阶级，即是说，这个资产阶级缺乏组织训练，不能也不愿干需要做的事情，如制止战争，调整生产分配，给农民以土地。

后来，士兵脱掉了军装，现出了农民的本色。联盟继续斗争，进行国内战争，这是工农联盟。追随他们的还有下层，最下层的劳动知识分子。而“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他们的上层和领导层则反对该联盟。这些人实行怠工，这表现他们的“不文明”——组织水平落后，历史训练不足。

联盟的代表是俄共。它的组织是苏维埃政权。

七

联盟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因此它也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

的社会经济形态。联盟转入新经济政策。

而组织者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他们取消了这一联盟，或者也可能是将其抓到自己手里，从而成了革命人民之首……

荒唐的画面。这些知识分子在扮演这一角色时，实际上显示出既缺乏文化修养，又缺乏历史训练。他们以前的全部革命性，或者确切些说，反对性，皆来自旧制度，靠无党派主义维持，这种主义也曾妨碍其获得社会升迁和发展。他们在组织和文化方面之低下，简直无法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尤其是德国知识分子。他们才刚刚在摸索掌握统治的道路，在为此构想思想体系，开始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直接地和自觉地登上统治，但他们却已走过了所有阶段并立即攫取了一切。

不，他们并不十分具有天才，他们的作用小得多。他们服从联盟，现在自然是乐意这样做的，就像以前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一样，但并不心甘情愿。

八

最后。由于我上面指出的原因，我一直认为，最好是把对俄国看法局限于指明事实，而不作预测。但对我看到的東西，我决不向同志们隐瞒。

共产主义联盟是牢固的。它为抗拒灾难和国内战争的可怕打击而结为一体。联盟中有瓦解的倾向。但它坚持住了。其直接必然性的基本因素依然还在：俄国和从前一样处在敌对的包围之中。而联盟体现着俄国的统一和力量。

甚至面临一场新的战争、武装干涉和封锁，可能有必要再搞一次军事共产主义。所以我说：“除了联盟和俄共，没有形成其他政治力量和其他政党的客观条件。”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我知道，这些观点并不十分正统。它们是

否有害，我不能妄评。但这些就是我提请您注意的东西。这些思想我早就说过，其中最晚的才一年多；自从近来反对我的运动尖锐化之后，我已不再对我们的时代进行社会分析，我躲到别的领域去了。这些思想是否能存在，不取决于我个人。

它们被运用，它们也被滥用。“工人真理”歪曲它们之后，塞进符合他们自己意愿的结论，企图把它作为自己的名号。这符合“工人真理”的政治利益，我的名号看来还有点价值。

既然我并没有把这个署名权交给“工人真理”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根据什么来进一步迫害我个人呢。

假如我提出抗议：“你们非法剽窃”，如此等等。他们会回答：“不，这是您的观点不彻底，您没从自己的思想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我们则十分正确地为您作出了结论；在这点上，苏维埃政权赞同我们。苏维埃政权本身用自己反对您的措施证实了这一点。”

这样，事实的力量就在他们那一方了，他们会赢得他们所要的东西。但除了他们，这还会对谁有利呢？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1月29日

【专题说明】

组建苏联的最初过程

(1922年8月至12月)

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共（布）中央开始考虑将内战中形成的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军事政治联盟关系发展为统一的联邦国家。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联邦的目标。1922年8月，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联邦的筹建工作正式展开。8月1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起草关于俄罗斯联邦与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的方案。该项工作由斯大林具体领导。斯大林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自治化”计划），该方案在分发各共和国党中央讨论后（其中格鲁吉亚明确表示反对），略作修改于9月24日在组织局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当时病休中的列宁十分关注这个问题，9月22日曾向斯大林了解情况，斯大林作了书面答复。9月26日，列宁在看了有关材料后写信给加米涅夫并转政治局全体委员，对斯大林的方案提出异议，要求对第一条作原则性修改，即把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改为各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斯大林于9月27日给列宁回信，有保留地同意了列宁的修改意见。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修改后的联盟方案。此后，联盟的筹建进入实施阶段。11月21日，俄共（布）中央

决定成立一个分委员会，起草联盟宪法基本条款（即联盟条约）。条约草案几经讨论修改后于12月18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成立。

本专题选编了34份俄国档案文献，基本上反映了苏联筹建过程中两个阶段的情况和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与斗争，关于此期间列宁对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考虑及其思想和言论，可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所载有关文献。

（本专题文件由余伟民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有周绍珩、吕允连、韦清豪、马逸若）

№02406

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各独立共和国
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①

(不早于1922年8月11日)

1. 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几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适宜的。关于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目前只和他们订立有关关税、外贸、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条约。

附注：第1点中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宪法中的相应改动，将于苏维埃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后着手。

2. 认为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扩大到第1点中所列举的各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的相应机构是适宜的。

3. 第1点中提到的各独立共和国外事（外交和外贸）、军事、铁道和邮电，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事务合并。

4. 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正式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应人民委员部的指令。

^① 该决议草案亦被称作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

5. 认为第1点中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卫生和劳动保障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

附注：上述各共和国与反革命斗争的机构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令。

6. 本决议如果得到俄共中央委员会赞同，将不公布，而作为通令分发各民族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以便在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先由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

委员会成员 约·斯大林

№02407

曼努伊尔斯基就乌克兰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9月4日)

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在我动身外出前，想就有关乌克兰事务的问题，或更确切地说，有关边境情况的问题谈几点想法。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边境上，特别是乌克兰一边形成的那种导致中央当局和地方当局之间一系列冲突的状况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这种使得负责同志为解决冲突耗费四分之三时间的状况应该得到彻底的重新审议，因为它不再符合客观形势的要求。

朝着什么方向解决呢？

我以为，应该朝着消除独立共和国而代之以广泛的、现实的自治这样的方向来解决。这就是说，对于外贸问题和外交事务，应在相应保证边疆区的利益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不被抛在一边的情况下建立起中央的统一领导。对于整个经济也要同样处理。现有的相互关系形式——取代统一领导而形成了好几个“主人”——已经过时，这不能不对经济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现在，当我们在管理机构中要求每个人对其所承担的事业树立和提高责任感的时候，这种双重体制只会造成混乱，并使全国的经济恢复陷入困境。

除了这些实际的想法外，还有一些可以说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想法。在边疆区建立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独立共

和国，曾是与我们的革命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不妨粗略地称之为“民族”阶段，然而在这段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解开民族问题的绳结。这是对革命所启动的民族自发势力不可避免的让步。这种民族自发势力由于依仗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有可能变成严重的“反革命暴动”。经济政策的改变给农村带去了平静，冲掉了那些企图利用经济问题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分立主义分子脚下的土壤。毋庸置疑，目前在有着“独立”体制的地方推行自治，将影响我们称之为“路标转换”^①的那种转变的速度。在我们共和国的一些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乌克兰，“路标转换”由于一些民族因素的影响而来得较晚。正是推行自治把乌克兰的路标转换延迟了一段时间，然而没有引起任何同这一方针有着对立含义的重大民族运动。乌克兰的庄稼人对“民族”问题不感兴趣，再也不想参加政治性的反革命集团。我以为只需按如下方式实行这一措施，即在12月的全俄代表大会上完成立法，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倡议。

致以

共产党人的敬礼

德·曼努伊尔斯基^②

1922年9月4日于哈尔科夫市

① “路标转换”一词源自20年代初流亡国外的俄知识分子创办的杂志《路标转换》。这里借指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改变苏维埃政权性质的企图。

②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1883～1959）——时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No 02408

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全会

第七次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9月11日）

听取：

3. 关于给前往莫斯科参加独立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互关系委员会的阿加马利-奥格尔雷同志的指示的报告。

决定：

①认为苏维埃阿塞拜疆在教育、地方行政管理、司法和农业诸问题上，比迄今以前更加紧密地同俄罗斯结成联盟，并在赋予民族共和国最大限度独立性的同时建立统一的苏维埃联邦是必要的；②认为就工业状况和地理位置而言，阿塞拜疆迄今实际上已经与苏维埃俄罗斯结成联盟，现在需要在广泛自治的基础上正式加强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统一；③不开展使这一决定普遍为人所知的广泛宣传运动，但认为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其目的在于向广大工农阶层阐明对这一改革的态度。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谢·基洛夫^①

^① 基洛夫，谢尔盖·米洛诺维奇（1886～1934）——1926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年被暗杀。

№07307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9月15日)

听取：

1. 斯大林同志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化的提纲。

决定：

1. 认为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所建议的各独立共和国以自治化形式实现统一为时过早。

我们认为，在经济上统一力量和统一总政策是必要的，但要保留独立的全部属性。

表决：

中央委员：5人同意，1人（埃利亚瓦同志）反对。

候补中央委员：6人同意，没有人反对。

列席会议者：19人同意，6人（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基洛夫、索科利尼科夫、戈戈别里泽、卡西亚尼同志）反对。

米哈·茨哈卡亚同志弃权。

委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询问缺席的中央委员奥拉赫拉什维利、埃什巴、托罗舍里泽、卡兰达泽、戈吉亚、格格奇科里各同志的意见。

责成姆季瓦^①尼同志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奥库贾瓦、杜

^① 姆季瓦尼，波利卡尔普·古尔格诺维奇（1877～1937）——时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成员，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姆巴泽、钦察泽各同志的意见。

2. 上述问题暂不向广大党员群众传达。

中央委员会书记 萨巴什维利（签名）

№02410

奥尔忠尼启则需要亚美尼亚 中央委员会支持致卢卡申电

(不早于1922年9月15日)

致卢卡申^①同志

根据我交给你的提纲，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许多县做出了积极的决定。这里的中央委员会看来会争吵不休。需要亚美尼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如果不能召开全体会议，则最好能（需要）在星期六晚上以前，由主席团和负责同志做出决定。

奥尔忠尼启则^②

于梯弗里斯^③

① 卢卡申，С. И.——时任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② 奥尔忠尼启则，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86—1937）——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格鲁吉亚人。时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③ 格鲁吉亚首都，1936年以后改称第比利斯。

№02411

卢卡申就亚美尼亚党中央的决议
致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电
(1922年9月16日)

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亚美尼亚共产党埃里温市^①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负责人会议一致表明，赞同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政治经济关系问题的提纲。并已做出某种合理的决议。决议将呈送，编号№3145。

卢卡申
于埃里温

^① 亚美尼亚首都，旧译“耶烈万”。

№02412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局 第二次全会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9月16日)

听取：

1. 关于委员部的规章草案（切尔维亚科夫同志）。

议定：

- 1.（秘密地）讨论了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会者认为，出于对在地区经济和文化自然发展的基础上白俄罗斯与维捷布斯克省和戈梅利省联合的政治合理性的考虑，提出白……^①。

2. 认为在白俄罗斯各委员部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委员部之间，建立类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乌克兰之间的那种关系是恰当的。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博古茨基（签名）

^① 维捷布斯克省和戈梅利省于1922年划归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前者于1924年3月，后者于1926年12月，先后划归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02413

**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主席团
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9月16日）

听取：

13. 关于外高加索共产党对外高加索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的提纲态度的报告。

决定：

13.1. 赞成关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联合的提纲，获悉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他们已同意这一提纲的报告。

4 票赞成，1 票反对。1 票弃权。

2. 得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他们对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将不向广大党员传达。

3. 由马哈拉泽同志、卡夫塔拉泽同志和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书记萨巴什维利同志负责此决议的贯彻执行。

4. 建议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按上述提纲的精神使广大党员思想情绪有所准备。

4 票赞成，2 票反对。

俄共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07308

斯大林就地方和中央的 关系问题致列宁

(1922年9月22日)

对便条^①的答复。

列宁同志！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现状，即缺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正在变得忍无可忍，这种现状引发了冲突、怨恨和愤慨，把所谓统一的联邦国民经济变得有名无实，在全俄范围内阻碍一切经济活动，使其处于瘫痪状态。两者必择其一：要么真正独立，那样的话，没有中央干预，有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自己的租让委员会，自己的铁路部门，而且，共同的问题通过对等的谈判，根据协议解决，而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各独立共和国不必执行；要么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统一成一个经济整体，把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正式扩大到各独立国家的人民委员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即以各共和国在诸如语言、文化、法律、内务、农业等方面真正的内部自治来取代有名无实的独立。

应当注意到：

1. 如果正式规定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

^① 指1922年9月22日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便函，在该信函中，列宁要求斯大林就有关各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情况向他汇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各独立共和国不一定执行，而这些机构又经常取消各独立共和国中央机构的决定，这会引来后者对莫斯科中央机构“非法行为”的抗议。

2.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中央一般是在地方中央机构已经发出自己的命令，而这些命令旋即被莫斯科中央机构取消之后才进行干预，这就造成经济工作中的拖延和停滞现象，而且在地方上引起非党群众的不解和共产党员的愤慨。

3. 在四年国内战争期间，由于武装干涉，我们莫斯科不得不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自由主义，但是却意外地在共产党人中培养出一些真正彻底的社会独立主义分子，他们要求全部意义上的真正独立，把俄共中央的干预视为莫斯科的欺骗和虚伪。

4. 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形式、法律和宪法不能轻视，地方上年轻的一代共产党人不把搞独立投机看做投机，固执地把关于独立的文字当成真的，还固执地要求我们一字不差地落实独立共和国的宪法。

5. 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使地方应当在一切基本的问题上无条件地服从中央这种中央和地方相互关系的形式，与实际的关系一致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用形式上的（同时也是实际的）自治取代形式上的（名义上的）独立，那么，一年之后，维护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统一将无比困难。

现在的话题是可别“得罪”民族共和国的人，一年以后，话题很可能是可别因此引起党的分裂，因为“民族”自发势力在地方上的作用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不利，形式上的独立有利于这种作用。实例很多，其中之一是：前不久，格鲁吉亚中央竟然不与俄共中央打招呼就决定，允许奥斯曼银行（英法资本）在梯弗里斯开设分行，这无疑会导致外高加索在财政上屈从于君士坦丁堡（现在，土耳其里拉已经成了统治货币，正在把格鲁吉亚货

币和俄罗斯货币排挤出市场)，而且中央的果断禁令（在索柯里尼柯夫^①同志的坚持下通过的）竟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中引起轩然大波。

我的计划：

1. 关于布哈拉、希瓦和远东共和国（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暂时搁置，即暂不实行自治。

2. 对其他5个独立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宜承认自治，好让这些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己自愿地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它们愿意在自治的原则下，加入到与莫斯科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中来（我已经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希望自治化的申请、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希望保持独立的申请）。

关于确定与边疆区关系的中央委员会^②会议可能于23或24日召开（尚未全部到达）。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赞成自治，其中也有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至于美国股东，有消息传开：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另一些人认为他们不可信赖。近日内我将收集准确的信息告知。

附笔：

1. 为备不时之需，给您寄上“假冒的”民族主义者马努伊尔斯基同志的信^③并告知您，据说，绝对“不是假冒的”乌克兰人拉柯夫斯基^④同志对自治表示反对。

① 索柯里尼柯夫，格里戈里·雅柯夫列维奇（1888～1939）——时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财政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

② 即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

③ 即本专题文件№02407。

④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1873～1941）——时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2.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已来，向您致以热烈的敬礼。

约·斯大林

星期二详谈^①。

斯大林又及

^① 列宁和斯大林的面谈于1922年9月26日在列宁休养地哥尔克举行，据《列宁年谱》记载，这次会见持续了2小时40分钟，主要讨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问题。

№02415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会议记录（一）

（1922年9月23日）

出席：阿加马利—奥格雷（阿塞拜疆），莫洛托夫，米亚斯尼科夫（亚美尼亚），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霍贾耶夫·法伊祖拉（布哈拉），钦察泽（格鲁吉亚，姆季瓦尼同志因病缺席），切尔维亚科夫（白俄罗斯）。

缺席：姆季瓦尼（格鲁吉亚），拉柯夫斯基，霍贾耶夫·阿卜杜拉赫曼（花拉子模），杨松（远东共和国）。

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秘书：纳扎列强

听取：

1. 关于由钦察泽同志代替因病缺席的姆季瓦尼同志。
2. 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
3.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独立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决议。
4. 逐条讨论了斯大林同志的决议。
5. 关于下一次会议的日期。

决定：

1. 同意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钦察泽同志参加委员会并有发言权。
2. 基本上采纳了斯大林同志的决议草案（一致通过；被单独

问及的钦察泽同志弃权)。(见附件。)

3. 驳回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一致通过;被单独问及的钦察泽同志投票赞成决议)。(见附件。)

4. 第一点经采纳切尔维亚科夫同志的修正后被通过。

5. 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定于9月24日下午1时举行。

主席 莫洛托夫

秘书 纳扎列强^①

^① 纳扎列强,阿马亚克·马尔卡洛维奇(1889—1937)——1922年起在俄共(布)中央和《真理报》工作。1924年起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02416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会议记录（二）

（1922年9月24日）

出席：阿加马利—奥格雷（阿塞拜疆），姆季瓦尼（格鲁吉亚），莫洛托夫，米亚斯尼科夫（亚美尼亚），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霍贾耶夫·法伊祖拉（布哈拉），切尔维亚科夫（白俄罗斯）。

缺席：拉柯夫斯基，霍贾耶夫·阿卜杜拉赫曼（花拉子模）和杨松（远东共和国）。

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秘书：纳扎列强

听取：

1. 斯大林同志的决议第二点。
2. 斯大林同志的决议第三点。
3. 姆季瓦尼同志关于在共和国建立民族军队组织的建议。
4. 将外高加索联邦继续存在及其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问题列入委员会议事日程的提议。

5. 斯大林同志的决议第四点。

①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修正意见：“邮电人民委员部挪到委员会通过的第三点中。”

②彼得罗夫斯基^①同志的修正意见：“将粮食人民委员部挪到

① 彼得罗夫斯基，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1878～1958）——时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同志的决议草案第五点中。”

6. 斯大林同志的决议第五点。

①不加附注的第五点。

②第五点的附注。

③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对于第五点的附注的建议：授予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大赦权。

④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对获得通过的彼得罗夫同志的建议③提出的建议：将大赦权的使用限制在民事范围内。

7. 斯大林同志决议的第六点。

8. 姆季瓦尼同志的提议：请求俄共中央在各共和国最高党组织讨论委员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前，不将它们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9.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提议：允许各共和国省委会讨论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10.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声明：我请求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曾讨论它与俄罗斯联邦的相互关系一事写入记录。

11. 切尔维亚科夫同志的请求：将不属本委员会讨论范围的白俄罗斯边界问题转交中央委员会。

12. 外高加索联邦继续存在及其与俄罗斯联邦的相互关系问题。

13. 关于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决定：

1. 通过带附注的切尔维亚科夫同志的的修正本，表决情况：8票赞成，1票反对（姆季瓦尼），1票弃权（彼得罗夫斯基）。

2. 将有关财政和邮电的内容挪入第四点，按以下文本（见附

件^①) 通过第三点。

表决情况：

第1段一致通过。

第2段：6票赞成，2票反对（索柯里尼柯夫，米亚斯尼科夫），2票弃权（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

第3段：9票赞成，1票反对（姆季瓦尼，赞成采用“认为……是必要的”这一说法）。

第三点整体经表决一致通过。

3. 撤销对此问题的讨论，表决情况：8票赞成，2票反对（姆季瓦尼和阿加马利-奥格雷）。

4. 同意列入（一致通过）。

5. 按以下文本（见附件^②）通过。表决情况：9票赞成，1票反对（姆季瓦尼同志）。

①通过。表决情况：8票赞成，1票反对（姆季瓦尼），1票弃权（霍贾耶夫）。

②驳回。表决情况：3票赞成修正（彼得罗夫斯基，切尔维亚科夫，姆季瓦尼），7票反对修正。

③驳回。表决情况：3票赞成修正（彼得罗夫斯基，阿加马利-奥格雷和姆季瓦尼），7票反对。

6.

①一致通过。

②通过。表决情况：8票赞成，1票反对（姆季瓦尼），1票弃权（切尔维亚科夫）。

③通过。表决情况：6票赞成，3票反对（斯大林，莫洛托夫，

① 见本专题文件№02417。

② 见本专题文件№02417。

米亚斯尼科夫)，1票弃权（姆季瓦尼）。

④通过。表决情况：7票赞成，3票反对（彼得罗夫斯基，切尔维亚科夫，阿加马利-奥格雷）。

7. 通过。表决情况：7票赞成，1票反对（姆季瓦尼），2票弃权（彼得罗夫斯基和阿加马利-奥格雷）。

8. 驳回。表决情况：1票赞成（姆季瓦尼），9票反对。

9. 驳回。表决情况：4票赞成（彼得罗夫斯基，切尔维亚科夫，阿加马利-奥格雷，姆季瓦尼）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霍贾耶夫）。

10. 写入记录。

11. 将转交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无反对意见。）

12.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确认本委员会各项决议之前不予审理。（通过，无反对意见。）

13. 略去第六点复制多份，只发给本委员会委员，指示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做出决定以前不得传播。将委员会的决议略去需严格保密的第六点后发给委员会的委员。

主席 莫洛托夫

秘书 纳扎列江

№02417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通过的
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
决议的最终文本^①

（1922年9月24日）

1. 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利亚诸苏维埃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缔结关于它们正式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是适宜的，关于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目前只限于同它们在关税、对外贸易、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缔结条约。

附注：第1条中所提到的各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宪法中的相应修改在这个问题按苏维埃程序通过后进行。

2. 与此相应，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第1点中提到的各共和国的中央机构所必须执行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对于这些共和国的联合的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

附注：这些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3. 把第1条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外事（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军事、交通（地方交通运输除外）和邮电人民委员部同俄罗斯联邦相应机构合并，而俄罗斯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则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532页。

在各共和国驻有自己的全权代表以及规模不大的机构。

全权代表由俄罗斯各人民委员同各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协商后指派。

认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国外代表机构中有有关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是适当的。

4. 各共和国的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各人民委员部正式服从俄罗斯联邦相应人民委员部的指令。

5. 认为第 1 条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工农检查、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

附注 1：上述各共和国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机构服从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令。

附注 2：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只对民事案件有大赦权。

6. 本决定如得到俄共中央赞同，将不公布，而作为通令发给各民族共和国的党中央，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先通过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

№02418

**斯大林等人关于修改文本
致俄共（布）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

（不早于1922年9月26日）

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关系问题委员会的决议（已分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基本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只需确切说明主要涉及联盟中央机构的组成和部分涉及其职能的几点。与某些中央委员和与许多当地民族共和国人士的交谈使我们对此确信不疑。据此，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经过某些改动的，对该委员会决定更加准确的说明：^①

“1. 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缔结关于联合成‘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同时为每一个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的条约是必要的。

2. 认为‘联盟’的最高机关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代表人数按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人口分配。

3. 认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联盟人民委员会’，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4. 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和联邦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邮电人民委员

^① 以下修改后的决议文本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533页。

部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应的机构合并。而‘共和国联盟’的各人民委员部在各共和国和联邦中有自己的全权代表以及规模不大的机构。这些全权代表由‘联盟’的各人民委员同各联邦和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协商后指派。

附注：认为吸收各有关共和国代表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相应的国外代表机构是必要的。

5. 加入‘共和国联盟’的共和国和联邦的财政、粮食、国民经济、劳动和检查等人民委员部及其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中央机关服从‘共和国联盟’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指令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6. 认为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
奥尔忠尼启则
米亚斯尼科夫
莫洛托夫

№02419

加米涅夫就组建联盟的问题

致列宁^①

(不晚于1922年9月27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以为要么完全不触及“独立”问题（这看来已不可能），要么组成联盟的方式要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形式上的独立，即接近附后的框架图所示。^②

关于联盟的条约必须包含：

- (1) 有关单方面退出联盟的权利的条款；
- (2) 准确划分管辖的范围。

列·加米涅夫

① 此便函系对列宁9月26日来信的回复，列宁的信件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213~2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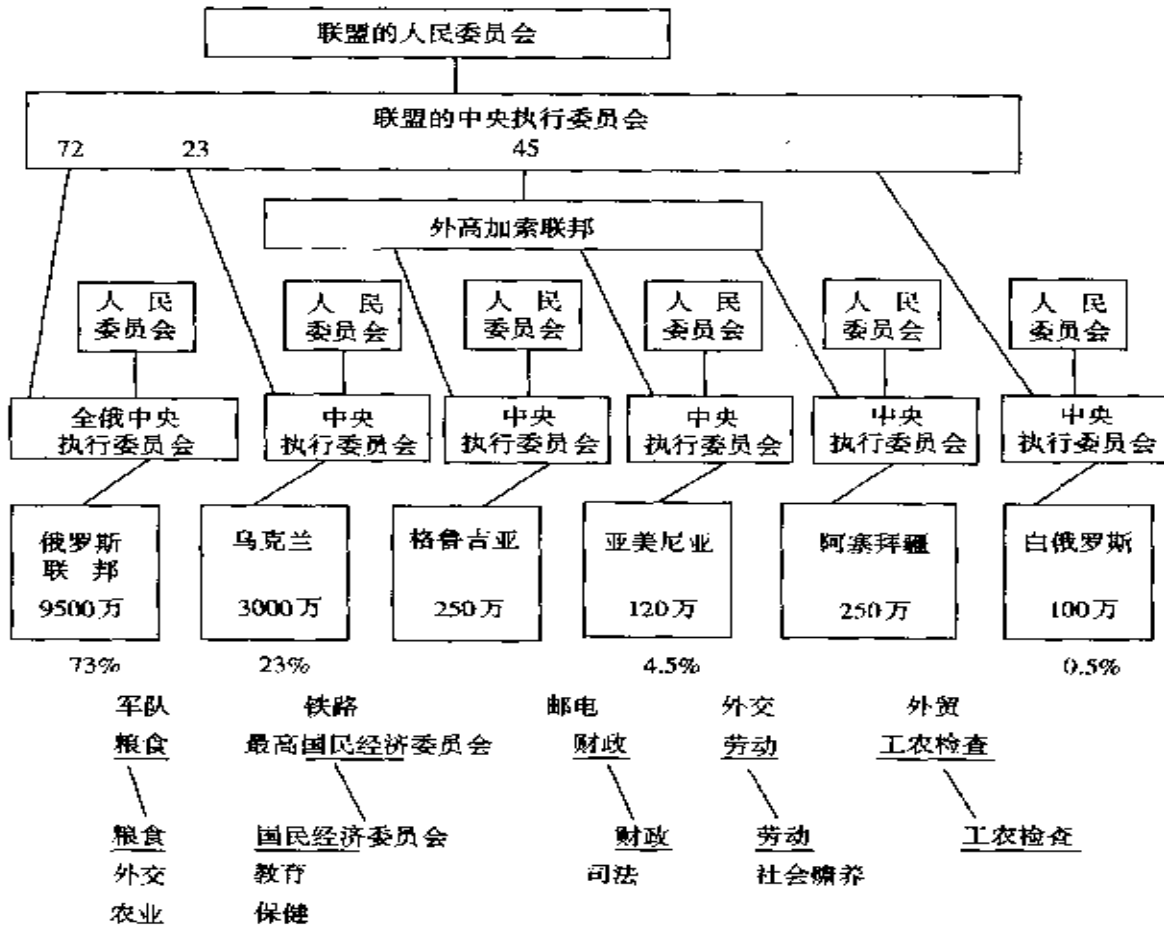
② 见本专题文件№02420。

No02420

加米涅夫给列宁的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结构的框架图

(不晚于1922年9月27日)

1. 单方面退出联盟的权利
2. 条约规定的联盟和各共和国管辖范围的划分



№01527

列宁就民族问题致加米涅夫

(1922年9月27日)

副本

1922年9月(26)27日第8477号

民族问题

抄送政治局全体委员：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茨基、莫洛托夫、加里宁同志

加米涅夫同志：您大概已从斯大林那里收到了他的委员会关于各独立共和国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决议。^①

如果没有收到，请立即从秘书那里要来看一下。我昨天同索柯里尼柯夫，今天同斯大林谈过这个问题。明天将要会见姆季瓦尼^②（被认为有“闹独立”嫌疑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

依我看，问题极端重要。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您曾经打算研究这个问题，甚至已经作过一些研究，您要好好考虑一下；季诺维也夫也一样。

^① 该决议即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

^② 姆季瓦尼，波·古·（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第10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20～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成员、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斯大林已经同意作一个让步。在第1条中把“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成“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我希望，这一让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即“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这样一来，第2条也要作修改。例如，除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外，建立一个“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

如果前者和后者每星期各开会一次（或者后者每两星期开会一次），这是不难安排的。

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

第2条第二段可以保留。不满意者（对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向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但不得因此停止执行（与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相同）。

第3条可以保留，措辞要修改：“合并为全联邦的各人民委员部，留驻莫斯科，同时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各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在加入欧洲和亚洲共和国联盟的所有共和国中均有自己的全权代表以及规模不大的机构”。

第3条第二段保留；为了更加平等似可写成：“由加入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协商”。

第三段斟酌一下；是否以“必须的”代替“适当的”？或者是否加上有条件地必须遵守规定，即至少要征求意见，只有在“特别紧急重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不征求意见就做出决定？

第4条似可也写成“按照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合

并”？

第6条似可补充：“设立纯粹协商性质的（或者只具有协商性质的）联席（或共同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附注（1）和附注（2）作相应修改。

斯大林同意推迟到我回来后再把决议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我在星期一，即10月2日回来。希望在上午能同您和李可夫会见两小时，比如说1点到2点，如果需要，可在下午，比如说5点到7点或6点到8点。

这是我的初步方案。我将根据同姆季瓦尼和其他同志的谈话作补充和修改。务请您也这样做，并给我答复。

您的 列宁

附言：副本分送政治局全体委员。

№01528

斯大林答列宁致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9月27日)

绝密

1922年9月27日

致列宁同志、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答列宁同志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信)

(1) 依我看，对委员会决议的第1条可以同意列宁同志的建议，把它表述为：“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适宜的（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暂不正式联合，因为其中前两个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第三个还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

(2) 列宁同志对第2条的修改，即除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建立一个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我看，不应接受，因为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个看来将代表“下院”，而另一个将代表“上院”，这除了制造冲突和摩擦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我建议用以下修改方案代替列宁同志的方案：“与此相应，把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成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入共和国联盟的中央机构都必须执行其决定。”我认为，按列宁同志的修改意见所作的其他任何决定都会导致一定要建立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把加入俄罗斯联邦的8个自治共和国（鞑靼

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等等)排除在外,并宣布这些自治共和国同乌克兰和其他独立共和国一起独立,导致在莫斯科建立两院(俄罗斯院和联邦院),总之,导致深刻的改建,这在当前国内外都无此必要,依我看,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不适宜,至少为时过早。

(3) 列宁同志对第3条小修改纯属措辞上的修改。

(4) 依我看,对第4条,列宁同志要求把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入联邦的各人民委员部有点“操之过急”。毫无疑问这种“操之过急”将“助长独立分子”而有损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

(5) 依我看,列宁同志对第5条的修改是多余的。

约·斯大林

№02422

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交换的便条

（1922年9月28日）

加米涅夫：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建议我见见格鲁吉亚人。他甚至要拒绝昨天的修正意见。玛丽亚·伊里尼奇娜^①来过电话。

斯大林：我认为，反对伊里奇需要坚定性。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影响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而后者影响伊里奇，试问，这就是其中的“独立性”吗？

加米涅夫：我想，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抗拒会更坏。

斯大林：我不知道。让他瞧着办吧。

^①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是列宁的妹妹。

№02423

拉柯夫斯基就斯大林草案

致斯大林

(1922年9月28日)

绝密

致俄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抄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列别德同志

首先我要指出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草案中第2、3、4和5点内的下列含糊和矛盾处：

关于第2点。既然说到乌克兰，则俄罗斯联邦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现在就已经在所有涉及联合委员部的问题上，扩展到乌克兰全部相应的中央机关。如果需要理解为上述机构的职权范围将来也要扩展到未联合的委员部，那么，就不能像第5点规定的那样认为它们是独立的。

关于第3点。至于乌克兰，所列举的各委员部，如外贸、军事、铁道、财政和邮政，现在就已和俄罗斯联邦的这样一些委员部联合。未联合的只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这个委员部我将单独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出于什么目的在第3点中谈论联合的必要性时仅仅提到已经联合的人民委员部？这里是不是考虑到高加索共和国，那里似乎没有这样的联合？或者，斯大林同志认为现有的联合形式不能令人满意而希望有一种更加紧密的联合形式？这一点仍然含糊不清。

还有一点也不清楚：外交人民委员部应以什么形式联合。各个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可以存在，并以目前的形式代表各个共和国行事，然而形式上在苏维埃系统内服从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它的指示和命令。可以按如下的含义来理解这种联合：撤销人民委员部并将它们缩小为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办处，这就像克里木自治共和国所属塞瓦斯托波尔的情况。按照契切林^①春天去热那亚之前提出的方案（此方案当时被推翻），各个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保留下来，然而正如契切林所写明的，承认它们作为被动的和主动的驻外代表，有权“处理地方性质的外交事务”，而进行谈判和签订条约等其他权利则留给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

第4点中说：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诸人民委员部必须正式服从俄罗斯联邦相应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谈到乌克兰还是这句话，劳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是已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因此在这里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目前的联合形式是否要作某些改变？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形式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服从俄罗斯联邦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问题是：如果它将正式服从俄罗斯粮食人民委员部，为什么它要有别于其他联合人民委员部的局而叫做“人民委员部”。

草案谈到独立共和国的义务，谈到对中央指示的服从，但对这些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及所属人民委员部和联合人民委员部的局所享有的权利却只字不提。实践证明，某些独立共和国的中央机构，对于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一无所知，他们常有被指控的危险：或被说成没有主动性，或被说成有分离主义性质的行为。

^① 契切林，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1872～1936）——181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问题的实质

必须使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这种必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在有利的论据当中，让我指出以下几点：第一，新经济政策。不仅在周围环境，而且在国家机关和国营经济联合体中，新经济政策都解放了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他们表现出一般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贪求钱财和渴望夺取，不区分那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在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之间，明显地表现出为夺取企业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在全联邦劳动群众中间正确地分配国家所有的财富，必须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个论据是国际形势。在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领导的统一。

第三个论据，是必须将我们的国家形式建设进行到底，并最后结束在这个意义上不断重复的尝试，即制订常被取消和常被修改的短期条约和短期规章。

所有这些绝对是无争议的。然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草案，也是这种反复尝试之一，尽管其说法有它的坚定性，但近期内还需作新的修改。

不是清晰而明确地提出有关我们国家（生活）形式和有关我们的中央机构构成的问题以求将已开始的建设进行到底，不是创造一个能够保证所有人具有同等的革命建设的条件，能够在平等基础上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真正的联邦，这个草案完全不顾这一任务。这个草案忽略了一点，即苏维埃联邦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在这方面决议草案是我党整个民族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的贯彻实行即正式取消独立共和国将成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联邦

内部种种困难的根源。它贬低了无产阶级俄国的革命解放作用。新政策在国内所有边疆地区都会被认为是转移到民族关系范围内的新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共和国承受着极度贫困的时刻，所有的民族种族感情会更加激烈，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支配。

新政策的实行是对共和国经济核算恢复计划的打击。而且现在独立共和国的经济首创精神已变得非常之小。在他们缺乏财政手段和支配地方财富的权利的情况下，不能好好地为提高地方生产力而工作。其首创精神的变小作为实行该草案的结果，将进一步减弱其经济作用，而所有这些“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只不过是它们所管辖的各个省和俄罗斯中央机构之间的有害的障碍。这些“人民委员会”无力帮助自己属下的各省，其本身的存在只会妨碍中央机构给予这些省以应有的关注。在乌克兰，那些忍饥挨饿的省份直到最近还未被承认是饥荒区，那里与饥饿作斗争所呈现的图景，在其他活动领域也将重复出现。

在国外，这一决议的实行，将加强资产阶级阵营和妥协主义阵营中我们的敌人的地位。独立共和国的形式使我们有可能对所有的边疆地区乃至国外，最大限度地产生革命的影响。通过独立的阿塞拜疆、布哈拉、希瓦和其他共和国，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东方最大限度地进行和平的革命渗透。通过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加里西亚^①、布科维纳^②、比萨拉比亚^③进行同样的革命渗透。否则，我们将在没有任何重大必要性的情况下使自己失去这一武器，反而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一种同我们斗争并加

① 当时部分属西乌克兰和部分属波兰地区的历史名称。

② 当时部分属乌克兰和部分属罗马尼亚地区的历史名称。

③ 当时属罗马尼亚的德涅斯特河及普特鲁河之间地区的历史名称。

强其民族政策的新武器。对于乌克兰，波兰扮演了得到里加条约^①承认的乌克兰独立的捍卫者角色。

其实，在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困难中，没有哪种困难不能通过其宪法的相应改动来消除。作为例证，可以指出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即各共和国自然资源的利用。对最主要的资源可以宣布共管，即成为苏维埃联盟的共同财产，同时承认俄罗斯联邦的中央联邦经济机构有权支配这些财富。

这里谈的是局部问题的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尚未触及，那就是建立一种严格的中央集权，然而不是联邦性质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要能够正确地保护各共和国的利益，使它们也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建 议

我建议委员会不要做出最后的结论。应该按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重新提出问题并予以充分解决。

克·拉柯夫斯基

^① 1921年3月18日苏俄与波兰签订的结束1920年苏波战争的和约。该条约确定了苏波两国边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并决定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02424

拉柯夫斯基关于保持乌克兰独立 致曼努伊尔斯基的信

(1922年9月29日)

尊敬的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

收到您的电报，获悉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于14日召开。在此之前我将到达那里。俄共中央全会的会议我不能前往参加。我想利用剩下的十天休假写书，现在正紧张地写这本书。但我认为，对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表明反对态度是自己的党员义务，因为我发现它对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所有边疆地区的地位是有害的。在给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其复印件给您寄上（也请您将给斯大林同志的一份寄给他^①）。我不知道，此决议以后以什么方式讨论通过，是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在10月5日的全会上。但如果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同意我的观点，那么最好是让已去莫斯科的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和伏龙芝^②同志坚持我们的观点。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主要地将会受害于其他独立共和国的不明智和偏向。事实上保持乌克兰的独立对于我们的国外革命影响来说，有着最重要的意义。波兰、加里西亚、喀尔巴阡罗斯、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近千

^① 见本专题文件№02423。

^② 伏龙芝，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1885—1925）——内战时期曾担任东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司令，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万的乌克兰人倾向于并将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苏维埃乌克兰。

我不知道决议的执笔人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这一点。

致以同志的敬礼

克·拉柯夫斯基

№02425

**李可夫就与中央集权做斗争问题
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

（不早于1922年9月28日）

鉴于过度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助长了独立和分离倾向，建议将民族问题和组建民族共和国联盟的指示，与关于同过度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做斗争及扩大州和省的机构自治权的问题联系起来。

李可夫^①

^①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1881～1938）——时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02426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

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10月3日）

出席：政治局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伏龙芝同志、乌加罗夫同志、科肖尔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

中央委员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波利科夫同志、克利缅科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波科同志。

《共产党人》报编辑舒宾同志。

听取：

2. 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报告（彼得罗夫斯基同志）。

决定：

2. ①绝对赞成最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承认维持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独立和以伏龙芝同志委员会^①通过的有保留条件的方式完成相互关系手续的必要性。对独立共和国的中央集权领导可以通过依据党的路线作相应指示充分得以实现。

②然而，如果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加入俄罗斯联邦，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坚持保留

① 系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为调整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的相互关系而于1922年5月设立的以伏龙芝为首的委员会。

乌克兰政治独立的形式特征，而应在实际可行的基础上确定关系。

③向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提出由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代表组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建议。代表由全联邦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各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不过进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共和国代表人数应有正式规定，而且应在莫斯科设立常驻主席团代表处。

④责成担任俄共中央委员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坚持本决议。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科肖尔

№02427

俄共（布）中央全会第七次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10月6日）

1. 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同志）。

①通过委员会成员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米亚斯尼科夫和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决议草案，将第4点的附注中“必要”一词改为“适宜”，修改稿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②为在此指示基础上制订苏维埃宪法草案并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预先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组成由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契切林、加里宁等同志和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的代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

委托专门委员会进行准备，并将有关的议案交由各独立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中央委员会书记

№0779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1月21日）

出席：斯大林、契切林、加里宁、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加米涅夫等同志。

主席——斯大林同志。

秘书——纳扎列强同志。

听取：关于将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共和国联盟问题的实施程序。

决定：

1. 应该制定出：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②关于共和国联盟宪法的文本。

2. 应该向各独立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在行将举行的外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共和国联盟宪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对代表这些共和国赴莫斯科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特别全权代表团的指示以缔结条约。

3. 应该同时向各民族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必须预作筹备，以便委托各全权代表团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

4. 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外高加索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中，应预作说明：在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在莫斯科缔结的条约应经各有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

5. 应该向外高加索边疆区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必须按国家的程序，在行将举行的外高加索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建立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作为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从而把外高加索联邦的形式固定下来。

附注：同时应把纳希契凡^①的地位确定下来。

6. 涉及联盟人民委员会委员办事处的地位，以及特派员的权力等问题，应该特别看待共和国联盟有关宪法的一系列问题，这里指的是：这些问题将在委员会予以特别的审理，而随后将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予以妥办。

听取了有关分委员会的情况。

做出决议：①考虑到委员会讨论中交换的意见，成立一个分委员会，以便在一周时间里，为将成为共和国联盟成员的各独立共和国和各联邦的全权代表团做出一份指示草案（宪法的基础）。

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斯大林、契切林、库尔斯基、皮达可夫、加里宁等同志，中途由萨普隆诺夫同志代替加里宁。

②同时委托该分委员会在两周时间里制定出关于各共和国联合条约文本的草案（宪法草案）。

关于对共和国联盟宪法各要点问题进行表决的基本情况

1. 关于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联盟最高机构的问题。

（一致通过）

2. 关于在保证少数利益的情况下，苏维埃代表大会和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方面的比例代表制问题。

（一致通过）

^① 指纳希契凡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3. 关于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设置（根据加入联盟的数目而定）及他们轮流担任主席的问题。

（一致通过）

4. 关于将各自治人民委员部（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社会救济等人民委员部）改变成联合的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赞成者：契切林、加米涅夫。

反对者：斯大林、加里宁、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等同志。

（建议未被接受）

5. 关于在一般情况下，由一些人同时兼任联盟和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及联邦的领导机关的最重要职务是不合适的。

（一致通过）

6. 关于修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第五点的问题，实质上使一些人民委员部，如财政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共和国的检查机关不隶属于共和国联盟有关的各人民委员部。

（拉柯夫斯基同志的建议被大家拒绝）

7. 关于必须建立隶属于联盟政府之下的最高司法监督机构和最高法院法规的问题。

（一致通过）

主席 约·斯大林

秘书 纳扎列江

№07798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1月25日）

出席：分委员会成员加里宁、库尔斯基、皮达可夫、斯大林、契切林和萨普龙诺夫等同志。

主席：契切林同志。

秘书：纳扎列强同志。

听取：

一、关于讨论契切林和库尔斯基同志提出的联盟宪法提纲草案的程序问题。

二、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结构。

三、关于主席团和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问题。

四、关于隶属于联盟人民委员会之下的各共和国特派员的问题。

五、关于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六、最高法院的权限。

七、草案的逐条讨论。

1. 第一条。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以及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在保证少数人权利的条件下，缔约的各共和国，按人口比例都有代表参加。

2. 第二条。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由缔约的各共和国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是在缔约的各共和

国代表团代表提出名单的基础上，由联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3. 第三条。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每年开会不少于三次；会议应根据每一个缔约的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

4. 第四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最高权力机构。

5. 第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有 4 名主席，他们由 4 个缔约的共和国代表的全体人员中选举产生，每个共和国产生一名代表，他们每人轮流在一次会议期间担任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由 15 人组成，他们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一年最后一次例会上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他们中间有 4 人担任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每一个共和国有一名代表，根据该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在联盟人民委员会，并在联合人民委员部担任该国的特派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一年最后一次例会上选举产生，任期一年。联盟人民委员会的组成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由选举产生的诸如外交、陆海军、外贸、交通、邮电人民委员，其次还有财政金融、内务（国家政治保安局方面）、粮食、劳动、工农检查机构，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方面的人民委员，还有联盟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联盟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议对全联盟来讲，都必须遵照执行，并由联盟人民委员会直接下达，在所有地区予以执行。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以上未予列举的各有关部门必须主持的一些法令草案，须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和隶属于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共和国特派员共同签名，而后提交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6. 第六条。以下各项属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1) 对联盟的宪法或代替宪法的联盟条约予以批准、修改和补充；

(2) 在国际法律关系方面代表联盟；

(3) 接受外国大使和公使的就任国书和离任国书，派遣和召回联盟的常驻和特派全权代表，派遣和召回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联盟的代表，这些会议通常解决一些被认为是与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的事情有关的问题。这些活动都是由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联盟的名义予以进行的；

(4) 变更修改联盟的对外边界，同时变更修改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

(5) 接受一些新的共和国加入联盟及承认其退出；

(6) 宣布战争及缔结和约；

(7) 订立向外借款契约；

(8) 建立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同时制定民法和刑法，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最高法院和司法监督机构。联盟的司法制度应该预先制定出由最高审判机构来解决关于对宪法和联盟法令的解释有争议的各种办法；

(9) 任命和罢免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联盟人民委员部委员，以及任命和罢免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委员；

(10) 批准国际间的各种条约；

(11) 批准有关联盟的国籍，以及各种外国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12) 批准普遍的和个别的大赦法令；

(13) 确定联盟武装力量的基本原则，任命联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以及联盟整个武装力量的总司令；

(14) 建立货币制度，同时建立全联盟地方性的税务；

(15) 建立度量衡制度；

(16) 建立联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制定总的计划；

(17) 制定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以及联盟全境内矿藏利用的总原则；

(18) 制定劳动条件的总原则；

(19) 确定和变更联盟的旗帜、盟徽和国家的印章；

(20) 废除加入联盟的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做出的的破坏这一条约的各项决议。

7. 第七条。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参加联盟的其他成员，在他们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对其所属人民委员会组成中的以下人民委员的职位应予以撤销：外交、外贸、交通、邮电，以及陆海军等。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中，联盟的人民委员依法取得表决权。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及几位副主席，还有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及几位副主席，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才整个地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的职位合并。

8. 第八条。各共和国的陆海军管理局，以及各地区的交通、邮电管理局，隶属于联盟相应的行政机构管辖。

9. 第九条。在组织联盟的对外代表团时（外交代表团、领事代表团和商务代表处），必须注意到，在某一条款中，应根据当地政治或经济的条件，把加入联盟的个共和国代表列入联盟代表团的成员之中。这些条款的确定工作，由联盟的人民委员会处理。在外交机关中，该代表应具有外交素质。

10. 第十条。盟旗、盟徽和国家印章。后者由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保存。

11. 第十一条。选择莫斯科作为联盟的首都（直到调换其他城市为止）。

12. 第十二条。为联盟的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国籍。

决定：

一、采纳契切林同志的第二个草案作为基础。在逐条宣读草案之前，特别挑出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事先讨论：

1. 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结构；
2. 关于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问题；
3. 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
4. 关于隶属于联盟人民委员会之下的共和国特派员的问题。
5. 关于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6. 最高法院的权限。

二、采纳草案的措词作为基础。

三、采纳草案的措词作为基础。

四、不必建立特派员制度。

五、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只要隶属于总的联盟之下即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

表决：赞成的有3票（加里宁、契切林、皮达可夫同志）。反对的有2票（斯大林、库尔斯基同志——赞成完全撤销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六、应使全会委员会决议的措词仍然有效（记录第一号，主要表决的第七条）。

七、1. 应以下列内容对草案加以补充，且应将此作为第一条：

“各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组成一个联盟国家，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这些共和国中的每个共和国仍然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一致通过）

2. 第二条^① 拟予通过，但在草案的措词方面，以“加入联盟的”这一词组代替“缔约的”一词。

3. 第三条^② 拟予通过，但在草案的措词方面，以“加入联盟

① 指原第一条。

② 指原第二条。

的”这一词组代替“缔约的”一词。

4. 第四条^① 以下措词予以通过：

“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不少于三次；同时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加入共和国联盟的一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或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主席团的决议召开会议。”

5. 第五条^② 不加修改予以通过。

6. 把后一项^③ 作为单独的（第七）条列出，到关于联盟人民委员会这一问题为止，用第六条^④ 予以通过。第六条用以下措词予以通过：“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从 15 个人中选举主席团”。

7. 第七条用以下措词予以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联盟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被选举产生的任期里，其人员组成有主席、副主席和各人民委员：外交、陆海军、外贸、交通、邮电等。联盟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议对全联盟来讲，都必须遵照执行，并由联盟人民委员会直接下达，在所有地区予以执行。”

8. 把分条（1）^⑤ 作为单独的（第八）条列出，原第六条用第九条予以通过。

第八条用以下措词予以通过：“对联盟的宪法或是代替该宪法的联盟条约加以批准、修改和补充，这是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特殊权力。”

9. 第九条用以下措词予以通过。

“以下各项属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1）在国际法律关系方面代表联盟；

① 指原第二条。

② 指原第四条。

③ 指原第五条后半部分。

④ 指原第五条。

⑤ 指原第六条（1）。

(2) 变更修改联盟的对外边界，以及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

(3) 吸收新的共和国加入联盟；

(4) 宣布战争及缔结和约；

(5) 订立向外借款契约；

(6) 制定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原则，同时制定联盟的民法和刑法；

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最高法院和司法监督机构；

(7) 批准国际间的各种条约；

(8) 批准有关联盟的国籍，以及各种外国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9) 制定普遍大赦的法律制度；

(10) 制定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组织原则；

(11) 建立外贸制度；

(12) 建立货币制度，以及全联盟的和地方性的税务制度；

(13) 建立度量衡制度；

(14) 建立联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制定总的计划；

(15) 制定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以及联盟全境内矿藏利用的总原则；

(16) 制定有关劳动的各项基本法律；

(17) 确定和变更联盟的旗帜、盟徽以及国家印章；

(18) 废除加入共和国联盟的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做出的破坏这一条约的各项决议。

8. ① 用第十条以下列措词予以通过②：“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参加联盟的其他成员，在他们修改宪法

① 档案原件序号即如此排列。下同。

② 指原第七条。

的过程中，其所属人民委员会组成中的以下各人民委员部予以撤销：外交、外贸、交通、邮电以及陆海军”。

9. 应予删去^①。

10. 应予删去^②。用第十一条下列内容予以通过：

“各人民委员部：包括粮食、劳动、工农检查机关、财政、内务（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及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部，在其活动中，都隶属于共和国联盟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管辖。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其余一些人民委员部，诸如：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部，都隶属于这些共和国相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10. 原第十条用第十二条以如下的措词予以通过：

“共和国联盟有自己的旗帜、盟徽和国家印章”。

11. 原第十一条放在最后一条（第十四条），并用下列措词予以通过：

“选定莫斯科市作为联盟的首都”。

12. 用第十三条以如下的措词予以通过^③：

“对于联盟的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国籍”。

① 指原第八条。

② 指原第九条。

③ 指原第十二条。

№0779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的 基本条款

(1922年11月2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的基本条款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员会 1922年11月25日通过

1. 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组成一个联盟国家，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这些共和国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2. 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以及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在保证少数人权利的条件下，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按人口比例都有代表参加。

3. 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是在加入共和国联盟的各代表团提出名单的基础上，由联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4. 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不少于三次，同时，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加入共和国联盟的一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要求，或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主席团的决议召开会议。

5.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

6. 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由十五人组成的主席团。按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数目确定其中出任主席职务的人数。

7.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选出的任期内，其组成人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几名副主席和人民委员，包括：外交、陆海军、外贸、交通、邮电等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议是全联盟都必须遵照执行的，同时由苏联人民委员会直接下达，在所有地区予以执行。

8. 对联盟的宪法或代替该宪法的联盟条约加以批准、修改和补充，这是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特殊权力。

9. 以下各项属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1) 在国际法律关系方面代表联盟；

(2) 变更修改联盟的对外边界，以及加入共和国联盟的成员相互间的边界；

(3) 吸收新的共和国加入联盟；

(4) 宣布战争及缔结和约；

(5) 订立向外借款契约；

(6) 制定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原则，同时制定联盟的民法和刑法。

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最高法院和司法监督机构。

(7) 批准国际间的各种条约；

(8) 批准有关联盟的国籍，以及各种外国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9) 制定普遍大赦的法律制度；

(10) 制定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组织原则；

(11) 建立外贸制度；

- (12) 建立货币制度，同时建立全联盟和地方性的税务制度；
- (13) 建立度量衡制度；
- (14) 建立联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制定总的计划；
- (15) 制定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以及联盟全境内利用矿藏的总原则；
- (16) 制定有关劳动的各项基本法规；
- (17) 确定联盟的旗帜、盟徽和国家印章；
- (18) 废除加入共和国联盟的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做出的破坏这一条约的各项决议。

10. 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参加联盟的其他成员，在他们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其所属人民委员会组成中的以下人民委员的职位予以撤销：外交、外贸、交通、邮电以及陆海军。

11. 各人民委员部，包括：粮食、劳动、工农检查机构、财政、内务（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及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部，在其活动中，都隶属于共和国联盟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管辖。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其他一些人民委员部，诸如，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部，都隶属于这些共和国相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12. 共和国联盟有自己的旗帜、盟徽和国家印章。

13. 为联盟的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国籍。

14. 选定莫斯科市作为联盟的首都。

(抄录无误) 分委员会秘书 纳扎列强

№07800

皮达可夫就组建苏联的机构问题

致斯大林

(1922年11月27日)

斯大林同志：

我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分委员会制定联盟条约总原则的会议之后，此时我在尽力设想，如果清晰地分析一下，这究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非常不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我的结论告诉您的缘故。

1. 结果是得到一个十分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建立起新的一级机关，根据我们的实践看，这样一来，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正在扩大，即使不是这样，因循拖沓也是够多的。譬如说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联盟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进行的争论，例如有关运送种子或其他东西的问题。由谁来对这一争论做出明确的判断呢？照我们刻板的方式，农业人民委员部去找自己的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而人民委员会要有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在场的情况下来讨论这一问题。比如说，人民委员会解决这一问题希望有利于农业人民委员部，可是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却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于是，特派员和人民委员会之间的这一争论就只好提交苏联人民委员会来审处了，不言而喻，争论在这里终于是解决了，但是没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参加，甚至连形式上也没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

参加的份，因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不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成员。

或者，我们就假定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之间发生了争讼。既然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在苏联，存在着两个人民委员部。首先问题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加以审核，比如说，做出了不利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这时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便跑到苏联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了，从那里得到了别执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的指示，这样一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又跑到苏联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去了，为的是对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行为诉说怨气。问题转到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于是问题在那里才最终得到解决。

这种事情是十分清楚易懂的，在我们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下，问题往往要弄到最高一级才行，可见虚费时日无聊的麻烦事将会多么严重。

2. 国家机关的扩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重复设置）。

3. 我们未必能建立一个既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又是苏联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因为在我们缺乏文化力量的条件下，哪里都很难找到人才。由此得出的结果或是完全兼职的办法，或是一个不中用的委员会。

4. 如果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规定一种解决的办法，即人民委员部遇事都各自回避，而直接向苏联各机关提出请求，这样一来，必将导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机关

的衰败。如果采取坚决的方针，遵守由主管各级办理，那么将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因循拖宕的现象。

还可以举出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来，而充分地引证这些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绝对不能以行政实用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老是停留在解决政治问题的圈子里。

我不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只是觉得，在进行预定的改革之前，应从正确地建立机构的观点出发对改革进行仔细的研究，为此应由有实践经验的，有组织能力的一些人组成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冒着给国家机关的工作带来极大混乱的危险，随后我们又将匆匆忙忙，缺乏周密考虑而又无系统计划地尽力去排除这种混乱。

格·皮达可夫^①

^①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奥尼多维奇（1890～1937）——时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0780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1月28日）

出席者：斯大林、加米涅夫、皮达可夫、马努伊尔斯基、切尔维亚科夫、古谢伊诺夫、茨哈卡娅、捷尔—加勃里耶梁等同志，还有萨普隆诺夫和库尔斯基同志。

主席：斯大林同志

秘书：纳扎列强同志

1. 听取：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条款的草案，这一草案是由分委员会提出的。

2. 决定：以最后确定的形式通过下列条文（见附件）^①

3. 主要表决：

（1）加米涅夫同志建议，将分委员会提出的草案第9条作为第2条，用这样的词句予以表达：“归共和国联盟管辖（一些分项列于后）”。

（赞成者：加米涅夫和古谢伊诺夫同志。反对者：委员会的其他委员。）

（2）加米涅夫建议保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名称，作为联盟国家的名称，删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

（赞成者：加米涅夫、萨普隆诺夫同志。反对者：委员会的其

^① 见本专题文件№07799。

他委员。建议未被接受。)

(3) 捷尔-加勃里耶梁同志建议，在缔约的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中撤销以下各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赞成者：捷尔-加勃里耶梁同志。反对者：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建议未被接受。)

主席 斯大林

秘书 纳扎列强

№07802

加米涅夫关于苏联基本章程草案

致列宁的信

(不早于1922年11月28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现给您寄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基本章程的草案^①。请您注意引起我疑问的以下各条：首先，（在）这些基本章程中，共和国联盟的权限与各共和国的权限，相互之间没有划分清楚。替而代之以的只是列举了一些归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的问题。照我看，这在逻辑上和理论上都是不正确的。

我建议，在建立联盟国家的第一条之后，接着就把现在的第十条作为第二条，其意思用如下表述：“下列各问题归共和国联盟管辖：”，联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盟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的人民委员会等各机关之间职权的分配是属于完全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一建议没有被委员会接受。

我的第二个疑问涉及到下面一个问题。根据委员会的草案，结果我们是搞成了三种类别的委员部：一种是（例如军事人民委员部）只在联盟的人民委员会组成中才有，另一种是（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存在于联盟人民委员会和各民族人民委员会之中，第三种是（如司法人民委员部）只在各民族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中才有。体系是很复杂的，而导致的结果是：联盟既没有联盟的司法人民委

^① 见本专题文件№07803。

员，又没有联盟的教育人民委员，也没有联盟的农业人民委员。这是否好呢，实际上是否可以容许呢？体系简化一点不好吗？在体系简化的条件下，无论是联盟的人民委员会，还是民族的人民委员会，把所有人民委员都包括进去就好了，但军事人民委员和外交人民委员除外，因为他们只列入联盟人民委员会。

我本人并不相信这一体系的优越性，不过但愿能引起您对此予以关注。

№0780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

（1922年11月3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的基本条款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

1. 各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组成联盟国家，名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这些共和国中的每个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2. 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以及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在保证少数人权利的条件下，缔约的各共和国按人口比例都有代表参加。

3. 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并从缔约的各共和国代表中选举产生“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4. “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不少于三次，同时，它根据缔约各共和国中一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或根据“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而召开会议。

5.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6. “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15人组成的主席团，按缔约

的各共和国的数目确定其中出任主席职务的人数。“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主席轮流主持。

7. 联盟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它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在它的任期内，其组成人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几名副主席和人民委员，包括：外交、陆海军、外贸、交通、邮电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等部的人民委员。联盟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和决议对全“联盟”来说都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同时由联盟人民委员会直接下达，在“联盟”全境内予以执行。

8. 为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建立革命的法制，并把缔约各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直属于“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具有最高司法监督职能的最高法院，而在直接隶属于“联盟人民委员会”之下则建立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联合机关，其主席作为“联盟人民委员会”成员之一，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其中“联盟”各成员国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仍保留在相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中。

9. 批准、修改和补充联盟的宪法或代替该宪法的“联盟条约”，属“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特殊权力。

10. 以下各项属“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 (1) 在国际法律关系方面代表联盟。
- (2) 变更修改“联盟”外部边界。
- (3) 签订关于吸收新的共和国成为“联盟”成员的条约。
- (4) 宣布战争及缔结和约。
- (5) 订立对外借债契约以及批准地方性的外债。
- (6) 批准国际间的各种条约。
- (7) 建立外贸制度。

(8) 制定“联盟”整个国民经济的原则和总计划，以及批准租赁合同。

(9) 制定“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组织原则。

(10) 批准苏联统一的国家预算，制定货币制度以及全联盟和地方的征税制度，同时成立全联盟的国家银行。

(11) 制定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以及利用“联盟”全境内的各种矿藏的总原则。

(12) 制定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原则，并制定联盟的民法和刑法。

(13) 制定有关劳动的基本法律。

(14) 制定普遍大赦的法律制度。

(15) 建立度量衡制度。

(16) 建立全联盟的统计组织。

(17) 制定有关全联盟的国籍，以及外国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18) 废除加入共和国“联盟”的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做出的破坏这一条约的各项决议。

11. 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联盟”的其他成员，在其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其人民委员会组成中的以下人民委员的职位应予撤销：外交、外贸、交通、邮电以及陆海军。

12. 其余一些人民委员部，诸如：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社会保障等人民委员部都列入缔约各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其中前五个人民委员部，在其活动中，必须遵循“联盟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指示。

13. “共和国联盟”有自己的旗帜，盟徽和国家印章。

14. 为“联盟”的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国籍。

15. 选定莫斯科市为“联盟”的首都。

16. 缔约各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责任按照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对各自的宪法作相应的修改。

№07804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2月5日）

出席：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加米涅夫、古谢伊诺夫、捷尔-加勃里耶梁和帕列钦等同志。

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叶努基泽和萨普龙诺夫同志。

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

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李维诺夫同志。

主席——斯大林同志。

秘书——纳扎列强同志。

1. 听取：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议日期。

决定：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安排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工作结束的时候召开是适宜的，因为：

（1）注意到早先做出的由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关于共和国联盟条约的指示；

（2）建议缔约各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预先规定的选举名额，选举出席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授权他们不仅缔结共和国联盟的条约，同时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一道共同宣布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选出所有的中央机构。

（一致同意）

2. 听取：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标准。

决定：委托由弗拉基米尔斯基、叶努基泽、萨普龙诺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的小组，在一周时间里详细订出各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准则。

由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召集会议。

3. 听取：关于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向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申诉的权利。

决定：通过以下决议作为对宪法条文起草委员会的指示：

(1) 缔约各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对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向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申诉，但无权终止执行该决定；

(2) 联盟人民委员的指示，只有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主席团和联盟人民委员会才能予以废止；

(3) 联盟人民委员的指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在该指示与人民委员会或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决议明显抵触的情况下，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缔约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并由他们负责，才能予以中止执行，同时，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应立即将中止该指示的情况向联盟人民委员会和联盟相应的人民委员通报。

4. 听取：关于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及其会期问题。

决定：规定出席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为 300 名委员和 10 名候补委员。

委托同一个委员会编制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在各共和国之间的分配方案。

把会期问题公开。

5. 听取：关于联盟的统一预算案。

决定：委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十五天时间里深入研究，详细

订出共和国联盟以及列入其成员之中的共和国的预算案。

6. 听取：成立三个分委员会以制定：

- (1) 联盟的宪法条文并附宣言；
- (2) 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法；
- (3) 联盟人民委员部的章程。

决定：

(1) 委托由加米涅夫、斯大林、库尔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叶努基泽和萨普龙诺夫等同志组成分委员会，在十天时间里制定出共和国联盟的宪法条文并附宣言。

由斯大林同志负责召集。

(2) 问题 (2) 和 (3) 应予延缓。

主席 斯大林

秘书 纳扎列强

№07805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员会 通过的苏联宪法草案

（1922年12月5~16日之间）

绝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组成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2. 加入共和国联盟的每一个国家（见第1条所述），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3. 联盟的最高权力属于联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属于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4. 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以下代表组成：各市的苏维埃代表，按每25000名选民产生一名代表计算，以及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苏维埃代表，根据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人口比例，在保证少数人权利的前提下，按每125000名居民产生一名代表计算。

5. 参加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各省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或在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

6. 例行的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其本身的倡

议，或根据不少于两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要求召开。

7. 苏维埃代表大会按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在保障少数权利的条件下，选举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为300名。

8. 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或根据加入联盟的一个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召开会议，每年不少于三次。

9. 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主席团，主席团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

10. 主席团由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包括几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加入联盟的每个共和国都有一名出任。

11. 对联盟的宪法或代替该宪法的联盟的条约予以批准、修改和补充，由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特别处理。

12. 以下各项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 (1) 在国际法律关系方面代表联盟，
- (2) 修改联盟外部边界，
- (3) 签订关于吸收新的共和国加入联盟的条约，
- (4) 宣布战争及缔结和约，
- (5) 订立对外借款契约和批准地方性的外债，
- (6) 批准国际条约，
- (7) 制定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制度，
- (8) 制定联盟整个国民经济的原则和总计划，同时批准租赁合同，
- (9) 调整交通、邮政、电报、电话事业，
- (10) 调整国内商业，
- (11) 制定联盟武装力量的组织原则，

(12) 批准联盟统一的国家预算，制定货币制度及全联盟和地方的税收制度，同时成立国家银行。

(13) 制定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以及利用联盟全境内矿藏和森林的总原则，

(14) 制定有关迁移问题的全联盟总的法律，

(15) 制定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原则，以及联盟的民法和刑法，

(16) 制定关于劳动的基本法律，

(17) 制定普遍大赦的法律制度，

(18) 建立度量衡制度，

(19) 建立全联盟的统计组织，

(20) 制定有关全联盟的国籍，以及外国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21) 废除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做出的破坏联盟宪法的各项决议。

1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联盟的人民委员会）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它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在其任期内的人员组成如下：

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

几位副主席，

外交人民委员，

陆海军人民委员，

外贸人民委员，

邮电人民委员，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劳动人民委员，

粮食人民委员，

财政人民委员。

14. 为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建立革命的法制，并把缔约各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力量联合起来，在隶属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之下，建立一个具有最高监督职能的最高法院，而在隶属于人民委员会之下，则建立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联合机关，其主席列入人民委员会成员之中，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其中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仍保留在相应的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中。

15. 联盟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议，是全联盟都必须遵照执行的，同时由苏联人民委员会直接下达，在联盟全境内予以执行。

16. 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对人民委员会的各种决定，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但无权终止执行该决定。

17. 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和指示，只有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才可予以废止，而联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可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予以废止。

18. 联盟人民委员的指示，对所有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来说，都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并通过联盟的一些机构和一些负责人，或通过共和国的一些机构予以实施。

19. 联盟人民委员的指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在该指示与人民委员会或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决议明显抵触的情况下，根据加入联盟的某一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的决议并由其负责，该指示才准许予以中止执行，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应将中止执行该指示的情况，立即向联盟人民委员会和相应的联盟人民委员通报。

20. 以下各人民委员部列入联盟各个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之中：

- (1) 粮食人民委员部，
- (2) 劳动人民委员部，
- (3) 财政人民委员部，
- (4)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 (5) 农业人民委员部，
- (6) 内务人民委员部，
- (7) 司法人民委员部，
- (8)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 (9) 教育人民委员部，
- (10) 卫生人民委员部，
- (11)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

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粮食、财政、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部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其活动中不仅必须执行共和国相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同时必须执行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和联盟各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指示。

21. 在加入联盟的共和国中，按照宪法第 20 条，撤销以下各人民委员部：外交、陆海军、外贸、邮电、交通各部。

22. 加盟国家的收支统一合并在全联盟的预算之内。

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何种收入和周转额归入全联盟的预算，而何种收入和周转额归联盟各共和国支配，同时规定出征税的范围。

23. 联盟的公民有统一的联盟国籍。

2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和国家印章。

25. 莫斯科市是联盟的首都。

26. 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共和国，在各自的宪法中，有责任根据本宪法而作某些相应的修改。

№07806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2年12月16日）

出席：斯大林、李可夫、茨哈卡娅、古谢伊诺夫、捷尔-加勃里耶梁、帕列钦等同志，还有索柯里尼柯夫、叶努基泽、弗拉基米尔斯基、萨普龙诺夫、李维诺夫等同志。

主席——斯大林同志

秘书——纳扎列强同志

1. 听取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的草案^①。

（草案由中央委员会所属分委员会提出）

决定：作某些修改予以通过。（文本见附件一）。

（一致同意）

2. 听取：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宣言草案。

（草案由斯大林同志提出）

决定：作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予以通过。（文本见附件二）

（一致同意）

3. 主要表决：

（1）将联盟国家命名为“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一致同意）

（2）把各共和国的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类别从联合的人民委员部改变为混合的人民委员部。

^① 即联盟宪法。

(3) 个别决议的草案经过某些修改后予以通过。(文本见附件三)

(4)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宣言和条约，是苏联惟一基本法，这应予以通过。

(一致同意)

主席 斯大林

秘书 纳扎列江

附件一

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

分委员会的草案，中央委员会 1922 年 12 月 16 日会议通过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缔结本条约，在下述基础上联合成“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权力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下列代表组成：各市的苏维埃代表按每 25000 名选民产生一名代表计算，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苏维埃代表根据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人口比例，按每 125000 名居民产生一名代表计算。

3. 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省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或在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

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苏维埃例行的代表大会，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提议，或根据不少于两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要求而召开各次非常代表大会。

5. 苏维埃代表大会按每一个共和国人口比例计算选举 300 人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例行的会议每年召开三次。根据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或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的要求，同样根据加入联盟的一个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而召开非常会议。

7. 苏维埃各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规定的次序，分别在缔约共和国的首都召开。

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团，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主席团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9. 主席团由 17 人组成，其中包括几名主席，他们由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每个共和国各 1 名。

10. 对联盟条约的批准、修改和补充都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特别处理。

11. 以下各项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 (1) 代表联盟发生国际关系，
- (2) 变更联盟的外部边界，
- (3) 缔结接收新共和国加入联盟的条约，
- (4) 宣战及媾和，
- (5) 订立外债以及批准地方性的外债，

(6) 批准国际条约，

(7) 制定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制度，

(8) 规定全联盟国民经济的原则和总计划，同时批准租赁合同，

(9) 制定交通（铁路、公路、海运和航空）、邮政、电报和电话事业的领导原则，

(10) 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组织原则，

(11) 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统一的国家预算，规定铸币制度、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并规定全联盟的和地方的税收制度，

(12) 规定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总的原则，以及制定联盟整个境内地下资源和森林使用的一般原则，

(13) 制定全联盟的移民法，

(14) 规定法院组织和诉讼程序的原则，并制定联盟的民法和刑法，

(15) 制定劳动基本法，

(16) 规定度量衡制度，

(17) 建立全联盟的统计组织，

(18) 制定全联盟国籍和外籍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19) 决定大赦，

(20) 撤销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与联盟条约相抵触的决议。

1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人民委员会（联盟人民委员会）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其组成人员如下：

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外交人民委员，

陆海军人民委员，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交通人民委员，
邮电人民委员，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劳动人民委员，
粮食人民委员，
财政人民委员。

13. 为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土上巩固地建立革命的法律制度，为了团结各共和国的力量与反革命作斗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成立具有最高审判监督职能的最高法院，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政机关，其主席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有发言权，其中，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相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组成中仍然予以保留。

1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命令和决议，对全联盟来说，都必须遵照执行，同时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直接下达，在联盟全境内予以执行。

15. 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对人民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申诉，但无权终止执行该决定。

16. 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才能废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和命令，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可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主席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予以废除。

1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的决定，对所有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来说，都必须遵照执行，并通过联盟的或各共和国的机构和负责人予以实施。

18. 在下列特殊情况下，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的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可以予以中止：当该决定与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明显抵触的时候，中止执行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应立即将中止执行决定的情况通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的人民委员。

19. 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 (1) 粮食人民委员，
- (2) 劳动人民委员，
- (3)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4) 农业人民委员，
- (5) 内务人民委员，
- (6) 司法人民委员，
- (7)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8) 教育人民委员，
- (9) 卫生人民委员，
- (10)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
- (11)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粮食人民委员、劳动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直接隶属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同时，在其活动中应遵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

民委员会的决定办事。

20. 建立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授权的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制度，这些部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组成部分，有发言权，并以此来代替各共和国里的外交、陆海军、对外贸易、财政、邮电以及交通等人民委员部。

21. 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的国家收入和支出应组成一个统一的联盟的预算，这一预算须经相应的全联盟机构予以批准。各共和国的全部国家收入被确认是全联盟的收入。国家的全部支出规定为全联盟的开支预算。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一些原则，对国家和地方收入和支出的分配做出规定，在此原则的基础上以建立地方的预算。由地方的政权机关根据预算案对收入和支出加以管辖。

22. 对于各加盟共和国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的国籍。

23. 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自己的旗帜、盟徽和国印。

2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是莫斯科市。

25. 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共和国按照本宪法修改自己的宪法。

26. 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附件二

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

从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起，世界各国就分成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是民族仇视和不平等，是对殖民地的奴役

和沙文主义，是民族压迫和蹂躏，是惨无人道和战争。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是相互信任与和平、是民族自由和平等、是各族人民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数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企图用各族人民的自由发展同人剥削人的制度结合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这种企图显然是枉费心机的。相反地，民族矛盾的线团愈搞愈乱，它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资产阶级显然已无力建立各族人民合作了。

只有在苏维埃的阵营里，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大多数人显然才有可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创造相互信任的环境，奠定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的基础。

只是由于这些情况，各苏维埃共和国才击退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即国内外帝国主义者长达四年的侵犯，只是由于这些情况，各苏维埃共和国才胜利地扑灭了国内战争，保障了自己的生存，并着手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

可是连年战争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田地荒芜、工厂停工、生产力遭到破坏和经济资源枯竭的现象，使得各个共和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仅仅靠单独努力就不够了。在各共和国单独存在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恢复显然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和新的侵犯的威胁，使得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包围。

所有这些情况无条件地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的国家，这个国家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

不久以前，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都举行了自己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各族人民的这一意志就是一个可靠的保证，它保证这个联盟是各个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保证每一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

权利，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可以加入联盟。新的联盟国家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可靠的堡垒，是各族人民和陆共处和兄弟合作原则的辉煌现实，而这一原则早在五年前就已奠定了。

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已经体现在授权予我们全权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里面。当我们，这些共和国的代表们，把这一切向全世界宣告，并庄严地宣布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不可动摇的时候，根据授权予我们的全权，决定签订欧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

附件三

一些决议

(一)

根据 1920 年对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共和国人口总调查所查明的人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确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 220 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 58 名，外高加索的代表 16 名（阿塞拜疆 6 名，亚美尼亚 4 名，格鲁吉亚 6 名），白俄罗斯的代表 3 名。

苏维埃代表大会委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总人数，并委托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些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代表一些省（州）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确切人数，根据联盟条约第 3 条所规定的代

表人数的定额，同时每一个省（州）的人口数按照 1920 年的调查统计而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将这一统计表予以公布，时间不迟于 1923 年 7 月 1 日。

(二)

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拟定委员会遵照下列规则：

应把列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或列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等其他中央联合组织名单中的各共和国的同志，按照总的分配原则，从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300 名委员分摊到相应的共和国的人数中扣除。

(三)

在宣言中（及宪法的开头部分）应该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重申苏维埃政权组织现有的一些原则是坚定不移的，在 1918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中，对这些原则已经作过说明。

№0780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12月18日）

出席：

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泽连斯基、布哈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托姆斯基、李可夫、鲁祖塔克、科罗特科夫、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彼得罗夫斯基、斯米尔诺夫、伏龙芝、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丘巴尔、索柯里尼柯夫、萨普龙诺夫等同志。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布勃诺夫、米哈伊洛夫、施米特、苏利莫夫、斯米尔加、拉希姆巴耶夫、皮达可夫等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什基里亚托夫、索尔茨等同志。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1. 听取：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条约草案（斯大林同志）。

决定：

（1）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之前应召开联盟的代表大会。

（2）联盟的代表大会应该：

①通过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宣言。

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

③制定出条约的文本。

在制定条约的文本方面，应把10月6日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指示作为代表大会工作的基础。

(3) 代表大会制定的条约文本应提交各加盟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予以赞同。

(4) 条约文本在经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赞同，并经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之后，应即予以实施。

(5) 条约文本须由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予以最后批准。

(6) 选举联盟各人民委员会和组织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应延期至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进行，这次会议应于 1923 年 4 月间召开。

(7) 为此按加入联盟的共和国之数而选出的那些代表，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出的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主席。

(8) 委派一个委员会主持联盟代表大会的工作，并最终制定出作为向代表大会提出的现有的条约和宣言的文本，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伏龙芝、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萨普龙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彼得洛夫斯基等同志。

委员会由斯大林同志负责召集。

【专题说明】

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二）

（1922年11月至1923年10月）

从1922年开始，列宁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在列宁不能视事期间，党的政策屡屡出现失误，引起列宁的极度不安。这大体上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成立苏联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格鲁吉亚事件”。1922年8月11日斯大林领导的中央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讨论共和国间关系问题的中央全会作准备。斯大林为委员会拟订了“自治化方案”，规定各共和国一律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个方案受到一些共和国，特别是格鲁吉亚代表的反对。列宁得知后，对斯大林提出了批评，提出“再建一层新楼”的主张，要求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共和国都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新的联盟。斯大林接受了列宁的修正，但又节外生枝，不让格鲁吉亚直接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而是要它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这更加激起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不满。斯大林和主持高加索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对此采取了高压手段，使矛盾尖锐化，遂酿成“格鲁吉亚事件”。二、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当时斯大林、布哈林等主张放松垄断。1922年10月6日，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俄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决议。这引起列宁的不安。他要求推迟决议的执行，同时做有关人员的工作，寻求托洛茨基等的支持。三、列宁

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二）

口授了一批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防止党的分裂，加强监督，改组工农检察院等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几名党的核心领导人的优缺点作了评述，鉴于斯大林性格粗暴，建议把他调离总书记的职位。1923年3月初，列宁在口授了最后三封信（给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姆季瓦尼等）后病情急剧恶化，从此不能视事，他的最后努力被迫中断。围绕列宁的有关指示，党内出现了各种摩擦和斗争。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吕允莲、韦清豪、刘燕明、黄有自、翟民刚）

№07308

俄共（布）中央秘密决定的保管办法^①

（不早于1922年11月30日）

（一）1.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的记录摘录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各级党委书记的各项指示应分送给哪些人员，其范围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书记和各级党委的书记决定并以他们本人的名义发出。

2. 绝对禁止将中央委员会和党委的记录摘录和各项指示交给非指定的收件人。

3. 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的记录摘录和各项指示应保存在专门的人事档案里，绝不允许将其放入苏维埃和工会的卷宗中。

4. 绝对禁止复制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的记录摘录和指示，禁止在苏维埃和工会的公文中书面引用党的决定。

（二）1. 对一切违犯中央委员会以上决定的事例，应立即报告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或各级党委，以便对当事人追究最严厉的党内责任。

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1922年11月30日决定，第77号记录，第58条。

① 此件规定要刊印在每件公文纸背面。

№01537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
致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

（1922年12月12日）

副本

绝密

莉·福（季耶娃）记录

1922年12月12日

致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①

抄送：托洛茨基

由于病情恶化，我无法出席全会。我完全意识到，在同你们的关系上，我目前的做法很尴尬，甚至比尴尬还糟，不过我反正无法采取较为恰当的方式行事。

今天我收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一封信，现附上，也许除了谈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最后几行，信中的全部主要内容我都同意。我将写信给托洛茨基，告知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鉴于我的病情而在全会上为我的立场辩护。

我想，辩护可分三部分进行：

第一，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基本原则，予以（垄断制）完全

^① 斯托莫尼亚科夫，波·斯·（1882～1941）——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5年任苏维埃俄国驻柏林商务代表。

彻底的肯定。

第二，把阿瓦涅索夫^①提出的实行这一垄断的实际计划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仔细的讨论；在这一委员会中外贸人员应不少于一半。

第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应另行处理，并且我认为，如果托洛茨基只限于要求以发展国家工业为宗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工作时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各方面活动提提意见，那么我同他将不会有分歧。

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再起草一个就这一问题本身给中央全会的声明并寄给你们。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一问题具有高度原则意义，如果得不到全会的同意，我将把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去。而在此之前向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俄共党团宣布目前的分歧。

列 宁

^① 阿瓦涅索夫，瓦·亚·（1884～1930）——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初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No01538

托洛茨基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列宁

（1922年12月12日）

副本

秘密

邮政电报第551号

1922年12月12日

致列宁同志

弗·伊·：

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一件绝对必要的事。但是现在实际上对外贸易的反对者不是对它实行正面攻击，而是采取复杂的迂回行动。另一方面，改变和完善对外贸易垄断的方法也是绝对必要的。

出现一种危险，这就是在改善实行垄断制的方法的外交下偷运实际上损害垄断制的措施。

阿瓦涅索夫同志今天曾来我这儿并告知他的委员会的基本结论。据我对他的理解，他希望贸易垄断制不是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直接施行，而是在外贸部监督下由一些最大的经营单位（辛迪加、康采恩）施行。克列斯廷斯基显然是同斯托莫尼亚科夫商量后建议，各重要经济单位（即显然仍然是辛迪加和康采恩和部分主管部门）在各相应的点上有自己的常驻代表处，这些代表处应成为商务代表处的一个分部。这个计划有些地方是和阿瓦涅索夫的计划—

样的，然而也有很重要的差别，克列斯廷斯基基本上把商务代表处看做是共和国的直接贸易（出售和购买）机关。各经济单位通过商务代表处所属各分部经营业务，并且这些分部是同相应的经济单位协商组织的。而阿瓦涅索夫则直接把这些辛迪加的代表处看做基本贸易机关，而商业代表处保留监督的职能。

也许其发展的结果会导致这种情况。但是目前也许以商务代表处为基础要可靠一些。不过，也可能我没有完全准确理解阿瓦涅索夫委员会的计划。他答应明天寄来书面建议。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根据整个经济工作从俄国去调节我们的对外贸易。需要有人懂得并且决定，什么可以输入和什么不能输入，什么需要输出和什么需要留给自己。不要从法律调节、死的产品清单的观点，而要从实际的、不断变化的、始终根据整个经济需要的观点作出这种决定。这显然应当是本身以发展国家工业为宗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这是一个特殊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已写过不止一次了。阿瓦涅索夫委员会只不过证实了迄今为止对我们的进出口还没有进行这样的核算。

托洛茨基

№01539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13日）

副本

绝密

电话记录。莉·福季耶娃

1922年12月13日

致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

托洛茨基同志：

您对克列斯廷斯基的信和阿瓦涅索夫的提纲的意见我已收到。我觉得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我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照现在这样的提法就可以清除（或者撇开）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否需要指挥权的争论。

不管怎样，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上次全会^①在这方面通过了与对外贸易垄断完全背道而驰的决定，又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我认为，正如我在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中所说的，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失

^① 指1922年10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的一次会议，列宁因病没有出席。会上根据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

败，我们就应该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为此，有必要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简略地陈述一下分歧所在。如果来得及，我就把它写出来，如果您也这样做，我将十分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会给我们造成前所未有的危害，而反对的理由无非是指责办事机构不完善。而在我们这里办事机构不完善到处都很突出，由于办事机构不完善就取消垄断，岂不等于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

列 宁

№01540

托洛茨基就簿记问题致列宁等

（1922年12月13日）

副本

邮政电报第552号

1922年12月13日

致列宁、加米涅夫、李可夫、瞿鲁巴、皮达可夫、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皮达可夫提出关于集中的簿记的问题，是绝对正确和非常及时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工农检查院”是绝对不值一提的东西，而簿记才是一切。

现在，工农的市场才是工农的检查。这是强硬的、切实的检查，而不是骗人的检查。只要善于记录下这一检查的结论，即计算一下收支多少和盈亏情况。这也就是簿记的任务。商业核算要求有商业评估，而商业评估则要求有正确的簿记。由于谈的是国有企业，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簿记，而且需要格式统一的簿记。

我认为，要断然决然地提出这个问题，正像皮达可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那样。

托洛茨基

№01541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15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2月15日

托洛茨基同志：

我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我相信，我们的决定一定能通过，因为在十月全会上投反对票的一些人，现在正部分地或者完全地转到我们这一边来。

万一我们的决定通不过，我们就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声明，并宣布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那时请通知我，我也将寄去自己的声明。

如果这个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被撤销（我想是不会这样做的，而您当然应该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全力反对这样做），那么我想，还是应当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并要求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因为继续动摇不定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给您送去的全部材料可以在您那里放到全会开完以后。

您的 列宁

№01542

弗鲁姆金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列宁

（1922年12月15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2月15日

第11809号

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昨天我产生一种担心，怕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也许出于下述考虑而被从全会上撤销：鉴于您对这一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把该问题的讨论延期到有您参加的下一次全会。

据我今天听到的传闻，这样的打算是存在的。

我认为完全有必要解决这一问题。继续处于不确定状态会断送全部工作。

您是否有可能就这一问题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谈一下。

致共产主义敬礼！

您的 弗鲁姆金

№01543

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15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2月15日第8620号

莉·福季耶娃根据电话记录

致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同志：

我今天收到弗鲁姆金的信，现转给您。我也认为，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会使我感到不安，甚至会使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拖而不决将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就更会使我一万倍地感到不安。因此，我请您注意附上的信，恳请支持立即讨论这个问题。我确信，如果我们有失败的危险，那么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失败并立即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声明，总比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失败有利得多。或许，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妥协，即我们现在作出一个确认垄断的决定，但问题仍然向党代表大会提出来，并立即就这一点谈妥。依我看，从我们的利益和事业的利益出发，其他任何妥协都是我们根本无法接受的。

列 宁

№01544

克鲁普斯卡娅就转交列宁信件致托洛茨基

（1922年12月21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2月21日

列夫·达维多维奇：

弗尔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信给您。

“托洛茨基同志：

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①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为此要通过一项提案，即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的措施问题。这件事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宣布。我希望您不会表示异议，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报告。

尼·列宁

弗·伊·还请您给他回电话。

娜·康·乌里扬诺娃

（娜·康·乌里扬诺娃手书）

^① 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撤销了十月全会的决定，重申“保留和从组织上加强对外贸易的绝对必要性。”

№01545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①

(1922年12月)

1922年12月23日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

① 列宁从1922年12月23日起至次年1月止口授了一组文件。内容涉及对一批领袖的评价和防止分裂的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民族问题。这些文件没有标题，实际上是列宁准备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为防备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代表大会而采取的措施。这批信列宁嘱咐作为绝密文件保存。但12月23日口授的文件当天即送达斯大林，为此列宁特别对秘书重申了保密的规定。然而到年底列宁的秘书违背列宁的规定，让多数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列宁口授的这些文件。1923年5月底或6月初，列宁12月24日口授的被叫做“列宁遗嘱”的文件被正式移交给政治局。1924年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移交这些文件，仅仅是履行一个正式手续而已。这里所收文件部分已刊载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和第53卷，为便于读者阅读，现与其他有关文献一并刊载。托洛茨基在题后加注道：“手稿原件上没有标题”

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 50~100 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加千倍。

列 宁

1922 年 12 月 25 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 C.Φ. 奥登堡^①）在《俄罗斯思想》^②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

^① 此处应是谢·谢·奥登堡。1922 年他在布拉格出版的白俄杂志《俄罗斯思想》任政治评论员和撰稿人。

^② 《俄罗斯思想》，原为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1918 年被查封。后由司徒卢威在国外复刊，1921~1924、1927 年先后在索非亚、布拉格和巴黎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译作《俄国思想》。

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插曲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望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 宁

1923年1月4日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副本经我核对 列 宁

列·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手书）

副本

绝密

(不供发表)

1922年12月27日

续 记

四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给国家提供经过鉴别分析的材料，而国家机关则应当解决国家事务。我想，在目前国家事务变得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往往要交错着解决各种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人员鉴定，有些问题不需要他们鉴定，甚至有些问题的某些方面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鉴定，另一些方面则不需要它鉴定，因此我想，目前应该采取步骤来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

我是这样设想这一步骤的：应该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改变决定要有特别程序，例如，把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根据特别指令对需要改变决定的问题进行准备，根据特别条例写出报告，来权衡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否应该取消，以及对改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的决定规定特别的期限，等等。

我想，可以而且应该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等等。我觉得，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现在听到有人攻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副主席皮达可夫同志，攻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太软弱，缺乏自主精神，没有主见；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粗枝大叶，作风粗野，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等等。我想，这些攻击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把两个方面都夸大到极点，实际上我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需要的是这两类性格的巧妙结合，一种典型可能是皮达可夫，另一种典型可能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①。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我想这种人应当具有的主要不是行政才能，而是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

列 宁

副本

绝密

1922年12月28日

五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具有立法性质的续信

我觉察到，我们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

^①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格·马·（1872～1959）——1893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2次代表大会上缺席当选中央委员。1919年底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总局局长，1920年任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志夸大了行政这一方面。当然，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行政这一方面是必需的，但是不应该把它同科学修养方面、同掌握广泛的实际情况、同吸收人才的能力等等混为一谈。

在一切国家机关内，特别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必须把这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当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告诉我，他已把皮达可夫吸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同他谈妥工作的时候，我同意了这种做法，虽然一方面我还有些怀疑，可是另一方面，我有时又希望，我们这样做能够把两种类型的国务活动家结合起来。这个希望是不是实现了，现在应该等一等，看看稍久一些的经验，但是在原则上我认为，毫无疑问，把不同的性格和类型（人才、素质）这样结合起来，对于国家机关正确地发挥职能是绝对必需的。我认为，在这里夸大“行政手段”正像任何夸大一样，同样是有害的。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不能做好。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他要善于做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这方面有一个或几个得力的助手。一个人兼有这两种素质未必会有，也未必需要。

列 宁

副本

绝密

1922年12月29日

续 记

六

看来，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

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的人。这种机关的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从这种科学机关的权威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能否具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取决于一点，这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地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计划。

现在具有后面这种品质的人当然是极其少有的，因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感染了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偏见，而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是由他们组成的。从这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查应当是可以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几个人的任务，他们应当是共产党员，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天天观察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是否忠诚，是否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及是否逐渐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这种科学考察和纯行政管理双管齐下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者们的目标。

列 宁

副本

绝密

1922年12月29日

究竟怎样做才合理，是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管的工作分解为各个单项任务，还是相反，应当设法组织一批固定的专家，他们经常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检查，能够解决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的全部问题？我想，后一种办法比较合理，应当竭力减少临时的和紧急的个别任务。

列 宁

1922年12月30日

续 记

一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机会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①，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②——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

① 捷尔任斯基是1922年11月24日中央书记处任命的赴梯弗利斯调查格鲁吉亚事件三人委员会的主席。12月12日捷尔任斯基回到莫斯科后当晚即向列宁做了汇报。

② 奥尔忠尼启则在1922年秋动手打了格鲁吉亚领导人卡巴希泽一记耳光。

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①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

^① 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挥拳打人的警察。

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列 宁

1922年12月31日

续 记

二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做“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

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

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列 宁

1922年12月31日

续 记

三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第一，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

第二，就外交机关而言需要保留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顺便指出，这个机关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别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皇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关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在其他各人民委员部中只好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

第三，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谈到这点时，我深感遗憾，因为我本人是他的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同他一道工作过），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

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第四，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检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

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详细地？）拟定出来。而且决不应事先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应当注意到，拿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来说，各人民委员部的分散及其工作不协调的影响，是能够靠党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只要十分谨慎和公正地运用这种威信。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列 宁

（《社会主义通报》^① 1923年12月17日第23—24期）

^① 《社会主义通报》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的刊物，1921年2月由尔·马尔托夫创办，先后在柏林、巴黎和美国出版。

№01546

列宁手书哥尔克村地址的便条

(1923年1月15日)

沿着谢尔普霍夫公路大约20—23俄里。经过一座铁路桥，然后沿着公路经过第二座非铁路桥，向左拐（也是沿着公路，但是一条窄小的公路）第一个弯，就到达哥尔克村（前雷因博特庄园）。离莫斯科总共约40俄里。

（列宁同志手书）

No 10808

**托洛茨基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
劳动国防委员会问题致中央政治局**

（1923年1月15日）

绝密

1923年1月15日第27/T号

致中央政治局

（关于斯大林同志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信）

（1）我提交中央的一些书面建议的核心是关于必须保证每天对国家经济进行正常的计划领导的问题——这首先是从恢复和发展国有工业的角度出发的。我一再肯定地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机关直接负责有计划地领导国有经济，并在其权利、职责和人员方面都能实施这种领导。我断定，正是由此才愈来愈努力叠床架屋地设置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导机关和统一机关，这些机关归根到底只能相互干扰。除了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我们现在还有：副主席小组（三人团）、劳动国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时，许多问题还往往转交中央（书记处、组织局、政治局）处理。我认为、领导机构如此繁多，它们的相互关系不明确，责任又分散，从上头造成了混乱。

斯大林同志现在建议合并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团和财政委员会。这个建议，不管其直接的实际价值如何，至少表明存在独立的副主席团和独立的财政委员会是不适当的。

在我第一次建议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当作统一的经济机关时，我当然还不能评价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因为他的建议比我的建议晚提出了两年。而且斯大林同志的实际上极端重要的关于改组中央机关的建议，是他在批评我再次提出的建议时顺便提出的。

(2) 我认为，最近时期我们经济政策的失误在于孤立地提出财政问题。不稳定的卢布不可能成为经济的调节者，因此财政专政往往变成牺牲国有经济进行冒险的投机。这样的政策暂时可以带来虚假的成功。但它必然孕育着自身的失败。

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必须把统一的国有工业的利益作为重点——在带有一切必要的附加条件下——向国有工业的利益看齐。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原因，这样才能首先从工业利益的角度来研究所有的计划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远景目标达不到，就可以由劳动国防委员会自上而下地加以纠正。斯大林同志的方案建议从劳动国防委员会中撤销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内的所有部门，而只留下财政人民委员部。因此财政和工业间的不正常的关系在斯大林同志的方案中又得到了新的组织上的表现。

(3) 其次，斯大林同志把个人的任命问题拉扯到这一组织问题上来。因此我也不得不谈谈这个问题。一点不错，列宁同志在恢复工作几个星期后，曾建议我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我对此回答说，如果中央任命，那么，我当然从来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但我认为这个决定非常不合理，同我的所有组织观点和行政经济观点、计划打算完全相背。

我在同列宁同志的谈话中作了进一步解释的原因如下：

(a) 我认为，副主席团的存在本身就是有害的，因为副主席团使一些担负十分负责工作的同志脱离明确的行政岗位和行政经济岗位，使他们的地位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家似乎对一切全

负责，又似乎全都不负责。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人民委员会设一个常务副主席是必要的，而且也足够了，也许再设一个管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在他们之间保持正常的相互关系（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

（b）我向列宁同志指出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和政治局在苏维埃问题上的政策。最近两年来组织局、书记处和政治局实际上越过有关主管部门，甚至背着它们频繁地对一些问题，例如对军事问题，作出决定（频繁裁减军队而不是考虑周到的有计划的裁减，这导致了极度的混乱及物资和粮食供应的开支急剧增加；在预算方面也有这样的现象，类似现象还出现在人员任命上……）。所有这一切完全破坏了进行正常的工作，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及稍微有计划的经济的稍微正常的核算和预见的可能。自然，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对于军事部门的任何负责人都已不是秘密），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去为其他机构承担责任。

列宁同志回答说，他不会违背我的愿望建议任命我为副主席。列宁同志在指出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的选拔确实很糟，我们需要特别有权威的党的工作委员会来研究如何更正确地挑选、培养和提拔工作人员及更正常的组织上的相互关系问题之后，建议我等他对这个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和组成考虑得更明确后加入这个工作委员会。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列宁同志在他的病复发以前再也没有提出这个工作委员会的问题。

（4）斯大林同志提出任命我为副主席的方案（这个建议从未提交政治局、全会，也从未在那里讨论过）时，建议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由我“专门关注”。如上所述，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专门关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应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专门“保护人”的角色只会造成责任的分散，在最需要最应该明确的部门中造成不明确和混乱。我们需要正常地实际地协调各经济主

管部门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分别对其中的每个部门实行双层领导。

附注：正如第4点所指出，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就是列宁同志的建议，是完全不对的。列宁同志建议我负责监督的首先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而恰恰不是经济主管部门。

(5) 没有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领导，任何经济工作都无法进行。计划不应是学院式的，而应是实际的。把订计划和监督执行情况分开本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计划机关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副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或者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者临时设置和建立无数个工作委员会。摆脱这种状况的惟一出路是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抓在手中，也就是说，派负责人员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并使他们同专家真正结合起来。最高机关应能从国家计划委员会获得经过精心研究、认真检查、协调一致，并且当然是从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角度出发的高质量的材料。

有了这样的正常运作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给上面的只是一些需要作出立法决定或者需要提出崭新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

打个比方，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起参谋部的作用，而劳动国防委员会将起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作用。

№ 10809

托洛茨基就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问题

致全体中央委员

（1923年1月20日）

绝密

1923年1月20日第40号

致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就组织中央经济机关的问题交换书面意见当然不方便。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大好处：使全体中央委员更直接地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全会的会议上不得不草草地研究积压了两个月，有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问题。

1. 十分明显，人民委员会除了常设主席外，还需要一位副主席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领导人。由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委员会，可以任命第二位副主席——专管劳动国防委员会。但是，十分明显（无论就工作的实质，还是从形式上的考虑），副主席不能脱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决不能给人以副主席的权利和职责不明确的印象。“副主席本身”的设制是什么？斯大林同志最近的建议最明显不过地突出了这样提问的错误，他建议说：“由乌克兰出一位副主席参加改组后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由乌克兰出一位副主席”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副主席是谁的副手呢？是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还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

我认为，鉴于要成立联盟，可能需要有一位捍卫乌克兰利益的人参加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把这样的人称作乌克兰事务人民委员，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赋予他副主席的称号，只会告诉大家，这个称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官衔，而不是职务。

2. 增加副主席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工作繁多。工作的确不少。但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1）副主席加米涅夫同志。他作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领导共和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和最重要的一个省份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此外还履行副主席的职责。

（2）副主席瞿鲁巴同志。他作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任务是从合理性和法制的角度检查所有的国家机关的活动。此外还担任副主席。

（3）副主席李可夫同志。他只履行副主席的职责。

（4）打算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副主席，他现在担任军事人民委员，还打算任命他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做几项工作，而同一项工作又分给了好几个人去做。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不是节省人力，相反是浪费人力。在我们这里，兼职通常在任何部门都没有好结果。所有的问题，也包括副主席这个职位，都需要更深入的专业化。

如果决定，加米涅夫同志担任副主席更有利，那就要解除他莫斯科苏维埃的职务，领导莫斯科苏维埃的工作是一项独立的而且愈来愈复杂的任务。

如果认为工农检查院意义重大（当然，不是作为对全体居民的全能的教育者，而是作为苏维埃的国家监督机构），那就要解除瞿鲁巴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如果相反的话，那就解除他国家监察人民

委员部的职务，任命他为副主席。这样来解决问题（即担任副主席的——或者是李可夫和瞿鲁巴同志，或者是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会节省很多人力，也就是说一切井井有条。

以为让一个机关的成员摆脱明确的责任并赋予他们以副主席的称号，就可以使这个机关摆脱本位主义或增加本位主义，那是根本错误的。如果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现任委员们是十分狭隘的本位主义者，那至少应当派那些最负责最内行的工作人员来领导这些部门。其他出路是没有的。

附注：现在副主席的情况如何，从他们之间的正式分工可见一斑。经济部门中由瞿鲁巴同志主管的有：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李可夫同志主管的有：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等。同时，瞿鲁巴同志作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当从“检查执行情况、监督缩减编制和改进机关工作”的角度出发监督所有的人民委员部。副主席作为副主席却没有任何监督和监察的机关。一人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另一人监督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体制能够有效吗？可是有人却建议我们还要增加副主席的人数，各主管部门的名誉监护人，却没有机关，也没有……明确的工作。

3. 斯大林同志反对“回顾过去”。而提倡这种回顾的却完全是他。我在最近一次全会后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有必要消灭中央在经济管理机构中的混乱现象的声明。斯大林同志对此作出回答时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建议。本来进一步的争论完全可以局限于以下问题：什么机关同什么机关合并，任命谁去什么地方等。但是，斯大林同志却回顾“过去”，并谈了原来打算任命我为副主席，而我却拒绝了。

因此我不得不谈了同列宁同志的谈话以及我之所以拒绝的理

由。

斯大林同志现在又说：不需要回顾过去，否则，他斯大林同志也许不由得要回忆往事并谈起（为了告诉别人，这样做多么不好多么不恰当），“托洛茨基同志好像在一年半或一年以前曾在政治局里要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布谷鸟已经叫了”，如此等等。十分明显，如果说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回顾过去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并迫使我进行更正，那么他第二次这样做则已经是出于教育上的考虑：为了表明回顾过去会把一个严肃的人变成布谷鸟。

是的，为了回答某些同志的一种依我看是肤浅的、不可饶恕的乐观主义，不是在一年半前，而是在半年前，我不止一次地在政治局里说过：如果我们这样进行管理，那么我们不会有时间听到布谷鸟叫的。如果有人把这些话评价为“悲观主义”，那么我总是回答说：是的，我对于我们的管理混乱的现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种乐观主义要牺牲掉我们革命的许多利益。我常常举下列事实为证，我们在政治局里，不经什么准备，讨论10分钟，凭耳闻眼估在一次会议上就决定10~12个十分重要的实际经济问题。在同这种做法的斗争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布谷鸟，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特殊的副主席团，其中每个人对什么都负责又都不负责，那么没有布谷鸟就很难赶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了。

斯大林同志在旧事重提之后问道：“难道需要旧事重提吗？”我回答说，不，本可不必旧事重提的。

4. 我在1月15日的信中写道：关于任命我为副主席的建议，“从未提交政治局、全会，也从未在那里讨论过”。斯大林同志却出乎我的意料试图根据文件来反驳这一点。我又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因为这些文件可以出乎我的意料鲜明地使全体中央委员了解，问题有时是怎样决定的。斯大林同志引用了列宁同志9月11

日的便条，其中建议由于“瞿鲁巴回来后李可夫同志休假”，任命加米涅夫同志和我为副主席，如此等等。关于这张便条，斯大林同志是用电话通知我的。这时，我自己也请了4个星期的假（并获准），主要是为起草预定由我在当时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因此，甚至完全不取决于我对增加副主席所持的根本否定的态度，十分明显，列宁同志由于李可夫同志休假而想解决的实际任务，并没有因任命我为副主席而获得解决，因为在此后的几星期，我本人也获准休假，接着要开代表大会，我得全力以赴。十分明显，这些无可辩驳的实际理由，即使对于那些主张这一任命的同志，至少也足以把对我的任命问题往后放一放。看来，如果还是想马上解决问题或者把政治局的意见肯定下来，那就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我同斯大林同志通过电话简单交谈后，我确信，这个问题本身至少在我回来以前已被撤销。但是却没有。表决（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文件上有我作的标记）仍然进行了。我只是现在从斯大林同志的信中第一次得知表决的结果。原来斯大林和李可夫投了“赞成”票，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弃权”，加里宁“不反对”。

此后，政治局在9月14日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其中“遗憾地确认托洛茨基同志断然拒绝”。从斯大林同志的信中，中央委员们可能会以为我出席了政治局的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我已经在休假。然而，尽管我的理由实际上无法反驳，至少可以把问题往后放一放，政治局却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遗憾地确认”等等。我对这一不是由我提起的插曲不予置评。但我再次指出，问题一次也没有提交政治局，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至少是在我出席的会上。我想，我的出席不会是多余的，因为事关对我的任命。

5. 为了使这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不致由于重提往事而被搁置（而发起重提往事的，如上所述，完全是斯大林同志），下面我提供从我1921年8月7日提交中央的建议和1922年4月29日提

交政治局的信中准确摘录的我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有关文字。

列·托洛茨基

附件一

托洛茨基就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
问题致中央全会
(1921年8月7日)

中央全会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经济政策的新路子。但是必须指出，在苏维埃机关的直接经济活动中贯彻这些指示，贯彻相关的各项法令，广大党的工作者、苏维埃工作者掌握经济政策的新原则都需要经历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其速度不可能满足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形势的要求。贯彻新政策的速度缓慢，由新政策引发的具体做法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已经制定的这些原则极端缺乏系统性。在经济领域里绝对不容许政策大转折，更何况对这种转折内部意见还没有统一。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中心，不由它来监督经济活动、进行种种经济活动试验、统计和总结其成果、把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切实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制定出内部达成共识的经济计划，那么，就不仅会造成诸如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这样的严重的经济动荡，而且也不可能在内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制定出经济政策的新原则。由此严重影响下面，影响我们经济基础的推动和反推动机制。

无论是执行新方针，还是执行旧方针，恢复和巩固国有化大工业都是主要的任务。从组织方面来说，这项头等重要的任务只能在建立起真正统一的管理后才能完成。经济机关、工会机关和党的机

关经常发生摩擦，特别是在人事任命和人事调动问题上经常发生摩擦，有可能把最健全的工业毁掉。在目前情况下，对全国经济的领导有四分之三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和调配的问题。这项任务只有在国有化工业的管理上意志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完成。

因此在近期内要把工业企业划分为以下三类：国有企业、与国家有明确合同关系的企业（生产合作社和根据合同建立的国家管理部门等）和根据私人资本主义原则出租的企业。这些企业与国家机关、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与铁路、水路运输部门和工农检察院等的相互关系，必然会成为产生办事拖拉、吹毛求疵和滥用职权行为的新的土壤。因此，必须一方面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负起责任来；另一方面又要使中央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能够真正地、不间断地调节经济生活，积极排除官僚主义的干扰，帮助互相依赖的各个机关和企业建立起最简单的相互关系。

要是这样（惟一正确的方式）安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就得从人员结构和工作方法上对该委员会作全面改组。经济计划不是从理论上制定出来的，而应是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只能由实施计划的人来制定经济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计划委员会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可能真正有计划地领导经济工作。显而易见的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目前并未对经济工作进行切实的、不间断的领导，将来也不可能这样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经济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具体解决其他各级经济组织解决不了的棘手问题。

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围绕国有化大工业这个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建设也应围绕这个中心。谁实际上在领导工业生活，谁就应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制定和检查经济计划，随时随刻调节计划的执行情况。国家计划委员会无法形成共识的问题应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处理。但是总的说来，应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国有化大工业

这个经济主导因素的情况来负责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并在日常工作中加以保证。

托洛茨基

附件二

托洛茨基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1922年8月23日)

副本

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抄送：政治局书记处

据我的大致估计，我们现在采取最重要、最刻不容缓的行政组织的经济措施往往要迟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也许，目前还没有到认真讨论和解决计划机关的问题的时候。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不对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初步设想。

随着改行新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成了经济计划的最重要的杠杆。国家财政的分配决定着经济计划。目前，不确定发行额，不在各部门之间分配资金，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经济计划。其实据我所知，国家计划委员会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是否因此才脱离了今年的经济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时是否因此才提不出什么补充意见？不管怎样

解释，十分明显，我们现有的组织根本错了。成立三人小组是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之间设了一道障碍。自然，这种障碍跟制动器一样有好处。但是谁也不能靠制动器行走。需要一个工作机制。需要一个积极的分配机构和调节机构。它在哪里呢？在讨论资金分配和发行额问题时，政治局中怎么会谁都没有想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呢？这意味着什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一位熟悉情况的发言者，好像是皮达可夫同志，报告说，在拨给工业部门的全部资金中，有1/4专门拨给泥炭工业。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如果准确的话，那是由什么引起的。至少十分明显，三人小组在审议日常贷款的过程中决定不了泥炭工业需要给多少，煤炭工业等等需要给多少。

瞿鲁巴同志说，财政人民委员部把玻璃瓶分成两半，并用这种办法来安排经济。换句话说，纯粹从发行出发考虑，不受经济“物质”监督的财政人民委员部正在破坏经济和经济机关。根据瞿鲁巴同志的结论，只要合理安排，不用打碎瓶子，就可以大幅度削减预算。但是合理安排——就是按计划行事。显然，瞿鲁巴同志必须监督其他部门也削减预算，但不是通过空泛的指导，而是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国家经济计划。

通过什么样的机关可以实现这一点呢？没有一个协调我国当前的经济，把它纳入一定的框架内并至少能预见几个月的机关，怎样着手这一工作呢？

如果一个部门一个机关对明天会怎么样都毫无信心的话，怎么能要求它们很好完成任务，按时报告工作呢？没有一个哪怕粗略的、大致的、哪怕是短期的计划，怎么能使工作有一点起码的稳定性呢？没有一个直接监控、联系、调节和指导我国经济的、而不是沉湎于虚无缥缈的学术议论中的计划机关，怎么能制订出一个哪怕粗略的、短期的计划呢？

很可能现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做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这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这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学术委员会应当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进行工作。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窃取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名义，从而把人引入歧途。而我们就每一个问题建立预算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等等，等等，从而使经济乱了套，遭到破坏并继续衰落。

列·托洛茨基

№02687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1923年1月25日）

绝密

我也认为我与斯大林同志的通信已经结束，可以作如下结论了：

1. 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本不解决我所提出的关于每天都要实际地统一经济的问题，因为分管各委员部的5位副主席绝不是“没有本位主义的”。如果每位副主席认真地管“各自的”委员部，那他将成为这一部门的领导人，不过是一个联合部门的领导人。

2. 目前国家计划委员会没有充分地进行实际的经济协调工作，这是事实。但谁也没有完成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通过出现危机、漏洞、损失以及新的危机等途径自然而然地完成的。只有把国家计划委员会从一个完成个别任务的机构改组成经济司令部，才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创造正常的前提，政治局最近对国家计划委员会人员的任命使我确信，我们正远离这一目标，而不是接近这一目标。

3. 当前所提的副主席工作是与我习惯以及我对组织得当的工作的认识完全相抵触的。任命我担任这样的工作，我认为这意味着除掉我这个苏维埃工作人员。

4. 我认为，任命一个“乌克兰人”担任副主席将意味着除掉一个乌克兰人。

5. 显然，对政治局在我缺席时作出的有关我的决定我不反对。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同志是对的。但是对其他许多问题我也不反对。

6. 我举出的“旧文件”对我的意义在于它们阐明了实际任务，说明这个任务一年半前向我们提出时是怎样的，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上还是这个任务。

列·托洛茨基

1923年1月25日

No 02688

书记处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和 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分工的设想

（1923年1月29日）

1. 将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扩大到 50 人，吸收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和经济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新同志，主要是工厂（厂长、州组织领导人、少数民族共产党中最有威信的党员等等）。之所以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证同地方的牢固联系，而且是为了促进从目前还缺乏经验，但表现相当突出的同志中培养新政治领导干部的事业。

2. 章程中第 23 和第 24 节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内容不作修改，要补充一句话谈关于召开紧急全会会议的问题，增加关于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领导仍由中央委员会掌握的内容。如不增加这些内容中央全会的职能仍然不清楚。

3. 章程的第 25 节应作如下修改：“中央委员会决定由 7 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领导日常政治工作，责成政治局根据情况把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提交例行中央全会或紧急中央全会解决。这一改动缩小了政治局的权力而扩大了中央全会的权力。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不作这样的修改扩大中央委员会组成就失去意义了。

4. 中央委员会决定由 7 名中央委员组成组织局领导一般组织工作。

5. 中央委员会决定由 3 名中央委员组成主管经常工作的书记处，负责日常组织工作和执行工作，为全会、政治局要讨论的问题准备材料。

6. 书记处下设由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主持中央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其职责是预先审议列入组织局或中央书记处议事日程的问题并将问题送交上述机构之一。

7. 由书记处分配工作的党的干部以省级为限。书记处一致通过的决定从会议记录上交时起 48 小时内如组织局无一委员反对，即视作组织局的决定。

8. 由组织局分配工作的党内干部以区域级为限。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只有经政治局批准才能变更中央委员会区域局、少数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边疆区委员会的组成。

9. 政治局根据组织局的推荐分配全共和国一级工作人员的工作。

10. 政治局可以否决组织局的决定，组织局可以否决书记处的决定，而且出现以上两种情况，决定都将中止执行。

11. 中央全会可否决政治局的决定，但无权中止决定的执行。

列·托洛茨基

1923 年 1 月 29 日

附：托洛茨基在文件上所写的札记

1. 争论

挑拨离间

拉林

2. 视察员由中央委员会领导还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不怕中央委员会”。

3. 由于党与国家结合得太紧密，监察〔委员会〕才接管党的政治职能。

4. 今天什么也没有批准。

5. 莫洛托夫，鉴定权。

[对第3条] 三名委员可以改动〔全会会议〕日期。

6.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视察员。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7. 过去地下工作的问题。

[对第7条] 有3人签名〔从组织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交出会议记录后48小时内无人提出异议〕即生效。

№0269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8号记录摘抄

（1923年2月8日）

送托洛茨基、李可夫同志

听取：

16. 托洛茨基同志的委员会关于工业报告日期和李可夫同志关于工资报告的日期（斯大林同志）。

决定：

16. 下星期四在政治局托洛茨基和李可夫同志作关于他们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No 02692

托洛茨基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1923年2月13日）

副本

致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李可夫同志

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致索柯里尼柯夫、瞿鲁巴、皮达可夫同志

据说部分政治局委员要求限定国有企业只有权用流动资金抵押贷款，我认为问题很严重，是明显而极有害的错误。

为了使这个问题的提法更明确，我草拟了一个提纲^①附上。这个提纲现在的惟一任务是明确问题的提法，从而正确地解决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13日

^① 见本专题文件 No 02693。

№02693

托洛茨基关于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问题的提纲

(1923年2月12日)

1. 从国有化经济与私有经济斗争的角度来看，不言而喻，物质力量的对比，即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对比具有决定意义。这种和那种资本的內部结构问题，资本利用范围和资本活动形式（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以及工业资本的內部结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2. 然而在国家资本内部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巨大优势本身有可能在斗争过程中完全丧失。在同一工业部门内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资本的錯誤分配乃是一种错误的结构。

3. 很清楚，如果全部工业财富由固定资本组成，也就是由工厂的厂房、机器组成，而没有流动资本，也就是没有燃料、原料和工资，那么国家与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只要私人资本有合理的内部结构，尽管从总的来说它比国家资本少几成）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惨败。

4. 认为国有化就是国家掌握机器和厂房的想法是浅陋的拜物教。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有化就是国家在国有企业中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得到保证。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和在一定的范围内将一定数量的固定资本变为流动资本对国家是完全有利的。实际上我们实行租让、租赁和合营公司制便走上了这条道路。很清楚，同一个政策应该在信贷制度中体现出来。因

为信贷是在经济的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进行物资的分配和再分配的手段，所以信贷制度就应促进确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间正确的比例。

5. 限定国有企业只有权在流动资本范围内取得贷款，这就意味着去犯既是原则性的也是实践性的骇人听闻的错误，其理由是：（1）国有企业主要由于流动资本短缺才寻求信贷。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国有企业只能用流动资本抵押贷款，就意味着推来推去踢皮球。换句话说，就是不准他们借款，（2）由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集中“计划”不能完成有利于工业不停运行的资源分配任务，所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才不得不采取市场办法，因此禁止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实质上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领域中将新经济政策的方法一笔勾销。

6. 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可能导致大量工业企业转到私人手中，这个危险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危险不是用厂房和机器抵押贷款引起的，而是使用厂房和机器不善引起的。不论贷款得到的数额多大和以什么名义得到，经营亏损必定要求要么撤销企业，要么另外对企业投资。

7. 国家不可能承认在这一领域中市场规律是不得上诉的法院，这样考虑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仅针对借贷制度，而且也针对我国全部经济活动。假如承认市场在任何时候都是终审法院，那我们就应容许铁路运输瘫痪。国家从更长远的角度进行干预并对目前的市场工作进行纠正。国有工业企业的借贷制度也同样如此：假如国家认为自己非保护自己的破产企业不可，那国家就得在一定限期内偿付该企业的债务。国家的这一权利无论如何应得到充分的保障。

8. 可以承认，把独立支付自己资本数额内的债务权交给个别企业或托拉斯是不谨慎的。在这方面可能需要加以限制，这出于经济上的谨慎考虑，而绝不是出于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盲目崇

拜。换句话说，比如，可以规定托拉斯有权贷款数额为国家交给它支配的财产数额的 1/5 或 1/10（这个比例可根据不同的工业部门进行调整）。借贷数额更大的款项必须得到上级机关的同意（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通报，以便在某些情况下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征求意见）。

9. 但应该注意一点，决不应当去找资本家借贷。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要向其他国有企业和联合公司贷款。比如完全可以这么设想，一个造纸托拉斯借纸给一个印刷厂或印刷托拉斯，以印刷设备为抵押，因而自己得到一个或几个印刷厂。在这种情况下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的制度便成为某些企业从一个托拉斯转到另一个托拉斯的手段。在这里不存在任何危险。相反，这是改造当前的托拉斯，建立生命力更强，机能更完善的联合公司的最富有生气的方法之一。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12日

№02694

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 关于政治局委员会分工的建议的意见

（1923年2月15日）

就我的理解，这涉及的是苏维埃政权内部的分工，而不是党内的分工。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设7个副主席，因为主管，或监察、或照管，或监督某一委员部或几个委员部的一位中央委员就是一位副主席，但他履行的职能还没有现在副主席的职能规定得周全。

我们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都担任某种工作并且相当繁重。是否可以再把某个部门的“专业”任务分给他们。我有怀疑。

我还考虑，如果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去分别监督一些部门，那么苏维埃问题将比现在更频繁地提交给政治局。

我认为政治局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对真正的党内问题管得太少。

总之，我认为，现在进行改革不是时候，因为距召开代表大会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所剩的时间已不多了。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15日

№0269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0日）

绝密

1923年2月20日

第23557/C号

送托洛茨基同志

俄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2月20日会议第51号记录摘抄

听取：

3.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组织国家工业的提纲（今年2月8日政治局第48号决定）。

决定：

3. 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作为基础。

提交全会详细讨论提纲。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0269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0日）

绝密

1923年2月20日

第23553/C号

送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同志

俄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2月20日会议第51号纪录摘抄

听取：

1. 政治局所属委员会关于工资的报告（政治局今年2月1日第46号决定）。波格丹诺夫、安德列耶夫、皮达可夫同志。

决定：

1. (1) 认为委员会根据其工作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即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日程中把工资问题单列一条是缺乏根据的。

(2) 认为李可夫同志向委员会提的建议总的来看是可以接受的：①关于重新研究某些生产缩短工作日的情况；②关于重新研究不同生产部门中所规定的童工百分比；③关于重新研究企业和某些工业部门按危害和危险程度的分类；④关于重新研究扩大解释的有关工作服的规定；⑤关于重新研究社会保险条例和工资；⑥关于工业和运输不再付超过社会保险所规定的医疗费用等问题——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相应的条例、命令和对劳动法典作补充规定，并

在上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后由苏维埃系统加以贯彻。

按第“(2)”条规定委员会应在一个月之内结束工作。责成委员会在结束这部分或那部分工作后立即交苏维埃系统加以贯彻。委托李可夫同志监督贯彻的情况和委员会按期结束工作的情况。

(3) 必须免去工会对至今仍由其管理和提供经费的孤儿院和幼儿园等的拨款以及特殊的社会保险提成。

责成由教育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在两周内向人民委员会报告是否可能停办一部分这样的机构（托儿所、赈济饥民委员会的机构等），而另一部分机构的经费由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责成上述委员会研究是否有可能完全由经济机构提供社会保险的提成问题。

调节这一问题的计划应以三个月为限。

任命委员会应由苏维埃进行。

(4) 认为必须保留用于工会文化工作的工资附加额，其数额不超过1%。

(5) 责成组织局再一次研究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组成，以保证工会工作人员和经济管理干部在其中的影响相等。

(6) 基本上赞同委员会结论中的第3和第7条，建议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些指示为自己的机构制定出尽可能具体的通知细则。

(7) 委员会结论中的其余各条应同托洛茨基同志商定并作相应的修改。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附 件：

俄共中央政治局 1923 年 2 月 20 日会议第 51 号记录（第 1 条）

李可夫同志向委员会就工资问题提出的建议摘抄

3. 目前时期的工资政策应立足于务必刹住轻工业工资的增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提高各类落后企业，首先是运输部门和重工业的工资。

战前的工资标准不应是衡量工人劳动报酬多少是否合理的尺度，因为战前的工资是对工人的廉价劳动过度剥削和工人缺乏组织性的结果。但当前经济状况总的看来，工资的进一步提高完全取决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整个经济组织的改进。

7. 法律规定的工厂委员会的经费开支以及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无论如何不能视为工人工资的一部分。

认为必须取消如发放各种东西、对某一部分工人提供实物和特权等一切隐蔽形式的工资，并严格实行统一工资，规定企业向工人提供任何服务都必须收费。

№0269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1日）

绝密

1923年2月21日

第23573/C号

送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俄共中央全会1923年2月21日会议第11号记录摘抄

听取：

2. 下述问题的提纲：（1）关于组织国有工业和（2）关于农村的税收政策。

决定：

2. 改在1923年2月22日。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02698

托洛茨基关于改组和改善 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

（1923年2月22日）

绝密

致中央全会全体与会者

改组和改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

一、必要的预先的实际说明

1. 关于我在改组党中央机关（列宁同志首倡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相当一部分全会与会者事实上已被误导。我没有向全会也没有向政治局提过任何建议。我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建议。此外，在政治局我们一致决定在这个尖锐的问题上不提任何单独的建议，而力求通过每一次会议交换意见取得一致。这是我们的建议，它得到大家的赞同。我们指望党对列宁同志的信作出自己的反应，在《争论专页》上将会发表文章，而政治局和全会将可能更深入地捕捉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并且以更准确的形式完全步调一致地去迎接业已成熟的组织改革。我再重复一遍，我在政治局提的建议就是这些，它得到大家的完全赞同。

2.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全会上提出的草案完全出于我的意料。这个提纲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这个提纲的提出程序本身就背离了

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达成的协议，即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单独行动。

3. 我在开会前几个小时收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根本不明白，“两个中心”思想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向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提过什么“两个中心”的草案。我的便函只不过是商定的交换意见中的一个简单插曲，我不认为它是什么草案，而且我这个便函的实质也根本不是“两个中心”。仅仅在全会的讨论中才向我说明了“两个中心”思想大致反映了什么意思，同时我确信，我给政治局委员们的便函仅仅是在政治局内部的初步讨论中的一点意见，但它被全会的某些与会者当成了我的“建议”，说它的实质是“两个中心”，是一条反对列宁同志的建议。全会的某些与会者从某某人那里得到相应的消息和指示，因此他们才在发言中说，列宁同志的草案目的在于维护统一，而我的草案则是在搞分裂。

4. 在这里我不去追查这是什么人干的，也不去追查经过相应策划的这些来自小圈子的流言的目的。但是我要声明：只要如实地转述列宁同志的信和我对这封信以及这封信前面的文件所持的态度，这场不诚实的牌戏必将失去任何影响。情况却相反。当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同志的信时，相反地，我不仅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缺席），并且始终捍卫信中的基本思想或（为了说得更准确些）我所认为的信中的基本思想。

我保留自己向全党说明这一事实的权利，如果反击流言需要这样做的话，因为我几乎从未对它们作出过反应，这些流言至今没有受到惩罚。

二、改组党的中央机关的基本任务

5. 中央委员会应保持其严密的形式和迅速决断的能力。因此

进一步扩大党中央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中央委员会补充一些中央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使党中央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各项工作受到巨大损失。

6. 另一方面，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与“下层”和整个苏维埃机关保持经常的而不只是定期的联系，在自己周围有一个一贯生气勃勃和积极的党的“外围”，这一个“外围”一方面可以给中央委员会提供地方和“下层”的新鲜经验，并通过这些新鲜经验的力量来给中央委员会施加必要的压力（在需要的时候施加“联合”压力），另一方面，这一“外围”本身由于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密切联系和对这一工作的参与，能站到苏维埃和党的更高的高度上并为中央委员会培养接班人。这一“外围”的主要职能应是从党的角度实施视察、监督、指导、教育和惩罚，因为党渗透到苏维埃机关并把触角伸到城市和农村的下层深处。

7. 这里的问题是，这一“外围”对中央委员会直接抓的问题是否应拥有决定权或发言权，在哪些情况下和以什么形式（“两个中心”问题）进行，我认为与上述基本任务相比是次要问题。我在自己的便函中提了一条建议，我认为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授予这一“外围”以决定权。不过我同意这样的意见：这样做，特别是在初期，总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还没有积累好必要的协作经验。因此，至少在第一年对“外围”仅授予发言权可能更为合理。

三、我对组织方面的建议

8. 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加上人数也许不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因此，中央委员会的上述组成比现在的组成有所缩小，至少不会扩大。根据现有的经验，政治局、组织局和

中央书记处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更加明确了。

9. 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拔 75 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些工人和农民要有较长的党龄且适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领导下从事党和苏维埃的监察工作。

选入主席团的 7 至 9 名成员要有很长党龄，也就是大体相当于中央委员一级的工作人员。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 75 名检查员（或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基本工作任务是在党内和苏维埃的工作中保证全面落实党的路线。

说明：由于在上述一类监察工作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相互联系密切，他们的工作必须协调一致。可以通过以下办法达到协调一致：部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工农检察院院务委员会和部分工农检察院惩罚委员会成员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也可以实行检查员兼职制。

10. 中央委员会有权（根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委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去完成检查任务和其他任务。

11. 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检查员参加的中央全体会议。该会议有权要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他们各部门的工作作全面汇报。

这个组成广泛的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本身是咨询性的，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后负责全会联席会议的正常筹备工作。

12. 确定经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命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应正常参加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并发表意见。

* * *

这些建议仅仅是我在两次会议休会期间仓促拟出的草稿，它们

仅涉及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的组织方面的补充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考虑。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22日

№02699

俄共（布）中央全会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3日）

绝密

1923年2月23日

第23703/C号

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伏龙芝、鲁祖塔克、索尔茨、莫洛托夫同志

俄共中央全会1923年2月22日晚间会议第13号记录摘抄

听取：

1. 托洛茨基同志就组织问题的声明。

决定：

1. (1) 删去组织问题提纲的第一句话（关于“两个中心”）。
(2) 向全会今年2月21日就组织问题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会结束前完成自己的工作并提出报告。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02700

俄共（布）中央全会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3日）

送托洛茨基、李可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安德列耶夫^①、丘巴尔^②、皮达可夫同志

绝密

1923年2月23日第23701/C号

俄共中央全会1923年2月22日晚上会议第13号记录摘抄

听取：

2.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工业组织的提纲。

决定：

2. (1) 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作为基础。(2) 成立由托洛茨基、李可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安德列耶夫、丘巴尔和皮达可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对提纲进行最后加工。托洛茨基同志为召集人。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交报告。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① 安德列耶夫，安·安·（1895～1971）——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铁路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历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农业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

② 丘巴尔，弗·雅·（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3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7月～1934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死，后平反。

№02701

俄共（布）中央全会记录摘抄

（1923年2月24日）

送托洛茨基、李可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安德列耶夫、丘巴尔、皮达可夫同志

绝密

1923年2月24日第23779 / C号

俄共中央全会 1923年2月24日会议第15号记录摘抄

听取：

1. 由全会任命的起草国有工业提纲的委员会的报告（加米涅夫同志）。

决定：

1. 建议委员会继续工作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结果，以便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下次全会上能最后批准关于国有工业的提纲。

№0270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3月1日）

送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同志

绝密

1923年3月1日第23963/C号

俄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3月1日第52次会议记录摘抄

听取：

16.（A）关于国有工业的提纲和（B）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提纲。

决定：

16. 下次会议再议。

中央书记：约·斯大林

№02703

列宁致托洛茨基

(1923年3月5日)

副本

绝密

亲收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

玛·沃·记录

№02704

玛·沃洛季切娃致托洛茨基

（1923年3月5日）

致托洛茨基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对通过电话转给您的那封信补充一点，告诉您加米涅夫同志星期三去格鲁吉亚^①，弗·伊·让我问一下，您是否打算往那儿捎什么东西去。

玛·沃洛季切娃^②

1923年3月5日

-
- ① 加米涅夫和瓦·弗·古比雪夫1923年3月7日星期三前去参加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了解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对格鲁吉亚问题的调查情况。
- ② 沃洛季切娃，玛·阿·（1891—1973）——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4年是人民委员会打字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助理秘书。

№06511

玛·沃洛季切娃的询问结果

(1923年3月5日)

1923年3月5日

托洛茨基同志对于向他口头传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信答复说，由于生病，他不能承担这一义务。但是，他有希望很快恢复健康，因此他请求把材料给他送去（如果别人都不需要的话）先熟悉一下，一旦健康状况允许，他就通读这些材料。

他说，他对文件一无所知。他同马哈拉泽和姆季瓦尼谈过话，还听过奥尔忠尼启则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他声明，如果说他过去还犹犹豫豫，那么现在已确信，一定是出了大错误。

他说，他浑身剧痛，只因得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来的电话，才勉强起来接；他说，他现在不能工作，他甚至不知道，他能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完全失掉了活动能力，他本应起草关于工业的提纲，可是他非常怀疑，他的健康现在能否允许他这样做（他说他现在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改组工农检查院^①的问题很感兴趣，可能的话，他想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谈这个问题，如果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大量工作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信补充说，加米涅夫要去格鲁吉亚参加

^① 指列宁1月23日写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3—377页）。

代表大会，问他是否想往那里捎什么东西，对此他暂且未作任何明确答复。

今天将把材料连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一起寄给他。

玛·沃·电话记录

1923年3月5日

№10810

列宁致斯大林

(1923年3月5日)

绝密
亲收

致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① 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② 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

① 1922年12月21日列宁经医生许可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此信由克鲁普斯卡娅记录。斯大林得知后在电话里骂了克鲁普斯卡娅，并以诉诸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克鲁普斯卡娅因此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② 1922年12月23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如下短信：“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来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提出请求，因为你们是弗·伊·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娜·克鲁普斯卡娅。”

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5日

№02705

列宁致姆季瓦尼等

(1923年3月6日)

致姆季瓦尼、马哈拉泽^①等同志

抄送：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全神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致以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6日

^① 马哈拉泽，菲·耶·（1868—194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3月至1922年2月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农业人民委员。1922年起任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0811

斯大林致列宁

（1923年3月7日）

亲收

斯大林致列宁同志

列宁同志：

大约5个星期前我同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谈过一次话，在我看来，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当时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

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因为除了愿您尽早康复之外，我别无他求。此外，我把监督制度的执行视为自己的职责。我同娜·康·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谈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①

约·斯大林

^① 列宁由于病发瘫痪，没有看到这封信。

№06512

加米涅夫致季诺维也夫

(1923年3月7日)

绝密

1923年3月7日4时

亲爱的格里戈里：

两小时后我就要走了。为使你了解情况，向你通报几件事。老头子^①在得知格鲁吉亚代表大会定于3月12日召开后非常激动不安，并且（1）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请他“出面在党内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托洛茨基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昨天晚上把我叫去商量；（2）给“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写了一封两行的短信（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并让我转交他们，此信实际上支持姆季瓦尼一伙，否定谢尔戈、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3）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抄送我和你），想必你已收到。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

我将竭尽全力争取高加索在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和平，但愿这些决议能将双方联合起来。

我认为这一点能够达到。但是我担心这将不会令老头子满意，看来，他不仅希望高加索实现和平，而且希望从上边作出明确的组

^① 老头子——列宁的党内化名。

织结论。

我认为，这段时间你必须待在莫斯科并同在梯弗利斯的我保持联系。代表大会延至4月15日召开^①，这样就有机会再次讨论从列举的全部事实中得出的所有结论。遗憾的是，走前不能同你面谈了。

握手！

列·加米涅夫

^① 指1923年4月17~25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No 06513

斯大林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3年3月7日)

绝密
莫斯科

亲爱的谢尔戈：

加米涅夫告诉我，说伊里奇给马哈拉泽等同志捎去一封短信，他在信中站在倾向分子一边并责骂你、捷尔任斯基同志和我。目的显然是向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大会施加压力以利于倾向分子。不用说，倾向分子收到此信后，定会全力利用它来反对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特别是反对你和米雅斯尼科夫同志^①。我建议：

1. 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不要向格鲁吉亚共产党多数派施加任何压力，而且可以让他们尽情表现。

2. 争取达成这样一种妥协，也就是说，应是合乎情理的、自愿的妥协。

3. 我听说，米雅斯尼科夫想来参加代表大会，但似乎由于人手不够而不肯放他。我认为，绝对应当准许他作为代表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因为我相信，他肯定会当选为大会代表的。

^① 米雅斯尼科夫，亚·费·（1886～1925）——十月革命后历任西方面军总司令，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常务局主席，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二）

你的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7日于莫斯科

附 言：

代表大会延至4月15日开幕。全会定于4月10日召开。请准时出席。

约·斯大林

№02706

托洛茨基关于工业的提纲

(1923年3月6日)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相互关系最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在对于振兴国家具有头等意义的农业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虽然不断扩大和深入，但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内仍将主要具有辅助的、协助的经营教育性质，因为绝大多数的农产品还将长期由小商品生产者来生产。

在财政方面，目前的政策——节约国家资金、正常的税收制度、正确编制的预算——应该并今后仍将以不懈的努力加以执行，但只有在国有工业获得盈利并得到大力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我国的国防在大力缩编、几乎只剩下军队骨干、因而逐步向民兵制过渡时，其任务基本上归结为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预算的编制、国家信贷政策、整套国家军

事安全措施以至整个国家活动都应该把关心国有工业的有计划发展放在首位。

在我国总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国有工业的复兴必然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农业中作为超出农村消费的农产品余量应形成必要的流动资金。但对于国有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落后于农业，否则在农业的基础上会形成私有工业，而私有工业最终会吞并或蚕食国有工业。

工业只有在产出大于消耗时才能取得的胜利。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而生存的工业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稳固而长期的支柱。关于国有工业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国家不积累剩余价值，国有工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国有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又是我国农业朝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因此，通过国有工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二、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优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良好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影响表现为工业活动的复苏、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生活状况不容置疑的大幅度改善，以及首先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对待基本的和局部的经济任务，这是今后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但是工业的实际状况仍然极其困难。轻工业的复苏自然是由于收成不错、市场恢复这一事实作成的，但这一复苏并未成为所有的轻工业企业和部门进一步正常发展的保证。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极其高昂（尤其是同农产品价格相比）却并非总是具有恢复的性质，因此，并不能保证生产的扩大。一些托拉

斯活力的提高是依靠原有的原料储备，而恢复原料储备目前是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重工业刚同市场有所接触，实际上完全依赖国家定货，为了恢复，需要国家投入经过精确计算的大笔资金。铁路和水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如此。

因此，由于整个经济的条件，轻工业价格尚未调整得正常（价格极其高昂又往往达不到恢复的水平），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这都是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主要缺点，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期是由于此前的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经济关系的必然破坏所导致的。在市场基础上达到比较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价格调节，确立轻工业部门和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工农业部门之间比较正常的关系；最后，重工业和轻工业战线拉平——这是国家在目前已经到来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时期中在工业活动方面的根本任务。这些任务只有在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时才能完成。

三、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在苏维埃俄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资料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和主人的统治作用，计划原则在初期就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此前的整个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时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订出这样的计划。

因此最近这一时期的任务具有一般指令性质和很大程度上的准备性质。这一任务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确定，要求经济领导机关及其基本任务、方法、实际工作始终不断地、百倍警觉地适应市场现象和市场关系。计划方法只有得到彻底发展才能并必然能控制市场并从而取缔市场。

因此十分明显有两个由于近期采用国家的经济计划方法而引起的危险：（1）当试图通过计划干预超越经济发展，用尚未得到生动的经济经验必要验证的行政措施来取代市场的调节时，必然会出现我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见过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局部的或全局的经济危机（“阻塞”、“堵塞”等）；（2）当集中调节落后于对调节的迫切需要时，在适时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将用市场的非经济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托拉斯为了取得工作成就应能自由定向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负责，那么，另一方面，国家应把托拉斯及其他联合组织看做自己的职能机构，借助它们摸清整个市场，从而使优于单个托拉斯或联合组织的市场定向的一系列实际措施可以实行。例如，中央经济机关能够早在一个托拉斯通过实践确信自己的处境毫无希望之前就得出必须撤销这一托拉斯的结论。

轻重工业的相互关系决不能仅仅通过市场途径来解决，因为这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危险，即在最近几年摧毁重工业，然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予以恢复，但已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了。

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国家对于大部分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以及信贷资金来说仍然是所有者和经营主体，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原则就其规模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原则区别不大。但就其方法而言则区别极大。总管理局式的行政手段被经营的机动所取代。

计划方法在行政实施时应通过仔细地摸清基础的办法慎而又慎地加以扩大。

准备工作应表现为有关经济机关对在某种经济情势（由于新粮上市、资金流向农村，等等）下必然或十分可能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现象作出经济预见或指示，并把这一预见尽可能在工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具体化，对利用预期的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作出大致的逐日指示。

十分明显，工业基本计划的实现不可能靠工业本身内部即仅靠工业的行政领导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努力，这项工作应成为位于工业组织之上并把工业与金融业、运输业等联系起来的专门计划机构的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其地位来说应是这样的机构。但是必须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比较确定的地位、比较固定的组织、比较明确和肯定的权力，尤其是职责。以下一点应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加以确认：共和国各高级机关不能撇开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不管是由它自身还是由其他任何主管部门提出的倡议，应结合整个经济工作来分析新问题、方案或建议，从而确定其比重和意义。必须十分坚决地摒弃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和机关匆忙草率、心血来潮、拐弯抹角地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的尝试，把这样的尝试看做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和行政游击主义十分有害的残余。

对每个主管部门工作的成功与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以供全面研究和协调。而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工作成功与否的评价则更应从以下角度来考虑：是否及时提出经济问题，是否正确预见未来和促使各主管部门及时在预算上和实践中协调其工作需要协调的各部门和各个方面。

必须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与我们国家工作中最大的祸害——建立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偶然性的工作委员会（后续性的、指导性的、检查性的、筹备性的等等）的现象作斗争。必须保证通过正常的常设机构来正常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改进这些机关，发挥其必要的灵活性——办法是使它们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适应其任务。

由于不预先决定今后是否需要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计划工作的领导机构、国家经济的总司令部以这样或那样的行政权力以及具体是哪些权力，近期内只需要确定当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需要强制力时，应由中央有关权力机关（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予以批准。

四、托拉斯及其作用和必要的改造

国家是生产和运输业固定资产的拥有者。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关和联合组织（托拉斯）管理着委托给它们的一部分国家产业，其独立程度视目前市场条件下的经营需要由上面即上级国家机关决定。

国家支配托拉斯、铁路等债务之外的财产的权力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实际上国家政权对经济机关的日常工作的干预和经济机关对各下属全权机构、托拉斯等日常工作的干预，其范围和形式完全根据经济上是否适宜这一点来确定，并由有关条例来调整。

大部分国有工业组成托拉斯，即享有广泛的经济自主权的联合

组织，它们在市场上作为交换经济单位自由行动。这些经济联合组织及其所属各企业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并实现国家积累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只有国家积累才能保证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直接满足国家重大需要的国有企业，如军事工业，还应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要求。

鉴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企业的组合及其划分成托拉斯、各托拉斯之间的资金分配、信贷等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带有先验的、官僚主义的性质。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看，这只是大略的、粗线条的试验。对这些试验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对经验、对日复一日的市场和行政管理经验因素的配合的检验，而不是通过思辩来加以纠正，加以改变。

对缺乏流动资金的抱怨只说明国家在改行经济政策时管理的工业企业的数量超过我国在由于几年国内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总的经济状况下的能力。其后果是企业不稳定，工作时断时续，主要是负荷不足，以致造成产品成本过高，市场萎缩及由此出现的种种经济困难。

出路是坚决把生产集中在技术装备精良、地理位置优越的企业里。反对这样做的各种附带的、次要的考虑，不管其本身如何重要，与用必要的流动资金保证国有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取利润等基本经济任务相比，都应退居次要地位。

从纯生产条件和商业条件的角度对托拉斯的结构和构成的重新考虑，应完全摆脱企业只按横向或垂直原则结合这种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偏见，因为这种重新考虑的指导原则应是关于企业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各企业间以及它们与交通和市场的地理位置（联合公司等）等的物质考虑，而不应是形式上的考虑。在摒弃部

门的或地区的非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与更有利、更能获利的生产组织原则发生冲突）的同时，必须认真听取和考虑到有关的托拉斯和工厂本身的呼声，因为他们的生动经验证明了必须放弃组织上的公式化。

降低生产费用应从复兴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而不是从取得市场上的短期成功的角度出发。

按昨天的虚拟价格考虑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应该作为对国家财产的浪费而受到严厉惩处。

通过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临时降价的政策，同样是完全错误的，致命的。不恢复重工业，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就失去了基础。煤炭、石油、金属——这些工业部门的成就才能切实保证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及其外部安全。

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常坚定不移地对托拉斯实施领导，按上述指示精神把工业的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预见并酝酿其必要的组合，保证在生产各个阶段正确而及时地利用生产的各个要素（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工业战线上才有可能取得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成就。

五、工业和商业

如果不能正确组织销售，生产成就今后仍将导致局部的阻塞，即导致即使在目前极为窄小的市场状况下也难加以认可的商业疲软的危机。应把建立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真正的、尽可能多的联系的商业机关基层环节的工作提到第一位。至于辛迪加化，在近期内实施应十分谨慎，应充分符合市场的状况和托拉斯的资源。把辛迪加变成商业“总管理局”只会缩小商业活动和提高附加费用。强行辛迪加化在经济上应作好准备，在商业上应有充分理由。

托拉斯和各个企业较大的业务独立性，各辛迪加较灵活的活动，以至我国工业的整个现状，都要求纯生产活动和纯商业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这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来说都是如此。在不预先规定这一协调的组织形式的同时，现在就应该确认，对这一领域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制定协调工商业活动的实际方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不断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后，才有可能完成。

六、工厂

生产取得成绩或遭致失败的根子在基本的工业单位即每一个工厂。不仅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托拉斯在保持对企业的总领导并把为此所需的一切生产和商业部门和业务集中起来的同时，应尽全力避免集中过头，扼杀主动性和强行干预各企业的工作。

每个工厂的独立的成本核算应不仅能使人确定工厂获利多少、其发展或衰落的程度，而且能成为严格与企业特点相符的奖励制度的总的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表和监督

企业、托拉斯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否正确，整个经营活动是否正常，在目前条件下对此惟一重要而可靠的凭经验的检验，只有看其物质成果，看商业平衡表所表现出的这些成果。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囊括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的簿记，没有决定国有工业产品实际成

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就无法保证防止国有化财产化整为零或遭到盗窃，而且托拉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有财产流入私人之手的渠道。

制定出统一簿记的方法和监督簿记的实际进行、全力使之更加精确和完善，应是经济领导机关，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这一工作的目的应是实行整个国有工业（在今后则是整个国有经济）的统一的实际平衡表。

正确组织国家对工业成本核算和工商业平衡表的检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紧迫任务。缺少这种内行的熟练的监督会使其他各种经济检查化为乌有，造成与正确安排经济不相容的不负责任感。

八、工 资

前一时期的工资实践总的来说证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尤其是关于工会和经济组织之间订立集体合同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以认定，去年各类工人的工资都有很大提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工资的总政策今后的方向应是把各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或多或少地拉平，并对平均熟练程度作必要的调整，以使不同工业部门中相同熟练程度工人的工资，尽可能不取决于市场的局部波动，在个人工资确实受实际产量制约的条件下大体相同。有关国家机关应与工会一起致力于使某一工业部门较好的形势不仅给这一工业部门的工人带来好处，而且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提高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和运输业的工资。

国家机关和工会在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时，应该牢牢记住只有在工业不断发展即工业带来利润的基础上才可能持续而

全面地得到改善。从这一角度来看，如维持任务不足的企业开工，工厂养活的工人数量与该厂的实际生产率不相适应，这样的措施都是亏损最大最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形式，因而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明天的。

以各种不是出于生产需要也不是法律规定的附加费用来加重工业企业的负担，不管其用途多么重要，都会给经济和国家带来无穷的危害，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正常的成本核算的可能，以半隐蔽的形式把国家目前财力所不及的支出强加于国家。托拉斯的生产“赞助”，即不是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国家调控的“赞助”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必须认真检查在目前形势下劳动法典以及关于劳动力、工资、各种工种工时长短、社会保险提成、文化教育提成等等条例的实施情况，以便一方面在工业现状容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取消或暂时修改目前经济状况下明显难以执行的条例。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应十分客观地共同挑选经过严格检查过的实际材料，供采取上述立法修正或行政措施之用。

九、拨款、信贷、税收和海关税率

整顿和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要条件，是切实调整国家预算，使之接近于国家的实际资金，接近于这些资金的有计划的支出。必须把以下财政上的做法当作最大的祸害来加以彻底肃清，在收支不符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卢布贬值来加以抵消，支付货币资金时随意确定折算率，从而从根本上破坏极其重要的经济机关的稳定性。工业（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无偿或按不能弥补产品成本的随意定价划拨给国家，主要是划拨给运输业和军事部门的做法带来了同样的后果。

今后一旦发现实际收入和预算用途不符并因此必须削减预算的开支部分，这样的削减不应是遮遮掩掩的，而应是公开的，通过修改预算及由此带来的一定后果（有计划地压缩运输业、工业企业、军队等）来进行。

工业信贷体制不仅是财政的任务，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和领导工业的活动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国有工业拨款必须尽可能集中由一个信贷机构进行，而这个机构则应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关于税收和消费税与工业支付能力和市场容量相符的问题、关于从保护有关国内工业部门的角度来确定某些进口商品的海关税率问题。

从国外采购和定货，如果并非绝对必要，而有关定货在国内的配置会对我国有关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原文如此，似应为：阻碍作用——译注），即使其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也应坚决放弃。

只有实行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制度，才能在目前的过渡时期里保证苏维埃国家工业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切实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完全能在一定的而且相当广泛范围内与工业部门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并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有条不紊的措施来吸收外国资本以目前已发现的合理的形式（租让、合营公司、租赁）投入工业。要仔细研究以下问题：哪些工业部门和企业根据哪些原则向外国资本提供有利于国家总的经济发展。这一研究应成为共和国计划机关以至一切经济领导机关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

一。

十一、经济工作者及其处境和任务，培养新一代 技术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工会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其正确性已为最近一年的经验所肯定，今后仍应本着上述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巩固。

切实的一长制应在工业组织中自上而下地全部实行。工作人员的选拔以及调动和撤换，是经济领导机关握有的切实领导工业和对其前途负起责任的必要条件。工会机构的推荐和鉴定应得到十分重视，但决不能推卸有关经济机关的责任，因为现行条例给予这些机关以选拔和任命的充分自由。

国有工业和商业的弱点是它们的组织臃肿，因循守旧，不善经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经济工作者的选拔不力，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的利益与其本身工作的成绩挂钩不够。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正确的有条不紊的措施。尤其是对企业领导人的奖励应取决于平衡表，而工资应取决于产量。

由于经济工作领导人（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等）的任务是降低生产开支和获取利润，因此他们的工作常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往往导致冲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始终面临两个危险：（1）由于要求过高而引起企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或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2）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针，从而牺牲企业的赢利，因而也牺牲了企业的前途。苏维埃工厂的厂长当然应该十分关注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关心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但他同时决不应忽视，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职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扩大

工人国家掌握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应对苏维埃厂长在采取这些行动时给予全力支持。认真、坚定和精打细算，是苏维埃经济工作者的必备品质。企业的顺差是对他的最高鉴定。

应当帮助工人群众懂得，力求获取利润的厂长同力求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保护工人的健康的工会工作者一样，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新的经济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应具有系统性，同时也应具有深刻的专业性。应当用具有一定工龄按一定计划有步骤的学习来取代匆忙草率，不求甚解的大轰大嗡的学习办法。应向第一时期提拔的、还来不及获得必要知识的工作人员提供弥补最重大缺陷的机会。

但是按实际工作类型划分的专业化应与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团结紧密结合，否则专业化会给党造成危害，如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会给经济带来打击一样。

党和工会应十分重视扩大各级经济系统工业管理机构中工人经济工作者骨干，尤其是共产党员。

学习技术对于新一代来说不仅应是专业化问题，而且应是一项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的条件下，以往青年工人用于革命政治斗争的热情应转向掌握科学和技术。对待学习马虎的大学生应像对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逃兵和叛徒一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不是追逐名利之途，而是建立功勋的事业。

十二、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认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分工的决议，坚持要在中央和地方更全面更有步骤地贯彻这一决议，尤其认为必须确认党毫无疑问有权支配自

己的工作人员，但这决不应在实践中变成未经协商就频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而应在严格和绝对必要时才行使这一权力，而且党组织应全力支持这样的做法：内行的经济机构不仅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实际可能性来逐步培养经济工作者，并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正常地加以提升。

十三、印刷业

正常组织印刷业的问题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代表大会认为印刷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改进。

必须改进出版物，首先是大量发行的出版物的技术。关于组织印刷工业的问题应在短期内解决，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列·托洛茨基（签名）

1923年3月6日

这是关于工业的提纲的定稿本

维 特

1923年3月22日

№0270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3月8日）

绝密

第 24379 / C 号

送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安德列耶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波格丹诺夫同志

俄共中央政治局 1923 年 3 月 8 日第 53 次会议记录摘抄

听取：

13. 关于国有工业的提纲（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安德列耶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波格丹诺夫同志）。

决定：

13.（1）责成中央书记处向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工作委员会委员分发对关于国有工业的提纲的所有修改意见。

（2）建议工作委员会于本周内再次开会并在政治局下次会议上提出报告。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02708

彼·阿·波格丹诺夫对工业提纲的修改意见

(1923年3月13日)

关于第二部分

在评述轻工业的艰难处境时必须指出，由于缺少足够的流动资金以及信贷条件苛刻，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工业部门状况的困难。

其次应指出缺少良好的市场分配机构，特别是合作社工作薄弱，因此给轻工业状况造成困难并促使价格上涨。

在这一部分的第二段中应指出，市场总的组织欠佳是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缺点，在这一时期调节价格的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因为市场机构的组织以及信贷同样是重要问题。

在这一部分结尾应指出新经济政策第二时期的任务是：(1) 为了发展工业而组织市场，尤其是确立价格的有效调节（不是行政干预）；(2) 对国有工业的商业业务扩大信贷。

关于原料问题，基本任务是恢复提供原料的经济部门，因为其中某些部门几乎已完全遭到破坏，而不是“确立轻工业部门和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部门之间比较正常的关系”；提出的这一点在整个原料问题中是个局部问题。

关于第四部分

在说明建立托拉斯条件的那一段之后，应补充一点：对托拉斯的

重新审查应极其慎重，要保留已证明有能力经营赢利的联合组织。

说明向集中过渡的理由的那一段应作修改：不是抱怨流动资金不足，而是分析托拉斯经营活动的结果，特别是确定造成产品成本高昂的原因，让人得出以下结论：国家在现有的流动资金的条件下无力经营现在联合成托拉斯的那么多数量的企业。

关于第五部分

在“建立商业机关基层环节”一句之后应稍加指出有必要加强合作社工作以及利用表现出充分活力并在多数省份能深入农村的省商业机构。

至于辛迪加化，则关于把辛迪加变成商业总管理局的那句话令人不解。辛迪加化的过程是这样的：起初把辛迪加看做仅仅是托拉斯的商业组织；随着工作的发展，轻工业辛迪加越来越成为调节加入辛迪加的各托拉斯的总的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机构，并对组织生产产生间接影响，因为辛迪加考虑到市场对一定质量和一定价格的商品的要求。我认为辛迪加的这种作用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能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实现价格的有效调节。应该指出辛迪加作为组织市场的机构的这一正面作用。

从实践中发现的辛迪加的第二个作用是，把托拉斯对主要品种的原料的采购业务集中在辛迪加的手中。这一点同样是肯定的，因为这一组织由于拥有商务办事处、仓库等分支机构，能轻而易举地处理原料的采购业务。

这一部分的结尾我建议可以这样提：“国民经济的利益要求正确组织市场，尤其是调节价格。这一任务只有通过作为主要部分工业商品的拥有者和与组织良好的市场基层分配机构利益攸关的工业机构对市场的有效影响来完成（合作社、省商业机构、交易所等的

工作)。从组织上来说，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把目前所有从事解决工业问题和商业问题的国家机构，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内商业委员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机构——人民委员部才能完成”。

关于第九部分

在关于税收和消费的那一段中应强调税收和消费还必须与市场容量相符，因为在消费税方面可以证明，高税率和多次提交消费税只会导致销售下降（如白糖）。

1923年3月13日^①

^① 波格丹诺夫，彼·阿·（1882--1939）—1921—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0270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3月22日）

绝密

第 23963 / C 号

送托洛茨基同志

俄共中央政治局 1923 年 3 月 22 日第 56 次会议记录摘抄

听取：

26. 托洛茨基同志就用作固定资本的信贷问题提出的建议（托洛茨基同志）。

决定：

26. 下次会议再议。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0651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7号记录摘抄

（1923年3月26日）

听取：

8. 加米涅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关于格鲁吉亚的报告。

决定：

一、通过加米涅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提出的下述建议：

1. 鉴于姆季瓦尼同志和格格奇科利同志热衷于在党内制造紧张关系，从而造成格鲁吉亚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气氛和难以克服的有碍和平的障碍，将他们调任别的工作。

2. 将科捷·钦察泽^①增补进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3. 关于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人选问题，鉴于该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奥拉赫拉什维利^②、米雅斯尼科夫和基洛夫^③四同志的电报请求，推迟到外高加索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到来后共同讨论。

① 钦察泽，科捷·马·（1887～1930）——1904～1927年为苏联共产党党员。1921年任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主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② 奥拉赫拉什维利，马·德·（1881～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在格鲁吉亚从事地下工作，任格共（布）中央主席和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成员。1921年起先后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格共（布）中央书记、俄共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2年12月起任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③ 基洛夫，谢·米·（1886～1934）——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5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和市委书记。1934年12月遇刺身亡。

二、赞同加米涅夫同志、古比雪夫同志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两派代表于今年3月14日签署的提纲草案。

三、责成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古比雪夫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给格鲁吉亚共产党员的信，信中应指明双方的错误，并在对这些错误作出评价的基础上坚决要求双方必须团结合作。信中还必须指出在统一各人民委员部实现联邦的过程中所犯的的错误，特别要强调指出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过分指责是不正确的^①。

四、否决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召回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建议（5票对2票）。

五、将决定全文报告俄共（布）中央全会^②。

① 1923年2月5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散发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内的冲突给各省委和州委的信的简述》。1923年2月6日俄共（布）中央书记助理A. M. 纳扎列强将这封信寄给列宁。保存下来的玛·伊·格利亚谢尔的记录写道：“纳扎列强同志今年2月6日向我转达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立即将中央委员会就政治局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定一事给各省委和州委的信呈报列宁同志……我问道，这么做难道不需要等费尔斯特尔教授的诊断了吗？因为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关于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的问题推迟到费尔斯特教授作出诊断之后，此外，我们只能在三个星期以后，在研究完全部材料后才能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纳扎列强同志再次请示斯大林同志后对我说，可以把这些材料写进综合报告，但是当我们写报告时，务必要把这两封信写进去。玛·格利亚谢尔”

② 1923年3月31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

№06515

格利亚谢尔同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①

(1923年3月26日)

格利亚谢尔致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

在对民族问题进行辩论时您曾说过，如果说您在通过关于格鲁吉亚冲突问题的决定时还有怀疑，那么现在（辩论时）您就更加确信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奥尔忠尼启则在高加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我对您的话理解得对吗？

玛·格利亚谢尔

托洛茨基致格利亚谢尔

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难道进行辩论的情况已被记录在案？

我说的话大意如下：如果说我曾怀疑奥尔忠尼启则的政策和政治局的决定是否正确，那么现在（在奥尔忠尼启则发言之后）这种怀疑则增加了一百倍。

托洛茨基

^① 这两张便条是格利亚谢尔和托洛茨基在1923年3月2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写的。格利亚谢尔当时是会议记录员。

№06516

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第 19 号记录摘抄^①

（1923 年 3 月 31 日）

听取：

4. 关于格鲁吉亚的情况（加米涅夫同志）。政治局会议第 57 号记录第 8 条^②。

决定：

4. 原则上批准政治局今年 3 月 26 日的决定，并作如下修改：

（1）格格奇科利和钦察泽两同志留在格鲁吉亚，将钦察泽同志增补进中央委员会。

① 1923 年 4 月 2 日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向全体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散发了由斯大林签署的修改后的决定文本。

“1. 格格奇科利和钦察泽两同志留在格鲁吉亚，将钦察泽同志增补进中央委员会。

2. 将姆季瓦尼同志调离格鲁吉亚（多数票对 3 票）。

3. 关于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人选问题，鉴于该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奥拉赫拉什维利、米雅斯尼科夫和基洛夫四同志的电报请求。推迟到外高加索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到来后共同讨论。

4. 赞同加米涅夫同志、古比雪夫同志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两派代表于今年 3 月 14 日签署的提纲草案。

5. 责成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古比雪夫、伏龙芝和彼得罗夫斯基五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给格鲁吉亚共产党员的信，信中应指明双方的错误，并在对这些错误作出评价的基础上坚决要求双方必须团结合作，信中还务必要指出在统一各人民委员部实现联邦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错误，特别要强调指出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过分指责是不正确的。

6. 否决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召回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建议（多数票对 2 票）。”

② 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3 年 3 月 26 日会议第 57 号记录。

(2) 将姆季瓦尼同志调离格鲁吉亚 (多数票对 3 票)。

(3) 否决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召回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建议 (多数票对 2 票)。

(4) 将伏龙芝和彼得罗夫斯基两同志增补进给格鲁吉亚共产党员的信的起草委员会。

(5) 给委员会追加一项任务, 即指出少数派在反对联邦思想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错误。

№06517

托洛茨基致布哈林

（1923年4月1日）

致布哈林同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觉得，您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民族问题写一篇文章，不是轻描淡写，要有分量。您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特立场无疑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一致，不是显示那种表面上的和谐，而是要表明党的基本核心在这个问题上将会一致地、毫不妥协地同一切错误行为进行斗争。

顺便将我收到的吉基亚同志的来信转寄给您。此信本身写得不很严肃，也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但是暴露出很多苗头。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心情不安，认识不清。在民族问题上的“漠不关心”往往是假的，掩盖着惊慌失措情绪。在民族问题上必须动用党的固定资本了。

吉基亚同志的信用完后请退还给我。

您的 列·托洛茨基亲笔

1923年4月1日

№06518

福季耶娃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文章致斯大林^①

(1923年4月16日)

机密

致斯大林同志

随信所附的列宁同志的文章^②是他于1922年12月31日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打算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在他最近一次发病前不久我问过他，他是否认为需要发表这篇文章，他说，是的，我打算发表，不过要晚些时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民族问题感到不安，他准备就此问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这篇文章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让您知道这篇文章是我对党应尽的义务，尽管我没有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正式指示。

早些时候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起初还不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在代表大会前亲自表达他在这方面的意愿，而最近两个半星期我又生病了，今天第一天上班。

请您把文章退回，因为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档案中惟一的一份。

莉·福季耶娃

1923年4月16日

^① 信上有福季耶娃的批注：“未寄出，因为斯大林说，他不介入此事。”

^② 指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

No02711

托洛茨基就列宁论 民族问题的文章致全体中央委员

（1923年4月16日）

绝密

致俄共全体中央委员

我今天收到随此件附上的列宁私人秘书莉·福季耶娃同志就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致加米涅夫同志信的抄件。

列宁同志的文章我于3月5日收到，同时还收到列宁同志的三封短信，这些短信的抄件也随此件附上。

我当时为自己抄下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具有非常的原则意义，我把这篇文章当作我对斯大林同志的（斯大林同志采纳的）提纲的修改意见和我在《真理报》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的基础。

如上所述，这篇文章具有头等重要的原则意义。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包含了对三位中央委员的严厉谴责。当时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篇文章向党代表大会作出某些指示（从各种情况看，尤其是从福季耶娃同志的信看，这篇文章是为党代表大会写的）尚抱有一线希望，因此至今我没有提出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

在目前出现的局面（这一局面已为福季耶娃同志的来信所确认）下，我只有向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通报这篇文章，此外别无办法，因为依我看，这篇文章对于党的民族问题政策的意义不小于前

面那一篇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的文章。

如果没有一位中央委员（出于党内性质的考虑，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提出关于以某种形式将这篇文章告知全党或党代表大会的话，我将把这一点看做是默认解除我对党代表大会就这篇文章应负的个人责任。

列·托洛茨基

1923年4月16日

附：福季耶娃同志的信，列宁同志的三封短信和文章。

№02712

福季耶娃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文章致加米涅夫

（1923年4月16日）

致加米涅夫同志

抄送：托洛茨基同志

列夫·波里索维奇：

作为对我们电话通话的补充，我向主持政治局的您作如下报告：
正如我已向您报告的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922 年 12 月 31 日口授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这个问题使他非常激动，他打算就这一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讲话。
他在最近一次病倒之前不久对我说，他要发表这篇文章，不过要再过一些时候。之后他就病了，没有做出最终的安排。

弗·伊·认为这篇文章是指导性的，赋予重大的意义。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把这篇文章告诉了托洛茨基同志，鉴于两人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一致，弗·伊·委托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就这一问题维护弗·伊·的观点。

根据弗·伊·的指示，我手头的这篇文章的惟一的一份存放在他的秘密档案中。

上述情况特向您报告。

此前我没能这样做，因为我今天才病愈上班。

列宁同志的私人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3年4月16日

№06520

加米涅夫致俄共（布）中央书记处

（1923年4月16日）

致中央书记处^①

我刚刚（5时35分）收到所附的福季耶娃同志的便条，现转寄给中央，因为便条内容与我个人毫无关系。我认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的发表问题，中央应立即作出明确决定。

列·加米涅夫

1923年4月16日5时45分

^① 加米涅夫给自己留了一份该便条的抄件，内容如下：“致中央书记处。尊敬的同志，我刚刚收到所附的福季耶娃同志的便条。其内容显然与我个人毫无关系。因此现将福季耶娃同志的这张便条和我给她的答复转寄给您。”这张加米涅夫用红墨水写的便条同他抄写的给福季耶娃的信的抄件保存在一起。

№06521

加米涅夫致福季耶娃^①

（1923年4月16日）

1923年4月16日

福季耶娃同志：

刚刚收到您的便条。一个多月前托洛茨基同志给我看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并指出（根据您说的）要完全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公开，不仅不能发表，而且不能口头传达。我觉得，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能作新的指示了。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您对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和现在对我所说的相矛盾，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惊讶。

我怎么也判断不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是什么，因为您在转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这种对于全党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显然没有做到绝对准确和合乎手续。

如果您确信您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上的意愿是什么，您就应该立即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

因为政治局里不存在“会议主席”的称号（主席是每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所以我感到奇怪，您为什么要给我写信，而不是按照正常的党内程序——通过中央书记处。

您的便条和我的答复我全部转寄给了中央书记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加米涅夫

^① 在该信的第2份上有加米涅夫的批注：“抄件，送俄共中央。”

№06522

福季耶娃致斯大林

(1923年4月16日)

斯大林同志：

我今天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商量过是否可以发表我寄给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篇文章，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他打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后（他曾准备发言）发表此文。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意思是，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关于发表这篇文章的直接指示，文章不能发表，她认为只能向代表大会代表作传达。

我认为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这篇文章尚未完成，还不能发表。

莉·福季耶娃

1923年4月16日晚9时

№06523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委员

（1923年4月16日）

斯大林同志给中央委员的声明

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早在3月5日就收到了列宁同志这些无疑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文章，他居然认为可以把它们搁置一个多月而不向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报告，直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提交出来。今天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告诉我，说大家都在议论这些文章，在代表中间有种种流言和传闻。我今天得知，知情者都是些与中央委员会毫不相干的人，而中央委员却不得不靠这些流言和传闻过日子，显然，应该先向中央委员会通报文章的内容。我认为，列宁同志的文章应该在报刊上发表。但遗憾的是，正像福季耶娃同志的信明确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能发表，因为文章尚未经列宁同志审定。

约·斯大林

1923年4月16日晚10时

№06524

纳扎列强致俄共（布）全体中央委员

（1923年4月16日）

绝密

致全体俄共中央委员 列宁同志

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委托，兹向中央委员们呈送以下文件：

1. 托洛茨基同志给中央委员的信；
2. 列宁同志 1922 年 12 月底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3. 福季耶娃同志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信及加米涅夫同志的回信；
4. 福季耶娃同志给斯大林同志的信；
5. 斯大林同志的声明。^①

中央书记助理 A. 纳扎列强

^① 所列文件散发给俄共（布）中央委员并根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1923 年 4 月 18 日的决定向各代表团代表分别宣读。

№02713

托洛茨基就斯大林的声明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们

（1923年4月17日）

绝密

就斯大林同志4月16日的声明致俄共中央委员们

1. 列宁同志的文章是由列宁同志通过福季耶娃同志秘密地交我亲收的，而且尽管我马上就表示打算请政治局委员们读一下这一篇文章，列宁同志却通过福季耶娃同志坚决反对这样做。

2. 由于我收到文章后两天列宁同志的病情恶化，自然停止了就这一问题同他的进一步联系。

3. 过了一段时间格利亚谢尔同志向我要这篇文章，我就还给了她。

4. 我抄录这篇文章是供个人使用的（为了表述对斯大林同志提纲的修改意见，为了撰写自己的文章等等）。

5. 列宁同志对于他的文章以及关于格鲁吉亚（“我正在准备发言稿和文章”）的其他文件作了哪些指示，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推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或列宁同志的秘书那里有有关的指示。出于无需解释的原因我认为就此事去问任何人都不合适。

6. 我昨天和福季耶娃同志通了电话并看了她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信才知道，列宁关于这篇文章没有作任何指示。既然列宁同志对

此问题没有正式表示意愿，这一问题还应根据政治上的适宜性来解决。我当然不能单独对作出这样的决定承担责任，因此把这一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决定。我在刚一得知列宁同志对他的文章今后如何处理没有给任何人作过直接的正式指示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就这样做了。文章的原件保存在他的秘书那里。

7. 如果有人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对，那么我建议或者由代表大会的争议委员会或者由专门委员会来审理这件事。我认为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列·托洛茨基

1923年4月17日

No 02714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

（1923年4月18日）

亲启

无副本

斯大林同志：

昨天您和我面谈后说，您已完全清楚，在关于列宁同志的文章的问题上我没有做错什么，您将本着这一意思写一个书面声明。到今天上午（11时）我没有收到这样的声明。也许您昨天的报告妨碍您这样做。

您的第一个声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为您所否定，这就使某些同志可以在部分代表中散布相应的说法。

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容许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其原因您自然很清楚），我认为必须尽快了结这件事。如果您在回复这封信时没有说明，您将在今天向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发声明，排除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不清的可能性，则我将认为您改变了您昨天的打算，我将请求争议委员会审理整个这一问题。

您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至今没有这样做，决不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的利益带来损害。

列·托洛茨基

1923年4月18日

№06525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会议第2号记录摘抄

（1923年4月18日）

听取：

1. 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包括格鲁吉亚问题的信件。

决定：

1. (1) 在各代表团代表会议上宣读列宁同志的信件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材料。

- (2) 此后主席团委员再次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宣读这些材料。

- (3) 与此同时向各代表团代表和各代表团通报中央全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定。

- (4) 上述信件和材料不向民族问题小组宣读。

听取：

2. 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即4月16日向俄共中央委员通报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内容的问题。

决定：

2. 由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确认：中央之所以在代表大会前夕才得知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信，这与任何一个中央委员的意愿完全无关，而只是由于列宁同志的指示和他的病情所致。

因此，如再散布任何传闻，说某个中央委员拖延了这一信件的公布，主席团都将认为这是诽谤行为。

№10806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团委员对季诺维也夫
建议的意见汇编^①

（1923年6月初）

副本

绝密

1. “我认为此文应当公布，如果没有妨碍这样做的某种手续上的理由的话。

此文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论苏汉诺夫）在转交方面（在转交的条件上）有无区别。”

托洛茨基

2. “不能刊印，这是未讲的政治局讲话。仅此而已。文章的基础和内容是对个人的评语。”

加米涅夫

^① 季诺维也夫的建议本身未见。从汇编的内容可以看出，应是指列宁1922年12月24日和1923年1月4日所口授的文件，即通常所说的“列宁遗嘱”。《托洛茨基档案》第1卷公布的此文件标题是：《中央政治局和主席团委员们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的建议的意见汇编》。

3. “娜·康·也认为只应转交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一事我没有问，因为我曾认为（现在也认为）这是不行的。可以提出这一问题。转交的条件没有不同。只是这一札记（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交给我的时间略晚一些，是在几天以前。”

季诺维也夫

4. “我认为没有刊印的必要，况且没有伊里奇对刊印的认可。”

斯大林

5. “赞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只通知中央委员们。不公布，因为广大群众对此毫不理解。”

托姆斯基

6. “弗·伊·的意见不是写给广大群众的，而是给中央委员会的，因此用这么多的篇幅写对一些人的评语。论合作社的文章没有此类东西。不应刊印。”

阿·索尔茨

7. “布哈林、鲁祖塔克、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赞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斯洛瓦京斯卡娅

№ 10807

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1923年6月2日）

副本

绝密

俄共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同志

娜·康·乌里扬诺娃—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我一份弗·伊·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的札记。鉴于这一札记极为重要，我建议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读一下。现附上上述札记一份。

格·季诺维也夫

1923年6月2日

№02734

托洛茨基就政治局分工问题 致俄共（布）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3年6月15日）

关于政治局管辖分工的问题我当时就已发表过意见，而且是完全否定的意见。问题早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就第一次提出了，那时政治局否决了这一建议。现在建议通过了。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认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首先反映了错误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我认为有必要以具体的形式表达我对这一决定的评价，因为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将不得不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为了更明确起见，我举对外贸易为例，正如租让总委员会那样把对外贸易从其他经济问题中突出出来。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就作过决定，指出对外贸易不可能也不容许有一条独立的路线，对外贸易只应是总的经济计划的手段之一。可以输出什么，需要输出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只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基本因素。

既然决定谈到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准备材料”，那当然不是指从技术方面，而是指从原则上和实践上阐明上面涉及到的每一个问题。但是对外贸易问题是在对外贸易之外来阐明的，确切些说，是通过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国内贸易来阐明的。应该从这4个部门来准备材料，才有助于政治局解决对外贸易的问题。但由此可见，对外贸易问题不能不由那些主管基本经济问题的同志来阐明。李可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掌握着对总的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他们是政治局在这一领域的天然的情况通报者，对此自然不需要作

什么专门的决定，正如斯大林同志自然是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情况通报者一样。

很不明白，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正式交给季诺维也夫同志负责在政治上会造成什么后果，大概只会引起关于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合并的传闻，而这对这两个机构未必有利。

责成我准备关于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斗争的材料的决定同样在实际上不适宜，而且基本上实现不了。只有掌握材料来源，时刻注意这些材料的人才能在这方面进行认真而一贯的观察，这就是中央书记处。我认为，即使不作任何专门决定，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就这一问题准备材料也会比我干得好得多。我不去谈其他具体的分工了，因为这种分工无非是确认理所当然的事情（加里宁同志通报农民的情况，托姆斯基同志通报工人的情况），或者未必会带来什么实际结果。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上面已经指出的人为地把经济问题分割开的做法，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是纯粹形式地对待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的结果。不久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收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的信。这封信的中心是什么呢？由于承认有计划的即协调一致的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在十分广泛的一定范围内甚至应具有必须执行的效力。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否应同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毕竟只具有次要的组织技术上的意义。我的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要在整个经济模式中保证国有工业利益具有足够的影响。现在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得多的步骤，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务合而为一。很明显，用不同的组织手段和套路可以达到同样一个目的，而这些手段和套路还有待于经验的检验。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要保证对一切经济问题的处理采取统一的态度和统一的

方法。

我在给列宁同志的一封信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简单地阐明了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必须有一个总的经济的有计划的处理方法观点。列宁同志在他的回信中同意我阐明的意见。我认为有必要在这封信后附上上面提到的两个文件，即我给列宁同志的信和他的复信，因为这两封信与上面所谈的种种看法直接有关。

列·托洛茨基

1923年6月15日

№02735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

（1923年6月16日）

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基本条例

我并不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目前的组织符合其基本设想。

1. 因此对基本条例我暂不作批评，希望今后的经验会提示我们如何更正确地组织。

2. 我认为必须提出，任命古谢夫同志为红军事务委员会主席未必能保证在这方面有最起码的正常而有成效的工作。我认为，过去的经验已经足够清楚，不需要我再提出任何证据。

托洛茨基

1923年6月16日

№02736

托洛茨基就开放酒类买卖 致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1923年6月29日)

最近有一次全会上竟然又提出了为了国库收入允许自由出售酒类的问题——而我认为这个问题早已排除。由于事关重大，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要负的责任非同小可，我认为有必要发表书面意见，尤其是因为我在休假，没有参加全会。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我国的预算只能依靠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输出粮食、木材等）的成就。试图把预算置于酿酒的基础上是欺骗历史的尝试，因为这就使得国家的预算不再取决于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工人的工资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但工人阶级整个来说仍然精神振奋。如果酗酒现象卷土重来，那一切又要走回头路，下坡路。做群众工作的鼓动员就我进行的关于工人生活的调查回答说：是两个基本因素改变了生活，第一，是8小时工作制，第二，是工人喝酒少了，打老婆孩子少了。我们将毁掉工人阶级这一向上的运动，败坏党的作风。更不必说，这种向旧时代的回归将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声誉。

我坚决反对这项建议。

列·托洛茨基

1923年6月29日

No 02737

托洛茨基针对开放酒类买卖提出的决议草案

（1923年6月30日）

鉴于党内主张以某种形式开放酒类买卖以获取国家收入的呼声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全会认为有必要及时制止这种倾向，因为一旦这种倾向得以发展并获得成功，只会给革命和党造成危害。

工人国家的预算和我国总的经济发展之间不可能没有最紧密的内在联系。稳定而切实的社会主义预算可以而且应该依靠农业、工业和对内对外贸易方面取得的成就。尝试通过酒类来获取人民的钱财必然使经济走进死胡同，破坏刚刚出现的经济繁荣和振兴的过程，只会糟蹋人民的这些钱财，败坏执政的工人阶级的风气。

工人的工资接近于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一旦工人重又习以为常地酗酒，就会发现工资不够用。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道德败坏。

广大党员就只能认为使酿酒合法化是一种绝望的办法。成千上万的优秀工作人员将无所作为，更不必说为数众多的党员将不能抗拒工人政府使之合法化的酒类的诱惑。上述种种考虑促使中央委员会坚决拒绝并谴责一切开放酒类专卖或其他自由买卖伏特加酒的主张。

只有根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常而紧张地工作，振兴工农业，整顿和扩大对外贸易，才能保证有一个作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的稳定而切实的预算。

托洛茨基

1923年6月30日

№02738

四十六人声明

(1923年10月15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秘密

异常严重的局势迫使我们（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中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造成严重的灾难。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党内关系方面党的领导都不称职。

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系统，在经济领域未能首尾一致，结果我们尽管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业方面取得了无疑是重大的成就（我国经济的这些成就是自发的，不是依靠，而是无视不称职的领导，或者确切些说，是在不存在任何领导的状况下取得的），却不仅面临这些成就中断的前景，而且面临普遍经济严重的危机的前景。

我们正面临日益迫近的切尔文卢布的动荡，在消灭预算赤字之前切尔文已自发地变成基本货币；面临信用危机，国家银行不冒剧烈震荡的风险就不仅不再能为工业和工业品贸易提供资金，而且不再能为购买用于出口的粮食提供资金；面临工业品因价格高昂而没有销路的局面，价格之所以高昂，一方面是由于对工业完全缺乏有

计划有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是由于信贷政策不当；面临粮食出口计划由于采购不到粮食而无法实现的危险，面临食品价格低得让农民破产、以致农业生产大幅度缩减的危险；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危险，这自然会引起工人的不满；面临直接造成国家机关混乱的预算混乱——制订预算时的削减和实现预算时的新的任意削减这类革命措施从过渡性措施变成了经常现象，它不断地震撼国家机关，并且由于缺乏削减的计划，对国家机关的这种震撼是偶然的，自发的。

这一切都是已开始的经济上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某些因素。如果不立即采取广泛的、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和强有力的措施，如果现在这种缺乏领导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出现异常剧烈的经济动荡的危险，这必然引起国内的政治麻烦和我国对外活动积极性和能力的全面瘫痪。而任何人都明白，这种活力和能力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一点。

在党内关系方面我们同样看到了那种瓦解党和腐蚀党的错误领导，这一点在目前危机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由于目前的党的领导人政治上无能，恰恰相反，尽管我们同他们在对形势的估计和选择改变形势的措施方面分歧很大，但我们认为，目前的领导人在任何条件下不可能不被党置于工人专政前沿的岗位上。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在保持官方统一的表面形式下，实际上在挑选人才和确定行动方向时，片面地迁就一个小集团的观点和好恶。由于党的领导被这种狭隘的盘算所扭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成为有生命力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而这个集体由于与生动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来能敏感地把握住这一现实。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党越来越加速地几乎毫不掩饰地分化成书记等级和平民百姓，由上面选定的职业党的官员和不参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党员群众。

每一个党员都知道这个事实。党员虽然对中央甚至省委的这一或那指示不满，心中产生这种或那种怀疑，独自发现这种或那种错误、混乱和失常现象，却不敢在党的会议上把这些想法讲出来，不仅如此，甚至不敢相互交谈，除非交谈的对方绝对可靠不会说漏嘴，因为党内的自由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党内舆论沉默了。现在不是党，不是广大党员群众推举和选出省委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相反，党的书记等级越来越多地在选拔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越来越成了这一等级的安排工作的会议。

党内确立的制度令人根本不能容忍，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性，用精心挑选的官吏机关来取代党，这种机关在正常时期运转正常，但在危机时期必然会卡壳，而面对迫在眉睫的严重事态有完全失去独立行事能力的危险。

出现这样的局势，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的派别专政制度已经过时了。我们中的许多人自觉地不与这样的制度对抗。在我们中的某些人看来，1921年的转折，接着是列宁同志患病，这一切都要求作为临时性措施在党内实行专政。另外一些同志从一开始起就对这个专政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到召开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这个制度已经过时。它走向了反面。党内的联结装置开始削弱。党开始停滞。党内持极端反对派立场的、明显不健康的思潮已开始具有反党的性质，因为党内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进行同志式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能轻而易举地向党员群众以及这些思潮的参与者揭示这些思潮的不健康的性质。其结果是出现了使党员越出党的范围的非法小集团，党脱离了工人群众。

如果既成的局势在最近的将来没有根本的改变，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危机和党内派别专政的危机将给俄国的工人专政和俄国共产党

以沉重的打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领导者俄国共产党肩负着这样的包袱，在迎接日益迫近的新的世界动荡时不可能不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战线上遭到失败。当然，乍一看来，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现在由于整个局势不应提出、也不可能把新的复杂的任务提上日程，等等。但很明显，这样的观点是无视现实形势的官方立场，因为危险完全在于，目前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没有实在的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党内斗争越是暗地里秘密进行，就越加激烈。我们向党中央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使分裂党的各种矛盾尽快得到痛苦最少的解决，使党立即健康起来。必须有见解和行动上的实际的统一。日益迫近的考验要求我们全体党员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完全自觉、异常积极、异常团结地行动起来。派别制度应予取缔，而这一点首先应该由培植这一体制的人来做，派别制度应该由同志团结和党内民主制度来取而代之以。

为了实现以上所说的一切，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走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党内危机，我们建议中央作为第一个紧迫的步骤召开中央委员和最著名、最积极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会议，与会者的名单中应包括一批对形势持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不同观点的同志。

在1923年10月15日给俄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内形势的声明上的签名者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Б. 布列斯拉夫

列·谢列布里亚科夫^①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彼（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我虽然不同意这封信对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的某些解释，认为党遇到的是不能用迄今采用的办法彻底解决的问题，但完全同意这封信的结论性意见。

亚·别洛博罗多夫^①

我虽然对某些理由有不同看法，但完全同意提出的建议。

阿·罗森霍尔茨^②

阿尔斯基

我基本上赞同这一呼吁书的主张。现在非常需要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处理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因此我完全支持关于召开上述工作会议的建议，以便确定能使我们摆脱积聚起来的困难的实际途径。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③

A. 韦涅季克托夫

伊·尼·斯米尔诺夫

-
- ① 别洛博罗多夫，亚·格·（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东南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内务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内务人民委员等职。
- ② 罗森霍尔茨，阿·巴·（1889～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期间是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 ③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弗·亚·（1883～193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秘书。后任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乌克兰陆军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34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8年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旋即被捕，卒于狱中。后平反。

尤·皮达可夫

瓦·奥博连斯基（奥新斯基）

尼·穆拉洛夫^①

季·萨普龙诺夫

党内形势和国际形势要求党内力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全力以赴，团结一致。我同意声明的看法，认为声明完全是一个重建党内团结和使党为面临的事态作好准备的尝试。当然目前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内斗争。中央委员会必须清醒地估计形势并采取紧急措施来消除党内和非党群众的不满。

阿·哥尔茨曼^②

弗·马克西莫夫斯基^③

列·索斯诺夫斯基

达尼舍夫斯基^④

П. 梅夏采夫^⑤

T. 霍列奇科

-
- ① 穆拉洛夫，尼·伊·（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0～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36年被捕，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 ② 戈尔茨曼，阿·季·（1894～1933）——苏共党员。十月革命后在工会和经济部门担任负责职务，曾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 ③ 马克西莫夫斯基，弗·尼·（1887～194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起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教育人民委员等职。
- ④ 达尼舍夫斯基，卡·尤·克·（1884～1938）——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俄罗斯联邦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托维亚政府副主席、党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
- ⑤ 梅夏采夫，П. А.（1889～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4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我不同意声明第一部分中的一些估计，不同意对党内形势的一些评价。同时我深信，党的现状要求采取断然措施，因为党的目前情况不好。

我完全赞同实际建议。

安·布勃诺夫

A. 沃龙斯基

弗·斯米尔诺夫^①

叶·博什^②

维·柯秀尔^③

Ф. 洛卡茨科夫^④

我完全同意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我认为目前削弱政治专政是危险的，但更新是必要的。

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召开工作会议。

卡冈诺维奇^⑤

-
- ① 斯米尔诺夫，弗·米·（1887～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
- ② 博什，叶·波·（1897～1925）——为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参加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担任党政负责工作。
- ③ 柯秀尔，斯·维·（1889～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至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2年调任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3年起先后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死，后平反。
- ④ 洛卡茨科夫，弗·伊·（1881～1937）——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至1920年任东线第三和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 ⑤ 卡冈诺维奇，Л.К.（188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等地负责粮食工作。1923～1925年任中央消费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委员。

德罗布尼斯^①

П. 科瓦连科

亚·叶·敏金^②

瓦·雅柯夫列娃^③

完全同意实际建议。

波·埃利钦

我同意布勃诺夫同志的保留意见。

列维京

我同意布勃诺夫的保留意见，不赞同这一声明的形式和调子，这一形式和调子的出现更使我确信应同意这一声明的实际部分。

И. 帕柳多夫

О. 什米杰利

Н. 瓦甘扬

英·斯图科夫^④

-
- ① 德罗布尼斯，雅·纳·（1891～1937）——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该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任副主席。
- ② 敏金，亚·叶·（1887～1955）——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省委书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副院长等职。
- ③ 雅柯夫列娃，瓦·尼·（1885～1944）——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副教育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职。
- ④ 斯图科夫，英·尼·（1887～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某部部长、《莫斯科工人报》编辑、红色处女地出版社编辑等职。

A. 洛巴诺夫

拉法伊尔^①

谢·瓦西里琴科^②

米·雅柯夫^③

A. M. 普扎科夫

尼·尼古拉耶夫

由于近来我多少离开了党中央的工作，因此我对导言部分头两段的意见持保留态度，对其余部分表示同意。

阿韦林^④

我同意对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部分的阐述。我认为描绘党内形势部分说得重了一些。完全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持党的统一。

И. 博古斯拉夫斯基

我不完全同意谈到我国经济形势的第一部分，我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很严重，要求极其认真地对待，但至今党还没有推出能领导得

① 拉法伊尔，P.（1893～？）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后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局长。

② 瓦西里琴科，谢·菲·（1884～1937）——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初任布尔什维克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矿区区域委员会委员，并任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政府的总务委员。1921年起在莫斯科从事文学出版工作。

③ 雅柯夫，米·彼·（1893～1936）——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任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政府成员和布尔什维克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矿区区域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顿河区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④ 阿韦林，瓦·库·（1885～194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苏维埃主席、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担任国家和行政管理部門的负责工作。

比至今领导的人好的人。

关于党内形势问题，我认为所谈到的一切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真话，我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Ф. 苏德尼克

№06526

格利亚谢尔致布哈林

(不早于1923年12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近来我难得见到您，然而我必须同您谈谈。我力求把事情写清楚，但恐怕难以做到。

不久前我读了托洛茨基的信^①（在党内秘密散发的他的信件之一），此信使我确信，他利用弗·伊·同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联盟”来证明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思想一致，同时以此败坏斯大林同志的声誉。因为托洛茨基（还有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民族问题的态度是我告诉弗·伊·的，所以说是我在这方面帮了托洛茨基的忙。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托洛茨基在党内争得多数，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现在，当我对目前发生的事情日渐明白时，我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现在给您写信，是想要您帮我弄清楚，我是否真的犯下了完全不可容许的过错。我必须弄清这一点，因为这种想法会使我发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是在任命委员会（福季耶娃、哥尔布诺夫和我）了解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材料之前。当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先入之见，他直接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并且非常担心我们不能在自己的报告中证明他所需要的东西，担心他来不及在代表大会前准备好自己的发言稿。同时，他要我们保证

^① 大概是指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第23~24期《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发表的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和列宁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的便条的转述以及莉·亚·福季耶娃1923年4月16日给加米涅夫的信。

在这项工作结束之前对一切严守秘密，只字不提他的文章。因为他有病在身且疑心很重——他总觉得他的意见已不再受重视（我这样认为），正因为如此，辜负他的信任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也没有权利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及时转告中央。我想（这种想法也许过分简单），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同他想的一样，他将不会这样强烈地担心他不能亲自促进问题的解决。再说，如果弗·伊·身体健康的话，他同样会知道这一点的。我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各种相互关系，也没料到托洛茨基会这样利用这件事：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这张便条现在已被收入托洛茨基的信和《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并让我们向托洛茨基——只向他——转交他12月份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弗·伊·知道此事后确实很高兴，也好像放心了。我丝毫不怀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像以往一样是正确的。现在我仍然确信，他尽管病魔缠身，对格鲁吉亚局势的评价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由于生病，他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或许，我现在把这一切都告诉您的做法并不妥当。他还没有解除自己的禁令——不能对任何人说。可我不能再沉默下去，反正这些事实现在不仅全党知道，而且《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也已知道。我一想到由于自己的介入而带来这样的损害，就感到万分沉痛。尤其使我感到沉痛的一个原因是，在政治局工作的这两年半中，我耳闻目睹政治局的工作，我不仅学会了深刻评价和尊重你们大家，包括斯大林同志（现在我很愧对他），而且学会了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路线同托洛茨基的路线的差别。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托洛茨基，只是想安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该这样做呢还是不容许这样做，我现在也弄不清楚。但是又必须弄清楚。请回信谈谈您的想法，只是要非常坦率。我觉得，如果能狠狠地骂我一顿或处

罚我，我会好受些。请原谅我对您的打扰。

尊敬您的 玛·格利亚谢尔

1923年1月11日^①

^① 该信的日期错标为1923年1月。从信的内容来看，它的写作日期不早于1923年12月。

【专题说明】

俄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21年6月至1923年5月)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出于苏维埃国家生存的需要，也出于国际主义的义务，把支持各国共产党以至直接策动其他国家革命，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就是一个从事世界革命的党。本专题的文件展示了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俄共(布)同各国党的关系。这里涉及德共、法共、意共的问题，特别是德国的“三月发动”的评价问题。1922年在柏林召开了三个国际代表会议，列宁对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会上的表现有所批评，本专题发表了一组有关文件。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任建华、刘燕明、王锦文、
沈志恩、韦清豪、王伟文、赵静男、刁绍华)

No 01447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 组织工作致列宁等

(1921年6月5日)

副本

绝密

邮政电报第61号，莫斯科，

1921年6月5日19时

致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加米涅夫和莫洛托夫同志

刚才一些同志向我谈了代表大会^①的组织工作搞得十分糟的情况，我绝对相信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和诚实的。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处境很糟。准备工作一塌糊涂。尽管我们预料与会者近千人，但是只来了300人左右，一个房间却安置8~10名代表。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食堂以及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共产国际的职员们不愿意离开柳克斯旅馆，狂妄地抵制迁至另外一所楼房的决定（他们把房间锁上，走开了，把汽车和载重汽车藏起来，等等，等等）由罗斯梅尔、杨松和鲁德尼扬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处处遇到令人气愤的怠工。代表们一到便对我们的秩序产生极坏的印象。最令人气愤的是不尊重前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床铺上没有褥子，没有枕头，没有洗脸池……

^① 指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

这是怎么回事？罗斯梅尔及其夫人向我讲述此事时，气得直发抖。难道可以容忍这种胡作非为吗？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采取最果断措施，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全权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

托洛茨基

№01448

列宁复托洛茨基

(1921年6月5日)

列宁同志的回复（速记记录）

我正在城外。由于健康原因我去休几天假。昨天，我已经同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叶努基泽同志谈过。从他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事情安排得令人满意。我认为现在必须把您的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转给中央书记处，请书记处要么召见叶努基泽，要么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检查，并指派一个非常全权委员会。

列 宁

No01450

德共代表团就“三月发动”问题致俄共中央

(1921年6月16日)

绝密

莫斯科，1921年6月16日

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根据昨天同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会谈，德国代表团声明：

(1)德国代表团对策略提纲的赞同是它作出的一个让步，因为德方看到本提纲含有对三月发动^①的批评。我们赞同提纲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是希望德国代表团在代表大会期间能同俄国代表团一起工作，而不是同其他诸如俄国的(?)代表团或者法国代表团一起工作。

(2)如果除本提纲外还打算就三月发动专门发表声明的话，那么德国代表团坚持下列几点：

(a) 三月发动不是“骚乱”；

(b) 三月发动在政治上推动了德国革命和德国党的发展；它公开证明党是有战斗准备和战斗力的；它使党有可能积累重要的作战经验、为迎接未来战斗加强自身；

(c) 德国代表团承认三月发动在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存在着错误：宣布这次行动是进攻行动，没有充分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准备工作，战斗任务下达得不够明确。

^① 三月发动，指1921年3月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库·贝拉和德国统一共产党领导下，德国中部工业地区15万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发动以失败告终。

(3) 由于莱维^①卑鄙地背叛党和破坏党的纪律，批准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4) 党员不得在脱离党的监督的委员会及其他机关工作；未经组织同意不准成立散发秘密材料的派别。

(5) 共产党必须维护党的严格纪律，领导同志、议会代表以及编辑人员更应如此。

德国代表团确认弗勒利希^②同志的如下声明：德国代表团赞同与俄国代表团的委员会共同制定的策略提纲，如果俄国代表团拒绝本提纲，德国代表团将把它作为自己的提纲提出来。

上述几点是德国代表团提出的最低要求。

德国代表团代表：塔尔海默^③

弗里斯兰特^④

(签名)^⑤

① 莱维，保·(1883~1930)——德国共产党人。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成员。1918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年当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在德国“三月发动”问题上同德共“左派”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1922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着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② 弗勒利希，保·(1884~1953)——德国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190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创办《红旗报》。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被选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是“进攻理论”的发言人。1921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协助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

③ 塔尔海默，奥·(1884~1948)——德国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1920年政治局委员。1921年春参与制定“进攻理论”，支持“三月发动”。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同库恩·贝拉一起提出“进攻理论”策略提纲。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失败后被撤销领导职务。1928年被开除出党，宣布成立德共反对派。

④ 弗里斯兰特，即罗伊特，恩·(1889~1953)——191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任党的总书记。1922年1月因同共产国际发生冲突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又回到社会民主党。

⑤ 第三个签名无法辨认。

№01451

列宁就德共代表团的信致托洛茨基

（1921年6月18日）

副本

秘密

致托洛茨基（莫斯科）

托洛茨基同志：这里有四分之三是空话，很不严肃。

列 宁

No01453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致列宁

(1921年7月3日)

副本

电话记录第65号

莫斯科，1921年7月3日

致列宁同志

昨天的争论对弄清代表大会参加者的观点极为有益。德国代表团成员的发言一个比一个具有进攻性。最后一个发言的汉堡工人台尔曼^①竟然作了如下声明：

“不仅你们的提纲，而且经我们修改过的你们的提纲，都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我们一回到德国，面对的将完全是另一种情绪，不得不作彻底的转变。”

另一方面，库恩·贝拉^②对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说，他赞成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他的

① 台尔曼，恩·（1886～1944）——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底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时当选中央委员，属“左派”。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维护“进攻理论”。1923年10月领导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在集中营遇害。

② 库恩，贝·（1886～1938）——1902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1月创建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中央主席。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不久被派往德国指挥“三月发动”。返回苏俄后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被处决，后平反。

这番话是在我发言前说的。各种各样的发言者一再引用布哈林的话，其中包括台尔曼，他认为布哈林的观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勃兰特的话完全是德国人的口气，指责我们是在墙上涂鬼。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平和、慎重，彬彬有礼。不过他发言的政治内容是说，我们的提纲和修改稿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保证能达到完全统一。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希望您收到记录这个报告时能收到我的发言记录稿）表示赞成季诺维也夫的发言，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提纲绝不同于修改稿，为了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缓和提纲的提法，我引证了台尔曼的话。台尔曼提醒大家注意如下事实是非常正确的，即留在德国各地的各级共产党领导人和半领导人的情绪在建立进攻理论的时代同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的情绪完全符合。

我的发言结束后，季诺维也夫、拉狄克^①在同个别人交谈时把我的发言称之为“炸弹”，甚至还给我送来一个小小的照会，说我破坏了协议，他们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因为我在发言时表示赞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所以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没有同他进行辩论，维护了提纲，而实质上我坚决地，但照我的理解又是完全同志式地和心平气和地对修正稿及其中潜在的倾向表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我非但没有违背协议，而且执行了政治局的决定。我正是以这种精神来回答他们的。他们威胁说以我们的提纲为基础是通不过的。我却丝毫不相信这一点。与会的各个代表团开会修正稿讨论了10分钟，季诺维也夫同志便提议停止讨论。

他不想让库恩·贝拉和其他报名要反驳我的左派分子发言，所以终止了讨论。提纲被一致通过。但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

^①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

以及意大利人发表了书面声明，对我在发言中对提纲的解释表示反对。意大利人还单独发表声明，反对似乎据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把他们党说成是暴乱党的评价。于是，库恩·贝拉在其庇护者的帮助下，企图联合德国代表团、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列宁就提纲的理解达成共识，把提纲当作基础，以此来“孤立”托洛茨基，因为在本次会议上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坚持认为我们的提纲与德国的修正稿是不可调和的。

拉狄克在闭幕词中对法国人、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进行了略加掩饰的针对我的辩论（诸如若有人说提纲是妥协，是向左作了大量的让步，那么相反，我们要说提纲是向右作了大量的让步；关于三月事件：不能像指挥红军那样指挥工人阶级，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德共中央的过失恰恰在于它试图以指挥的方式把工人阶级推向斗争，等等，等等）。

希望您至少能看看我的发言稿，因为您在委员会（最好也以某种形式在全体会议上）势必要对我的发言“表态”。

致同志的敬礼！

托洛茨基

因召开工会和政治工作联席会议，提纲委员会今天休会。

№01454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再致列宁

（1921年7月3日）

副本

电话记录第66号

莫斯科，1921年7月3日11时30分

致列宁同志

今天1点钟，确切地说是2点钟召开政治工作和工会联席会议，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德国代表黑克尔特^①将作关于工会运动的报告。我当然至少能够参加会议。不过在政治局尚未解决关于昨天会议的问题之前，情况将是复杂的。季诺维也夫今天去彼得格勒，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他宣布，提纲委员会的工作将由布哈林接替。我担心黑克尔特会发表一些错误言论，尤其是当他谈到法国的时候。最后我想今天您是否能留在别墅里。请您谈谈对目前情况的看法。

托洛茨基

^① 黑克尔特，弗·（1884～1936）——190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创始人之一。1919年起任德共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01455

列宁复托洛茨基

(1921年7月3日)

副本

第65和66号

列宁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电话记录的答复

您的电话记录已经收到。目前只有布哈林对我谈过发生的情况，他显得非常焦急。我将采取措施争取今天拿到您发言的速记记录。如果能拿到，我力争今晚通过您的秘书同您联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约定明晚在城里见面。策略委员会是否确定在星期一开会，确切地说是在几点？或许委员会开会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现在又收到了您的第二个电话记录。我考虑今天不回去了。期待您的回复。

(打字稿，无列宁同志的签名)

No01463

托洛茨基就德共问题致列宁和布哈林

（1921年8月15日）

副本

莫斯科，1921年8月15日

致列宁同志和布哈林同志

您也许已收到克拉拉·蔡特金^①同志写给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信，但我仍将我收到的这封信的副本寄上，以防万一。我没有收到过单独写给我的信。信和文章中的全部重点记号显然都是蔡特金本人所作。因为我收到的文件其原样一如寄给您的信。

（1）查明推迟公布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情况是完全必要的。

（2）我以为，也许有必要由列宁同志写信或写文章来进行安抚，其目的是间接地向弗里斯兰特、赫尔列^②、马尔察恩^③和蔡特金本人那一批人表示某种支持。

为通报情况，我补充以下几点：

① 蔡特金，克·（1857—1933）——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9年参与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兼妇女书记处书记。

② 赫尔列，埃·（1883—1952）——191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1923年任党的中央委员。

③ 马尔察恩，亨·（1884—？）——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为共产党人。1921年是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和德国工会中央理事会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 我翻阅了代表大会开幕以来的《红旗报》^①。该报报道的消息不完整，非常片面。根本没有认真讨论大会决议。

(2) 赫尔列（我在蔡特金的信中在他的名字下作了记号，这是我作的惟一的一个记号）在大会期间到我这里来过。别看他曾经是个神学家，出身于德国一个有影响的神父—神学家家庭，可是通过他与我进行的两小时的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看来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严肃的革命者，他对策略问题考虑得很深入，在3月行动爆发的日子里无条件地敌视莱维，认为莱维是罪有应得，对蔡特金支持莱维一事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说，大会对他赫尔烈及其亲密战友在3月事件中试图探索的问题作了极其准确的表述。像赫尔列这样的人参加德国党中央委员会无疑是件好事，因为他比目前的一些中央委员高一头。赫尔列战前或战争初期入党，属斯巴达克派^②，据我所知，他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信。顺便说一下，他现在负责领导农业宣传工作。

托洛茨基

① 《红旗报》，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创刊，陆续出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② 斯巴达克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组织。1916年1月1日德国左派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采用“国际派”的称号，此后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8年11月11日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主要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等。1918年12月30日联盟同其他左派联合创建了德国共产党。

No 01464

列宁就德国统一共产党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8月16日）

副本

绝密

托洛茨基同志：

现将我们有关德国统一共产党^①的材料寄上。阅后请退回。依我看，拉狄克的文章直接破坏了我们当时的协议。

敬礼！

列 宁

^① 德国统一共产党——1918年12月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于1920年12月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改名为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8月恢复旧称——德国共产党。

№01466

托洛茨基就法共任务致列宁

(1921年9月)

副本

致列宁同志

法国比其他任何地方受“保卫祖国”论的沙文主义毒害更深，对胜利更为陶醉，因此反对战争的表现也比其他国家都要来得缓慢。这种情况使法国社会党内的多数人早在事态发展尚未向其提出采取革命行动这一决定性问题之前就开始向共产主义方向演变。法国共产党愈是能够坚决地从自己的队伍中，特别是从上层领导人中清除民族和平主义和议会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及策略的残余，就愈是能更出色、更全面地利用这种局面的极为优越的条件。党不仅要比过去，而且要比现在都更加紧密地接近群众，接近群众中最广大的受压迫阶层，并清楚地、旗帜鲜明地反映他们的疾苦和需要。党在议会斗争中要坚决与那些充满谎言的极端丑恶的法国议会制程式决裂，因为这些程式是资产阶级为控制、恫吓和迷惑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故意炮制并推行的。共产党员应当撕掉裹在每个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革命传统的外壳，并把每一个问题当作阶级利益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

报刊宣传的目标应更加集中，应更有力度，更加坚持不懈。报刊宣传不应被每日每时变幻莫测的表面的政治情势和计谋所淹没，而应从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得出同样的基本的革命结论，并使之为最

落后的劳动群众所掌握。只有坚持这样一条真正革命的行动路线，共产党才不致被人当作激进的龙格派^①联盟的左翼，而这个联盟在动荡以不可阻挡之势接二连三地席卷法国之时为保护资产阶级社会而越来越死心塌地、得心应手地向其大献殷勤。

无论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事变何时到来，深受革命思想鼓舞、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共产党现在，即在准备阶段，就能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把工人群众动员起来，并使他们的斗争具有更加广泛、更加明确的性质。

那些对革命怀有急躁情绪和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试图采用最极端的办法，其实质是要让无产阶级为了某些个别问题和任务而举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起义（1919年号召全阶级抵制动员的建议，用武力阻止武装占领卢森堡的建议等），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极端危险的冒险主义因素，如果这样做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断送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做的切实的革命准备工作。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实质是不了解群众运动的任务，不了解运动面临的困难，只会使革命痛苦地，有时则是致命地流产。抛弃这种极端危险的办法也像其他任务一样是法国共产党的义务。

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首先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密切党同工会的联系。问题绝不在于让工会从组织上服从党，迫使工会放弃由自身活动性质决定的那种自治，而在于那些由共产党联合在工会中的真正革命的分子遵循符合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方针，从工会内部搞好工会工作。

因此，法国共产党一定要善意地同时又坚决而明确地对无政府

^① 龙格派，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以让·龙格为首的中派。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后，同其他少数派一起另组新党，仍采用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称，加入第二国际，1923年又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工团主义倾向和中派工团主义倾向展开批评，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成集中的领导组织——共产党的必要性，而中派工团主义倾向以亚眠宪章^①（战争开始前8年制定）为掩护，拒不对战后的新时期面临的基本问题作出清楚明确的回答。

将工会内的革命工团主义集团同共产党组织融为一体是法国无产阶级进行一切重大斗争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

同时，只有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在党本身能够真正以革命的态度对待生活和斗争中的一切问题，把自己变成吸引法国工人群众的强大中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和必将彻底清除并消灭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倾向，战胜革命工团主义者所主张的原则上的暧昧态度和组织上的分离主义。

托洛茨基

^① 亚眠宪章，指法国总工会1906年在亚眠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亚眠宪章主张工会独立于政党，采取总罢工等方式开展经济斗争，认为工会今天是抵抗性的团体，将来会成为生产和分配的团体、社会改革的基础。

№01472

列宁就德共莱维书信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1年10月9日）

副本

“莱维的信保存在我这里。格利亚谢尔^①”

托洛茨基同志：

寄上此件一阅。阅后请交加米涅夫退我。

拉狄克说，莱维同志后来决定不将这封信寄出。

列 宁

^① 格利亚谢尔，玛·伊·（1890～1951）——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4年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

№01473

托洛茨基就德共莱维书信问题致列宁

(约于1921年10月10日)

副本

绝密

致列宁同志

现将勃朗斯基^①同志来信(寄自维也纳)摘要附上。这段摘要表明,拉狄克同志所说似乎莱维不想将自己的信寄出是不符合事实的。

托洛斯基

附 言^②：

莱维在8月25日的信中请我转告您和列宁同志,在他写给您和列宁同志的信中(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大会)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笔误。第3页最后一行的“gewonnen”一词应为“begonnen”。

① 勃朗斯基, 美·亨·(1882—1941)——波兰社会民主党人, 后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副工商业人民委员。

② 关于附言详见1921年10月11日便条。

№01475

托洛茨基就德共莱维书信问题再致列宁

（1921年10月11日）

副本

绝密

第 127 /C 号

莫斯科市，1921年10月11日

致列宁同志

接到您的秘书处的电话询问后，我开始怀疑我装进信封的不是勃朗斯基的来信摘要，而是一张不相干的纸片。勃朗斯基在写给我的信中抱怨共产国际对他态度不好，并寄来了他写给执委会的答复的副本（您有这个副本吗？）。勃朗斯基在附言中所谈的内容大致如下：

“莱维在某日写给我的信中请我转告您，在他写给您和列宁同志的信中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笔误，就是将 *begonnen* 写成了 *gewonnen*”。

我当时就把这段附言撕了下来，加写了一段关于拉狄克的话并装进了信封。但是您看到了我加写的一段话，却没有看到勃朗斯基的来信摘要，所以我怀疑我是否把要寄的东西寄上了？

托洛茨基

No01517

列宁：我们的代价太大了

(1922年4月9日)

副本

1922年4月9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把我的短文送政治局委员们传阅，还有一些具体建议随后送上。

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①

比方说，共产党人的代表要进入资产阶级代表向人数相当多的工人集会进行宣传的会场。再比方说，资产阶级对我们进入这个会场要价很高。如果价钱事先没有谈定，我们自然应该讲讲价钱，以免增加我们党的开支。如果我们为了进入这个会场而付出的代价太大，那我们无疑犯了错误。但是宁可多付一些，尤其是在我们学会好好讲价钱之前多付一些，也比放弃机会，不去向至今仍被改良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最忠实的朋友“独占”的工人讲话要好些。

^① 列宁的文章是针对三个国际代表会议而写的。代表会议于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举行，会议的全称是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第二半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主要议题是联合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阶级采取共同行动问题。列宁的文章载于1922年4月11日的《真理报》上。

这个比喻是我看了今天《真理报》上的一则报道三个国际的代表在哪些条件下达成协议柏林电讯之后想起来的。

依我看，我们的代表同意以下两个条件，是做得不对的：第一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对 47 名社会革命党人案件不施用死刑；第二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准许所有三个国际的代表出庭。

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向反动的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为了揭示这种人政治上的幼稚，只要向他提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英国或别国的现政府在审判那些被加上暴动罪名的爱尔兰工人时，或者在审判不久前举行起义的南非工人时，是否会同意所有三个国际的代表出庭呢？在这种以及类似的事情上，英国政府或别国政府是否会答应对它的政敌不施用死刑呢？只要对这个的问题稍加考虑，就会明白下面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是反动资产阶级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件事情上，代表斗争一方的苏维埃俄国向另一方即反动的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因为尽人皆知（除了那些想隐瞒明显的真相的人），社会革命党人枪杀过共产党人，组织过反对共产党人的暴动，他们在事实上、有时还在形式上同整个国际反动资产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

试问，国际资产阶级为此对我们作了哪些让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让步。

只有抹杀这个简单明了的阶级斗争真理的议论，只有蒙骗工人和劳动群众的的议论，才会企图模糊这个明显的真理。根据第三国际代表在柏林签订的协定，我们已经向国际资产阶级作了两个政治让步。而我们却没有换得他们的任何让步。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扮演了要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的角色，却坚决不让甚至也不想让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任何政治让步。当然，这一无可争辩的政治事实被资

产阶级外交老手弄模糊了（许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一些人培养成很好的外交家），但是模糊事实，丝毫也不能改变事实本身。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某些代表同资产阶级有直接联系还是有间接联系，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并不指责他们有直接联系。这里是直接联系还是相当复杂的间接联系，同问题丝毫无关。要紧的仅仅是苏维埃俄国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代表的压力下对国际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而我们却没有换得他们的任何让步。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拉狄克、布哈林同志做得不对。

其次，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撕毁他们签了字的协议呢？不。我想，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撕毁签了字的协议。我们只应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次资产阶级的外交家比我们的外交家老练，下次如果入场费事先没有谈妥，我们应当老练一点，讲讲价钱，用点计谋。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不向苏维埃俄国或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其他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作大致等价的让步，我们就决不向国际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不管中间人是谁，不管他们怎样巧妙地掩饰这种让步）。

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和部分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团主义者，可能会从上述论断中得出结论说，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错误的。这种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共产党人的代表为了进入会场，能有机会（虽然是不大的机会）向至今仍被改良主义者所“独占”的工人讲话，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下一次应该竭力纠正这种错误。可是，对于进入这种守卫森严、门户紧闭的会场的任何条件和任何费用，都一概加以拒绝，那就犯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更大的错误。拉狄克、布哈林同志所犯的错误并不大，这个错误所以不大，

是因为我们所冒的风险大不了是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在柏林会议结果的鼓舞下，对某些人进行两三次也许能得逞的暗杀。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事先知道，他们可以枪杀共产党人，同时可以指望像柏林会议这样的会议阻止共产党人枪毙他们。

可是，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可以进入这个门户紧闭的会场了。不管怎样，拉狄克同志还是向部分工人揭露了第二国际拒绝在游行示威的口号中列入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意大利共产党人和部分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团主义者的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满足于自己现有的认识。他们满足于自己已经很清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以及保尔·莱维、塞拉蒂等先生是资产阶级最老练的全权代表，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但是，确实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和确实理解这一点的意义的人和工人，无论在意大利、英国、美国或法国无疑都占少数。共产党人不应当闭关自守，而应该学会进入资产阶级代表影响工人的门户紧闭的会场，不惜承受一定的牺牲，不怕犯一些在任何一种新的困难的事业开始时必然要犯的错误。共产党人不愿了解和不愿学会这一点，就休想在工人中间赢得多数，或者说，他们要赢得多数至少会困难得多，缓慢得多。而这对共产党人和一切真正拥护工人革命的人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可宽恕的事情。

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外交家又一次表明他们比共产国际的代表老练一些。这就是柏林会议的教训。我们不会忘记这个教训。我们要从这个教训中得出全部必要的结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需要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希望从我们方面得到过分的让步，从而削弱我们；他们想不花任何代价就进入我们共产党的会场，他们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希望使工人持相反的看法。我们共产党的代表犯了错误，我们既要怪这些代表，也要

怪犯这种错误的党；我们要努力从这些错误的实例中吸取教训，以免将来重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把我们共产党人的错误推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现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面临着资本对它的猛攻。为了帮助这些群众同资本斗争，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整个国际经济和整个国际政治方面的两条战线的“巧妙把戏”，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

列 宁

№01518

列宁就三个国际会议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2年4月9日）

电话记录 格利亚谢尔

1922年4月9日

莫洛托夫同志：

请您用传阅办法把这篇文章和我下列建议交政治局委员表决。

（1）不反对把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星期二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

（2）指示苏维埃的和党的报刊按所述观点来评价柏林协议，特别是要详细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个党的右翼同国际资产阶级实际上有联系的确凿事实。

（3）为了上述目的，要加快用欧洲各种文字出版萨文柯夫的小册子《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斯捷·伊万诺维奇^①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没落》，并要详细说明这两本小册子证实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右翼同国际反动势力的现实联系。

（4）责成托洛茨基同志监督尽快用各种文字出版这种材料和这一类材料，并附必要的说明。

（5）打电报建议拉狄克携带柏林会议全部记录尽快回莫斯科。

^① 伊万诺维奇（波尔土盖斯），斯捷·（1880～1944）——俄孟什维克，政论家，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为南方白卫分子的报刊撰稿。后移居国外。

(6) 不准布哈林同志回俄国，要他去把病治好。

列 宁

№01519

托洛茨基就三个国际会议问题致政治局

(1922年4月10日)

邮政电报第286号

1922年4月10日

致政治局

抄送：列宁同志

(1) 赞同列宁同志的文章。只需对有关布哈林和拉狄克的部分作些修改。由于没有提到别的人（蔡特金、弗罗萨尔等），不宜称他们为国际的代表。可以说：国际中的俄国代表，或类似的提法。

(2) 至于实际建议则还不够。我仍坚持我昨天提出的好些其他建议。

(3) 我还赞成这样的建议：社会革命党人案件的起诉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作品，要对该党的全部活动作出评价。起诉书应由卢那察尔斯基^①、克雷连柯^②和库尔斯基^③精心修改。

① 卢那察尔斯基，阿·瓦·（1875～1933）——1898年起从事革命运动。1903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至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② 克雷连柯，尼·瓦·（1885～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陆海军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年11月22日出任最高总司令和军事人民委员。1918年起在司法部门工作。1922～193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革命法庭庭长等职。1938年死于狱中。后平反。

③ 库尔斯基，德·伊·（1874～1932）——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苏联总检察长。1924～1927年任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4) 至于责成托洛茨基同志督促“尽快用各种文字出版这种材料和这一类材料，并附必要的说明”一事，这个建议显然实现不了。我自己写的关于格鲁吉亚的小册子至今还没有用一种外国文字出版过。如果不建立一个具有专门编制和拥有专门资金的专门组织，我除了给共产国际打电话或是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电报外，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因此即使通过“责成托洛茨基”的决定，显然也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托洛茨基]

№01899

列宁就英国选举问题致拉狄克

（1922年10月28日）

拉狄克同志：

您干得实在不好。您写的小品文（谈劳合—乔治^①）长得可怕。谁也不会去读的。这样的文章只宜登在杂志上，可报纸的文章要短——您是很善于写50行短文的。

其次，今天关于马尔托夫^②和唐恩^③的社论^④，糟透了，糟透了！应当放在第3版，用小号字。要让大家都读，都喜欢。而您却无意中吹捧了他们——近乎可笑。

现在说另一件事。我看英国现在进行着一场决定性的战斗——选举。依我看，所有来这里的英国人都应尽快回去。要这样安排：在俄国待12小时，然后飞回英国。

当那儿举行选举时，在这儿多待1小时都是极端愚蠢的。

在这12小时内商量好策略：

-
- ① 劳合—乔治，戴维（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
- ② 马尔托夫，尔·（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20年出国侨居，1921年2月在柏林创办《社会主义通报》，该报从1922年起为孟什维克机关报。
- ③ 唐恩（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在柏林参加《社会主义通报》编辑部。
- ④ 指拉狄克1922年10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社论《马尔托夫之后是唐恩》。

1. 拥护工党；^①
2. 语言完全自由（候补超级恶棍，所以我拥护他，群众会学会的）；
3. 鼓动完全自由；
4. 向群众散发的传单要体现简短、有趣、格外便宜的精神；
5. 需要我们给予多大帮助？
6. 把我党所有党员动员起来，挨家挨户地访问，整天待在大街上，等等。

请把所有来到的英国人打发到我这儿来。

给我挂电话吧。

您的 列宁

1922年10月28日

① 工党——英国两大党之一，社会主义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党。1921～1922年是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1922年11月15日英国举行议会选举，保守党获胜。1924年1月23日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织第一届工党政府，旋即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01532

托洛茨基就法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2日）

副本

绝密

邮政电报第513号

1922年11月22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抄送：列宁、拉狄克和布哈林同志

代表大会上^① 是否正式成立法国共产党新中央委员会？

或者把新中央委员的名单作为代表大会向法国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各派当中没有一个派别认为可以在莫斯科这里直接任命新中央委员。左派尤其害怕这样做，因为他们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左派中央委员总是由莫斯科来定，也就是说，强加给党。瓦列茨基^②甚至断言，弗罗萨尔^③的整个计划就是这样一个圈套：通过莫斯

① 指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

② 瓦列茨基（霍尔维茨），马·亨·（1877～1938）——1906～1918年是波兰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18年是波兰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1921～1925年是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25年由波共转为联共（布）党员。

③ 弗罗萨尔，吕·奥·（1889～1946）——法国社会党人。1920年初参加第二国际重建工作。

科把左派弄入中央来使左派声誉扫地，然后利用法国工人的党的“荣誉”感。

自然，由莫斯科直接地、公开地正式解决问题大有好处，因为这会在一段时间里解决中央的组织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决不能无视，万一中派真的准备同国际决裂或半决裂，那么由共产国际任命中央将非常有助于中派的这一工作。

另一方面，绝对有必要（在）莫斯科解决新中央的人选问题，不仅要像中派所希望的那样确定比例，而且要确定确切的名单。这件事可以这样做：我们同三派商定中央委员、政治局、《人道报》^①编辑部等的人选。所有代表一无例外地在有关文件上签字。由加香^②向代表大会声明，法国代表团根据巴黎代表大会的经验和在工作委员会中同其他党讨论问题的结果，各派一致承认必须以下列方式组建党的中央机关：（加香宣读确切的名单）法国代表团将全力以赴地促使将召开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或拥有代表大会全权的全国委员会）赞同这一名单。

代表大会听取加香的声明后提出一项决议：赞同法国代表团的建议并表示坚信，即将召开的法国代表大会将不作变更地赞同这份名单，各派不会就这份名单挑起任何争论和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必然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和党的队伍的进一步瓦解。

所以，这个决议要求，现在的中派中央作为党的正式领导机关再存在一段时间。这也带来一些不便之处，但我认为，好处要多些，何况召开法国党全国委员会或非常代表大会的日期取决于我们。

^① 《人道报》——1904年由让·饶勒斯在巴黎创办，为法国社会党机关报。1920年社会党分裂后，成为法国共产党机关报。

^② 加香，马·（1869～1958）——法国共产党创始人。1891年加入法国工人党。1920年12月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任政治局委员，兼《人道报》社长。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不但如此，我认为，必须迫使现在的中派中央在工会领域和清洗党内的共济会会员等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在新中央建立以前摧毁中派同公然反共分子的亲密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整个清洗工作将由左派进行，那么中派无疑将保持同反莫斯科的工团主义分子共济会会员等等的友好关系。如果由于惩处这些分子而产生的仇恨落到中派身上，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寻求左派的支持。此外，我们将很好地考验一下那些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中派代表，因为他们现在必须立即解决中央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报刊撰稿人保尔·路易^①、共济会会员克尔^②和苏提夫的问题。中派中央如果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前的两个月里在这些问题上毫无作为，那么它将使自己声名狼藉，将由新的中央委员会来采取措施，而这个中央委员会是根据整个法国代表团提出和代表大会批准的名单组成的。

至于名单本身，我现在还难以谈最终的意见。我认为，至少公然耍两面派、三面派，本派已不予承认的丹尼尔·雷诺进入中央委员会将大成问题。在我看来，雷诺·琼作为右派和左派间的仲裁者（前者和后者各有4人，雷诺·琼是第9人）进入政治局同样十分悬乎。很可能，我们为了国际而救他。不排除他有可能甚至在退出国际后再回来找我们。但我担心，在他目前的状况下，如让他担任极其重要的职务，那就意味着害了党，也害了他自己。

列·托洛茨基

① 路易，保尔（1872~1955）——法国社会党人，1915~1920年为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常务委员会委员。1920年初参加第二国际重建委员会。同年12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20年12月~1922年10月任党的指导委员会委员。192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重新加入法国社会党。

② 克尔，安·——属法国共产党中派，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01533

托洛茨基就法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3日)

副本

秘密

邮政电报第516号

1922年11月23日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抄送瓦尔加^①同志

我刚刚看过来自柏林的关于法国共产党在1922年11月11日代表大会以后状况的例行报告。这一报告纯属保护中派反对左派的辩护词，并且表明该报告的作者完全不了解局势。我认为，应该把作者召到莫斯科来，并向他解释一下，否则如果他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下去，我们有完全失去他的危险。

列·托洛茨基

^① 瓦尔加，叶·萨·（1879～1964）——生于布达佩斯，先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9年先后任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移居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成为俄共（布）党员。此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

№01534

托洛茨基就意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4日）

副本

绝密

邮政电报第517号

1922年11月24日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抄送：列宁、布哈林和拉狄克同志

（1）如果博尔迪加^①想在代表大会上展开大争论并迫使我们同最高纲领派^②结成反对他的统一战线，那么其后果将是极端不利的，首先这将使塞拉蒂^③得到加强。我们是否以我党中央的名义给意大利代表团写一封信，建议它在代表大会上根本改变政策：

① 博尔迪加，阿·（1889～1970）——意大利社会党人，弃权派领袖。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并为该党领袖。1930年被开除出党。

② 最高纲领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形成的一个派别。主要领导人为塞拉蒂。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最高纲领。1918年起掌握党的领导权。1922年10月改称最高纲领社会党。1924年塞拉蒂带领部分拥护共产国际原则的党员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③ 塞拉蒂，扎·梅·（1872～1926）——1892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起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主张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执委会委员。1922年4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代表会议，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4年率社会党部分党员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博尔迪加一旦同我们达成协议，就可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说他的代表团提出了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的反对合并的一切理由，但是由于问题由委员会事先决定，所以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决定，建议代表大会予以通过，要求对执行这个决定表现出良好的愿望，同时对意大利最高纲领派的形形色色中派表现和残余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求各兄弟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样保持警惕。

不做这种大胆的急剧转折，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处境就极其困难。其结果是，塞拉蒂在意大利将成为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倡导者。无论如何应当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2) 我那份关于新经济政策等问题的提纲怎么样了。^①

列·托洛茨基

^① 托洛茨基的提纲发表在《国际通讯》1922年第238、241期。俄文本收入《托洛茨基全集》第12卷。

№01535

列宁就意共等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25日）

副本

1922年11月25日

第8572号

电话记录 莉·福季耶娃

1922年11月25日上午11点

致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

1. 关于博尔迪加的问题，我极力主张采纳您的建议：以我们党中央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意大利的代表们，十分坚决地建议他们采纳您提出的策略，否则他们的行动在今后整个时期里对意大利共产党人将是极其有害的。

2. 读了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我认为总的来说写得很好，某些提法恰到好处，但有少数几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我建议暂时先在报上发表，以后一定要再印成单行本出版。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那它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

列 宁

№01536

列宁就土地纲领草案致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25日)

副本

电话记录 玛·沃季切娃

1922年11月25日第8573号

1922年11月25日13点

致托洛茨基同志

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同志

你们寄来的文件，即主要由瓦尔加起草并经委员会批准的题为《土地行动纲领草案》的德文稿，我看过了，对这个文件我很难表示赞同。我觉得，这个草案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相比，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某些提法，可能是出于偶然，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一致，我很担心会引起误解，造成这个草案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存在分歧的曲解。似乎还存在这样的差别，这会冲淡决议中所说的支持农民运动的意思，会在贫穷农民和农业无产者之间造成某种裂痕。

我不可能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把你们送来的瓦尔加的决议草案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逐句加以对照。我认为我们必须极力防止就同一问题作出许许多多可能引起误解和混乱的决议。我建议至少应该：

1. 把新决议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逐句加以对照。

2. 使这个新决议具有某种类似局部说明的性质。

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新决议是否有益是很值得怀疑的。^①

列 宁

^① 决议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做了修改，增加了副标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提纲实施细则》，从而明确了决议的性质。

№03369

克里姆林宫保管员给俄共（布）中央的报告

（1922年12月2日）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例会期间，宫内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坏。

亚历山大厅变得像一个板棚：地毯上撒满了香烟头、葵花籽壳和大量纸屑，而烟灰缸和字纸篓却几乎是空空的。在几个客厅的丝绒家具上，人们穿着肮脏不堪的鞋子躺在上面，如此等等。

这里有一个与米尼金同志工作能力并无关系的问题：是否要保持宫内一切完好，还是让它也遭受到其他一些破败不堪的公共建筑物同样的命运？如果要想保存完好，那就必须尽可能地限制它的使用，同时要尽可能地由较有文化素养和较爱护公共财物的人们来进行管理。

现将初步发现的损坏清单附后

克里姆林宫保管员 奥里明斯基

1922年12月2日

损坏清单

1. 安德列耶夫厅内，由于乐谱架从台上跌落造成圆柱大理石砌面脱落，进入会议厅的门庭大理石砌面损毁。在安德列耶夫厅的

走廊上，大理石窗台上多处因香烟头而出现锈迹。

2. 亚历山大厅内，因新闻处工人和人员不爱护，许多地方的镀金雕塑饰物脱落；部分软面家具毁坏，布套上沾了不少油迹和污垢，使用手摇油印机的桌子前后，壁柱的大理石砌面，地毯和镶木地板撒上了许多油墨和墨水。

3. 在大客厅里，桌布上有不少墨水渍，大小沙发前的桌套被靴子挂破和弄脏，所有布套都要重新洗过；圈手转椅撑脚损坏，两只椅子的靠背损坏，三个门把手损毁。

4. 客厅厕所椅背损坏。

5. 住房部餐厅的气窗玻璃破损。

6. 宫门玻璃破损。

克里姆林宫保管员 奥里明斯基

1922年12月2日

№06259

关于建立“意大利军团”的建议

(1923年5月26日)

莫斯科，1923年5月26日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是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委员，专门负责军事问题。

虽然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是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它在组织上仿佛铁板一块，而所有的革命力量似乎是分散的——但是我们的党仍然在抵抗，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组织重建，处于非法状态，然而并没有交出自己的阵地。我们国家的状况是这样的，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期待事件的有利发展，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开展积极的进攻。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仅团结我们党的队伍，不仅为吸引工人和农民的同情而工作，而且也还想要培训武装战斗队伍，以便开展进攻。当前事件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冲突。

自从我们党诞生（1921年）起，我们就建立了战斗小组，但在武装上不足以进行对法西斯的斗争。

在军事问题没有为革命政党所认真对待的地方，成立战斗小组也许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

虽然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却能够证明我们的同志们都是优秀的革命战士。意大利工人毋庸置疑地将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但是由于战斗，由于三年来不断遭到反动势力的打击，我们数量众多的同志尽管具有战斗力，也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且每天都有一些人

跟他们走。他们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国，人数大多无法统计。结果是年轻的革命力量流失了。

但是要解决监督和不断教育同志们的问题并不容易，他们大多数在流亡中过着贫困和绝望的生活。哪怕是部分地，但实际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在红军中建立意大利红色指挥部队“意大利军团”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的正式建议。

我知道，俄国人口众多，可是我确信，意大利军团是一支有道德素质的力量，无论就红军内部来说，还是对于敌对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或迟或早总会派遣敌对力量来反对俄国）来说，都符合革命的目的。

当前在俄国，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很少——大约有 30 人。他们中间某些人能够组成一个稳定的核心，我们可以围绕着他们把一部分分散在意大利国外的同志集中起来。

语言不通是个困难，但是在俄国有一位很好的同志而能够消除这个困难，这位同志从前是意大利军官——是一位组织者、教官和指挥官。这就是阿尔曼多·西尔瓦，他在俄国已经待了五个月，共产国际驻意大利全权代表推荐他进入俄国军队司令部。其他一些有才干的优秀的年轻同志可以在工作中帮助他。

俄国军队中的意大利军团的组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俄共党员，因此肯定是有纪律的，并且单独受到监督。

俄国军队的意大利军团不只是优秀的俄国军队内的一个小小核心，而且也能够并且应该是意大利革命群众军队中所不可少的优秀分子进行实践和训练的场所，在反对国内势力的起义期间，或者在对于意大利来说不可避免的外国干涉和反革命军队进攻期间都是如此。

我担心占用您的时间，因此不想展开对于本建议的论证，我向

您提出这项建议也是代表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委员会。

恳请您研究我的建议并且能够促成其实现。

您如果能够使我有机会当面谈谈我的请求，我将会很高兴。我在此向您禀报，我在俄国还要逗留不长的时间。

请原谅，我占用了您如此宝贵的时间。

致以同志的敬礼！

布鲁诺·福尔蒂基亚里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了解并赞同上述建议（这句话原文是法语）。

乌姆贝尔托·特拉齐尼

安东尼奥·格拉姆什

莫罗·斯科齐马罗

（签名皆用意大利文）

托洛茨基等俄共领导人的批语：

“送政治局。急件。传阅。托洛茨基。”

1. “建立这样一支军团从意大利革命的观点来看是适宜的。

2. 军事主管部门无论如何都不难承担此项费用。

3. 外交上的困难很大，——需要很大的伪装。1923年6月1日托洛茨基”

“我的意见是：这不会取得任何结果。流亡者如潮涌，在此基础上的斗争，不满于莫斯科的生活等等。至于外交上的困难就不必说了。季诺维也夫”

“我赞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雅罗斯拉夫斯基”

“同意季诺维也夫的意见。鲁祖塔克”

“在和平时期，实际上很难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有战斗力的部

队，况且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在国际局势上造成一系列事件。米·加里宁”

“索尔茨”

“已阅。维·莫洛托夫”

“瓦·古比雪夫”

“问题在于钱。加米涅夫”

“这不管如何诱人，但可反对的理由太多。不得不放弃。托姆斯基”

【专题说明】

俄共(布)与 1923 年的德国革命

(1923 年 7 月至 10 月)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特别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上，为此曾多次采取措施帮助甚至策动西欧国家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特别寄希望于德国，认为德国革命的条件最为成熟，而德国革命的胜利将能直接帮助俄国解决经济技术落后的问题。1923 年，有关德国革命问题曾在俄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决定把革命的日期定在 1923 年 11 月 9 日。1923 年德国爆发由台尔曼领导的汉堡起义，10 月 23～25 日达到高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德共中央取消了本应转变为武装起义的总罢工。德国革命未能成功。有关文件收藏在严格保密的档案中，于 1995 年首次公布。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吴能翻译)

№0323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拉狄克同志关于德国形势的通报》的决议
(1923 年 7 月 27 日)

绝密

1923 年 7 月 27 日

送拉狄克同志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3 年 7 月 27 日
会议记录（第 19 号）摘抄

听取：

39. 拉狄克同志
关于德国形势的通报

决议：

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一致决定，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向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发出电报之前弄清他们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的分歧，为此建议拉狄克同志与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联系一下，弄清他们的意见的准确表述。

中央书记

№0323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外交人民委员部问题（关于德国）》
的决议（附电文）

（1923年8月18日）

绝密

1923年8月18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3年8月9日
会议记录（第22号）摘抄

听取：

1. 外交人民委员部问题：（关于德国）。（斯大林同志）。

决定：

1. 向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发出以下内容的电报：政治局认为，有必要联系德国的事态对国际形势进行一次总的讨论。是否有可能前来参加几天讨论，然后再回去休假。如果同意，请通知何时到达，以便确定召开专题会议及召唤德国同志。

中央书记

电 报

密码

副本

莫斯科 国家政治保卫局 致别连基 按指定收件人通过国家

政治保卫局中央机要局发送 3771 / III 8 月 12 日

致斯大林

我认为莫斯科的会议是必要的，特别是由于从我们方面已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我可以在星期三，即 8 月 15 日出发，但最好根据治疗进程在星期六，即 8 月 18 日出发。治疗间断时间不应超过一周。

托洛茨基

8 月 11 日第 343 号。编号：57 萨姆索诺夫

密码译解：奥斯特林娜

电 报

副本

密码

莫斯科 国家政治保卫局 致别连基 按指定收件人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机要局发送 3770 / III 8 月 12 日

发自基斯洛沃茨克

致斯大林，抄送托洛茨基

我们当然要来。请与德国人联系，收到他们的回答后，请定下会议时间，但要使您关于会议时间的电报能于会前 3~4 天送达。

季诺维也夫

布哈林

1923 年 8 月 11 日。编号：58 萨姆索诺夫。

密码译解：奥斯特林娜

电 报

副本

密码

莫斯科 国家政治保卫局 致别连基 按指定收件人转发
发自基斯洛沃茨基
致斯大林、拉狄克

蔡特金和我的意见：应当请德国人来，他们的代表中必须有布
兰德勒^①、奇克列姆连、台尔曼^②。后二人必须来是因为他们同工
人的联系特别密切。当然也可以另外派遣他们想派的人。

季诺维也夫 8月12日

第59号。萨姆索诺夫
密码译解：奥斯特林娜

电 报

副本
密码
加急

基斯洛沃茨克 国家政治保卫局 ЛИИТО 萨姆索诺夫
请转告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会议定于8月21日召
开。德国人届时将来莫斯科。

斯大林 1923年8月13日

别连基 第1125号
密码电报于18时45分发出。

① 布兰德勒，亨利（1881～1967）——1919～1923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23年
要求把革命斗争限制在和平罢工的范围。1929年被开除出党。

② 台尔曼，恩斯特（1886～1944）——德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3年汉堡起义
领导人。1925年起任德共中央主席。

№03236

中央书记助理致拉狄克、李可夫、
加米涅夫和鲁祖塔克（附斯大林对
季诺维也夫提纲的意见）

（1923 年 8 月 20 日）

绝密

第 3216 / C 号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鲁祖塔克等同志

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委托，寄上他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的意见，供参阅。

中央书记助理（签名）

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意见

绝密

1. 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的提纲不应公布。应当在一定时间内禁止俄国同志在德报刊上发表自己关于德国革命的指导性文章。应当想方设法避免一切可能让人认为革命是有人从俄国“操纵”、“策动”的任何借口。必须绝对通过德国共产党和以它的名义行动。

2. 必须在提纲中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地说明，所指的是由共

共产党人夺取政权，而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应当直截以当地指出，工人政府的口号只不过是包含有统一战线的思想的鼓动性的口号，它的最终形式（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如果它万一竟能实现，那么这样的政府必定是瘫痪的和一片混乱的政府，由于软弱无力注定要在最短时期内立即垮台的政府。应当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共产党人，只能靠他们单独在德国夺取政权。

3. 提纲中正确地指出，当前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工农政府。但是，应当坚持不懈地向群众解释，这个政府不是国会的机关，而是由他们批准的，对他们负责的苏维埃的机关。地方苏维埃应当在发生第一个革命高潮时就组建起来。也许在萨克森这样的地区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应当说明，没有地方苏维埃作为其支柱和组织基础，工农政府只会是无根之木。

4. 提纲丝毫没有提到，或者极少提到，德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保持政权，以及根据哪些主要条件可以期望能够保持政权。提纲主要谈到必须和可以夺取政权。然而，保持政权目前是德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础。提纲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此。众所周知，列宁同志在号召俄国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时，把自己论据的全部重心都集中于说明“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政权”的问题上。现在，由于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一点应当以更大的力量加以强调。

5. 应当在提纲中直截了当而明确地指出，德国的工人革命意味着法国和波兰（也许还有别的国家）有可能同德国开战，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封锁德国（不让从美国运来粮食，等等），对此现在就要制定对策。提纲中这个问题含混不清。

6. 应当在提纲中清清楚楚地说明，德国发生革命和我们用食物、武器、人员等帮助德国人，这就意味着俄国将同波兰也许还有其他缓冲国爆发战争，因为，显而易见，不进行一场胜利的战争，

至少战胜波兰，我们就不仅不能运去食物，而且也不能同德国保持联系（期望德国发生工人革命时波兰会保持中立，并让我们能够从波兰走廊和立陶宛过境——这不啻是期望发生奇迹；关于拉脱维亚也应这样说；至于英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不会允许我们从海上运输的）。我已经不去说从我们方面给予革命的德国以军事支持的其他论据了。如果我们想真正帮助德国人——而我们愿意也应当予以帮助——，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作战，而且要认真和全面地作好准备，因为事情归根结蒂涉及苏维埃联邦的生存和世界革命的近期前途。提纲中对这个问题也说得含混不清。

7. 必须制订出德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具体经济纲领。

8. 其他较次要的意见以后再谈。

约·斯大林

1923 年 8 月 19 日

№0323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1923年8月22日）

绝密

第27/23号

盖有“特别卷宗”印章

中央政治局1923年8月22日会议记录（第27号）摘抄

关于国际形势

（政治局，1923年8月9日，记录第22号，第1节）

（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同志）

1. 根据中央现有的材料，特别是根据领导德国共产党的同志们的来信，中央认为，德国无产阶级正直接面临夺取政权的决战。

2. 认为不仅德共和俄共的工作，而且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都应当适应这个基本事实。

3. 据此中央责成俄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当前国际形势作出基本结论，并提交政治局批准。

4. 与此相联系，俄共当前的任务是：

（1）从政治上使共和国联盟的劳动群众对面临的事变做好准备；

(2) 动员共和国的战斗力量（特别是研究布兰德勒同志提出的问题）；

(3) 从经济上援助德国工人；

(4) 相应的外交准备。

为研究后几个问题，成立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拉狄克、契切林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负责召集。同时责成这个委员会草拟一份给各省委的秘密信件初稿和报纸宣传的提纲。

5. 委员会的所有决定须通报政治局委员，如无反对意见，即视为政治局的决定。

6. 责成书记处让中央委员了解这些决定。

中央书记

№032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记录

（1923年8月21日）

副本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讨论纪要

俄共中央政治局 1923年8月21日会议

主席：鲁祖塔克同志

出席：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

中央委员：安德烈也夫、伏罗希洛夫、皮达可夫、拉狄克。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

书记处：纳扎列强、巴扎诺夫。

契切林同志：我请求发言，通报一些实际情况，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契切林同志曾和德蒙西^①谈过话，弄清了法国各派对待德国革命问题的态度。恰恰是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对于德国革命将采取最令人反感的立场，而且坚持一旦德国爆发革命一定要占领柏林。相反，那些奉行“鲁尔”政策的敌对集团却为德国革命感到非常高兴，期望共产党人把德国彻底“搞垮”。

^① 德蒙西，安纳托里（1876~?）——1920年起为法国参议员。主张同苏联接近。

波兰的态度。佐尔曼^①（这个骗子中的骗子）的信：他认为，如果德国爆发革命，那么苏维埃共和国只会在柏林市内存在，而且在那里也支持不了很久，因为有 4 万名有组织的法西斯分子。

季诺维也夫同志：首先应当肯定，我们之间近几个月来关于德国革命问题分歧已因事态的发展而消失。现在只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德国革命有 90% 意味着战争，因此应当避免德国革命。还有另一种提法，而我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就是我在提纲中说明的那一种。对于第一种提法无法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德国发生保皇派政变的可能性太大，因而很可能随之使德国转而由国际监督，进入“奥地利”状态。剩下的只有第二种提法。

德国形势如何。库诺^②垮了台。发生的事件超过了议会危机，但还没有达到革命的程度。相当于 4 月与 7 月的中间。社会民主党状况。社会民主党出现危机是事实。社会民主党大致分成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民主法西斯分子（我指的是那些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起来的百人团）。第二部分是莱维^③一类的人，颇像我们的国际主义者^④。第三部分是过时的，僵死的，御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一部分人对谁都要妨碍，对什么都要阻挠，但将遭到所有人的打击。社会民主党的崩溃是无庸置疑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德国完全独特的经济状况使德国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处于一种完全特殊的境地，其特点是极易被极端的政治派别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在这方面必须谨慎从事。在这个问题上布兰德勒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竟把

① 佐尔曼，威廉（1881~？）——1923 年任德国内务部长。

② 库诺，威廉（1876~1933）——1922~1923 年是德国政府首脑。

③ 莱维，保尔（188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共中央成员。1921 年 2 月退出中央，4 月被开除出党。

④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派别。

争取到小资产阶级的多数作为社会革命的前提。这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际上也无法实现。不过，看来，德国共产党不会再坚持这一迷误而不醒，而且根据我们的建议德国共产党已经开始采用“民族的”语调。共产党。多数是否会跟他们走？也许。任务是艰巨的。应当看到，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要比在工会中“容易一些”。不过许多迹象表明，多数已经存在。也有差的地方（农民，等等），但总的看来，可以说德国的形势处于7月和10月之间，至少说形势相当于4月和10月之间^①是不会错的。与德国革命相联系的国际形势。当然，法国人和波兰人中将在两种观点之间展开斗争：狭隘的帝国主义观点和较为开阔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波兰人可能真的想要得到西里西亚东部，等等。如果这些派别在德国革命时占了上风，那对我们的这场角逐会有好处。但不应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基础之上。危险是巨大的。下了一笔极大的赌注。但是，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这也是使我们党振奋起来，考察自己的力量，检验自己能否取胜的一种手段。总之，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局面，而在采取各种外交行动的同时，则应使波兰后方在军事上作好准备，准备作战。时间。要在冬季以前作好准备。事情在3、4个月内就会发生。德国的形势是这样的，不存在社会民主党使情况改善的客观可能性。希法亭^②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如果让共产国际为德国任命一个财政部长，我们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因为即使他聪明绝顶，但如不采取社会革命性质的果断措施，想改善德国的财政状况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只有一个，名

① 这里提到的月份均指1917年俄国革命月份。

② 希法亭，普道夫（1877~1941）——德国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拒绝1921年德国共产党提出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统一战线策略。1923年出任德国联合政府财政部长。

声扫地和彻底破产。共产国际。首先是统一战线策略。这个策略不仅必须继续有效，它目前应当起更大的作用。至于工农政府的口号，应当说，斯大林同志是正确的，如果在政府中与社会民主党人形成联盟，这只会造成危险。我曾经说过，工农政府的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号，它历史地正在得到证实。直截了当地说“政权归苏维埃”，是不行的。第一个原因——苏维埃在第一次德国革命期间败坏了自己的声誉，群众习惯于把它们看成是清谈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饥荒，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此为口实发动的疯狂宣传：“你们看，俄国的苏维埃把事情搞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主要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别的原因迫使我们使用代号。口号和书籍一样有自己的命运。现在德国工人群众中最受欢迎的口号是“工农政府”。应当以这种情况作为出发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很有代表性。在柏林委员会的全会上，鲁特·费舍^①发言要求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予以取代。在她之后发言的布兰德勒回答说，应当继续保留工农政府的口号，但是谁愿意谁就有权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确认布兰德勒的立场。如果左派想取消“工农政府”的口号，那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有人想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反对。我建议提出“反法西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

我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必须对经济纲领、民族因素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三部分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材料是有的。

我们的决定现在对于德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没有统一的运动，他们的行动分散零碎，互不联系。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① 费舍，鲁特（1895～1961）——20年代德共领导人之一。反对统一战线。1926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

促使统一。但是，当然，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粮食、经费、加强军队、提供人员、进行领导——这些是目前德国共产党所最需要的，我们应当向他们提供这一切。

拉狄克同志：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曾经有过的分歧因事态的发展而消失了。但是，形势可能引发其他的分歧。现在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形势，以便克服这类分歧将来再产生的可能。我们在判断上可以发生分歧的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同盟国占领德国造成的威胁不是建立起反革命的后方，而是民族战争。其次，我担心的是在目前的德国继法西斯之后不是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是继共产主义之后法西斯的到来。我们不能掌握群众。或者是由党来组织斗争，或者斗争自发地、毫无秩序地发生，而我们将在斗争中被击溃。这后一种情况将导致党的溃散。显而易见，斗争是必须的，组织斗争也是必须的。对时间的判断我并不比别人更加悲观。

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俄国同德国的第一个差别。在俄国穿军大衣的农民起了巨大作用，而在德国农民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德国，将起巨大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起如同法西斯分子那样的作用）。因此，使他们中立化十分重要。因而，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不仅不应当同法西斯分子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避免冲突直到经济形势使法西斯瓦解为止。俄国和德国的第二个差别，是存在一个庞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正在崩溃。我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崩溃估计过头了。我们的优势是，共产党人的积极力量比社会民主党人的积极力量要占优势。但是，不应当忘记，社会民主党的后备力量还很庞大。正因为如此，“工农政府”的口号才有了根据，而不是说“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德国不受欢迎。我们应当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还有一个问题——德国共产党应当对凡尔赛条约持什么样的立场？防御，还是投降？（托洛茨基：“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在夺取政权之前。回答应是这

样的：我们应当作为保卫德国的政党出现。当前十分重要的还有一个拟定出过渡要求的问题，我们将据此安排在德国的宣传鼓动（例如，不能急于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国有化。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它就会把一些在社会地位上对我们很重要的阶层从我们身边推开）。为了说明波兰的立场，我还可以援引我同克诺尔“面对面”的谈话。关于这一次谈话，我已向契切林和某些政治局委员作了通报。克诺尔开诚布公地说，波兰惟一的实际政治目的是兼并东普鲁士；因而对于俄国已经形成的关于波兰动员必然应当引起俄国动员的看法表示惊诧。从历史上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在革命后的几个月内也可能有一段喘息时机。对这一点也要记住。现在我们应当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军事部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处来拟定措施。

托洛茨基同志：可惜这里没有德国同志在座，不然我想向他们提几个由德国经济形势引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将能为我们解释清楚许多情况。不过我手头有布兰德勒同志给俄共中央的信，发信日期是 7 月。是请求给将要领导德国革命的军事工作的司令部派出军事专家。很可能，这封信表达了党的路线。

斯大林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在领导；不仅俄共，而且共产国际也不行。从这个观点看，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最前面两页透露给报刊，那就会酿成极大的祸害。我认为我从报纸上获悉的事实也属此类错误，这一事实就是由工会国际提供一百万德国金马克。这是谁批准的？

至于德国的革命工人群众的情绪，说感觉到他们正处于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那么这种情绪是存在的。但是，这里产生一个准备工作的问題。对革命的混乱无序加以祝福是不行的。问題是这样——或者是使革命不受任何约束，或者组织革命。我这里有在布兰德勒手下工作的一名军事专家的报告。这名军事专家可能并没有对于事

件的宏观的政治认识，只有对公式和图纸的过分的热情（尽管也许在那里现有的组织状况下，对公式的偏爱也决不是多余的）。这名军事专家凭军人的嗅觉已经正确地感觉到了事情的军事战略方面。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在军事上软弱无力。革命会沿着不同途径发生（包括混乱无序地进行）。但是，党应当组织革命。报告直截了当地说到有可能出现军事失败的危险，因此必须考虑德国当前的形势，以及它所拥有的铁路网的有效机制，和总参谋部掌握的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军官，他们善于有效地使用这些铁路。因此，十分清楚，工人在公开发动时遭到组织严密的法西斯匪徒击溃的危险，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德国这样大。结论。德共应当规定在军事上作好准备的时间和政治鼓动上相应的进度。规定这个时间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在第八个月份存在受到挑唆和革命发生流产的巨大可能性，这比在第二个月份发生流产更加危险。这里我们该讲一讲关于左派和关于工人百人团的问题。5月15日曾有337个百人团，其中197个是混合编组的，140个是清一色由党员组成的。在第一类百人团中，共产党人大约占50%，社会民主党人占20~25%，无党派工人占25~30%。在第二类百人团中，党员占90~95%，无党派工人只是个别的。这些百人团的人数有时超过百人，经常是不足此数，平均约为80人。在混合编成的百人团中，领导权常常由共产党员掌握。我还有另外一些数据，是7月份的。7月份已经有900个百人团，其中718个是混合编成的，其余的全由党员组成。混编百人团有迅速增长的趋势。如果按平均每一个百人团有50个人计算，我们已经有了45000个将参加作战的人。他们的情绪很说明问题：他们不参加政治性群众大会，而去训练场，只要有可能，他们很乐意，而说去打击法西斯分子，他们就兴高采烈。如果所说的左派在组建混编百人团时表现了有组织的消极怠工是真的，那这是极大的危险，正是这样的危险可能酿成在第八个月

份的流产。总之，我上面谈到的军事专家的报告渗透着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到时候可能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这一报告还以军人特有的敏感提到（而且说得对），革命是最近几个月，甚至是最近几周的事。

凡尔赛和约。作为一个政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凡尔赛和约。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并不能以此收买法国，但却会吓倒德国一些我们需要的阶层，也会伤害德国工人群众的某些部分。而且，最后一点，我们何必束缚自己的手脚——谁知道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反法西斯斗争苏维埃”的口号不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法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也不正确。向法国士兵抛出“在要你们镇压德国革命时应进行反抗”的口号是个大错误。这只会导致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遭到残害，而一旦法国人占领德国，则会使法国共产党失去领导人。不能把这张王牌拱手交到法国帝国主义者手里。考虑到法国共产党的反对党立场是可以的，也应当加以利用，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这种冒险步骤是不可取的。现在应当尽量少做决定。第一，应当承认，德国革命是几个月内和几周内的事。第二、准备工作应按日程表安排，应当定出时间，并按时完成准备工作。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们联邦的存亡问题。或者是德国革命失败，我们被打倒，或者是革命获得成功，一切顺利，从而我们地位得到保障。没有别的选择。重要的是俄共的行动路线。而问题的核心是必须把我们的军事力量全力调动起来。

“工农政府”、“统一战线”口号。不能取消这些口号，它们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要向我们的共产党员亮清底牌，应当说明他们要承担起主要的重担。必须约束左派，必须向布兰德勒说清，基本的重负要由上层承担。

凡尔赛条约——在这方面正确的是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拉狄

克同志。不能提出承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最好是玩弄手法：也许承认，也许不承认（拉狄克：“我赞成这样做”），那就好。应当加进托洛茨基的修改意见。还有一个措施可以缓和局势：必须加强我们在缓冲国中的力量。应当选派这些民族的共产党员去那些国家。有一小块同德国的共同边界对我们很重要，也很必要。应当力求在某一个资产阶级缓冲国打开一个窗口，从而形成一个通往德国的走廊。到革命开始时，应准备好这步。目前还不清楚怎样做，但应当研究这个问题。

至于日程表，我怀疑它是否适用。工人们仍然相信或半信社会民主党。也许希法享有8个月就够了（布哈林：“他无事可做。”拉狄克：“也可以8个月什么也不做”）。可以规定尝试性发动的日期，不能规定决战行动的日期。

应当把俄共问题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删去。问题要分成两个：一个是涉及德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涉及我们俄共。这第二方面要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划去。自然决定不能透露出去。

契切林同志：我们近期对西欧国家的政策，是同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能不能召集一个会议，研究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例如，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打算联合捷克斯洛伐克或南斯拉夫，还是准备在那里发动起义，或者两者都进行（插话：“当然，两者都要进行”）。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阶段。这个问题要专门研究。罗马尼亚。这里存在两种方针。或者把比萨拉比亚交给罗马尼亚人，从而获得他们的友谊；或者在比萨拉比亚发动起义（这不很困难），并组织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我们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阿比西尼亚、的黎波里掀起运动。是否要在非洲建立牵制地带。殖民地工作问题之所以更加重要，之所以更加需要考虑，是因为将来去占领德国的是黑人军队。我们小心提防，但我们的机会很大。关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波兰。如

果波兰承担义务保证让粮食通过，那么能给它什么回报呢？拉脱维亚。他们害怕我们，而由于德国日益临近的事态将更加害怕我们。在这里可以利用恐吓，利用军事威胁来施加影响。爱沙尼亚的状况也是这样。同时也要考虑到法西斯的分化。建议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我国对外政策问题。

布哈林同志：我不同意某些同志对于反法西斯日的估计。我们并没有被击溃（拉狄克：“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起事”）。它还起了积极的作用。发展前景。形势的特点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前途。我们的行动路线应当是怎么样呢？把共产国际作为一种公开的组织力量抬出去吗？我以为，是的，要抬出去，而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点上是不正确的。对于工人们来说，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对小资产阶级也是重要的——如果他们知道，在德国革命后面站着苏维埃俄国——这是有利的。共产国际应当公开出面。也有人主张召开秘密会议。但是没有共产国际的公开号召是不行的，没有它对重大事件的反应是不行的，等等。

时间。规定局部发动和动员力量的时间是有利的，不应当规定决战的时间。

关于左派。不要打击他们。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要回忆一下，他们建立过多少功勋。例如，正是左派争取到柏林五金工人的联合。这是极其巨大的现实成就。至于说到过渡措施，最好集中注意力说明他们不需要做什么。提出鼓动问题很重要。应当使我们党做好准备。应当把关于德共和俄共的问题分开。

李可夫同志：十分清楚，把一切都押上了。而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当然，各种各样的外交措施——这不是主要的东西。显然，国际法西斯主义将在打垮柏林之后再摧毁莫斯科。应当设法拖延。必须通过准备工作的日程表，而不是起义的日程表，但这日程表不仅是对德国而言，也是对我们而言。关于左派。当然，应当打击他

们——如果他们妨碍正常组建工人百人团。提出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是必要的。最大的危险是仓促行事。应当一面拖延，一面准备。要在更加深刻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

日程表应予通过，同时要为争取相近的阶层而继续进行斗争。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日程表问题。应当考虑到，德共是一个不曾有过1905年革命的党，这个党也不像我们那样有过地下活动经历以及进行过有关起义技术的理论探讨。有许多人遭到过失败，害怕盲动主义，害怕革命变成为暴乱。党整个说来处于惊慌失措状态。重要的还有他们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能够进行领导的中央。那里还存在自3月份经受失败后的垂头丧气情绪。需要帮助德国共产党组织起（如果不害怕这个波格丹诺夫式的术语）自身对待面临的革命的态度。日程表的实际意义。应规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当然，时间应当是灵活的，可变的。要拟定计划的初步设想，要先同德国同志谈一谈。

不过日期还是需要的。要规定，什么时候把瞄准器对好。你们对它估计过高了。看看实际情况吧：马克贬值、居民的状况。更大的危险在于，德国革命发生过早。如果没有组织方面的工作，战斗人员会出现意志沮丧，而我们也会削弱现有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关于日程表问题。我们完全赞同制订我们的日程表。在德国则是另一回事。有些因素是无法事先预见到的。而举行发动恰恰应当赶上这类有利的因素。我们当时曾存在这样的因素：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撤出（托洛茨基：“这些因素是我们创造的。”斯大林：“是我们激起的”）。我赞成制订时间可变动的大体的日程表，而且要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发动的时间要赶上有利的因素。

关于左派。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过早地夺取工

厂等等，会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束缚左派的手脚，但不要打击他们。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要用公开发表关于援助、关于重心转移、关于德国革命等等的一般性言论来敷衍，而不应下达具体的指令。共产国际只应核准，而不是提出具体计划，不要采取主动行动，不应通过报刊而是暗地里纠正错误。

当前，外交游戏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必须换牌，对我们外交政策上的许多问题要重新审视。必须见机行事。同外交人民委员部要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关于凡尔赛条约最好避而不谈。这样可以显示出正常的民族色彩。

应当在我们国内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告诉庄稼汉，土地和自由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向他们说明，一旦吃掉德国，接着就会吃掉我们。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提出召集共产国际所属地下工作委员会开会的问题。根据目前落到它头上的那些极其重大的职能，应当对它的成员加以变动，把真正的指导共产国际政策的人员增补进去。

季诺维也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陈述的关于日程表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凡尔赛和约。这里主要的东西是德国工人群众的情绪。他们最怕战争。我国的革命是另一回事。那里的群众不同。他们那里人人读报，一切都要仔细盘算，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先掂掂分量。而他们最害怕的，我再说一遍，是战争。不能默不作声。在那里的政治舞台上不仅仅只有我们一家。不应忘记，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宣传的主要的王牌是——“共产党人正在给你们准备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应当说，我们将迫使资产阶级慷慨付钱。中心的问题是夺取政权。要到那时候再决定怎样行动。而要夺取政权，就不能在这里因避而不谈战争而让人打倒。对于斯特莱斯曼这个投降主义者和拖延危机的人，应当加以打击。但我们也不开长期支票。我们说，我们会试试予以赦免。

左派。对他们不应打击。布兰德勒曾正确地考虑到要同左派结盟，从而表现出自己是党的真正的领袖。左派拥有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柏林、汉堡等）。不应当扼杀他们，而只能控制他们。挑起旧的争论是错误的。

关于共产国际的作用。当然，如果有关我们进行领导的任何一份文件泄漏出去，那会造成很大危害，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不该拟制我的提纲——要知道必须向政治局委员们通报自己的观点，以便掌握局势。关于共产国际工作的外部表现自然不能老是画蛇添足，但是例如号召也是需要的——不然又有什么统一战线的策略呢？

有人指责我对革命的混乱无序斗争不力，说我在提纲中把这一切推诿给当地。十分显然，我们采取的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反法西斯发动不是错误。说要组织革命，这是正确的，但是对所有的革命发动袖手旁观则是极大的错误。

最后，关于我们国内的宣传鼓动工作。其内容和进度应保证做到，在2个月以后任何一个农民也不怀疑：现在已拿国家的命运押宝了，白色的德国就意味着战争。应当把群众大规模地发动起来。

然后通过决议。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提议先通过第一条，然后没有分歧地通过其余各条（见决议）。

巴扎诺夫记录。

1923年8月22~25日整理

№03239

**中央书记扬·鲁祖塔克关于国际形势
致各省委、州委、民族共和国中央、
边疆区委和中央局的密码电报**

（1923 年 8 月 28 日）

绝密

密码

第 3774 / C 号

致各省委、州委、民族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中央局

根据德国最近的事件，俄共中央决定以密码电报向党组织通报国际形势。德国无产阶级正处于同德国资产阶级进行直接战斗的前夜。以斯特莱斯曼、希法亭为首的最后一届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已无力将德国从凡尔赛和约、战争赔款和财政经济危机的桎梏下解救出来。但是，德国劳动群众的胜利将对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造成威胁。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可能导致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决心用武装手段镇压德国革命。资本主义欧洲各国政府对德国的干涉和瓜分，将使它们进而打击苏联。如果革命的德国失败，我们苏联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必须努力使德国革命的进行，无论对于德国无产阶级，还是对于我们，都只付出最少的牺牲为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制止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干涉德国的事务。我们的外交工作应当致力于防止德国革命引起国际军事冲突。我们的政策，是和平和劳动的政策。但

是，我们应当对最坏的结局作好准备。在强调和平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实际上切实地作好准备以捍卫欧洲正在成熟的革命，当敌人进犯时保卫我们共和国联盟的领土。对于中央在这方面的一切措施必须以俄共所固有的坚定性予以贯彻。

致以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书记 扬·鲁祖塔克
1923年8月28日

№0324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鲁祖塔克同志的通报》的决议
（附鲁祖塔克的建议）
（1923 年 9 月 13 日）

绝密
第 7765 / C 号

1923 年 9 月 13 日

致鲁祖塔克、李可夫、克拉辛、莫洛托夫等同志
政治局会议记录（第 35 号第 5 项）摘抄（今年 9 月 13 日）
听取：

5. 鲁祖塔克同志的通报（鲁祖塔克同志）

决定：

5.（1）基本通过鲁祖塔克同志建议；

（2）责成由鲁祖塔克、李可夫和克拉辛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予以实际贯彻；

（3）不反对在必要时让图罗夫、阿夫拉莫夫和斯塔曼尼科夫同志了解这一问题，并责成书记处了解清楚是否有可能把图罗夫同志留在柏林和他是否有可能兼顾其基本工作和与执行本决议有关的工作。

中央书记 扬·鲁祖塔克

中央的决定

(1) 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迅即向德运送 1000 万普特粮食（小麦和黑麦）。

(2) 按商易原则安排这次业务时，应保证有关部门任何时候都能办理这批面粉的法律手续。

(3) 为了执行本决议第（2）项，组建一个完全在我们控制之下并拥有法人资格的辅助公司，由它按一般原则从苏联贸易机构按现行交易所价格获得粮食。

(4) 第（4）项^①中提到的辅助公司负责处理这一批粮食，包括保存、转运、重磨和在国内销售，办理一切必要的（税赋、贷款等）辅助手续。同时，由主管机关通过特别代理人向公司下达分配和销售这批面粉的指令，并保证全部工作合法进行。

(5) 筹建辅助公司和建立该公司与相应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事务，责成尤尔根松同志负责，并允许他也吸收久鲁阿同志参加这件事。

(6) 对该辅助公司的拨款按国家补贴的办法进行，其数额、期限和条件另由专项决议予以规定。

副本由米哈伊洛娃打印。

经核对无误。（签名）

鲁祖塔克同志的建议

(1) 将 1000 万—1500 万普特粮食经由平常不经营粮食进口业务的合作社或其他机构运入德国，无疑会立即引起普遍的注意，并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第（3）项”。

导致相应的追究和调查。

（2）要运入如此大量粮食而又不引起特别的怀疑，只有通过特别组建的粮食进口公司或股份公司经办才行，其全部股份应在可靠的人士中加以分配，但其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转又与普通的贸易公司毫无不同。

（3）这家粮食进口公司将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购买粮食，为此应向其提供必要的外汇资金。粮食将在汉堡交货，再从那里转运到公司租用的仓库和磨坊（例如，在萨克森），并以面粉形式保存在上述地点或运往国内其他地点。

（4）粮食或面粉部分进入市场销售，这样整个业务就具有了正常贸易的形式，收入的款项用于再从俄国购买粮食。

（5）在实施业务运转时，应使库存备用的粮食储备量始终保持在前述 1000 万—1500 万普特的数字上。

（6）在必要的时刻，这批储备全部或其中一部分以某种合法预售或信贷契约的形式，或在公开的运行中，直接根据主管的凭单发往某一个合作社、工会或工厂委员会。

（7）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因为组建上述公开机构至少需要 2 周时间。

（8）自然，通过在当地进行调查研究和经过同地方活动家对细节进行谈判以后，这一设想可进一步完善，例如部分粮食可以以优惠信贷条件预售给某一个合作社和付款前使自己通过以运达的粮食作为抵押获得处理它们的权利。

（9）如果偏离纯粹商业业务的原则和把它委托给未经营过粮食进口贸易的单位和个人，这项业务必然要失败。

（10）采用上述方法，无论在何种政府管辖之下我们都能通过所创办的公司的机制保持对粮食的一切法定拥有权，即使在强制征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032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决议

（1923年9月21日）

特别卷宗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3年9月21日会议记录第35号

听取：

2.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政治局今年9月20日决议，会议记录第34号，第2项。）

决定：

2. (2) 为了研究军队数量问题，建立由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李可夫、斯大林、什维尔尼克、伏罗希洛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由托洛茨基召集。(3) 责成该委员会研究关于海军舰艇的建造和修理工作的问题。(4) 托洛茨基同志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2天。委员会工作结果提交全会联系国防问题一起讨论，责成委员会向政治局提交初步报告。

中央书记

№03242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形势》的
决议（附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1923 年 9 月 23 日）

绝密

中央全会会议记录第 4 号摘抄（1923 年 9 月 23 日）

听取：

1. 关于国际形势（季诺维也夫同志）

决定：

1. 按政治局专门委员会 1923 年 9 月 22 日认可的文本批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一致通过）。

中央书记 斯大林

绝密

只发到中央委员和中监委主席团委员

临近的德国革命和俄共的任务^①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中央全会和中央召开的各地党组织工

① 节选。

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923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1923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修改通过。

1. 德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及其临近

目前已经十分清楚，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完全临近——近在咫尺。德国共产党争取到了无产阶级积极部分中的多数。在最近的将来，德国共产党就能够率领整个无产阶级的多数前进。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众不同的新特色，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官员、中小职员、小商人等）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可以说，在德国革命中因经济崩溃而疲劳不堪的，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向经济深渊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将起着因战争而疲惫不堪的农民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如今，德国共产党经过相对短暂的时期已经争取到小资产阶级很大一部分阶层的支持。如今，一部分职员、小官吏等等已在参加由德国共产党举行的工厂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如今，德国共产党已经同倾向于在将到来的斗争中支持工人的一些农民阶层达成协议。德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导致曾向农民暗送秋波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如今向农民大发雷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一方面受到协约国残暴政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德国大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政策，这就使德国无产阶级在极大的程度上便于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已达到极大的规模，这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向工人们靠拢。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于工人进行反对工厂主消极怠工的斗争 [……]

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不去加快变革的速度。但是，应当知道，这样一种时刻正在来临，届时继续拖延会导致革命力量瓦解、

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和德国交由协约国帝国主义进行全面的国际监管。

斯特莱斯曼^①同彭加勒^②的妥协，就它目前能够达到的范围而言，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形势。在对资产阶级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稍事拖延。

最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事件就将在几个月之内，也许就在几周之内发生。

2. 德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能否巩固？

整个反革命阵营现在寄希望于德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无法将其长期保持，而为法西斯资产阶级打扫地盘。

德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明天的主要困难将是：

(1) 国际政治方面的困难（来自法国、捷克、波兰资产阶级方面的立即开战的威胁、英国可能进行封锁，等等）；

(2) 粮食方面的困难；德国农民中最有组织的那一部分富裕农民和地主一起，无疑会给德国的苏维埃政府制造严重的困难；

(3) 经济困难（煤炭不足，等等）；

(4) 失业；

(5) 国内的反革命（法西斯科尔尼洛夫分子），旺代地区（巴伐利亚）；反动的亲法分离主义分子；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富农分子；

(6) 极其巨大的财政困难。

尽管如此，德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保持住政权。

① 斯特莱斯曼，古斯塔夫（1878～1929）——1923年8～11月领导德国联合政府。

② 彭加勒，雷蒙（1860～1934）——曾多次出任法国总理，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1922～1924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国际帝国主义无疑将力图组成反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取得成功还是问题。国际资产阶级反对俄国革命六年的历史证明，对国际资产阶级来说，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谈何容易 [……]。

不言而喻，德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必须按最坏的打算制订自己的策略，也就是说，它必须作好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而革命战争迟早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应当努力激励起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所有潜在的革命力量，以求对德国苏维埃政府进行直接而公开的革命支援。但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就凡尔赛条约给法国政府以报偿，如果用这个代价可以换取推迟战争，从鲁尔撤走军队等等的话。

至于粮食困难，那么在这方面德国的苏维埃政府在初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方面的有力援助。

至于煤炭，那么德国在鲁尔被占领之后现在在这方面就已面临十分困难的状况。德国苏维埃政府按照一定的条件可以向法国重工业的代表提出承担（也就是说由工人政府承担）煤炭供应的费用，以便，当然，也保证苏维埃德国的利益。在情况好转时，苏维埃德国也可以向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购买煤炭 [……]

对于国内的反革命危险和财政困难，总的说来苏维埃德国可以按照苏俄的榜样予以克服。

3. 国际形势和取胜的机会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比俄国革命更大的国际意义。德国是一个工业比俄国发达的国家。德国又位于欧洲的最中心位置。现代德国的命运是同法国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德国拥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成员调动起来，就足以使欧洲所有其他部分的任何均势动摇。这正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强大

力量之所在，诚然其极大困难恰恰也在这里。

对待德国革命，苏联不可能采取当年苏俄由于自身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下和力量薄弱的原因而对待匈牙利革命或芬兰革命所采取的立场，即使它想这样做也不可能。

国际帝国主义并不把德国革命看做是孤立的小事，而恰恰是把它看作为决定整个欧洲命运的事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将作出自己的实际结论。

即使欧洲帝国主义一些最大国家的政府胆敢立即攻击德国革命并直接向苏联宣战，我们取得胜利的机会仍然很大。

法国。在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法国无疑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法国在空军和整个武器装备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如果法国竟想大规模地占领革命的德国，为此就需要有几十万士兵，而且最终它还是无法避免当年德国军队占领革命的乌克兰时所遭受到的命运。在这样的战争中，士兵的情绪毫无疑问将是决定的因素。在这场战争中，道义的优势完全在无产阶级德国及其盟友一边。

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帝国主义法国利用肢解德国投机取巧，在开始时采取观望态度；一是帝国主义法国立即向革命的德国直接宣战，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会对法国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

英国。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上已经出现了由英国海军占领波罗的海港口的建议。不过英国资产阶级中建议英国在德国革命问题上采取某种中立态度的派别，也许有相当的影响。不过，即使英国敢对无产阶级的德国实行封锁，这种封锁也不会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派出大量陆军去镇压德国革命，英国是办不到的。

波兰。德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将是波兰资产阶级。波兰资产阶级之所以将成为最凶恶的敌人，不仅因为法国帝国主义最倾向于选择波兰作为实现自己反革命目的的工具，而且也因为波兰资产阶

级预见到自己处于苏维埃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困难处境，必将因绝望而拼死挣扎。但是，不应当对战争开始后波兰内部很快就會发生的民族磨擦的意义估计不足。民族因素（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德国人、犹太人）将给波兰统治集团造成极大困难。而波兰无产阶级恰恰是在这一场战争中能最快地摆脱沉重的民族遗产，因为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将对波兰无产阶级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地理位置，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在镇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也会被调唆起来反对苏联。可以说，进行这样的图谋是万事俱备的。不过，在捷克斯洛伐克，复杂的民族关系也会使资产阶级最反对革命的部分难以统一行动。而由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奥地利已经精疲力竭，伤病在身，不可能在迫近的事态中起到重大作用。相反，取得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在奥地利引发强大的运动，从而促进同德国的统一。

反动的匈牙利自身已进入严峻的内部危机时期，这使白色匈牙利无法充当镇压德国革命或同苏维埃德国的盟友作战的积极力量。

至于谈到巴尔干国家和我们的边界缓冲国，那么对于其中胆敢听命于协约国而直接进攻我们的那些国家，我们有力量给予足够的回击。

日本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使日本人民受到很大的牺牲。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至少在几年内无法滋事生端。而世界舞台上也少了一个强盗。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方有一处是平安的。

谈到帝国主义美国，虽然它反对欧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行动很有可能，但毕竟不是眼前的事，因而也不那么可怕。

无论在国内舞台上还在国外舞台上，德国革命在苏联的援助下

是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

4. 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结盟会有何种结果？

德国同苏联结盟的主张在德国受到广泛的欢迎，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

苏维埃德国从自己诞生的最初之日起，即将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这种联盟，无论对德国还是对于苏联的劳动群众都会带来无法估量的益处。

拥有农业优势的苏联和拥有工业优势的德国结合在一起，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相互补充。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的结盟在最近期间内就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样的联盟将拥有苏维埃德国和苏联双方都获得繁荣昌盛所必需的所有经济资源。苏联的农业能从这样的联盟获得极大好处，因为我们的农村能按有利的条件获得它所必需的农业工具，肥料等等。苏维埃德国的强大工业也会得到同样重大的好处，因为可以得到大量的原料和销售市场。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危险一面将最有效地得到缓解。

苏维埃俄国同苏维埃德国结盟将会在俄国形成新经济政策的新阶段，加速和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要从根本上消灭新的资产阶级企图在我们联盟的经济中占领统治地位的趋向。1918 年的第一次德国革命，尽管本身极不彻底，又遇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站住脚跟。正在来临的德国第二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能帮助苏维埃俄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定性战场上取得彻底胜利，并进而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在全欧洲的胜利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

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结盟还能形成一个同样强大的军事基础。两个共和国共同努力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军事力量的坚强

核心，足以保证两个共和国的独立，使其免遭世界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

5. 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

在整个欧洲当前所处的形势下，特别是鉴于正在来临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的情况，提出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口号是非常及时的。

目前已经为德国劳动群众广大阶层所接受，并且正在得到其中越来越多的人赞成的德国革命的中心战斗口号是：**德国同苏联结盟**。但是，德国革命以及整个共产国际，也应当现在就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对革命在欧洲有决定意义的国家里取得胜利以后欧洲国家存在形式有什么考虑？

按照“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口号的精神进行宣传，并把这种宣传纳入应有的轨道（批评并嘲笑那种对联邦的陈腐的和平主义理解、按照共产国际宣传工人政府的口号那样进行一般的宣传，等等），会带来巨大的益处。

宣传“联邦”的口号时，我们应当与此同时认真强调说明，这个口号非但与民族自决直至自由分离的口号不相矛盾，而且还要它为前提。如果看不到一系列民族还没有经历过以建立独立的国家实体而告结束的那个发展周期，还没有满足过成立独立国家的渴望，那是错误的。我们的整个宣传应当坚持不懈地强调指出，建立联邦所依据的原则是：自决（直至分离）的绝对自由，完全自愿地参加欧洲联盟（联邦），民族真正平等、全面保证参加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小民族和极小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联邦”的口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正是转向“欧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口号的一个阶段。而由于苏联理所当然地要参加这个联盟，因而它也将是转向“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口号的一

个阶段。

6. 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正在来临的德国革命将在极大程度上加速欧洲革命的到来，也加速世界革命的到来。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口号“世界革命”，正是在现在第一次获得了生动具体的形式。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取得辉煌成就。布尔什维主义还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就在期待世界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却显得更具生命力和灵活性。至于说到世界革命的具体日期，那么布尔什维主义早就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经常发生失误。不过，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预测还是正确的。不管敌人怎么说，布尔什维主义始终坚信不渝的基本前景，现在获得了直观的和无可争辩的证实。

与此相联系，俄共的策略现在也应根据世界事态发展速度变得更快这种预计而作某些修改。[……]

8. 俄共和可能发生的新战争

毫无疑问，目前彭加勒政府，无论如何，正在准备同革命的德国作战。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免遭革命的“恐怖”，以及在德国建立一个作为彭加勒手中普通玩具的白色政府。如果是这样——而毫无疑问会是这样——那这就意味着也在准备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一旦黑暗的反革命势力在德国取胜，无疑意味着这种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取得了胜利。如果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现今英国的反革命分子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如果说寇松的最后通牒 1923 年 5 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一旦德国革命遭到镇压和在德国建立白色政权，寇松的干涉政策就可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波兰，也许是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也许是执行英法

帝国主义探测形势的专门指令，现在就拒绝承认苏联，向我们提出挑战。帝国主义者如果得以把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镇压下去，他们的下一个步骤毫无疑问将是向苏联进军 [……]

俄国苏维埃政权，特别是苏俄外交机构的十分重要的任务，是使苏联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的舆论认识到：如果由于德国革命而有人将一场新的战争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场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将是一场防御性战争。特别是，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说服农民和红军的广大阶层。毫无疑问，一切敌视我们的集团，如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等，会力图让农民和红军相信，这一场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是进攻性的，我们醉心于“赤色帝国主义”等等。如果事态的发展竟为对给我们的这类指责留下一点点口实，那么在战争中对政府的这类指责特别敏感的人民可能会发生动摇。

在当前情况下，俄共完全有可能做到，使广大劳动群众把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战争看做正义的民族战争。因为，当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并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进行“民族”战争时，这样的战争不可能不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可能不是国际主义的战争。[……]

9. 当前事件的困难和危险

如果俄共坚决反对在德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如果它无情地回击任何一种市侩“民族”分子，那么这绝不意味着，俄共不清楚当前事件中的困难和危险。相反，俄共应当清楚地知道，我国自己革命史上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为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正在日益临近。革命的冒险主义在俄共内部必定遇到严厉和无情的反对。俄共在自己新的艰难的、决定性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将以极度的严肃认真和谨慎小心的态度加以权衡。这种态度是俄共面对即将来临的国际事态所承担的巨大责任所要求的。

俄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事态发展不利，可能出现同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许甚至同土耳其等国爆发战争的危险。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事态发展于我们不利时，可能试图策划针对我们的新的直接干涉。在白俄侨民的保皇派分子中已经有人直截了当地在说“欧洲事件”将导致“欧洲”对苏俄的新的进军，而在这次进军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①和弗兰格尔^②将军接受极其重大的任务。白俄侨民的“民主”阵营目前在口头上还反对干涉，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一有真正实现这种干涉的最小的可能性，整个这个阵营，从立宪民主党人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孟什维克，都会支持这种干涉。[……]

11. 我们的宣传

引导全苏劳动群众广大阶层的舆论作好对当前事态的准备，对于我们共和国来说具有与军事技术准备和经济准备同样重大的意义。此次党的工作会议的重要任务是，就上述问题拟订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宣传计划。关于事件的性质本身，在许多方面我们党在目前发展阶段还不能公开谈论。

在这里必须强调以下内容。在我们还拥有的 2~3 个月时间内，我们应当通过宣传鼓动做到，不仅我们苏联的每一个工人，而且每一个农民都能懂得，德国革命的命运同苏联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的宣传中，特别是在对农民进行宣传时，我们不能仅仅诉诸国际主义感情，我们恰恰要从切身的经济利

① 罗曼诺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78~1929）——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孙子。在俄国的部分侨民中被看做是俄皇位继承人。

② 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78~1928）——沙俄将军，1920 年曾任白卫“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后流亡国外。

益和政治利益上来加以说明。通过宣传我们应当使每个农民知道，如果发生战争，那么一定是强加给我们的，从我们方面来说是一场防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捍卫的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本身，是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等等。每一个农民应当领会：德国革命的失败就意味着白色德国的恢复和俄国地主在白色德国、白色波兰、白色罗马尼亚等等的帮助下力求从俄国农民手中夺走土地和在俄国恢复君主制，这又将导致必须偿还沙皇的债务，大大增加税赋，恢复奴役制。而德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俄国人民来说，除了其他等等以外，则意味着更快地提高农业，更便宜地供应农业机器，等等。我们共和国联盟的每一个工人应当懂得，德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资产阶级永远也不能再在苏联昂首阔步。新经济政策的不利方面将在萌芽状态就被消除；农业的俄国和工业的德国之间将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苏联将同苏维埃德国建立联盟，这样的联盟不仅是一种极其宏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且也是解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强大因素。

12. 建立国防基金

中央全会应当通过决议，建立保卫国防和支援德国革命的基金（当然，这两方面内容都不公开）。这一项基金主要由加入我们联盟的较富裕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承担。只要作出相应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收集到可观的资金。全会应把实际执行这一措施的任务交给政治局建立的那个“德国”事务委员会。

党应当理解，面临的战斗将要求我们首先付出大量的钱财。党应当力求更加有力地节约国家财力的花费，以便首先建立这一项基金。

13. 加强红军工作

鉴于面临的事态，党应当在加强红军工作方面表现出特别的毅

力。中央全会应当责成政治局督促财政人民委员部实际支付给予军队的拨款，并向财政人民委员部重申加强对严格准时地落实军事拨款的领导。〔……〕

15. 集中力量

俄共之所以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获得胜利，首先是由于它善于集中党的所有力量和全部意志于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事项上。如果说，在以前的国内战争年代里，在一国范围内，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现在，当革命已经进入国际舞台时，就百倍千倍地更加需要这样做了。这次中央全会和全俄党的工作会议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取得对任务的绝对、完全的一致认识，集中力量，并在关键时刻竭尽全力，以求达到目的。在德国革命的战线上取得胜利，就能立即把世界革命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在这一战线上遭致失败，则可能使我们后退许多年。党应当善于使全联盟数以千百万计的劳动群众认识到时代赋予的重大责任，准备自我牺牲，坚持不懈、刚毅果断并机智巧妙地进行斗争，并以比革命最初五年内的团结一致更加坚强得多的团结一致来进行战斗。

№0324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23年10月4日）

绝密
特别卷宗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38号摘抄（1923年10月4日）

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问题

（季诺维也夫同志）

1. 批准委员会的决定。

2. 建议接受派遣的同志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主要的危险是德国共产党上层的革命方针同客观情况及工人群众的情绪不符，因而起义准备中的最为急迫和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为德共领导规定明确的时间，并按照这一时间要他们重新进行安排。

3. 在规定日期问题上同意委员会的意见——今年11月9日。^①

4. 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竭尽全力，使此日期得到遵守。

5. 批准委员会的决定，认为规定的决定性发动的时间只是意向性的，这个问题最后应由德国共产党在当地决定。有可能推迟不应成为压缩工作规模和搁置起义准备具体任务的借口。应当记住，根据事态的演变有可能不得不把开始决定性发动的时间确定在预定

^① 这就是俄共（布）政治局指定的德国武装起义的日期。

限期之前。

6. 政治局认为，派遣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去德国目前是绝对不行的。政治局认为，这也是中央全会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委员中有人对此有所怀疑，政治局应当立即征询全体中央委员的意见）。万一上述两位同志在德国被捕，就会给苏联的国际政策和德国革命本身带来无穷的危害。苏联因当前事态而面临的任务，以及组织对德国革命的积极援助，这一切都要求这两位同志留在苏联。另一方面，已经指定的一批中央委员足以保证给予德国同志以有效的帮助。

7. 派遣皮达可夫、拉狄克、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同志前去德国。

8. 向德国同志通报本决议的内容。

9. 先行决定，上述四人小组成员自今年 10 月 5 日起摆脱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责成中央书记处在今日（10 月 4 日）之内决定临时（至少下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接替四人小组成员现在从事的工作的问题。

10. 责成四人小组会同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未参加四人小组的成员讨论自己的工作方针问题，并将自己的建议报政治局批准。

11. 建议四人小组到达柏林后就吸收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参加小组工作的问题做出决定，在有可能执行必要的保密规定的情况下吸收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参加四人小组的工作，并给予他在所有会议或某些会议上的表决权。

12. 关于向德国提供粮食的问题先予搁置。

13. 把特别基金增加到 50 万金卢布。

中央书记